

# 《现代人》创办时期文学的商业化大众化状况

——从果戈理和舍维廖夫的两篇文章谈起

耿海英

(上海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44)

**摘要:**1835年舍维廖夫的《文学与商业》,1836年果戈理的《论1834和1835年杂志文学的动向》两文挑起了关于文学商业化大众化的争论。此时创办的《现代人》也被裹挟在20—30年代俄国这股文学商业化的浪潮中。舍维廖夫抨击文学的商业化倾向,果戈理认为问题不在于文学是否商业化,而在于文学是否具有内在品质。具有贵族性的《现代人》因曲高和寡而面临生存的困境。普希金并不简单否定文学的商业化大众化,但他也坚持杂志的思想高度与艺术价值。

**关键词:**果戈理;舍维廖夫;普希金;商业化;大众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01-11

## 一、果戈理《论1834和1835年杂志文学的动向》

根据我们此前发表的研究文章可以得知,1830年代初登文坛的果戈理经普列特尼约夫引荐与普希金相识。他在普希金1836年创办的《现代人》第一期上发表的《论1834和1835年杂志文学的动向》(以下简称《动向》)<sup>①</sup>,也许因为是其早期文章,一直没有得到果戈理研究者的注意。实际上这篇文章观察精准,文笔犀利,对当时文学界的研判,用普希金的话说“因它公正的立论而引起普遍的注意”,“文中机智尖锐而坦率地阐述了许多公正的见解”<sup>[1]322</sup>;别林斯基则评价他“所有论断不仅辛辣、尖锐和巧妙,并且甚至是不偏不倚和公正无私的”<sup>[2]</sup>。甚至,该文因为匿名而被误认为是普希金所作,代表了普希金《现代人》的办刊宗旨,并且因文章指向明确的批评而给刚创办的《现代人》招徕普遍的围攻。

那么文章究竟是什么内容引来如此激烈的反应?笔者认为,从该文中我们不仅可以一窥俄国新闻出版业兴起的商业化大众化状况,同样可以观察

到19世纪初期俄国文学商业化大众化的表征。正是文章对当时流行刊物上文学的商业化与大众化的尖锐分析与抨击,遭到了来自资本力量的围攻。

首先需要阐明的是,果戈理文章题目中“杂志文学”一词,具有更宽泛的意义,他谈“杂志上的文学”的动向,实际上也谈当时的刊物出版及其内容,这些内容并不限于今天我们狭义的“文学”概念,它包含了各种体裁和各个领域的题材,而且他将这些“刊物及其内容”视为那个时代声音的“忠实代表”;果戈理还强调,杂志给出了现成的评判,引起无数人阅读与谈论。我们需要在这个语义中理解其整篇文章的内容。

果戈理开篇就指出,当时的“杂志文学”支配着大众的趣味,它引导和撬动着几乎所有图书的出版,囊括了百分之九十的文学创作(剩下的百分之十是与“杂志文学”相对的“图书文学”——以图书形式面世的文学作品)。他之所以开篇就点明这一点,是为后文埋下伏笔:“杂志文学”对公众影响如此之大,那么现时流行的刊物上的“文学”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文学呢?

收稿日期:2020-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与翻译30余年。

按照果戈理的观察,这一时期读者数量显著增加,读者对阅读的需求明显提高。可是近两年除了《读者文库》(1834)和《莫斯科观察家》(1835),没有新杂志出现,许多老杂志不是停刊,就是少气无力、平淡无奇:《莫斯科电讯》早已丧失了尖锐音调,从前它凭借这一点获得“与彼得堡杂志论战的杂志”<sup>[3]157</sup>的地位;《望远镜头》最近则变得没有任何新鲜性和紧迫性内容。那么新出的《读者文库》又怎么样呢?果戈理的文章最主要的就是针对《读者文库》。

果戈理认为,在出版界,出版商、书商斯米尔金勤勉进取,操持创办了一份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式的杂志《读者文库》<sup>②</sup>,“他争取所有文人,不论他们在俄罗斯有多少,都使他们参与到自己的企业中”<sup>[3]158</sup>。可是,令果戈理遗憾的是,斯米尔金挑选杂志主编“做得不谨慎了”<sup>[3]157</sup>——由阿拉伯文学教授先科夫斯基主持杂志,格列奇挂名。在我们已有的研究文献中都称,先科夫斯基几乎把杂志变成了他一个人的刊物。事实上,果戈理批评的也正是这一点:“公众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杂志中只有一个人的声调、见解和思想占统治地位,而那些占满卷首半页的闪闪发光的作家名字只是租赁来的,为了吸引更多订户。”<sup>[3]158</sup>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果戈理发现:“在《读者文库》中有一种在俄罗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的主持人要修改和重编几乎所有登载的文章,有趣的是他自己相当勇敢而且坦率承认这一点,他说:‘我们的《读者文库》同其他杂志不一样:任何作品我们都不会保留它的原样,都加以改写,有时两篇合一,有时三篇合一,由于我们的改写文章都大大改善了。’这样奇怪的监护迄今俄国还没有过。”<sup>[3]153</sup>这样一来,许多优秀作者担心读者误认为那些没有署名或使用笔名的文章是自己所作,便开始拒绝投稿,结果杂志上的文章变得更差。按照果戈理的话说,这就是他首先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即“杂志是否应该有一个特定的基调、见解,还是成为杂乱无章的意见和见解的堆放地?”<sup>[3]158</sup>显然,先科夫斯基全权代表了所有作者的意见,“施展得完全像个主人”<sup>[3]159</sup>一样。

然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意见呢?“这个杂志编辑部的目标是怎样的,他要解决什么任务?……在规划中先科夫斯基一点也没有谈到。”<sup>[3]159</sup>结果,果戈理读了《读者文库》所有刊载的文章,考察他所有说过的话,惊讶于先科夫斯基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确定的信念和感情,他“今天喜欢的,明天就成了

他嘲笑的对象”<sup>[3]161</sup>。“他从来不关心自己说了什么,在下一篇文章中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之前所写的东西了。”<sup>[3]161</sup>这也难怪,先科夫斯基在杂志中有很多身份要不断转换:他是勃拉姆别乌斯,莫罗佐夫、秋琼德如—奥格鲁、阿·别尔金,他是批评家、叙述者、学者、讽刺作家、新消息的喉舌等等。这是当然的,因为他要“照顾”各类文章,让它们经过他的修改后“大有起色”。最后,不要忘记,他还是——先科夫斯基,一位学者——阿拉伯文学教授。那么他自己的学术又是怎么样的呢?

先科夫斯基刊登了自己的一篇长长的关于古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作品的学术文章。果戈理发现:“它充满假设,不是自己的而是从草草读过的种种书籍中胡乱捡来的假设——根本不属于俄国历史的假设”,他却“将这一民间作品作为俄国历史的基石,而没有举出任何经过评判检验的证据。”<sup>[3]160</sup>果戈理指出,他根本没有指出古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作品的真正价值,却饰以各种花里胡哨的修辞,令那些善良却没有见识的人喜欢。

当然,先科夫斯基还是位东方学学者。东方课题是他真正重要的追求和真正的谈资。“在这里他总是抬高嗓门”,一旦别人在文章中、甚至在诗歌里提到了东方,他就发怒并论断,那人什么也不懂,“无能力、也不应当评论东方”。可是,果戈理指出,在他的文章中同样“没有说出任何新东西,没有任何鲜明特征、强有力的思想、天才的推论!不能说先科夫斯基先生没有掌握材料,相反很明显,他读得很多;但在他那里,一点也看不到能够引导他走向某种结论的推动的主导的力量。在他那里,所有这些材料处在晃动中,彼此抵触,不能共处”<sup>[3]160-161</sup>。

那么,他对文学有什么见解呢?同样,“先科夫斯基在批评中表现出缺少任何见解,以至于大概没有一位读者可以说出,这位评论家更喜欢什么,什么占据他的心灵,什么符合他的情感”<sup>[3]161</sup>。果戈理特别用斜体字标出:“在他的评论中既没有他肯定的品味,也没有他否定的品味——完全没有品味。”<sup>[3]161</sup>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喜欢的,明天就成为他嘲笑的”<sup>[3]161</sup>。他可以将库克尔尼克先生<sup>③</sup>与歌德相提并论,并声称,他这样做,只是他忽然这样想到;他可以称历史小说家沃·司各特冒充内行,他这样做,倒不是有什么企图,只是随口就说了而已。果戈理还指出,在他的评论中,从来不分析作品的内在特征,不能确定作品真正成就何在。要么就是绝对的赞扬,并对自己的词句沾沾自喜;要么就是辱骂,其中是可怕的残酷无情;至于评论,只是限于鸡

零狗碎地摘录三两句原文加以嘲笑。他最经常分析的是各种文学糟粕、各式各样空洞的书籍,对它们开玩笑,加以戏弄,并表现出读者喜欢的机智,以此博得读者欢心。

至于他以勃拉姆别乌斯署名的自己的作品,因过分模仿法国文学而令读者惊讶不已,因为他此前公开抨击所有当前的法国文学。他称自己的文学为幻想文学,果戈理认为这令人匪夷所思,因为真正的幻想文学并不缺少真理、自然和可靠性。“勃拉姆别乌斯的幻想作品令人想起那些曾大量涌现的书籍,如《不喜欢——就别听,但别打扰我撒谎》诸如此类,同样没有头绪,对论证某种思想更是没有追求。……作品中是从多处仓促剽窃来的东西,作者很少关心它们的联系。”<sup>[3]162</sup>

杂志中的其他内容是这样的:来自外国杂志的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的译文,名副其实的杂志栏目“大杂烩”中各种各样的新鲜消息,至于那些不加选择的原创和翻译作品则毫无趣味,当然还能见到俄国诗坛“明星”<sup>④</sup>们的名字。

果戈理对《读者文库》的分析整个是掩饰不住的揶揄和嘲笑的声调,但绝不止于揶揄和嘲笑。他之所以如此详细分析《读者文库》的内容,就在于他忧心忡忡于这样一种情形:靠斯米尔金的资金运作起来的杂志效益不会坏到哪里去,其大体量的厚厚的一本,令读者高兴,特别是对城市居民和乡下地主来说,如获至宝。“他一人在《读者文库》中起决定性影响,而他的见解随同四千多份杂志一起,在俄罗斯大地上迅速传播。”<sup>[3]162</sup> 尽管由于其品质之低劣,缺乏优秀作者,渐渐在京城读者在减少,可是在外省仍有众多读者,“它的见解同样迅速流传”<sup>[3]162</sup>。

可以看出,果戈理对《读者文库》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评价。由于主编先科夫斯基总是擅自修改作者来稿,且自己没有特定的见解,使得《读者文库》成了杂乱无章的见解的堆放地。他的学术文章是各种“书籍中胡乱捡来的假设”的拼凑,“材料处在晃荡中,彼此抵触”,毫无逻辑与思想,却以虚华的修辞抢夺毫无见识的读者的眼球。而他的文学批评不是“忽然想到”,就是“随口说说”,以浅薄的机智博得读者欢心。他的文学作品或是“过分模仿法国文学”,或是“从多处仓促剽窃来的东西”。而《读者文库》别的栏目:不是猎奇的译文,就是名副其实的“大杂烩”,或是毫无趣味的原创和翻译作品,以及诗坛“新秀”“明星”的应时之作。可是,就是这样一份靠斯米尔金雄厚的资金运作起来的杂志,发行量却是最大,体量肥厚,令人联想到麦当劳的多层汉

堡,对于城市居民特别是外省读者来说是大快朵颐的快餐,而它廉价的见解也随之在俄罗斯大地上迅速传播。

除了《读者文库》,其他刊物情况如何呢?

《北方蜜蜂》<sup>⑤</sup>发表官方消息,在这一方面它尽职尽责。主编格列奇按时按点出版,刊登政治消息和国内外新闻。可是从文学角度来讲,它同样没有自己的调子,“没有强有力的人物,推动其显出自己的见解。它只是一只筐,谁想装什么就装什么”<sup>[3]161</sup>。作者是一些形形色色的陌生人,用各种各样的字母署名隐藏自己——无疑是一些年轻人初试笔锋,机智却彼此雷同地挖苦嘲讽什么。书评总是由友人或作者自己撰写,总是善意地吹捧,或在结尾来上这么一句——“但愿尊敬的作者能修改自己一些语言和拼写错误”,或“一本好书需要友好的出版社”<sup>[3]164</sup>之类无关痛痒的话。书评人往往是关于首都新开工的烟草工厂或关于化妆品等消息的写手,这些消息写得俏皮,玩笑中显出精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理由令工厂主满意。果戈理解嘲地说:“不过对于《北方蜜蜂》不能要求更多了:它每日的广告总是准确无误,它的事业是吸引大众。”<sup>[3]164</sup>《北方蜜蜂》广告写手的创作与文评,更显现着这一时期文学的商业化、大众化,无异于今天众多的文学类公众号。

另一杂志是《祖国之子和北方档案》<sup>⑥</sup>。其封面上刊登庞大的罕见的规划:《祖国之子》将包含考古学、医学、法学、统计学、俄罗斯历史、世界通史、俄罗斯语文学、外国语文学,还有普通语文学、地理学、民族学、历史画廊等。果戈理调侃说:“读罢这令人恐怖的规划,有人一定会哎哟大叫一声,想这是迄今世界上有过的最大规模的百科全书式的杂志吧。”<sup>[3]164</sup>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刊行出来只是可怜的薄薄的三个印张的小册子。头一篇是关于某种疾病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连医生都不会去读。常常没有什么评论文章,更不要提什么好的当代性强的文章了。时政消息是些从《北方蜜蜂》上拿来的大家早已知道的枯燥的事实。刊登的中篇相当奇怪,短得很,平淡乏味得很。偶尔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结果也没有人注意”<sup>[3]164-165</sup>。他的读者和订阅人是“外省可敬的老年人,他们需要读点东西,正如午饭后需要睡个把小时,或一周需要刮两次胡子”<sup>[3]165</sup>。

彼得堡还有份纯文学报纸《残疾人报文学增刊》,这是多少得到果戈理肯定的一份报纸。它“拥有特殊的个性”,刊登的是些轻松的叙事文:乡下地主的文学谈话。这些谈话往往是非常普通的,但有

的地方却相当尖刻,近乎真理。读者可以惊奇地发现,到了文章末尾,地主几乎变成了地道的文人,十分关切当前的文学,以尖刻的嘲笑来加强自己的观点。该报的策略往往是摘引对手的某个段落,附上不超过一行的相当辛辣的评语,最后加上一个感叹号。主编沃耶伊科夫先生<sup>⑦</sup>就像个猎人一样,不慌不忙地等待着自己的猎物。果戈理认为:“在主编那里可以看到纯粹的文学生活,他孜孜不倦地关注着报刊界。虽然不知道他是否有很多读者,但报纸是非常值得偶尔翻阅的。”<sup>[3]165</sup>而莫斯科唯一的杂志《望远镜》,在果戈理看来,“最初反应敏锐,但很快就冷淡起来,充斥着不加选择的文章,没有任何文学活动。看来出版者没有用心经营它,只是随便出出”<sup>[3]165</sup>。

由此看来,《读者文库》占据垄断地位。《祖国之子》和《北方蜜蜂》的主编格列奇是《读者文库》的挂名主编。因而,果戈理分析说,《北方蜜蜂》势必赞扬《读者文库》中刊登的一切,《祖国之子》只会重复《北方蜜蜂》的话,因而两者都构不成《读者文库》的对手。唯有《残疾人报文学增刊》和《望远镜》能够站出来反对《读者文库》。沃耶伊科夫先生确乎表现出某种类似反对派的立场,但他的杂志只是对对手的疏漏进行间断的话语不多的短评,有时是用巧妙的俏皮话,或是用少数文学家明白而外行人不易察觉的嘲笑;缺少有分量的大部头批评文章。《望远镜》虽有反对《读者文库》的行动,但在果戈理看来,“行动软弱,缺乏耐心和必要的冷静,缺乏连续性”<sup>[3]166</sup>;虽然常常愤慨,但往往切不中要害,加之出版的延误和印刷的草率而损害了自己影响力的传播。

精明的书商、雄厚的资金和庞大的作者群——这一商业运作使得《读者文库》成为一份广泛传播的大众读物,与之相比,《残疾人报文学增刊》和《望远镜》远非势均力敌。《读者文库》近五千份的订阅量所传播到的读者群,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残疾人报文学增刊》和《望远镜》的存在。而《读者文库》主编一人之声的见解,以他的各种笔名发表,同时被热情赞扬,这对大部分公众具有了影响力,被那些朴素的读者当作真理来接受。读者的认可又成为《读者文库》发行量的强大支撑。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大致形成了以彼得堡的《读者文库》《北方蜜蜂》《祖国之子》三种杂志为基本格局的信息传播渠道,满足大众对各种体裁与资讯的基本需求,对大众是低水平文学教养的影响,甚至谈不上文学教养。然而它们不是拥有颇具规模的

资金,就是具有官方背景和资源,从而掌握了信息传播、舆论导向与阅读趣味的主导权。

对于这种垄断状况,莫斯科的一批文化人决定出版自己的刊物,它不是为大众读者所需,而是为拒绝在《读者文库》上发表被修改文章的作者,也为想要发表自己批评见解的作者——因为《读者文库》不接受任何不符合主编口味的批评文章,这就是《莫斯科观察家》(1835—1839)。然而,在果戈理看来,这份新面世的杂志并不成功,主要原因是:主编是文学圈名不见经传的统计学学者、业余诗人安德罗索夫<sup>⑧</sup>,缺少引领杂志的强有力的人物,杂志没有自己明确的追求和目标。虽然也发表了一些诗歌珍品,但刊物缺乏多样性;好文章如沙漠中的绿洲般稀有,即便有,也因为连载、待续而令读者不耐烦。虽有舍维廖夫针对《读者文库》的批评文章,抨击文学事业的商业化,但却没有击中要害;另一篇揭露勃拉姆别乌斯沽名钓誉、剽窃他人创作之后,就再不敢发声了。

除了对具体杂志的分析,果戈理在文中还整体分析了杂志上文学批评的种种令人惊讶的现象:

①文学批评不关注重大问题,议题琐碎,思想无聊,热衷于毫无意义的争论,热衷于谈论自己,谈论自己亲近和喜爱的东西,在自己的杂志中自吹自擂,而对别人的东西无视与冷漠,或对自己仇恨的作家作品漫无节制地指责,发泄愤恨,满足一时之快。

②文学批评缺乏纯粹美的鉴赏和品味,把精力放在一系列无聊的书上,对大部分书籍的书评是不加分析、不加区分地虚夸,而且根本不是为分析,而是为迫使读者一笑;相当浅薄地把所评作品看得高过拜伦、歌德。

③文学批评不是真情的流露、真正理解的表达和深深的心悦诚服,而是故弄玄虚,奇巧华丽的文体外表,散发着酷寒的冷气。

④没有批评家把批评当成严肃的事业,以恭敬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对伟大而卓越的事物视而不见,没有人回应同时代文学界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文学现象与问题:如司各特的去世及其创作;当代法国文学;因政治运动而在整个欧洲文学中出现,也在俄国文学中反映出来的令整个欧洲激荡的新的文学趣味与作品;散文取代诗歌,开始流行阅读小说,诗歌阅读与出版趋于冷淡的现象;俄罗斯读者是怎样的、处在什么样的教育水平,俄国作家的独创性又在哪儿等问题。

⑤文学批评对祖国文学无知、无历史感,在现今的刊物上见不到杰尔查文、罗蒙诺索夫、波格丹诺维

奇、巴丘什科夫等先贤的名字;对杰尔查文、卡拉姆辛作品新版本的面世毫无反应,无视他们依然还在的影响,没有他们与现今时代的比较;时代被从根部砍断了,过去的历史好像并不存在,好像俄国文学根本没有开端。

这些严肃问题在杂志的文学批评中的阙如,正是大众文学流行的反证,没有人关心严肃的文学问题。同时,1830年代出现的散文逐渐取代诗歌的现象,小说阅读成为流行,且其中很水的小说居多,也是大众文学勃兴的迹象,果戈理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这一点并不因为几位新诗人的出现而改变,相反,几位新诗人的诗作也是大众化的生产模式。

果戈理所描述的《现代人》面世前两年俄国刊物的这些基本状况,也是俄国1830年代俄国文学的主流形式——商业化潮流之下流行的“大众文学”的面貌,它们满足的是低水平的大众化的信息需求和文学阅读需求。《现代人》正诞生于这种大潮之中。

## 二、舍维廖夫的《文学与商业》

无独有偶。如果说,我们透过果戈理一文可以看到俄国文学的商业化与大众化现象,那么上文中果戈理所指的舍维廖夫针对《读者文库》的批评文章,即《文学与商业》一文,则是专门对俄国文学的商业化和大众化这一现象给予了敏锐的观察与分析,并加以激烈抨击。尽管果戈理认为舍维廖夫的文章没有击中要害,但是,这仅在于果戈理认为,舍维廖夫不应该指责文学的商业化,而应该在商业化之下如何提供高质量作品。作品的高下与商业化无关。果戈理讲的是另一个问题,与我们这里探寻俄国文学的商业化、大众现象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仅就对商业化、大众化这一现象来讲,舍维廖夫的文章要鲜明得多。

1835年以舍维廖夫为主编创办了杂志《莫斯科观察家》。作为刊物的主要批评家,舍维廖夫在第一期上的文章《文学与商业》成了新杂志的宣言,矛头首先指向《读者文库》及其主编先科夫斯基。该文严厉批驳了“商业”倾向,怒斥在杂志和作家中的道德堕落。

一般认为,正是先科夫斯基奠定了俄国“文学产业化”的基础,正如当时人们所言,他第一个实行了按页付酬,有意识地捍卫文学转化为文学家“自己的面包”。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中写道:“先科夫斯基创办自己的杂志,是作为商业企业来创办的。整个俄国贪婪地阅读它。”<sup>[4]</sup>埃亨鲍姆在文章《文学的日常生活》中也指出,“1830

年代初文学创作普遍职业化”,“杂志作为一个文学现象获得了新的意义”,出现了“新的、此前不具备的文学生活条件:读者圈子在宫廷和贵族之外扩展,一批特殊的职业化出版人(如斯米尔金)书商出现,出版物从具有‘爱好者’特征的文集向商业类型的期刊(先科夫斯基的《读者文库》)转变。与此相关,围绕作家职业化和‘我们新文学的商业化倾向’(舍维廖夫的著名文章《文学与商业》,其中讲的,用我们今天的术语说,就是关于‘订货’和‘挣外快’)的激烈争论获得了文学史意义”<sup>[5]</sup><sup>434</sup>。这里埃亨鲍姆还引用普希金给巴兰特信中的话——“文学在我们这里成为一个重要产业仅仅是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情,在此之前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优雅的贵族的事情”,“与这种‘产业化’同步,30年代作家走出了先前‘依附于政权的阶层’的状态,而职业化了”<sup>[5]</sup><sup>434</sup>。可以看出,先科夫斯基、《读者文库》、舍维廖夫、《文学与商业》,成为30年代俄国文学的商业化、作家职业化的核心词。

舍维廖夫一反人们对当代文学的高大上看法,从最低的物质视角切入,认为如果观察当代文学,首先遭遇的“就是一年十二次闯入我们视线的《读者文库》”<sup>[6]</sup>;《读者文库》代表了俄国文学的日常生活,那里几乎就是现今整个写作圈子,它是俄国文学巨大的脉搏,按照这一脉搏的运动就可以判断文学是否健康。<sup>[6]</sup>

那么,这一脉象如何?舍维廖夫发现,它并非某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也没有提供某种品味的典范从而引领审美教育,“《读者文库》的各式文章只不过是—沓钞票”,“那些杂志就是些资本家。《读者文库》对于我来说拥有5000个‘订户农奴’,《北方蜜蜂》也许是它的两倍”。“而那些‘订户农奴’比那些代役租农民还忠诚得多,他们从来不拖欠税款”。“我们的文学是个肥缺,可以请客,可以住宫殿,可以走在地毯上,可以坐轿式马车,可以坐上过漆的雪橇,可以裹上熊皮袄,穿海狸皮领子大衣,在拍卖场高声叫拍,可以购买领地……我们的文学如果不是金子的也是最肥的世纪到来了。我们等到了那个最幸福的时光:我们的文章被认为是最可靠的银行支票,我们的文学有了自己的交易所,这里又脏又皱的银票立马就可以与干净的可以带来一切的印张兑换。”<sup>[6]</sup>

接着,舍维廖夫尖锐地指出,新的主流的文学形式——中篇小说——产生的动力,并非是要力图表达民众、表达时代、表达人类生活,而是因为它们更畅销。不仅作品的主流形式,就是作品本身的文

体特点、艺术思想,也可以轻易从物质的观点得到解释。“当代文体为什么充满修饰语和动词?为什么可以用一个词可以说的,作家们要用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就足够了,却要拉成长长的一段,一段要变成密密麻麻的一页,一页要弄成一个巨大的印张?”<sup>[6]</sup>“秘密就在于一个印张的价格是200卢布或300卢布,他的文章中的每一个修饰语也许就值一个银锭;每个句子就是一卢布,每一段就是一张蓝钞票或红钞票。”<sup>⑨[6]</sup>这样,作者不再珍惜每一个词,因为每一个词构成的不是段落而是钞票;作者不再舍得勾掉他所写的每一页,尽管自己不满意,他会让读者勾掉,只要读者愿意。<sup>[6]</sup>“因此,我们文体的饶舌,无尽的同义叠用,不润色加工的粗陋段落,罗列一系列名词、形容词、动词的同义词,所有这些控制了我们的文学的速记法特征是有自己的源头的,也就是,现在每一个词就是钱——文体越是臃肿,就越是有利可图。由于这样的文体,文章越来越长,书籍越来越厚。”<sup>[6]</sup>从舍维廖夫的分析中,我们是否可以重新看待19世纪俄国文学某种冗长、重复、饶舌的特点呢,甚至包括一些现在所谓的经典?

舍维廖夫得出结论说:“商业现在操控了我们的文学,一切屈从于它的计算,一切文艺作品都被用来作商业交换,行市决定了思想和形式!我们诗人的灵感不作声了。”<sup>[6]</sup>“文学家称号在我们里不只是荣誉称号,还是有利可图的称号。现在文学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了。文学家已经是资本家了,智力资本……一句话,我们这里文学家获得了财产,他因自己的劳动而被慷慨地奖赏……”<sup>[6]</sup>但是,“文学高贵的任务在于,使自己的成就——劳作时鼓舞着自己的东西——不仅符合而且从属于社会道德成就,使自己暂时的荣誉不是建立在有伤风化的思想、道德情感和社会趣味上。可是,文学投机者不考虑这些,他需要的只是与印刷厂和图书销售商结算的销售利润的成就”<sup>[6]</sup>。舍维廖夫最后愤懑却又不无自我安慰地说:“在文学商业化倾向的最初时期这些投机者总是很多,而且总是活跃在前台。但是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这些堕落实际上只是暂时的,是我们文学与商业的最初结合不可避免的现象。”<sup>[6]</sup>

就舍维廖夫的文章,别林斯基在1836年第5期《望远镜》上发表《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文学与批评见解》予以回应。他认为,现在文学家靠自己的劳动富裕了,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不再嫉妒只有显赫的出身才能带来的富足生活,这令人高兴。舍维廖夫那些“文学是个肥缺”之类的话太言过其实了,他

在自己高尚的愤怒中走得太远了;他的文章真实地反映了当代文学现状,但没有正确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sup>[7]261-264</sup>

果戈理的《动向》一文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别林斯基的观点<sup>⑩</sup>,他认为,舍维廖夫文章的主要失误在于没有找准问题。他抨击那些为赚钱而写作的人,但丝毫没有从作品的内在价值出发,揭示问题的实质。问题并不在于“商业倾向”,“这些抨击并不公正,因为矛头指向了一个在任何活动中都必须遵循的不容争辩的规律。文学应该成为商业现象”<sup>[3]168</sup>,只是应该“从作品内在价值的角度”判断作者和出版物的作用,“而不是去计算他们的利润”<sup>[3]168</sup>。果戈理的文章又得到别林斯基如本文开头所引的高度评价。巴纳耶夫也回忆道,果戈理的文章“在文学界造成了极大的喧嚣”<sup>[8]172</sup>。

可以看出,文学的商业化问题已经成为文学界论争的重要问题之一。普希金刚创办的《现代人》也被这一浪潮所裹挟;普希金及《现代人》同样陷入商业困境之中。

从笔者已写的《现代人》研究中可知,普希金将自己的《现代人》办成了除文学外具有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和教育内容的刊物,这样,在内容的品质与品味上自然也就更为有教养,更为精英化,更加关注与思考重大社会问题,所以,普希金认为,如果说论争,更为恰当的对象不是《读者文库》,而是布尔加林和格列奇的半官方出版物。他强调刊物在形成社会舆论和科学、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可是这样一来,必然影响到刊物的传播与经济效益。因而,《现代人》并没有带来普希金所预计的经济收益,也没有成为一个“大众”刊物。为了清偿债务,包括因办《现代人》产生的债务,普希金于1836年8月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款。克拉耶夫斯基、奥多耶夫斯基(他们曾与普列特尼约夫一起帮助普希金筹办第2—4期)建议普希金改组《现代人》——1837年出12期;普希金担当文学部分,每期至少刊登自己的一篇散文或诗歌或文章;由奥多耶夫斯基和克拉耶夫斯基承担科学板块,以及杂志的一切技术性事务(排版、印刷、校对等),出版的利润(扣除印刷、纸张、书商报酬的费用)在他们三人间平均分配。接受这个条件,就意味着普希金不再是《现代人》的全权主人,于是他拒绝了。由此可见,当时普希金的艰难处境,不只是办刊内容上——是更通俗还是坚持贵族性,与杂志内部维亚泽姆斯基等人有分歧,还包括经营状况。

《现代人》的商业困境,一个原因是因为其本身

曲高和寡,也就是因它的“贵族倾向”,或说“贵族派头”,不能拥有更多的读者。普希金也曾试图改变此状况,希望拥有更多的读者,但也不愿使杂志走到布尔加林之类平庸低俗的地步;可是毕竟他还是希望扩大读者面,因而在《现代人》内部产生分歧:老合作者维亚泽姆斯基、克拉耶夫斯基和奥多耶夫斯基不同意普希金的一些意图(如将《现代人》办成比较平和的科普—文学杂志),而坚持刊物主要体现正统与贵族精神。这些老朋友都是他的主力撰稿人,他无法与他们切割。另一个原因,应该与大出版商、销售商斯米尔金以及布尔加林和格列奇的商业与政治围堵有关。别林斯基曾说:“在莫斯科,无论花多少钱也难买到一份《现代人》;尽管要求殷切,公众急不可耐,送到莫斯科的却还是寥寥可数的几份。真是咄咄怪事!”<sup>[9]405</sup>原因是,“凡不是斯米尔金君所出版、虽然由他经销的,凡不是格列奇和布尔加林二君所著或庇护的彼得堡的书籍,几乎经常发生这种情况。果戈理君的新作《钦差大臣》也发生过这种情况”<sup>[9]405</sup>。这暗示着当时最大的图书商斯米尔金在销售环节上对《现代人》的限制,也就是不积极销售《现代人》;以及格列奇和布尔加林对《现代人》的阻挠。别林斯基推断:“照公众迫不及待地盼望读它的情况判断,它在莫斯科似乎一天就能销售完一千本……”<sup>[9]405</sup>这虽是别林斯基的推断,但也可以说是普希金的《现代人》遭遇商业困境的原因之一。莫斯科很难买到《现代人》,更不要说外省了。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即《现代人》的诞生多少应是有些生不逢时。正如前文所讲,1830年代俄国读者群体不断扩大,出现了未曾有过的文学类型的读者——即所谓的大众文学的读者,他们要求文学符合他们的美学接受力而贴近他们;“在社会中已经可以隐约和模糊地感到一种对新话语的需求,显露出期待文学降下它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孤傲的高度而参与到社会生活中。”<sup>[8]173</sup>文学面临着争取新读者群的任务。这种争取是可能的,只要它服从读者的意志,猜透他们的渴望和期待,甚至是读者自己也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在实现这一任务,争取到读者的同时,文学就可以变成有利可图的一种产业。富有经验的文学活动家书商和出版人斯米尔金具有无可怀疑的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文学界的这一变化,创办了《读者文库》,他宣称其杂志没有文学纲领,唯一的目的是满足读者的“公共利益”。这是一份经过很好地组织、深思熟虑的商业企业的杂志,按照印张付给作者稿酬,并且非常准时地出版。该杂

志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当时批评家就命名这个时代为“斯米尔金时期”(别林斯基在其著名的《文学的幻想》中这样命名<sup>⑩</sup>),或俄国文学的“商业倾向”时期(即前述舍维廖夫的《文学与商业》一文中这样界定)。这样作者就不是仅有脆弱的荣誉了,还可以得到稳固的报酬。于是,随着大众读者的出现,也就形成了一个职业文人阶层。这就是前述埃亨鲍姆详述的现象。

1830年代俄国读者的总体形象用一个最贴切的词界定就是“外省的”。这一词汇在别林斯基的《琐事琐谈——最近半年(1835)俄国文学报告》中评述《读者文库》时大量使用:“《文库》是一份外省的杂志(别林斯基使用黑体——引者。下同),在这一点上包含着它的强大,它的力量,它在读者中的威信的全部秘密。”<sup>[9]310</sup>“《文库》经常不断的成功的原因在于这个杂志主要是一个外省的杂志,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惊讶它适应和迎合外省人的那份灵巧,那份天才,那份技能。”<sup>[9]277</sup>“我对《文库》的基本认识在于:这个杂志是外省的,他为外省出版,只是因为外省的缘故才是强大的。那么,我就来详细说明它的享有特权的外省主义(笔者使用黑体)的特征吧。”<sup>[9]280</sup>《文库》的外国文学栏目,“全部外国小说,和俄国小说一样,从第一行到末一行,渗透着外省精神(笔者使用黑体)”<sup>[9]298</sup>。这种外省精神是什么呢?“一切法国文学最坏的东西,法国杂志中、有时还有英国杂志中最起码的东西,与美文学毫不相干的东西,带有空虚、平庸、琐碎的味道东西,带有外省俏皮、外省滑稽味道东西,都在《文库》里被翻译了过来(笔者使用黑体)。”<sup>[9]298</sup>

我们认为,这里别林斯基的这个“外省的”概念需要准确界定一下:它具有特殊的意味,指读者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与品味;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美学概念。1830年代俄国“外省”读者的代表,表面看是“外省”草原上的地主,实质上是彼得堡的小官吏——他们是都市文明下中产阶级趣味的代表,“因为,彼得堡小官吏似乎构成了低水平读者层的峰脊,还因为彼得堡小官吏是作为尼古拉一世时期国家基础的最充分的表达、作为1830年代普通人的最理想的类型而被识别的”<sup>[10]160</sup>。同样,“外省性”还是毫无趣味的职业化文学的环境:“文学聚会时,既无鲜活的语言,也无悦耳的声音。不是关于艺术的翻来覆去的几句话,重复得令所有人厌倦;就是文学八卦令文人们暂时不再漠然,活跃几分钟。”<sup>[8]172</sup>“外省性”还是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文学风格,其中奇妙地混合了未来艺术体系(指即将主宰

文坛的自然主义,或后来称的现实主义)的元素与浪漫主义意识的陈旧痕迹,倾向于社会日常描写和直白的散文体,充满各种各样的隐喻、谢林的哲学和各种概念的大杂烩。关于这一点当代俄国学者莉·雅·金斯堡(1902—1990)在《普希金与本涅季克多夫》一文中指出:“在文学领域,小市民的折中意识是坚决排斥严格的……文学类型题材体系。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本涅季克多夫将巴丘什科夫、杰尔查文、普希金与谢林和雨果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只是个人的美的现象,他们的文化思想含义被剥去。自然哲学的主题与友好的寄语混合在一起。在语汇上,斯拉夫主义与考古学、城市俚俗语、民间词汇、‘最大胆的’用语、商务用语等等可怕地混合在一起。”<sup>[10]168-169</sup>普希金及其创作和《现代人》本质上与1830年代的折中意识完全格格不入,这一意识培育了自己的一大批偶像、明星,如库科尔尼克、季莫费耶夫、本涅季克多夫——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占有普希金在俄国的帕纳萨斯山的地位。巴纳耶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载道:“库科尔尼克当着自己众多‘粉丝’的面高度评价道:毫无争议,普希金是具有巨大天才的诗人,其诗歌的和谐与韵律是惊人的,但是他是轻浮、不深刻的;他没有创造任何重要的东西;如果上帝给我更长久的生命,那么我将创造另外一种严肃的文学,也许我将给出另一种文学方向……”<sup>[10]71-72</sup>果戈理文中所称的“杂志文学”正是由于能灵活地回应“外省性”大众读者的需求而获得活力,并逐渐操纵了读者意识,形成了一种生产大众文学的机制。与轻浮浪漫主义<sup>[11]</sup>联系在一起的季莫费耶夫没有任何基础的声誉就是被《读者文库》造出来的,也就是别林斯基不能容忍的“用金钱造出天才”<sup>[9]117-118</sup>的现象。

“外省性”正是当时大众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贵族性”的《现代人》诞生在大众文学兴起的时代,自然生不逢时。我们说,《现代人》的“贵族派头”与“大众文学”风潮兴起——两种因素合力,构成了《现代人》的商业困境。

实际上,面对商业大潮,普希金并非简单否定文学的商业化,他视文学劳动为人的一种生存形式。抱怨文学的商业化,浪漫地认为诗人应该“光荣的贫穷”,正如舍维廖夫在《文学与商业》中所写:“有谁不承认文人在自己光荣的贫穷中更诚实、更有鼓舞力?他渴望心灵因之会燃烧的荣誉,而不渴望心灵因之会生锈的金钱。”<sup>[6]</sup>这些在普希金那里引起或多或少的讽刺。针对诸如舍维廖夫、伊·伊·德米特里耶夫等人对整个当代文学的强烈愤怒,普希

金为自己这一代人所遭到的重商主义指责辩护,他借助卡拉姆辛的声望指出:“至于金钱利益,那么请允许我指出,卡拉姆辛是我们这里进行文学商业化的巨大变革的第一个榜样。”<sup>[12]408</sup>关于这点,早在1830年普希金给本肯多夫的信(草稿)中就有提及,他说道:“那个对俄国启蒙有影响,将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学术研究的人,卡拉姆辛,第一个作出了文学向商业化转变的示范。”<sup>[13]253</sup>其后(1836年)普希金在给巴兰特的信中谈到《1828年4月22日法令》<sup>②</sup>,认为《法令》保护了作家的权益,他抱怨此前因为没有法规,自己的作品被翻印,因而经济上蒙受损失。由这两封信可以看出,在法规出台实施后,文学活跃起来,走上了诚实守信的商业运作模式,这大大保护了作家的利益。对此,普希金大加欢迎。从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普希金清醒地计算着各个杂志的收益,他并非只会作诗、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另外信中还谈到,《北方蜜蜂》垄断政治消息的发表,这不仅给他们带来巨大利润,也让他们垄断了批评与读者,而纯文学没有市场,他们的文学书籍就卖不出去。所以,他在给本肯多夫信中争取“政治消息”的刊登权,既应该理解为普希金涉足政论严肃问题的愿望,也是其求生存的途径,因为他认为政治消息人人感兴趣,可以吸引读者。这也是他此前为杰利维格的《文学报》争取政治版块的原因之一。他既要坚持办刊的品味,也要刊物活下去。

可以看出,普希金无论如何不反对文学劳动的职业化,也就是商业化,他是把《读者文库》作为有效益的商业企业来看待的。其实,普希金从《读者文库》的第一期就参与了撰稿,并在一年半时间里将自己几乎所有的新作都交给了它发表。自然,他不可能不明白斯米尔金的刊物实际上是怎样一份刊物,而且进入普希金文学圈子的许多作者都在其中。舍维廖夫的《商业与文学》引发的关于文学与商业的话题,以及关于《读者文库》的激烈争论,普希金并没有直接参与;相反,他在《现代人》第三期上的《致出版者的一封信》,是对果戈理《动向》一文观点的某种调整和纠偏。对果戈理指责《读者文库》和先科夫斯基,普希金认为,和一份具有近五千订户的杂志斗争并要求它改变自己的个性,毫无益处;对它这个样子,你可以接受它,也可以不接受。普希金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从1835年年中他就默默地中断了给《读者文库》供稿。其实他也不是第一个,在他之前维亚泽姆斯基,叶·费·罗森,波戈金,舍维廖夫等人也都纷纷离开了《读者文库》。区别仅在于普希金在生前的最后几年尤其需要钱,这样,拒绝

斯米尔金非常丰厚的付费是非常不合算的。他没有明显的原因离开《读者文库》，只是深深地不接受《读者文库》所反映的当代文学生活中的那些现象。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普希金与“文学车间”，也就是“文学订货”，或曰“文学快餐”“挣外快”的风潮保持着距离。这还表现在他对当代文学惊人地克制，不发表评论。对那些文学“明星”的新作品、“俄国文学领唱者”的价值，他持相当怀疑的态度，但他拒绝任何公开的评论。他对我们上面提到的当红的被捧为偶像的几位文人库科尔尼克、本涅季克多夫、季莫菲耶夫等，保持相当冷漠的态度。在他 1834 年 4 月 2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库科尔尼克“看起来是个很体面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天分。我没有读完他的《托夸多·塔索》，也没有见到他的《天父之手拯救祖国》”<sup>[14]32</sup>。如果我们知道库科尔尼克的戏剧《托夸多·塔索》和《天父之手拯救祖国》在当时是声音最响亮的文学新闻，无论是在社交圈还是在杂志上都引起广泛的讨论，那么普希金的冷淡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个文学界围绕着本涅季克多夫兴奋之际，甚至在普希金的亲密圈子中（包括茹科夫斯基和维亚泽姆斯基在内）也能找到“粉丝”时，唯有普希金保持着冷淡，读过本涅季克多夫后，对诸如关于新诗人他怎么看这样的问题，他回答道：“他将天空与倒扣的碗的比较相当出色，对此他不用再再添一分……”<sup>[8]100</sup>这是巴纳耶夫回忆录里的记载。伊·谢·加加林<sup>⑬</sup>关于普希金对本涅季克多的态度也写道：“普希金当着众人面时会沉默，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时会如此猛烈、如此不公正地攻击他……”<sup>[15]502</sup>而季莫菲耶夫在俄国文学地平线上的出现，普希金好像完全没有发现。

实际上，这种对当时走红的大众文学的冷淡，正折射着普希金创办自己的《现代人》的“贵族”倾向，也可以说是一种严肃文学倾向和风格。他对于报刊的商业运作没有异议，但认为应该提高刊物文章的品质和品味：“指责《北方蜜蜂》，不是因为它刊登广告，而是因为它发表那些署名 Ф. Б.（即法捷伊·布尔加林）的无聊文章……请您相信，我们非常气愤地看到，诸多杂志出版人想用一些充满极其幼稚的思想和庸俗玩笑的劝谕文章来吸引我们……”<sup>[1]327</sup>所以，即便如别林斯基也指责<sup>[14]</sup>《现代人》太“贵族”并不公正，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在这样一个维度，普希金才得以思考更多俄国社会与文化的问题，当然这也使其《现代人》成为一份小众杂志。

为了使杂志更为有趣与普及，得到更多的读者和生存下去，除了我们前面提到普希金也曾试图改

变杂志的风格走向（尽管在杂志内部有分歧），还有，如果我们考察普希金发表在《现代人》上的文字，也不难发现他构建杂志的讥诮和有趣。研究者不只一次指出，普希金生命的最后几年是生活沉重、忧郁思考的几年，这不错，但是 1836 年——开始出版自己的《现代人》的年份，他也有很多风趣、幽默和机巧，在自己的文字或杂志编辑中制造了各种火花四溅的游戏、恶作剧、快乐的有时是无害的讽刺。例如，他的《题卢库鲁斯康复》，在仿古典的面具下是对乌瓦廖夫的最大讽刺；他对舍维廖夫的《诗学史》的评论（虽然没有发表，但原是为《现代人》准备好的稿件），在赞美的外表下是尖锐的讽刺；随笔《圣女贞德家族的最后一位后代》，讲述了圣女贞德家族的最后一位后代因伏尔泰在《奥尔良姑娘》一文中的诽谤和错误要与伏尔泰决斗的事件——这就是一篇年份错乱的文学恶作剧。《现代人》第一期果戈理的《论 1834 和 1835 年杂志文学的动向》一文的匿名，让许多当代人甚至别林斯基都误认为是普希金所写。第二期普希金编辑发表《纳·安·杜罗娃札记》，在题目下标出“普希金出版的”，紧接着引用奥维德《变形记》中的一句话“一会儿是男人，一会是女人”作为题记，并在正文“纳·安·杜罗娃的札记”前一本正经地做了序，落款为“出版人”——这简直就是一个迷魂阵，是杜罗娃写作由普希金编辑发表呢？还是普希金自己写作发表呢？它的形式简直就可以怀疑是文学骗局，可以直接添加普希金为真正作者。正像果戈理那篇《动向》一文一样，别林斯基就陷入了圈套：在评论第二期《现代人》的时候，别林斯基基本是一种激烈否定的态度，却很是赞扬《纳·安·杜罗娃札记》：“如果这不是骗局，那么应当承认该札记太有才了；如果这札记是真的，那么真是引人入胜，令人着迷得不可思议。”<sup>[16]164</sup>别林斯基推测作者应该是普希金，他怀疑 1812 年能用那样的语言写出这样的札记。还有，第三期的《致出版者的一封信》，真正的作者是普希金，却戴着特维尔居民 A. B. 的面具与虚构的普希金——《动向》一文的作者——争论。第三期的《一位女士未发表的札记片段》，发表时同样没有署名，这又是一个八卦阵，却是另一种：真正的作者普希金把札记作者直接说成是“一位女士”；文章讲的也是卫国战争，以一位女性的口吻叙述。第四期发表的《上尉的女儿》，同样是以札记的形式写历史题材，署名“出版人”——是《现代人》的出版人呢？还是《上尉的女儿》的出版人？并不清楚，又是小把戏，这是普希金在小心隐藏自己的作者身份，审查时他

请求审查官不要提他,而只说手稿是经普列特尼约夫得到的<sup>[17]178</sup>。

如果把普希金设计的这一切搞错,那就真是中了他的圈套。实际上也就是有人中了计。而在解这些圈套的过程中,甚至就会产生类似“陌生化”的效果而引人阅读。

凡此种表明,在1830年代俄国文学商业化、大众化的氛围中,普希金既坚持自己严肃的文学立场,也想使自己的杂志成为抓人眼球、引人入胜的读物,发表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更有趣但同时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而不是将读物降低到低劣小说的水平。在欢迎文学界的新秩序——建立法规、保障作者的权利——的同时,普希金也指责那些把文学变成了“跳蚤市场”的唯利庸俗的杂志人和出版商。他不认同当代文学生活中浮华的跟风,更拒斥以幼稚的思想和肤浅的玩笑劝喻和吸引读者。

同时,果戈理和舍维廖夫的文章也表明,1830年代随着散文时代的到来,俄国文学的大众化与普希金的《现代人》创办所代表的文学的“精英性”之间形成了激烈的较量。正是在这种对决中,我们现在阅读的所谓俄国文学经典(以普希金作品为代表)才慢慢沉淀与形成。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些经典在当时的力量和生存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也仅是在小众范围内得以流传。

#### 注释:

- ①“杂志文学”:原文为 *журн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笔者认为,这里“литература”不应理解为我们现在狭义的“文学”,它本身还有书籍、文献等语义,而且根据果戈理文章的内容,它是在谈论当时的几种杂志的状况,所以这里“журн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应该是指“报刊杂志”,直译“杂志类书”,也有点类似我们的“书刊”,俄语说某一期杂志时也用“*книжка*(小书)”。因此,该文此前也译为《论1834和1835年新闻报刊的动向》。
- ②普希金办刊物时,他就劝普希金放弃自己的事业而继续参与《读者文库》。
- ③库科尔尼克(Н. В. Кукольник, 1809—1868),俄国作家,戏剧家,果戈理中学同学。1840—1848年名声最旺,此后直到去世几乎被人忘记。
- ④是指新诗人库科尔尼克、本涅季克多夫(В. Г. Бенедиктов)、季莫费耶夫(А. В. Тимофеев)、柯尔卓夫等。
- ⑤《北方蜜蜂》1825年布尔加林创办,格列奇任主编。
- ⑥《祖国之子》1812年格列奇创办,并任主编。《北方档案》1822年布尔加林创办,1825—1828年,格列奇加入,两人合作办刊;1829—1835年与《祖国之子》两刊合并。此后三年停刊,1839年复刊,1840年停刊。
- ⑦А. Ф. Воейков(1779—1839),俄国诗人,翻译家、文学批

评家,出版人,杂志人,俄国科学院院士。

- ⑧В. П. Андросов(1803—1841),统计学家,《莫斯科导报》(*Моск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合作者,后为《莫斯科观察家》主编(1835—1837)。
- ⑨蓝钞票,5卢布;红钞票,10卢布。
- ⑩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文章几乎同时发表。发表别林斯基的文章的《望远镜》1836年3月21日审查通过,发表果戈理文章的第一期《现代人》1836年3月31日审查通过。
- ⑪别林斯基关于俄国文学的“斯米尔金时期”以及对《读者文库》的评判,见《文学的幻想》一文,出自:别林斯基文集(第一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P116—120。
- ⑫《1828年4月22日法令》:“一切作者或书籍翻译者有权出版和销售后天获得的(而非继承的)图书所有权。有权出版和销售自己的作品25年(在所有权没有被出让的情况下)。从其去世后算起25年后,其作品成为社会财富。”同年4月28日法律附件解释并补充了该法规法。主要条款是:已印刷出版或处于手稿中的作品不得出卖以满足其债权人,无论是其生前还是死后,只要他没有此要求。不管此前有何义务,作者有权出版自己作品的新版本,如果其三分之二有改动或完全重写。
- ⑬伊·谢·加加林(И. С. Гагарин, 1814—1882),天主教神父,作家,来自加加林贵族家族的教会活动家。《十六人》小组成员。
- ⑭在别林斯基评《现代人》第一期、第二期的文章中都有这种指责。

#### 参考文献:

- [1] Синюков В. И. . 《Современник》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Пушкиным [М]. Т. III М. :Изд - во Книга. 1987.
- [2]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е”* [М]. 见: [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0920.shtml](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0920.shtml).
- [3] Гоголь Н. В. . *О движении журна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1834 и 1835 году* [М]//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 АН СССР. Ин - т рус. лит. (Пушкин. Дом). - [М.; Л.]: Изд - 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 Т. 8. Статьи. 1952.
- [4] Герцен А. И.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 [М]// Собр. соч. : В 30 т. М. 1956. - Т. 7. “О развит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идей в России” - Пятая глава. 见: <http://russian-literature.org/tom/34173753>.
- [5] Б. М. Эйхенбаум,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быт* [М]// Б. М. Эйхенбаум,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М., 1987.
- [6] С. П. Шевырев. *Словес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ля* [М]. 见: [http://az.lib.ru/s/shewyrew\\_s\\_p/text\\_0031.shtml](http://az.lib.ru/s/shewyrew_s_p/text_0031.shtml) 以下引用皆出于此网页。
- [7]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 *О критик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мнениях*

-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наблюдателя”[M]//Собр. соч. : В 9 т. М., 1976. Т. 1. 见: [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0910.shtml](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0910.shtml).
- [8] Панаев 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M]. Москва, 1988.
- [9]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文集(第一卷)[M]. 满涛,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 [10] Гинзбург Л. Я. *Пушкин и Бенедиктов* [M]// Пушкин: Временник Пушкин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 АН СССР. Ин-т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Л.]: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6. - [Вып. ]2. 见: <http://feb-web.ru/feb/pushkin/serial/v36/v36-148-.htm>.
- [11]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имофеев А. В [M]//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 11 т. - М., 1929 - 1939. 见: [https://dic.academic.ru/dic.nsf/enc\\_literature/4546/Тимофеев](https://dic.academic.ru/dic.nsf/enc_literature/4546/Тимофеев).
- [12] Пушкин А. С. *Письмо Дмитриеву И. И. 14 февраля 1835 г.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M]//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 -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77—1979. - Т. 10. Письма. 1979. 见: <http://feb-web.ru/feb/pushkin/texts/push10/v10/d10-4082.htm>.
- [13] Пушкин А. С. *Письмо Бенкендорфу А. Х. : (Черновое, первая редакция), 19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 1830 г. Петербург*[M]//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6 т. - [М.; Л.]: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9. - Т. 14. Переписка (1828—1831). 1941.
- [14] Пушкин А. С. *Дневники* [M]//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 -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77—1979. - Т. 8.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История Пугачева. Записки Моро де Бразе. 1978. 见: <http://feb-web.ru/feb/pushkin/texts/push10/v08/d08-007.htm>.
- [15] Гагарин И. С. *Письмо Тютчеву Ф. И., март 1836 г.* [M]//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Тютчев / АН СССР. Ин-т мировой лит.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 М.: Наука, 1988. - Кн. 1. 见: <http://feb-web.ru/feb/litnas/texts/1971/ln1-5021.htm>.
- [16]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Вторая книжк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M]// 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1834—1837. СПб., 2008.
- [17] Пушкин А. С. *Письмо Корсакову П. А., 25 октября 1836 г. Петербург* [M]//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6 т. - [М.; Л.]: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9. - Т. 16. Переписка(1835—1837). 1949. 见: <http://feb-web.ru/feb/pushkin/texts/push17/vol16/y1621772.htm>.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Conditions of Commerci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During the Startup of *The Contemporary*

—Discussion from Gogol's and Shevryev's Articles

GENG Haiy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Shevryev's article *Literature and Trade* in 1835 and Gogol's article *On Tendency about Magazine Literature Between 1834 and 1835* in 1836, both provoked a debate 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the startup of *The Contemporary* was also involved in the wave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literature during the 1820s and 1830s in Russia. Shevryev attacked its commercial trend, but Gogol insisted the core issue was not literature's commercialization but its inherent quality. With the nobility, *The Contemporary* faced the dilemma in the business of its subsistence for it was too high-minded to be popular. Pushkin had never simply denied that 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matter, but he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insight thoughts and artistic value of the magazine.

**Key words:** Gogol; Shevryev; Pushkin; commercialization; popularization

# 知识分子的审美存在与精神生态

——李洱的小说意蕴及其《应物兄》的精神价值

胡艳萍,马治军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摘要:**综观李洱小说及其评论,“知识分子”是一个关键词。李洱对知识分子的关注,既体现为一种创作主体身份,也体现为众多的文学形象,更体现为呈现视角和认知。从前期小说到《花腔》,再到《应物兄》,在对知识分子的生活铺陈中,李洱小说呈现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其中绵延不断的精神追问是李洱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嘲讽式拷问和力图救赎的审美选择,这应当是李洱小说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李洱;知识分子;精神追问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12-06

对于李洱小说及其评论而言,“知识分子”是一个关键词;李洱集十三年之力于2018年底推出的长篇小说《应物兄》,更是向读者呈现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群像。如何理解李洱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视角、知识分子精神及其价值,《应物兄》的推出,无疑呈现了解读李洱小说知识分子精神的新标本,也开启了深入追溯其创作原型和精神价值的新路径。本文以《应物兄》为基点,回望、追溯李洱小说中知识分子群像的精神轨迹和文学价值。

## 一、李洱前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图谱

无疑,在李洱小说创作的历程中,“知识分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既体现为一种创作主体身份,也体现为众多的文学形象,更体现为一种呈现视角和认知。即便在李洱极少创作的非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中,如曾引起众多关注、被看成是乡土小说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仍然渗透着知识分子的体悟和省察。检视李洱前期的创作,其关注更多的是消费时代语境下知识分子丧失自我、苟且卑琐的生存状态。在李洱嘲讽式冷谐的笔调下,其前期作品中知识分

子群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一)卖弄学识却行动无力的悬浮者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的一部分,在社会历史中往往是启蒙大众、引领社会发展的思想标杆和行动规范,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被迅速边缘化,其在社会公共空间的启蒙性和引导性受到质疑,前后地位的悬殊使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徒有学识却行动无力的悬浮者,他们不得不、甚至间或是悠然地在失落感和空虚感的交合中苟且偷安。在李洱的小说中,《饶舌的哑巴》中的费定,《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葬礼》中的华林等,便是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典型。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人生经历很不同,但他们在繁杂琐碎的生活中显露出行动上的无力却如出一辙。

在《饶舌的哑巴》中,李洱塑造了一位在生活中不断饶舌的大学讲师——费定。他经常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做语言学分析,喋喋不休的言说不仅没得到学生们的认可,反而最后在无限的饶舌中被学生们轰下讲台。对费定来说,喋喋不休的语言是他

**收稿日期:**2020-03-1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生态文学理论的发展空间和实践路径”(2018BWX009)

**作者简介:**胡艳萍(1992—),女,河南商丘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马治军(1965—),男,河南浉池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文学、生态文艺学等。

思想的体现,但正是这喋喋不休的无意义言说,让他彻底沦为哑巴,事实上是言说的无力。

《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同样是一位才识广博的大学讲师,但其擅长分析的却是生活中无意义的细节。费边擅长用高深的语言装点生活,但是他对日常生活的分析没有任何指向意义。能将尼采、柏拉图等大师们的哲学信手拈来,但这些学说是他攻击对手或者获取什么的手段,而他自己则沉浸在语言的自我满足中。费边常常和一群知识分子在家里聚会,讨论的话题虽不乏有实质性意义,如创办刊物,但因为无法取到大家都满意的非同凡响的名字而被搁置,这场本来充满意义的办刊行动,最终在精妙的分析中烟消云散。他们的语言和行为看似充满激情,但剖开哗众取宠的面纱,行动上的无力便呈现无疑。喧嚣的知识和语言不能成为证明自身存在的工具,人生在看似“高深”的学识卖弄中悬浮着。

### (二) 深陷琐屑生活无法突围的绝望者

与五四以降那些引领思想文化潮流的启蒙者和救亡先锋迥异,也与20世纪80年代忧国忧民、勤勉激越、追求多元的知识分子群像不同,李洱前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抛开圣洁的精英光环,消融在世俗的生活场景中,变得平庸堕落,苟且于世俗。无论是《导师死了》里的主人公吴之刚教授,还是《遗忘》中的博士生导师侯后毅,都深陷在琐屑的生活泥沼中左右徘徊,无法突围,只得用死亡或者向历史追溯身份寻求新生的机会。

《导师死了》中的吴之刚是学术界新一代的翘楚,然而在社会生活和婚姻中,却是一个装聋作哑的失败者。他想尽一切办法试图突围或逃避这种人生状态。但无论是学术上的追求,还是爱情上的努力,抑或是装病住进疗养院的逃避,都没能得到精神上的救赎,反而把自己推向又一层深渊,甚至在疗养院失去了自由,彻底宣告了突围努力的失败。在冰雪开始消融的初春,他像一只大鸟从疗养院教堂的穹顶上跳了下来。在这里,吴之刚不再是肩负国家和民族使命的中坚力量,而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中无法突围的绝望者、可怜人。

如果李洱在《导师死了》中高调宣布“导师死了”,是让吴之刚以死表达对突围无路的绝望,那么,李洱在1999年出版的《遗忘》中塑造的历史学家侯后毅,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现实突围无果、企图通过重建自我身份寻求新生的另一个典型。导师侯后毅作为历史学专家,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竟荒谬地让学生冯蒙考证出自己就是夷羿转世,企图通过历史身份曾经获得的荣誉来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毫

无疑问,这种荒谬的考证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侯后毅企图通过历史身份的重新建构来逃脱现实的行为,只是跳梁小丑的把戏。遗忘今生,逃避现实,并不能让侯后毅、吴之刚这类觉醒但无路可走的知识分子走出庸常现实的困境,只能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四处碰壁,成为无法突围的绝望者。

### (三) 丧失立场随波逐流的沦陷者

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裹挟进驳杂的经济社会,为了生存,一些知识分子或自愿、或被迫向物质和利益妥协。在李洱的前期小说中,知识分子逐渐褪去精神上的孤傲,把知识语言彻底转化为物质和利益,完全褪去了道德感和耻辱感,成为丧失立场随波逐流的沦陷者。这类人物在李洱笔下以《抒情时代》的张亮、《从何说起呢》的美学教授丁宁等为代表。

在《抒情时代》里,讲师张亮有知识有能力,经常像《午后的诗学》里的费边一样出口成章,但他的全部才情都放在了与别人的钩心斗角上,“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至理名言是他为自己及时行乐找的借口。他很会为自己自甘堕落的行为找理由,认为生活本是无意义的。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张亮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传统知识分子的高洁,更遑论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他在自己的生活圈里洋洋自得,俨然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弄潮儿。

而在《从何说起呢》中,李洱更是将沦陷在欲望场域的知识分子形象刻画得辛辣无比。在通往病房的狭窄的电梯里,美学教授丁宁对出版商季宗慈大谈特谈学术上的方言以及自己的思想倾向问题,而目的只是希望通过巴结出版商,为炮制的美学史寻求出版的机会。很明显,知识分子的孤傲,在李洱的嘲讽中消解殆尽——“他们站在一起,就像相声演员中的捧哏和逗哏”<sup>[1]</sup>。“这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人格上已经背离了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完全沉溺在当下欲望化的生存现实中,他们与世俗生活和睦相处,在世俗层面谋得利益,并为之全力奋斗在都市的角角落落。”<sup>[2]226</sup>

## 二、《花腔》的理想与超越

在李洱铺陈的费边式知识分子谱系之外,《花腔》及其主人公葛任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可以说,李洱假借葛任这一形象寄寓了对知识分子另一维度的存在之思。有论者指出:“作者对葛任与‘个人’之间的隐喻,即《花腔》中的葛任其实是指历史中的任何一个个体的人。”<sup>[3]</sup>从这个角度看,毋宁说葛任是无数在驳杂现实中坚守自我、追求个体精

神的知识分子的缩影。

《花腔》的叙事在李洱众多的小说中独树一帜。作者围绕主人公葛任的生死,借三个讲述者展开了一场众声喧哗的追述。小说选取当年曾参与“阻杀”葛任的三位当事人,在不同年代分别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与葛任相关的事情,构成小说正本的@部分,并让葛任的后辈“我”搜集相关史料,对叙述者的言语和葛任的生平进行考证和补充说明,组织成&部分,与正文@部分相互补充,共同完成对葛任形象的描画。值得玩味的是,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葛任一直存在于别人的叙述中,从来没有直接在读者面前发声。在文本中,葛任始终是沉默不语的,处于被他人言说的无声状态,他的人生经历在不同叙述人各带目的的讲述以及“我”的考证解析中到处充满疑点,连具体是死于1942年的二里岗战斗,还是死于特务之手,或者在大荒山病逝,这一基本的历史真相都扑朔迷离。这样的叙述意味着:对葛任的个人印象,幼稚天真或者果敢坚强,都是讲述人遵照个人经验做出的主观评价,而与葛任本来的面目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李洱构思文本的方式取消了葛任作为“个人”的独立性,成为事实上的无言者。

有意味的是,虽然李洱安排三个叙述者和“我”把葛任放置在驳杂的历史追述中,变成事实的无言者;但是,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等叙述人对于葛任复杂甚至矛盾的追述中,有一点出奇一致,那就是葛任对于生死的超然态度。显然,李洱试图是借这一特殊的叙述方式对葛任的“个人性”进行解构和建构。也就是说,李洱把葛任放置在众声喧哗的讲述中,看似是对葛任作为“个人”的独立性的解构,但同时又是在另一种层面上对葛任的“个人性精神”的建构,即通过三个人各带目的的驳杂、繁乱讲述,展示葛任寻求自我的执着。

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诗歌《谁曾经是我》,是对葛任作为独立自我时“个人性”的称颂。在后期隐居地大荒山写出的《蚕豆花》,更是对他历经风雨还坚劲地追求“个人”主体性的绝唱。虽然前后两首诗歌仅是标题和内容的部分改动,但是在所有人为了活着而四处小心翼翼的年代,葛任能始终无惧生死、保持自我,无疑体现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在风雨飘摇、命如草芥的年代里,葛任依然是“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在生死关头不仅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尊严,甚至用付出生命的代价捍卫了“自我”,守护住了不卑不亢、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精神。无疑,葛任的存在,是李洱借以对现实中知识分

子精神普遍侏儒化的批判和讽刺,同时也是李洱对坚守个体精神、未曾向世俗权势低头的知识分子书写的赞歌。

葛任虽然是以失声的方式存在于四重“花腔”式讲述中,但他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通往日本的大贞丸号上偶遇陌生人时,他给予真切的关怀;在远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多重逆境中,他不抛弃不放弃;在侥幸从二里岗战役活下来,隐居大荒山时,他听从本心;发声悼念鲁迅逝世时,他不顾外界险恶的形势,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他依然坚持完成书写个人的精神自传《行走的影子》;在明知生命受到威胁,他依然选择留下来坦然面对生死。他像一个处于旋涡之中的“局外人”,更像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孤独者,即使身处纷乱的尘世,依然保持知识分子的单纯。这样的葛任在李洱或者是同时代作家描述知识分子的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李洱曾讲:“说到《花腔》中的葛任,我想,他确实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葛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现实处境,在今天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葛任的选择,即使在今天也是罕见的,或许是更为罕见的。”<sup>[4]96</sup>纵观葛任的一生,虽然他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死,但他一直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骄傲,放弃了明哲保身的妥协和独善其身的旁观,以生命为代价昭示“自我”的存在,超越了当时的历史境遇,以一种不灭的个性之光,烛照一代又一代坚守自我的知识分子的前进之路。对照费边式知识分子群像,李洱对于葛任的正面塑造,无疑体现出其知识分子精神反思的另一向度。

### 三、《应物兄》的现在进行时

在1990年代消费环境的冲击下,大众对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不再信从,五四以来以启蒙者身份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陷入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中。基于此,李洱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觉察到如何在文化废墟上重建知识分子的价值信仰成为首要难题。但是,重建信仰并不意味着要以拯救者的姿态对大众说教,而是首先从知识分子自身反思开始,即通过对自我价值和身份的反思,昭示知识分子唤醒身份意识,阻滞世俗侵蚀,引领精神方向,肩负时代重任。李洱曾说,除了创作中短篇小说外,计划创作三篇长篇小说,一篇追忆历史,一篇呈现现实,一篇绘制未来。<sup>[4]104</sup>如果说《花腔》是对历史的追忆,其中寄寓着李洱的知识分子理想;《应物兄》则是现实的集中呈现,其中渗透的是知识分子看似忙碌、充实、高雅而实则空泛、迷茫、流俗的生活铺陈,其间无

疑渗透着李洱对知识分子精神姿态越来越低的现状反思和力图救赎的文学选择。

### (一)反思:现实的生活向度

1990年代后,当代文坛出现大量揭示知识分子精神创伤、反思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文本,但是多数文本仅止于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摹写,或热衷于解构知识分子的启蒙特性,缺乏深入挖掘知识分子人性内核的力度。与简单揭露批判或肆意解构启蒙的知识分子文本不同,李洱在小说创作中卸去知识分子身上厚厚的铠甲,不仅仅把原因归结为物质和欲望对人的刺激,而是选择直接把知识分子放在生活常态里加以展示,借此反思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问题。

在《应物兄》中,“现实”是一个重要的关注向度,谢有顺将其表述为“‘现在’本体论”。谢有顺说:“现实并非只是发生在当下的事实,它也包含着一种精神状态……‘现在’是享乐、戏谑、搞笑、崇尚成功与财富的时代,我们不仅失去了一种思想的光芒,同时也失去了一种生活——一种有精神质地、价值构想的生活。思想不过是一个影子,赤裸裸的生活才是实体。”<sup>[5]</sup>李洱于2019年12月在郑州读者见面会上也曾说:我们面临的精神现实是“过去的尚未过去,未来的已经带来”。基于这种现实和对现实的认识,李洱重回知识分子的生存现场,以济大筹建儒学研究院的过程为核心情节,透过主人公应物兄的个人视角,见证三代知识分子从坚守自我,到被他者异化,最后又到自我阉割的流变。

从历史角度和世界范围看,知识分子总是扮演着社会批判或质疑者的角色,同时又总是表现出自我反思的能力。但是,李洱所描摹的知识分子已经自顾不暇,正在逐渐丧失社会批判的锐气和自我批判的勇气。虽然李洱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写老一辈知识分子高贵的灵魂,可是他们毕竟年事已高,何为教授和双林院士已经离世,芸娘体弱多病,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即使依然身体健康、依旧保持初心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也无可避免地坠入世俗社会的泥潭。正如李洱在文本中呈现的寓居国外的儒学大师程济世先生,虽然他时刻惦念着回归故土,为祖国文化发展做贡献,但是儿子吸毒,小孙子在还没有出世的情况下已经是一名“瘾君子”,家庭的问题让他自顾不暇。当他满心焦急地询问应物兄,自己刚出生的小孙子的状况时,这场声势浩大的儒学研究院工程宣告结束,新一代刚出生的孩子已经成了外在世界的“污染品”。“谁来救救孩子”,这句百年前的呐喊重现于世,反思的力度之深可见一斑。

在《应物兄》中出现的生造词“The Thirdself”,英年早逝的文德能将它译为“第三自我”。如果说《应物兄》中,让知识分子不能教育好自己的后代,是李洱对知识分子启蒙大众功能的质疑,那么,“The Thirdself”(第三自我)的设置,则是李洱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知识分子的自我能力。小说从一开始安排应物兄时常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自我发问,到后期让不同的人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如让生命科学基地的合伙人雷山巴,称自己为雷先生;生命科学学院领头人华学明,称自己为华先生。无疑,这种以第三人称称呼自我的方式出现在文本中并非偶然,因为“只有两种人会这么说话。一种人,是自大的人,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像恺撒,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以致他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整个世界。这种人要通过不断地称呼自己的名字,来向自己表示敬意。另一种人,是自卑的人,他是因为感觉到这个世界沉重,使他忍受不了这个重压,想要逃离自己,将自己从沉重的历史中抽出,或者将历史从自我中抛出”<sup>[6]745</sup>。显然,李洱借小说中芸娘对自称现象的解释,揭示知识分子身上的问题:知与行在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下走向背离。在世俗社会的驳杂里,知识分子遇到了知识的宿命,身上出现了两种极端:自大和自卑。如何应对这种极端?李洱在小说的最后,安排华学明疯癫与失语,也许就是李洱借此极端结局告诫知识分子,他们自身知行能力的背离,才是他们被社会边缘化的最主要原因。

比起前期小说,《应物兄》的超越性在于,其描述的知识分子群像呈现出整体性的思想与生活的悖论。其中,应物兄可谓是无二一的映像。按照当下的现实眼光,应物兄无疑是一个成功者,他有1980年代的学术梦想,充当过意气飞扬的启蒙之子;他有1990年代的学术事业,以研究儒学而成为济州大学的著名学者;他还有21世纪的学术饭碗,以所谓的学术声望成为混迹于学界、商界、媒体乃至政界和宗教界的多栖明星。但是,这位穿行于梦想、事业和饭碗之中的成功者,遇事总是欲言又止、自说自话、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其精致的利己主义行为,与现代知识分子全然无缘。同时,应物兄秉承的成熟的处事方式,所谓人长大的标志是能憋得住尿,人成熟的标志是憋得住话的戒言,实际昭示着其日常行为的人格分裂。所以,现实中的应物兄,既思想高尚,也生活堕落;既道貌岸然,也肉欲蓬勃;既倡导仁德,也事事物化。在这样的人物的主导下,《应物兄》呈现了如下的生活实景:“思想、学说在蔓延,大家不断在说,语言上无比喧嚣、振奋,行动上却是悖

反的,生活真实的增量不过是欲望和物质。‘言’成了嘴上阔论,甚至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自身行为的讽喻。”“知识分子一方面把语言变成了纸上的空谈,另一方面又把语言当作破败人生的伪饰。”“一切都在空心化、实用化、物化,在悄悄地变形、偷换、替代。”<sup>[5]</sup>在这里,以应物兄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既是面对这种生活的彷徨者,也是造就这种生活的呐喊者。

所以,在消费文化时代,物质的挤压、欲望的诱惑、生态的恶化、畸形消费观念的误导,逐步侵蚀乃至颠覆着人们曾经经历的贫寒但温暖的记忆、原始但闲适的田园生活等传统经验。面对这样的现实和文化状况,李洱笔下的知识分子或同流合污,或随波逐流,或推波助澜,其中尽管还有何为教授、双林院士等人的些许努力,但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弊端应有的清醒话语却在众声喧哗中无声淹没。当然,李洱的意图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无意义生活的呈现,呼唤的是对于生活本质意义的追寻;其对于应物兄看似充实、实则空虚的人生的描述,烛照的是当下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追求。在解构中寄寓建构,在对现实生活的反讽式呈现中寄寓主体的精神追求,这或许就是李洱小说呈现的审美价值。

## (二) 救赎:微弱的精神呼唤

李洱一方面以反讽的笔触揭示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另一方面也试图用道德坚守的方式来拯救知识分子。面对文学普遍迎合大众趣味的现状,李洱以知识分子的坚守姿态,继续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精神与责任意识,试图为悬浮的知识分子寻找新的价值和出路。虽然他把知识分子的精神救赎寄托于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坚守,确实存在着理想化的色彩,但也为当今社会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了一线希望。

在《应物兄》中,济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子房,历经社会的纷扰和世故,最终选择装疯卖傻落魄出走,回归到无人关注的状态。居住在贫民窟般的四合院里的张子房说:“只有住在这里,我才能够写出中国版的《国富论》。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体会到原汁原味的经济、哲学、政治和社会实践。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看见那些‘看不见的手’。”<sup>[6]1038</sup>虽然李洱写出的只是张子房在做学问时的状态,但也从另一角度呈现了世俗社会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抑制,并借张子房之口拒绝过度的物质生活对知识分子精神的侵蚀,以拒绝妥协的精神姿态试图出走世俗场域。

当然,《应物兄》的知识分子群像中,也不乏个别的清流和些许的光亮,如科学家双林院士,虽然他也讨厌现实生活中的世故,但他并不以一种逃离的方式解决生存的难题。双林院士离开原子弹试验科研基地之后,虽然在语言上一直保持沉默,但身体却时刻处在行动之中:坚持用毛笔写字;以书信的方式与好友乔木往来;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前往西北核工业基地悼念。对双林院士来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社会批判和启蒙的功能,想要改变不易,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行动的脚步,而是把目光转向关注未来孩子的教育问题,为此他精心编写了一本《适合中国儿童的古诗词》。他用行动表现出对人文精神切实的关注,期望给孩子阅读有益于他们健康成长的诗。双林院士是无言的,但在尽一己之力履行着知识分子在精神生活领域中的责任。毫无疑问,他的执着是对自己价值系统中的道德理念的坚持,更是以行动的方式走出知识分子生活的圈层,另辟解决的路径。双林院士的行为并非轰轰烈烈的大动作,但是在知识分子普遍被物质利益驱逐无暇顾及精神的现实境况下,却显示出精神的力量。双林院士用实际行动给知识分子救赎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以行动代替空洞的批判和哀恸,用反思自我的方式代替简单地把责任推脱给外在物质环境的挤压。

李洱曾讲,全球化时代和中国的飞速发展,不能掩盖中国特殊的处境,“我们仍然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传统的痛苦,比如贫困、暴力、愚昧、压抑”。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一种很真实的痛苦,“那就是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之后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由于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而带来的无力感,以及被压抑的欲望获得释放之后的困乏状态”<sup>[7]</sup>。如果说,刘震云笔下的小林们尚且困厄于物质的匮乏,李洱笔下的费边们则表现出物质生活满足之后灵魂的空虚和精神的困乏,而《应物兄》的意义在于,应物兄作为身处高位、左右逢源的精英知识分子,其看似充实、进取、高雅的日常生活,最终也没有逃脱空虚、迷茫、流俗的本质呈现,其具体明确的筹建儒学研究院的学科目标,最终也在尖锐的汽车撞击声中化为飘渺。相对于前期小说,《应物兄》不仅在知识分子群像的呈现中寄寓了主体寻求精神超越的多重探寻,而且在应物兄的无奈结局里映衬出探寻和超越的艰难。在知识分子自身神圣性被普遍瓦解的当下社会,李洱通过对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反讽式展示,以期构建知识分子新的精神趋向和价值系统,试图为知识分子摆脱物欲的奴役提供精神慰藉和拯救

的文学努力,无疑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作家的社会担当。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精神的讨论是一个通约性话题。小说家戴维·洛奇写于1988年的《美好的工作》,用调侃的笔法讲述了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后的生命沉浮,并借此叩问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价值。虽然东西方文化差异悬殊,而且年代相隔甚远,但在当今中国消费文化盛行的语境下再次阅读,仍与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精神困境以及试图对精神困境进行超越具有对话的意义。“浅薄、混乱、悲哀、痛苦之后,会有新的精神迎风站立,因为在一个文化巨变的时代,一种绝望从哪里诞生,一种希望也会从哪里准备出来。”<sup>[5]</sup>面对李洱这样一位具有忧患情怀和批判意识的作家,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其绘制未来的那部长篇,也许会延续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思考,继续其近乎绝望的精神追问。文学乃精神叩问之学,在自然生态失衡、社会生态和精

神生态均需关注的当下,文学的精神价值会日益彰显,李洱的精神探寻之旅也会持续坚实。

#### 参考文献:

- [1]李洱. 从何说起呢[J].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4(11).
- [2]张文红. 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3]洪治纲. 历史际遇与个人命运:论《花腔》[J]. 南方文坛 2002(2).
- [4]李洱,魏天真. 倾听到世界的心跳:李洱访谈录[M]//李洱研究,2015.
- [5]谢有顺. 思想与生活的离合[J]. 当代文坛,2019(4).
- [6]李洱. 应物兄[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 [7]李洱. 传媒时代小说何为?[N]. 社会科学报,2010-07-08.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Intellectual's Aesthetic Existence and Spiritual Ecology ——The Implication of Li Er's Novels and the Spiritual Value of *Brother Yingwu*

HU Yanping, MA Zhi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3, China)

**Abstract:** “Intellectual” is a keyword in Li Er's novels and literary reviews. His focus on the intellectuals can be reflected from the theme of his works, the multiple literary images, as well as the revealed perspective and cognition. In the expatiation of intellectual's life in Li Er's novels ranging from his earlier novels to *Coloratura* and *Brother Yingwu*, the lineage of the intellectual image presented in these works has provided a way to interpreting the intertextuality. The constant spiritual inquiry is Li Er's ironic interrogation about the intellectual's living states and the aesthetic choice to the struggling redemption, which should be deemed a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spiritual values in Li Er's novels.

**Key words:** Li Er; intellectual; spiritual inquiry

编者按:

彭闪闪,1989年毕业于郑州市文化艺术学校(2009年并入中州大学,现名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该文作者郑彦离教授时任其语文老师。郑彦离教授对早年毕业的学生持续关注,欣喜于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和成就。后彭闪闪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音乐人类学研究工作。后移居澳大利亚墨尔本,现任澳大利亚人类非遗与当代文化艺术交流协会执行主席,并从事文学创作。这里刊发书评,即是为我校有造诣的校友开辟“精神家园”,亦是为更多的青年学子从中获得借鉴和鼓励。

## 失落的希望

——解读彭闪闪的长篇小说《转身》

郑彦离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作家彭闪闪在其长篇小说《转身》中,以一个新移居澳大利亚华人家庭的房产交易引发的官司为主线,描绘了一群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历程。小说中的人物,或由于对异国的生活和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或由于以物质和欲望为主导的人生观,导致他们人生的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失落。小说提醒人们在跨文化生活中,要努力了解和学习异国的日常经验和文化习俗;不仅要努力奋斗,还要注重生活中的情感和精神质量。

**关键词:**彭闪闪;《转身》;跨文化生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18-04

移居澳大利亚的女作家彭闪闪的长篇小说《转身》,以一个新移居澳大利亚华人家庭的房产交易引发的官司为主线,描绘了一群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华人的生活状态,展现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努力奋斗和生存的不易。这部小说提醒我们,当你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到了文化差异很大的异国他乡,应如何适应?如何选择?方可在多元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生存和精神空间,安宁下来。

### 一、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的错位

肖梦影是《转身》里的主角,毕业于国内某知名大学中文系,曾在某出版社做编辑工作,2013年因丈夫孟立成投资500万澳元收购澳大利亚一家保健品制药公司,而取得澳大利亚永居身份,2016年入住墨尔本一个富人区。孟立成为跨国制药公司老

板,一年到头忙于生意,很少回墨尔本。肖梦影本人则除了照顾唯一的儿子、接送其上学外,每天并无其他必须要做的事。她“外貌端庄美丽,内在文艺浪漫”<sup>[1]4</sup>,不断有男人喜欢她,有时她也会做出非理性的举动。在现居房未卖出、资金无着落的情况下,签约买心喜的摩登房子,就是她非理性的一个举动,由此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痛苦和财产损失。

本来,肖梦影住着通过房产中介公司华人业务员索菲娅介绍购买的古典风格的法式花园别墅,日常生活消费由丈夫供给,衣食无忧。可是,在索菲娅给她推荐了临海且离儿子上学地方近一些的简约风格的摩登房子后,她不由心动。虽然她清楚“我必须卖了现在住的房子才可以买这套房,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现金”<sup>[1]109</sup>。她知道丈夫的钱“也都在项目

收稿日期:2020-03-10

作者简介:郑彦离(1960—),男,河南荥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书学、当代文学等。

上,不是说抽就能抽出来的”<sup>[1]110</sup>。但是,房产中介老板承诺为其销售现住房,“我有两三百个有钱的高端客户,他们是出得起钱立即交割房产的”,“我可以做到在销售后的三十天内同时交割房子”,在她看了该老板展示的周边三家相似房产高价出售的信息后,就签了购买新房合同。

按当地规定,签了购买新房合同后,卖方也签字生效后,有三天冷静期,可以反悔。肖梦影打电话问丈夫的意见,丈夫说有“资金的衔接问题”,“希望先不做此次交易”。她又询问其当时的情人薛华的意见,薛华对她说,“如果是我,就先卖了房子再买”。她担心,“如果卖了再买,这套房子就被人买走了”,薛华回答她说:“那就以后再找喜欢的房子。”可是她认为,把古典风格的法式房子换成简约摩登的房子,是新的生活体验。她相信房产中介老板和索菲娅对她现有住房高价销售的承诺,希望赚些升值利润,决心买下新房,两全其美,而不反悔。

然而,不久肖梦影的美梦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签约后将近一周时,肖梦影遇到同是移居墨尔本的华人朋友范爽,被告知她现住房是60年以上的老建筑,按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对有年份的老房子要进行历史性的保护,不可以拆建,会影响销售。由此,她也明白了房产中介当时未告诉她不可拆建的规定是为了保证那次房产交易;意识到了自己把索菲娅当作闺蜜,在她曾经的男友车祸死亡时,给她一千澳币致哀,可实际上对方却把她当作是能赚钱的大客户对待。

肖梦影责怪自己没有做多方面的了解,轻信了索菲娅这个所谓的华人朋友。担心现住房不能马上卖掉,无法支付买摩登房子的款,想终止合同。于是她给索菲娅打电话,可是对方没接。她又留语音,对方也没回应。次日上午,她又给索菲娅打电话和发信息,对方还是没接没回。直到午间,索菲娅才回电话,说卖家三天前签过合同,已过冷静期,不可以反悔了。她问索菲娅,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一下卖家已签合同?索菲娅说,卖家签过的合同已发到她的电子邮箱;并说,在澳大利亚,发电子邮件是常用的工作方式,是公认的法律依据。她怀疑,索菲娅是成心不给自己反悔的机会。

之后噩梦开始连环而来。

第一,她得在两天内把买房首付款几十万澳币汇到房产中介公司指定的信托账户。

第二,为了现住房方便销售,房产中介老板建议进行翻新打扮,设计、展示、广告、翻新等费用,约8万澳币。

第三,因为现住房翻新打扮,她和儿子得换地方

住。房产中介老板建议提前搬到新买的摩登房子,省得再次搬家,但是得支付提前搬进的两万六千澳币的房租。

第四,计时搬家两天,花去两千澳币。她整理摆放东西的过程,手裂出了血口,眼黑了一圈,腰疼得不能顺利站起身来。

第五,一个月过去,房价一直下跌,索菲娅说只有一家表示诚意购买,但出价比广告销售报价低100万澳币,且有附带条件,美梦破灭。

眼看房产中介私自缩短后的交割期将到,肖梦影心急如焚。没办法,她把实情告诉了丈夫孟立成。孟立成想简单了结这个交易,丢了首付几十万澳币算了,就当是她交了学费。可是当孟立成知道合同里还有买方违约需赔付卖方其他费用的条款时,感到形势难测,数不可控,决定咨询律师,与房产中介公司打官司,她也搬回了原住房。

律师费高得让人难以接受,且令人费解的是所找的华人律师张大为认为打官司要针对卖方,孟立成提出最好和解。肖梦影托人与卖方商谈,对方同意和解,退一半首付款给买方,请买方律师拟和解协议。律师拟好协议后发肖梦影的邮箱让其审查,她当时正忙,说如果按她的意思拟协议就不看了,可直接发给对方。对方看到协议信后又不同意和解了,原来律师信里教训口气的内容激怒了对方。对方告买方,要求撤销因未退买方预付款不能二次销售的禁止令,法院判卖方胜诉。在肖梦影的新男朋友——移居澳大利亚的荷兰人詹姆斯的帮助下,换了律师上诉,最后法院判买方只需赔卖方按当时市场评估价的差额,卖方提出的过分赔偿要求不予支持。随后,被追责的张大为律师同意赔偿她败诉那次的上法庭律师费用,房产中介公司同意赔偿她这次交易损失的一半费用,官司告结。但是,不仅期望的摩登房子没有得到,而且还损失了不少钱,更重要的是折腾得心灰意冷!

可以看出,肖梦影对交易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做事也不够认真扎实,更暴露出她没有控制财产损失的经验。因此,她在陌生的环境中,处处错位,惹出这些麻烦事。

## 二、人物的爱情观,随海外生活的阅历而改变

肖梦影的爱情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肖梦影因为长得漂亮,从青春时代到中年,一直有不少追求者,这造成了她的爱情自信,以致形成了她比较理想化的择偶条件:帅气、有经济实力、大气、年龄相当、爱她。应该说,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男性极少。幸运的是,年轻时她遇到了符合这些条件的孟立成。

年轻的孟立成是坐拥多家公司的董事长。当时还有一个叫沈铭浩的公务员，内心阳光，事业小有起色，非常爱肖梦影；但她对他虽然欣赏，却认为与孟立成不能比，于是和孟立成结婚。移居澳大利亚后，因孟立成是跨国公司的老板，长年在国际间飞奔，很少回墨尔本的家，使她感到寂寞而产生幽怨。孟立成认为，努力挣钱，保证她和儿子丰裕的物质生活就是爱她与儿子的表现。她则认为，爱不仅需要物质生活，还需要陪伴。丈夫很少回家，使她怀疑他可能出轨。在寂寞的日子里，一次在薛华家的聚会，她看到薛华仪表堂堂，虽然妻儿在中国，但家里到处摆放着夫妻和孩子的合影照片，洋溢着家的幸福。室外的花园，长满他栽种的花木，显示出他对家的呵护，因此她对他颇有好感。不久，他们成为情人。肖梦影一度幻想双方各自解除现有婚姻，和他再婚。但是，当她得知他一次酒后与夜总会一女子发生关系被逼结婚，并愿意就此下去，不禁对他姑且生活的态度有些鄙夷。她搬家时，让他帮忙却推脱不来等，使她感到他是一个不可信任之人。后来，肖梦影偶然发现，他引导她买画，他竟然收提成，彻底对他厌恶。

在肖梦影怨恨孟立成不常来陪伴并准备与他离婚时，年轻时爱慕她的沈铭浩执意到澳大利亚来看她，并提出二人结婚的打算。肖梦影心中仍保留有对沈铭浩青春时代的美好记忆，也对他来看她心生感动。但当她明白沈铭浩的意思是：当年自己没钱，与孟立成竞争爱情失败；后来辞去公职去经商，现已有经济条件，可以向她求婚，并且说男人就应该把精力用在挣钱的事业上，她感到相当失望。

当肖梦影对薛华心生鄙夷时，一次在朋友范爽家的聚会，邂逅了詹姆斯。詹姆斯是个大学教授，五十多岁，长相英俊，妻子去世两年，他在中国当过教师，能讲流利的汉语，说话真诚，使肖梦影对他有一种亲切感。但是，在肖梦影的心里，他与自己年龄不相当，且家境有些清贫，不符合自己期望的男友条件。然而詹姆斯却对她非常热情，肖梦影流露出想学英语的意思后，他每天通过微信给她发练习英语的句子，即使她不回应，他也不间断。在得知她的房产官司失败后，他积极帮寻找合适的律师，及时并不厌其烦地将一个个诉讼文书英文版翻译成方便她阅读理解的中文版，最终帮助她打赢了官司。房产官司结束后，肖梦影与丈夫也解除了婚姻，此时的她身心俱疲，选择了和詹姆斯在一起。因为，此时她认识到了在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情感生活的重要性。

### 三、欲望和物质化的人生观，造成人物各自的失落

在小说《转身》中，给肖梦影带来痛苦的主要是

孟立成、索菲娅和薛华三个人，一个是丈夫，一个是自认为的闺蜜，一个是情人，都是她倾注了感情并期望得到慰藉的人，但都以让自己痛恨而告终。反过来看，这三个人其实也都心怀希望，结果却很失落。

孟立成有能力，为人大气，他也很爱肖梦影。譬如，肖梦影买房失误引起纠纷，他提出愿意损失几十万澳币的首付款平息纠纷，权当是交了学费；再就是肖梦影执意离婚，他除了留给肖梦影在墨尔本的价值几百万澳币的房产外，还愿意支付足以维持肖梦影和儿子以后的生活费。但是，他未能抗拒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在还拥有婚姻的前提下，和另一个年轻女性另筑爱巢，同居生子。他以为，只要保证供给她们高层次的物质生活，就可以同时拥有。令他意外的是，情人带女儿去见肖梦影，事情败露后，肖梦影决意离婚，他也只得签字同意。这样的结局，是孟立成所没有想到的，他居然成了婚姻生活的失落者。这是他对爱情婚姻的态度所致，以为物质可以主导一切，事实上远非如此简单。

索菲娅是肖梦影刚到澳大利亚时买房认识的，肖梦影遇到一些不太明白的事情，时常会向她咨询，她也积极热情地回答，使肖梦影感到她们是无话不谈的闺蜜。但索菲娅骨子里是一个追求金钱、物质的女人，无论是做事还是婚姻，主要目的都是利益，为此不惜采取一些令人不齿的手段。她最初的丈夫是留学后留在澳大利亚工作的人，她与他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到澳大利亚生活。婚后，她看丈夫挣钱不多，虽已有一个孩子，她还是与他离婚。离婚的目的，就是希望找一个有钱的男人……索菲娅作为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在协助肖梦影买卖房产的过程中，为了得到更多提成，故意隐瞒信息，采取不诚实的手段，最终不仅没有得到想要的提成，而且她在华人圈里的名声变坏，使她赚钱更加不易。

薛华读大学时学的是贸易专业，明白机会、优势、成本等概念的意义，同时也清楚规则的重要性，然而他总想利用机会、优势投机牟利，逃避甚至触碰规则。在澳大利亚，他做着橄榄油和蜂蜜的非法贸易，面临着刑事和经济处罚。他在感情上及时行乐，但却弄巧成拙。

### 四、《转身》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小说《转身》的主要人物中，有一个特殊人物——詹姆斯。说他特殊，是因为：这部小说主要写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的生活，而他则是在澳大利亚的荷兰移民；在几个主要华人移民人物的经历中，都是满心的希望以失落结局，而他虽然也经历曲折，但最后却得到了超越希望的美好结果。

詹姆斯的父亲是个荷兰军人,母亲是法国一个富人家的女儿,因为作为军人的父亲收入低,詹姆斯的外祖父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就断绝了与女儿的联系,因此他们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詹姆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后随父母移居到澳大利亚。

詹姆斯曾在中国一所大学当过几年教师,爱上了一个美丽内向的中国姑娘。虽然他也知道对方有意,但担心自己囊中羞涩,给不了对方好的生活而未敢开口,结果对方挥泪而去。回到澳大利亚后,他任一所大学的教授,并结了婚。可是妻子管他很严,并嫌他挣钱少,因此他的婚姻生活不够愉快。妻子得肺癌逝世后,他对婚姻不再抱什么希望,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肖梦影的出现,复燃了他的爱情之火。在肖梦影陷入房产官司、精神几近崩溃时,他全力以赴地帮助,最终赢得肖梦影对他的喜爱。在肖梦影与孟立成解除婚姻,意欲和他在一起后,他又意外收到母亲遗嘱给他的两笔比较大的资产:一是当初外祖母给母亲的价值300万澳币的首饰;另一是母亲家乡——法国的一块价值相当于500万澳币的土地。不过,他想把两笔财产变现后,拿出一部分捐给孤儿院和老人院,再拿出一部分办一所语言辅导学校,自己教英文,让肖梦影教中文,使肖梦影由此前靠丈夫孟立成供养生活,变成普通人自食其力。

詹姆斯既赢得了美好爱情,又得到了意外大额遗产的喜悦结局,与前面肖梦影、孟立成、索菲娅、薛华的失落结局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他们的人生态度、行为选择的不同决定的,因为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及每个人经济基础与个性禀赋等的差异,相同的选择,可能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不同的选择,也可能得到相近的结果。比如詹姆斯

的喜悦结局,就具有偶然性。但是,詹姆斯的结局不会比他的希望落差太大,却是可能的,除非出现意外的天灾人祸。因为他本就没有抱太大的奢望,所以不会有太大的落差;他没有过分的越轨行为,因而也不会遭到法规的严厉惩罚。

小说人物不同的结局告诉我们:对于生活和事业,我们应尽力而为;对于利益,不要奢望;对于感情,要心态平和,不越轨,多角度思考。如年轻时肖梦影认为孟立成挣钱多是能力强,后来觉得钱多是孟立成久不回家和出轨的重要因素。婚姻感情也是这样,认识一面和认识多面会使自己产生不同的看法。如肖梦影曾喜欢外表帅气的薛华,后来发现他自私小气,就开始厌恶他。作家林语堂在小说《京华烟云》里写道:姚木兰喜欢才思敏锐的男青年孔立夫,父亲却让她嫁给性格温和的曾荪亚。木兰觉得与立夫在一起,情趣相投幸福,父亲则认为两人都易冲动会出事,木兰与荪亚性格互补,生活易于稳定。让心思周全沉稳的妹妹姚莫愁嫁给立夫,把控立夫的冲动。<sup>[2]</sup><sup>186</sup>我们无法简单地判断和描述人生,大千世界如此丰富又变动不居,我们只有做到不奢望,不越轨,尊重规则,充分考虑自身及外界的条件,明白“有无相生”<sup>[3]</sup>的道理,不因过分的非理性的追求反而失去更多。

#### 参考文献:

- [1]彭闪闪.转身[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9.
- [2]林语堂.京华烟云[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 [3]何新.老子新解[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The Lost Hope

——Comments on *Turn - back* Written by Peng Shanshan

ZHENG Yanli

(Library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her novel *Turn - back*, the writer Peng Shanshan depicts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emotional processes of a group of overseas Chinese, based on a lawsuit over a property transaction involving a newly immigrated Chinese family in Australia. Either because of a lack of in - depth understanding of foreign life and culture, or because of the outlook on life oriented by the material and desire,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lost their hopes in life by different ways. The novel reminds people that they should try to understand and learn the daily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customs of a foreign country in their cross - cultural life. Not only should they work hard,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Peng Shanshan; *Turn - back*; intercultural life

#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大地》中的土地情结

鲍成莲, 翟佳丽

(河南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赛珍珠的《大地》,通过描绘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在《大地》中,男主人公王龙与大自然(土地)的关系,相互依存,不可分离;他重返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理念,体现了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及对大自然(土地)的热爱,他对土地的热爱也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回报。王龙的生态观,有助于当代人对生态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生态批评;《大地》;土地情结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04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22-04

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也是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的女作家。她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把中文称为“第一语言”(母语)。在此期间,她写下了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大地》是她所有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大地》在美国出版后,好评如潮,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的书之一,并于1932年荣获普利策小说奖。随后,很快有了多种译本,《大地》受到世界读者的广泛关注。由于赛珍珠在《大地》中“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且在传记方面有杰出作品”(诺贝尔颁奖委员会评语),于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国内外专家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过解读,如国外学者Rochmat Budi Santosa(2016)从语用分析与社会学视角分析《大地》,进一步揭示小说中话语所反映的言语行为。<sup>[1]</sup>国内学者高鸿(2005)从异国形象学的角度分析小说里的中国形象,以此来解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sup>[2]</sup>苏小青(2018)从原生态的角度对赛珍珠《大地》中的思想倾向进行分析,认为:“赛珍珠的原生态写作,保留了中国当时社会现状的一部分真实情况,是我们进入那个时代的一个门径,这是《大地》最可宝贵的遗产。”<sup>[3]</sup>段怀清(2019)以“饥饿”和“成家”为两

条叙事线索,对《大地》中的叙事功能展开论述,将王龙一家对“家”的本质认知和体会传递出来,以此揭示他们的思想情感及内心世界。<sup>[4]</sup>目前,还有不少学者分别从其他不同的角度对《大地》进行了深入解读,但从生态批评角度的解读尚待深入。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对《大地》中王龙的土地情结进行分析,以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而激发人们对当前生态问题的思考。

## 一、“生态批评”理论

“生态批评”术语最早出现于美国学者威廉·克鲁特的《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试验》(1978年),但他只是把生态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sup>[5]</sup><sup>280</sup>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在西方才正式确立。当今世界生态频遭破坏,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已经发出警示信号,不少人文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在文学批评中融入生态的视角,以审视人类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生态批评就是从生态的基本原则出发,“关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出现对立及冲突的原因,分析当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呼吁人类保护环境”<sup>[6]</sup>,这是生态批评的目的所在。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人是自然的一

收稿日期:2020-03-05

基金项目:河南工业大学2019年度教改项目“新文科背景下英语写作的‘写深’研究”(JXYJ-Z201915)

作者简介:鲍成莲(1969—),女,河南商城人,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部分,人永远也不能脱离自然。

国内学者鲁枢元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次建构起他对精神生态的理解,他认为: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和社会性的存在,还应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分别对应生态批评中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他指出:“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他自己的关系。”<sup>[7]147</sup>

在生态批评的视野下,可以发现《大地》里王龙与生态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他与大自然(土地)的关系,他依恋土地,他对土地的依恋和热爱也获得了回报——精神和物质的丰收。这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双赢的效果——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 二、生态批评视角下王龙的土地情结

在农业时代,土地一直都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他们需要直接或间接地从土地获得生活所需,土地不仅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各种财富的最终归宿。下面我们从生态批评中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王龙对土地(自然)的态度和情感,以呈现这个人物所蕴含的生态思想。

### (一)王龙与土地的自然生态关系

在《大地》这部作品中,王龙与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即为自然生态。生态文学特别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正确的生态观应是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的准则。人与自然均应被平等对待,以此获得稳定、和谐的发展。

小说开篇就描述了王家的土地给他们带来的生活所需,如“厨房和住屋一样用土坯盖成,土坯用的是他们从自己田里挖的土做的……”<sup>[8]2</sup>王龙家的里里外外,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家产,都来自这片土地,土地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切。当王龙在家舀了很多水放进澡盆里时,父亲看到后严厉指责他——那么多的水可以把谷子浇熟。从父辈的话语里,可以看到他们心里的土地/粮食情结。不过王龙是珍惜大自然的人,他明白水的珍贵,最后将水用于滋养庄稼。父子俩对自然生态的爱惜,对水的节约,也是对土地一点一滴的爱。耕种是体力活,要忍受风吹日晒,但王龙很乐意在地里料理他的那些庄稼,这种快乐源于他与土地之间天然的和谐。令全家人一饱口福的饭菜,不仅是他们的自然之粮,更是王龙的精神之粮。人类对于自己辛苦付出而得到的劳动成果,总是怀着珍惜与感激之情,这种珍惜与感激之情孕

育了王龙的土地情结。夏天的雨水和初秋温暖催熟的阳光使稻粒非常饱满,这是一场大丰收,王龙把稻米拿到集市上卖,换成钱,给儿子买一些比洋钱本身还有价值的衣服,这使他兴奋而满足。这种兴奋与满足感,更增强了他对土地的热爱之情。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这片大地便遭遇了旱灾,即生态危机。当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之时,王龙会怎么做呢?他会放弃自己的土地吗?

烈日无情地暴晒,尽管王龙拼命地耕作,田地还是干得裂缝,天上无雨地上无收,王龙的麦苗停止了生长,最后枯黄而死,颗粒无收。但王龙决不放弃他的土地,坚持每天往田里挑水,可单凭一己之力与自然对抗往往是收效甚微。看着亲人面临快要饿死的窘况,王龙决定带家人去南方逃难。他们迫不得已将家具卖掉换成钱,但王龙决不会卖自己耕种用的工具,也决不会卖掉土地,这是他生命的依托。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面对绝境,王龙仍然时刻想着他的土地,当他离开他的土地之时,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至少我还有土地——我留下了我的土地。”<sup>[8]81</sup>此刻,土地在王龙心目中所占据的分量更重了。

在南方,他们生活在那座城市的最底层,他觉得拉车的活比在田里收割还要辛苦,生活的环境越是糟糕,他对自己的土地思念就越深。这股强烈的情感让他寝食难安,土地带给他的安全感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王龙最终回到了自己思念至深的土地上。

离开土地,回归土地,王龙仿佛经过了一次精神的洗礼,短暂的失去让他更加珍惜失而复得的土地。他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买了粮食种子和耕牛,他要让这块干瘪已久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他自己的田地,经过冬天的冰冻,现在松散而生机勃勃地躺在那里。”<sup>[8]128</sup>“桃树上粉红色的花蕾鲜艳欲放,柳树也已舒展开嫩绿的叶片。”<sup>[8]129</sup>一幅生机盎然的自然美景图展现在眼前。王龙对土地的尊重与热爱,也赢得了土地的回馈,他种粮一售粮换钱,发家致富。土地从丰收枯死、再到生机的过程,和王龙从喜悦到失落、再到牵挂的心理转变相对应,体现了生态理论的精髓,即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唯有敬畏自然、珍爱自然、保护自然,人类才能过得更踏实、更心安、更幸福。

### (二)王龙与“他者”的社会生态关系

任何一个社会要素或者环境要素出现问题,都会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若要长久保持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必须要约束自己的行为,管控自己的欲望,遵循社会生态的发展规律。小说中,王龙

与其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则为社会生态,而这些人物所涉及的故事情节从侧面反衬出王龙的土地情结。

百善孝为先,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王龙是个孝子,六年来坚持每天早上煮开水并端到父亲身边,以减轻父亲的晨咳;村里闹饥荒时,只要有吃的东西,孝顺的王龙总会先把东西给老爹吃。王龙是个好爸爸,他一个人扛起了全家的所有担子,在人们极度饥饿的时候,他用地里的泥土拌成泥汤给孩子们喝,这是他们的救世观音土。王龙在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时掂量着轻重,知道什么时候最需要自己。在南方逃难时,牵挂着土地的王龙决心要卖东西回乡,当无东西可卖的时候,妻子阿兰建议卖掉女儿,但是王龙拒绝了,他再难再穷也坚决不卖自己的孩子。即便是那可伶的傻女儿,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在晚年,他把这个女儿托付给可靠的人梨花;王龙是个好丈夫,饥荒年代,眼看村里的人一个个都快要饿死了,王龙的妻子阿兰又怀有身孕,王龙不得已向邻居老秦讨粮求救,忠厚善良的老秦将自己存放已久的用于应急的几把发霉的红豆给了王龙一些,救了阿兰的命。王龙对家人永远都有着一种负责、善待和尽力维护“他者”的情感和责任,营造了一种和睦的家庭关系。

王龙和“他者”的生态关系还体现在与他的邻居老秦和叔叔一家。王龙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正因为老秦的救命之恩,王龙南下返回后看到老秦过得穷困潦倒,就把自己买的种子分享给老秦。看到老秦为人诚实可靠,他让老秦做自己家的监工,还给他付工钱。随后王龙渐渐变得富有,生活中对老秦也是尽仁尽义。当阿兰和父亲去世后,王龙把他们安葬在小山上的庄稼地里,因为他对土地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与热爱,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是他们的恩人,他们在此扎根,不论生死,都要一直守护着这片土地。年迈瘦弱的老秦也相继离开了人世,王龙痛哭不已,给老秦厚葬之后,他嘱咐儿子在自己去世后埋在离老秦最近的地方。二人因地相遇,因地结缘,因地相伴终生。可见,这片土地不仅是搭建二人的友谊之桥,更承载着二人的同甘共苦之情。

王龙也是个孝顺的侄儿,即便是麻烦不断、好吃懒做的叔叔一家,他也一样照顾着。然而,叔叔并不因此对王龙心怀感激。当二人发生争执时,叔叔狠狠地打了王龙两耳光,以在村上散播王龙的不好为由威胁王龙,王龙想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只好委曲求全,顺着叔叔的心意借钱给了他。王龙心里虽有一大股怨气也没办法,他急忙回到土地上开始干

活,那种干活劲头仿佛让王龙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丝毫不知疲惫。土地就是他的收入来源,借出去的银圆有去无回,所以他必须得把这活尽快赶出来,以弥补失去的钱财。与王龙对土地的关爱与管理程度相比,叔叔只会抱怨,只要家里有吃的喝的,就不去地里干活。没责任没担当的叔叔,衬托出王龙靠土地上的劳作来修复与“他者”的社会生态关系。

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王龙一生虽迷失过,但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尽心尽力,该尽的情分都做到了,这正是大地孕育他宽以待人的美德与大爱。

### (三)王龙与“自我”的精神生态关系

王龙在从贫穷到富有的过程中,内心的波动及思想上的变化都与土地有关,即人与自我的关系——精神生态。在文学所展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有一种关系被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那就是:把人以外的自然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等,来抒发、表现、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

王龙的精神生态起初是和谐的。他有了儿子后,日子过得更精细了。在收成极好的年份,他把秋收的谷物堆满三间小屋,及早就做好过冬的准备。他既勤奋节俭又富有智慧,他从庄稼中获得了丰厚的银圆,并将这些钱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土地带给这个勤劳的人财富,使他内心安稳,并受到他人的尊敬。反观其他人物,如他的叔叔好吃懒做,经常抱怨自己的命不好。黄家也没人好好料理土地,反而一直卖地,这种对待土地的态度,让曾经作为大户人家的黄老爷变得非常消瘦、萎靡不振,直至衰败破落。他们想不劳而获,不懂得尊重自然,就会受到惩罚,最后他们的精神生态也崩溃了。

王龙富有的时候,曾经有过精神沦丧。他从黄家老爷那里购置大量的土地,渐渐变得富有,成为村上的大户,极大地改变了王龙一家人的生活质量,但也使他的虚荣心开始作祟,追求一时的名利与享乐。王龙刚认识荷花时,天天回到家像找不着魂似的,完全迷失了自我。他内心极度矛盾,既想从荷花那里得到快乐与感官上的刺激,又不想违背伦理道德,还要对得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想当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可是在欲望面前,王龙还是一时失去了理性。为赢得荷花的欢心,他用曾经积攒的来之不易的钱买各种衣物装饰自己,以彰显尊贵的身份;他开始嫌弃妻子阿兰,忘记了他们曾经同甘共苦才打拼出来今天的幸福生活。如果他的土地情结止于此,想必他的结局应该与他的叔叔及黄家老爷的下场一样悲惨吧。

庆幸的是,王龙醒悟了。妻子阿兰的身体每况愈下,王龙才突然有了一丝觉醒,意识到阿兰在这个家里是多么重要。二女儿的话像一把利器朝他的胸口戳去,他的内心像汹涌的海浪般翻涌咆哮着。那一刻,他清醒了,回想起阿兰的好,心中顿时油然而生一种内疚感。当身边的亲人好友相继离他而去,王龙开始对生命怀有一点点敬畏。他厌倦了荣华富贵而又清闲的生活,看着自己的儿子利欲熏心,他彻底地失望了。这时的王龙真正明白了土地就是他的魂,意识到自己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必须要回到自己最初生活的那片土地上,与自然相伴。王龙内心深处自始至终都有土地情结,这也是他精神沦丧之后能够醒悟、回归正途的根本原因。

当王龙听到儿子打算把地卖掉的时候,他再三叮嘱道:“我们是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谁也不能把你们的土地抢走……”<sup>[8]333</sup>“必须”“谁也不能”,这些有力的字眼饱含着王龙对土地的牵挂以及对儿子的警示与忠告。王龙的内心和命运与土地已深深地融为一体,“不忘本”是王龙对自然最敬畏的态度,土地可谓是他的第二个母亲。

王龙从贫穷到富有,从富有到浮躁,从浮躁到清醒,经历的一波三折,每一次心理和精 神的变化,最终都是土地呼唤他回到最初的本心:土地才是一切。土地使他安心,土地洗礼着他的心灵,也修复了王龙和自我的精神生态关系。

### 三、结语

小说《大地》彰显了生态批评理论下的自然生

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主题。在男主人公王龙的生活和命运中,我们看到:一个热爱土地的人,最终也得到了土地的拯救与馈赠。王龙重返土地和回归土地的生态理念,体现了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以及对土地的热爱,在此基础上,达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他者”的和谐,以及自我内心的和谐。小说在此角度,引发我们对当下生态问题的反思。

### 参考文献:

- [1] Rochmat B S. A Pragmatic Analysis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Pearl S Buck's *The Good Earth* [J]. Register Journal, 2016, 3(2).
- [2] 高鸿. 赛珍珠《大地》三部曲里的中国形象[J]. 中国比较文学, 2005(4).
- [3] 苏小青. 对中国农民的原生态描述: 赛珍珠《大地》中的思想倾向分析[J]. 理论视野, 2018(12).
- [4] 段怀清. 一个“家”的诞生、成长及分裂, 由“成家”和“饥饿”开始的叙事: 论《大地》的双线叙事结构[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 [5] 鲁枢元, 刘锋杰, 姚鹤鸣. 文学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6] 仲玉, 陈爱琴. 基于生态文学视野下的宫泽贤治作品研究[J]. 大众文艺, 2019(23).
- [7] 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147.
- [8] 赛珍珠. 大地[M]. 王逢振,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nd Complex in *The Good Ear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BAO Chenglian, ZHAI Jia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Pearl S. Buck projects the way human beings get along with nature by depi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farmers and the land in *The Good Earth*. In this novel, the main character Wang Long and nature (the land) are interdependent and inseparable. His ecological idea of returning to nature reflects the Chinese farmers' land complex and love for nature (the land), and in turn Wang long's love for the land has also been rewarded with materials and spiritual beings. His ecological view also sheds lights for the contemporary people to reflect on ecological problems.

**Key words:** ecocriticism; *The Good Earth*; land complex

# 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 物流效率协同发展研究

梁 雯, 顾大超, 叶仁慧  
(安徽大学 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通过对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的机理分析与指标建构,研究2009—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物流效率变化及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情况,并同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的测量结果进行对照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较高,呈“U”形趋势上升;物流效率总体得到不断改善,平均每年提升2.3%,但区域变化差别较大;受安徽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较低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两系统协同发展仍处于勉强协调,为三大城市群最低。据此,从改善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物流效率角度出发,提出增进区域分工协作,改善物流基础设施等建议,并强调安徽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and 科研创新活力,集中资源,快速创造出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物流效率;协同发展;长三角城市群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05

**中图分类号:**F292;F2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26-09

##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新格局。在新发展格局下,作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将更加突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期,由于发展不平衡和速度过快,致使环境污染、社会治理等问题频繁发生<sup>[1]</sup>。区别于过去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更侧重于解决好人的问题,强调城镇化建设的质量,“以人为本”是其核心理念<sup>[2]</sup>。《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与党的十九大报告先后指出“以城市群为新型城镇化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为新型城镇化明确了建设方向。

物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支撑我国新型城镇化有序发展,两者存在天然联系。

物流业贯穿商品经济活动全过程,是现代经济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产物,降低了商品交易成本,推动要素资源集聚,改善居民生活水平<sup>[3]</sup>。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往往伴随着人口和产业向城镇聚集,释放出大量物流需求,推动物流要素集中,降低物流运行成本,提高物流服务质量。两者在相互影响中生产反馈体系,通过该体系,城镇化同物流业实现协同发展<sup>[4]</sup>。

进入新时代,物流业发展必须要重视产业效率,避免盲目投资,做大规模。尤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对物流业基本要求在于高效发展<sup>[5]</sup>。新型城镇化与基于效率的物流业协同发展会驱动要素资源向城镇聚集,扩大城镇辐射能力,加强大中小城市与城镇的联系,增强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最终驱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长三角城市群新型

收稿日期:2021-03-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电子商务物流发展研究”(15BJY117);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下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效率研究——以长三角为例”(20YJA790043);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安徽省物流产业效率影响及路径分析”(SK2019A0034)

**作者简介:**梁雯(1962—),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城镇化、物流效率的水平,以及两系统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变趋势,并通过与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的对比分析,研究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在三大核心城市群中所处地位。

## 二、文献综述

### 1. 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研究

首先必须指出城镇化和城市化概念皆源自“Urbanization”,就其内涵而言,都表示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业型社会向以二、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型社会转变的过程<sup>[6]</sup>。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为表述方便,本文皆用城镇化一词。

步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城镇化率高速攀升,在享受高速城镇化带来的经济红利的同时,学者们开始反思快速城镇化导致的社会问题。尽管有学者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城市混乱、社会动荡是与城市化导致的城市人口压力有关,相反,城镇化为促进就业和农村发展带来好处<sup>[7]</sup>,但多数学者研究显示,城镇化仅强调速度,其发展结果必然是低质量、不完全、不可持续。因为伴随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地区逐渐难以为所有城市居民提供充足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sup>[8-9]</sup>,而缺乏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和风险管理,使城镇化成为灾害发生的催化剂<sup>[10]</sup>。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建设以土地为中心,进入发展快车道,但其本质是不完全的,低质量的城镇化<sup>[11]</sup>,发展速度过快导致城乡发展不协调,城镇发展同质化,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受损等问题逐渐凸显<sup>[12]</sup>。伴随着全社会对传统城镇化问题的批判不断深入,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标志着中国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上迈出重要一步。新型城镇化其核心是“以人为本”,重视城乡统筹,解决发展中社会矛盾,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sup>[13]</sup>;能够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驱动产业向更高层级转变<sup>[14]</sup>;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sup>[15]</sup>。

### 2. 物流效率研究

法雷尔在其衡量产业效率的经典论文中提出既考虑所有投入问题,也避免指数问题的生产效率度量方法<sup>[16]</sup>。沙尔内等人在此基础上引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经过数十年的不断演进,DEA 在理论和实践上皆获得蓬勃发展<sup>[17]</sup>。进入 21 世纪后,DEA 开始应用于对我国物流行业的研究,具体涉及物流业的产业结构、企业运行效率、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sup>[18]</sup>。

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得

到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甚至部分省市出现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投资物流业,导致产业效率下降<sup>[19]</sup>。从全国看,近些年物流产业效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空间上自东向西递减,物流发展中心持续向东部地区转移<sup>[20]</sup>。东部地区成为提升我国物流效率的决定性力量,而西部地区是致使我国物流效率较低的关键因素<sup>[21]</sup>。同时,研究还发现低碳约束<sup>[22]</sup>,产业集聚<sup>[23]</sup>,产业结构调整<sup>[24]</sup>等对物流效率具有显著影响。

### 3.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研究

现有文献中关于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问题研究十分稀少,相关研究集中在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关系领域。学者们认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使社会生产及消费能力普遍增加,物流需求随之增加<sup>[25]</sup>。同时,物流技术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提升了居民生活水平,吸引更多人口向城镇聚集<sup>[26]</sup>。进入“互联网+”时代,物流业与电子商务相结合,创造出大量创业就业机会,促进了城市与农村协同发展,使各功能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sup>[27]</sup>。总之,现代物流业已经在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及就业、产业结构调整、新兴产业、城市文化等诸多领域同新型城镇化产生紧密联系<sup>[28]</sup>。另有少数研究关注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协同发展情况和变化趋势,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实现协同发展有利于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促进物流业持续高效发展<sup>[29-30]</sup>。

已有文献对新型城镇化、物流效率相关问题的研究较为全面,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在以下领域仍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1)进入新时代,物流业发展应由过去重视规模,盲目投资向重视效率和发展质量转变,因而有必要以效率视角来重新审视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协同发展问题。(2)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主体,能有效促进大中小城市及城镇地区的联系,对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文献缺少以城市群为对象,研究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问题。

鉴于此,本文选取我国三大核心城市群 2009—2018 年间市级面板数据,测算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物流效率的变动及两者协同发展水平,并将各城市群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深入研究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问题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 三、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及指标构建

1.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  
“协同”又翻译为“Synergetics”,包含协作、合作的意义。1971 年,赫尔曼·哈肯提出“协同”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协同学。协同学是一门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揭示不同学科的共同特征,研究不同子系统由无序演化为有序的共性,具有很强的普遍适用性<sup>[31]</sup>。根据协同效应,当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协同,共同促进,系统总体将达到良性循环、有序发展,呈现“1+1>2”的效果。因此,追求各关联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目标和趋势<sup>[32]</sup>。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是指当两子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子系统之间实现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时系统总体所表现出的良性发展状态。新型城镇化是包含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环境的全方位、可持续性发展的城镇化。聚焦物流领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价值不仅在于行业规模的拓展,更在于效率的提升。当前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打破城际界限,加强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城镇区域与农村区域的联动,在此过程中物流业必须由分散经营,向规模化、节约化经营转变,物流效率随之得到提升。反之,城镇区域是商品交易及物流服务的中心,物流效率提升会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消耗,给予城镇居民生活幸福感,提升新型城镇化总体建设水平。因而,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与物流效率子系统在相互促进、协作过程中实现系统总体良性循环发展,即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

## 2.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指标体系

本文搜集了三大核心城市群 49 座城市 2009—2018 年的相关指标数据,因 *DEA - Malmquist* 模型需要,为研究 2009 年的物流效率指数,物流效率子系统的相关数据延伸至 2008 年。所有数据源自各地区历年的统计年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部分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补全。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选取。选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所列出的新型城镇化主要指标,并参考现有研究<sup>[29-30,33-35]</sup>,设计出包含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环境城镇化及城乡统筹等内容的指标体系。为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指标选择上更强调人均占有量,以此来度量不同地区居民的真实获得感。

物流效率评价指标选取。输出指标以最能代表行业产出能力的物流业增加值表示<sup>[36]</sup>;投入指标以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行业城镇单位从业人数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力投入<sup>[19]</sup>,以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衡量劳动力投入成本,以公路线路里程、民用载货汽车拥有量和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衡量物流行业发展环境<sup>[20,36]</sup>。因我国尚未将物流业视为单独产业门类,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故采取学术界通用方式,数据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来代替物流业。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维度层	指标层	指标指向	指标权重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正向	0.0624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万人)	正向	0.0545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万人)	正向	0.0558
	经济城镇化	非农产值比重(%)	正向	0.0645
		人均 GDP(元)	正向	0.0621
	社会城镇化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升)	正向	0.0639
		城市燃气普及率(%)	正向	0.0659
		城镇登记失业率(%)	负向	0.0591
		城市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正向	0.0647
	空间城镇化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平方米/人)	正向	0.0646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人)	正向	0.064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正向	0.0644
	环境城镇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0.0638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吨)		负向	0.0632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负向	0.0629	
城乡统筹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向	0.0637	
物流效率	输出指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亿元)	正向	0.1380
	投入指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亿元)	正向	0.140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城镇单位从业人数(万人)	正向	0.117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万元)	正向	0.1556
		公路线路里程(公里)	正向	0.1553
		民用载货汽车拥有量(辆)	正向	0.1476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万户)	正向	0.1455

#### 四、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研究方法

##### 1. 熵值法

为避免量纲影响,原始指标数据应首先做极差标准化处理。具体运算如下:

当该项指标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大越好时,

$$X_{p_{ij}}^* = (x_{p_{ij}} - x_{\min}) / (x_{\max} - x_{\min}) \quad (1)$$

当该项指标为负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小越好时,

$$X_{p_{ij}}^* = (x_{\max} - x_{p_{ij}}) / (x_{\max} - x_{\min}) \quad (2)$$

$X_{p_{ij}}^*$ 是指经过极差标准化运算后的  $p$  市第  $i$  年第  $j$  项指标的数据,  $i = 1, 2, 3 \dots, m, j = 1, 2, 3 \dots, n$ 。

计算熵值,公式如下:

$$E_j = -k \sum_{i=1}^m y_{p_{ij}} \ln y_{p_{ij}} \quad (3)$$

其中,  $k = 1 / (\ln m)$ ,  $y_{p_{ij}} = X_{p_{ij}}^* / \sum_{i=1}^m X_{p_{ij}}^*$ , 特别当  $y_{p_{ij}} = 0$  时,  $y_{p_{ij}} \ln y_{p_{ij}} = 0$ 。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权:

$$\lambda_j = (1 - E_j) / (n - \sum_{j=1}^n E_j) \quad (4)$$

其中,  $\sum_{j=1}^n \lambda_j = 1, j = 1, 2, 3 \dots, n$ 。

令子系统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乘相应的权数,并求和,便测得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  $U_u$ , 物流效率综合评价指数  $U_L$ 。

$$U_u (U_L) = \sum_{j=1}^n X_{p_{ij}}^* \lambda_j \quad (5)$$

##### 2. DEA - Malmquist

为方便比较不同区域、年份的物流效率的动态变化,本文选用 Fare 改造后的 DEA - Malmquist 方法<sup>[37]</sup>,公式如下:

$$TFP_{(t,t+1)} = \left[ \frac{D_t(x_{t+1}, y_{t+1})}{D_t(x_t, y_t)} \times \frac{D_{t+1}(x_{t+1}, y_{t+1})}{D_{t+1}(x_t, y_t)} \right]^{\frac{1}{2}} \quad (6)$$

$TFP_{(t,t+1)}$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由  $t$  时间点至  $t + 1$  时间点的动态变化,即 TFPCH。其中  $D_t(x_{t+1}, y_{t+1})$  表示在  $t$  时间点生产前沿下的  $t + 1$  期距离函数值。

表2 耦合协调度区间和协调等级划分

协调度区间	0.000—0.099	0.100—0.199	0.200—0.299	0.300—0.399	0.400—0.499
协调等级(失调)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协调度区间	0.500—0.599	0.600—0.699	0.700—0.799	0.800—0.899	0.900—0.1
协调等级(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 五、实证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规划面积积达 35.8 万平方公里,中心区面积积达 22.5 万平方公里,包含沪、苏、浙、皖 27 个城市,经济总量约占全国 2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60%,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城镇化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级战略,对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和国家发展全局有重要意义,并指出区域发展的关键在于“一体化”“高质量”。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生产率的指标,即一定时间内总产出与总投入之比。全要素生产率变动(TFPCH)则是衡量与上期相比,本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或降低幅度的指标,当 TFPCH 大于 1 时,TFP 较上期有所提升,反之则下降。该方法优点在于将 TFPCH 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动(TECHCH)和技术效率变动(EFFCH);EFFCH 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动(PECH)和规模效率变动(SECH),这为研究物流效率变动的原因提供了方便。

##### 3. 耦合协调度模型

建立新型城镇化系统与物流效率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测量两者协同发展水平。

###### (1) 计算耦合度

$$C = \sqrt{(U_u \times U_L) / (U_u + U_L)^2} \quad (7)$$

其中,  $C$  为耦合度,用以衡量新型城镇化同物流效率相互关联程度。  $C \in [0, 1]$ ,  $C$  值越靠近 1,两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程度越强,但  $C$  值不能测量两子系统协同发展的程度。因此,还需进一步测量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 (2) 计算耦合协调度

$$D = \sqrt{C \times (\alpha U_u + \beta U_L)}$$

其中,  $\alpha, \beta$  是待定系数,且  $\alpha + \beta = 1$ 。本文参考目前现有研究的一般做法,将两子系统的重要程度看作同等重要,所以令  $\alpha = 0.5, \beta = 0.5$ 。  $D$  为耦合协调度,用以衡量新型城镇化同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  $D \in [0, 1]$ ,  $D$  值越靠近 1,两子系统发展协同度越高。当  $D \geq 0.5$  时,视为两子系统发展协调,反之为发展失调。此处借鉴梁雯等<sup>[29]</sup>对耦合协调度区间和协调等级的划分,见表 2 所示。

##### 1. 新型城镇化水平分析

通过熵值法,计算出长三角城市群 27 个城市的新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按省份进行归类,结果见图 1 所示。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但区域差距大。其中,江苏、浙江发展水平较高,而上海、安徽低于区域平均水平。江苏、浙江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大省,江苏省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二,制造业发达,科教资源丰富。浙江省民营经济繁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常年位居全国第一,在数字

经济领域具有领先优势。两省所属城市群经济发达,城镇化率高,人口分布较为均匀,生态环境保护得当,公共基础设施良好且人均占有量较高。而安徽省创新能力强劲,毗邻苏浙,具有先天区位优势,但作为区域内唯一的中部省份,发展水平和基础相对落后,与苏浙沪相比存在不小差距。除此之外,安徽属于典型的“单核”发展模式,资源较为集中在省会合肥地区,造成安徽城市发展差距较大,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相对落后。上海作为世界著名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却并不高,甚至一度落后于安徽。其要因在于,上海经济发达,公共基础设施完备且覆盖率广,但城市发展早,人口密度过于庞大,导致城市臃肿,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人均占用量较低,严重阻滞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因而,作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龙头城市,上海面临着带动区域发展,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及转移等挑战,应考虑借助大城市群治理“大城市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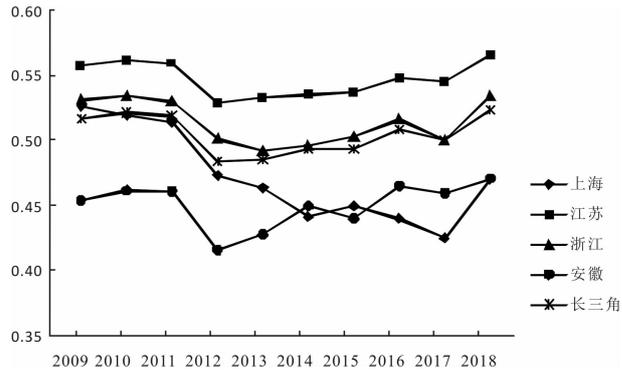


图1 长三角三省一市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

## 2. 物流效率变化分析

用DEAP2.1测算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TFPCH(如图2所示)均值达1.023,即物流效率年均提升2.3%。其中,技术效率平均每年降低1.5%,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皆降低1%。但技术进步平均每年提高3.8%,成为促使物流效率提高的首要原因。具体来看,江苏和浙江TFPCH均值最高,均为1.049,其次为上海,TFPCH均值1.027,以上都超过了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平均水平。表明10年来,苏浙沪地区物流领域的人力、资金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资源结构配置在不断优化。而与之相反,安徽TFPCH均值仅为0.9895,物流效率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略有损失。其要因在于,尽管安徽10年来物流业技术进步平均每年提高3.7%,但其技术效率却平均每年下降4.2%,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下降1.2%和1%。纵观整个安徽地区,仅滁州和宣城两市TFPCH均值高于1,分别为1.006和1.02,物流效

率随时间推移有所提高,其余城市因受技术效率下降影响,TFPCH均值均小于1,物流效率在不断损失,其中,马鞍山和安庆两市损失最大,TFPCH均值分别为0.942和0.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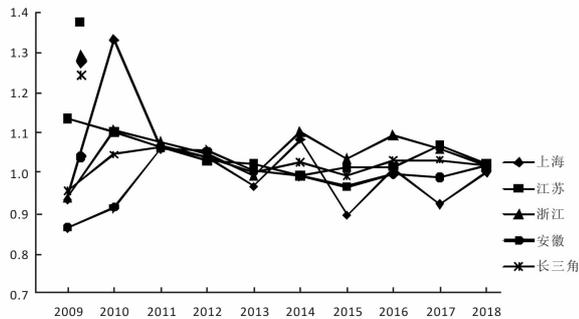


图2 长三角三省一市物流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率(TFPCH)

## 3. 协同发展分析

在运用熵值法先后测算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的综合评价指数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二者的协同发展水平,结果见表3。自2009—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略有上升,但各省市表现不尽相同。上海市协调度均值高达0.788,位居区域第一,但受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整体下降影响,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与十年前相比略有滑落,由良好协调滑落至中级协调。苏、浙两地,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变化不大,协调度均值分别达0.6021、0.6052,略高于区域平均水平,已达到初级协调。而安徽省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低于区域平均水平,10年来均值仅为0.4994。进一步分析发现:整个长三角城市群27个中心城市的新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主要集中在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两个等级上,仅安徽部分地区如池州、马鞍山、铜陵仍处于濒临失调的状态。而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和宁波等城市为中心组成“一核五圈”内,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基本能够达到勉强协调及以上水平,中心城市协调度指数都达到初级协调及以上水平。其中,上海和杭州近五年皆达到中级协调及以上等级。但以发展趋势来看,上述核心城市中仅杭州、合肥协同发展水平有所上升,而上海、南京、苏锡常和宁波等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 4. 区域间比较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是带动全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但三大区域的新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差异。其中珠三角

发展水平最高,10 年均值高达 0.5527;而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水平最低,均值仅为 0.4238。但从发展趋势上看,表现出极为相似的一致性,以 2013 年为分界线,整体呈“U”形发展。究其原因可能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理念提出前,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土地城镇化远远超过人口城镇化;流动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但因户籍制度限制,公共基础设施及服务无法惠及所有居民。三大城市群作为我国最发达区域,城镇化发展矛盾更加明显。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同高速城镇化进程严重脱节,最终导致人民群众不仅不能从快速增长的城镇

化进程中获利,反而原有的福利会受到损失。2013 年 7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2015—2016 年,国家发改委先后分三批次公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名单,其中江苏、安徽全省及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河北和广东部分地区位列其中。自此,我国城镇化建设紧密围绕“以人为核心”的理念,重视居民获得感,强调“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因此,在 2013 年之后的时间内,三大城市群内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开始逐渐上升。

表 3 长三角城市群内中心城市耦合协调度等级表

年份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2009	铜陵	安庆,池州,滁州,马鞍山,芜湖,宣城	常州,合肥,湖州,嘉兴,绍兴,泰州,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金华,南京,南通,宁波,台州,温州,无锡	杭州,苏州	上海
2010	铜陵	安庆,池州,马鞍山,宣城	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湖,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通,宁波,台州,温州,无锡	杭州,南京,苏州	上海
2011	铜陵	安庆,池州,马鞍山,宣城	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湖,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通,宁波,台州,温州,无锡	杭州,南京,苏州	上海
2012		安庆,池州,滁州,马鞍山,宣城	常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湖,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通,宁波,台州,温州,无锡,苏州	杭州,南京,上海	
2013		安庆,池州,马鞍山,铜陵,宣城	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湖,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通,宁波,台州,温州,无锡,苏州	杭州,南京,上海	
2014		池州,马鞍山,铜陵,宣城	安庆,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湖,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通,宁波,台州,温州,无锡,苏州	杭州,南京,上海	
2015		池州,马鞍山,铜陵,宣城	安庆,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湖,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京,南通,宁波,台州,温州,无锡,苏州	杭州,上海	
2016		池州,马鞍山,铜陵	安庆,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无锡,芜湖,宣城,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京,南通,宁波,台州,温州,苏州	杭州,上海	
2017		池州,马鞍山,铜陵	安庆,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湖,宣城,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京,南通,宁波,台州,温州,无锡,苏州	杭州,上海	
2018		池州,马鞍山,铜陵	安庆,常州,滁州,湖州,嘉兴,绍兴,泰州,芜湖,宣城,盐城,扬州,镇江,舟山	合肥,金华,南京,南通,宁波,台州,温州,无锡,苏州	杭州,上海	

表 4 三大区域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物流效率及协调度测度

年份	长三角			京津冀			珠三角		
	$U_u$	$TFPCH$	$D$	$U_u$	$TFPCH$	$D$	$U_u$	$TFPCH$	$D$
2009	0.5181	0.9570	0.5749	0.4294	0.9100	0.5970	0.5688	0.9260	0.6190
2010	0.5224	1.0480	0.5800	0.4398	1.0410	0.6034	0.5656	1.0110	0.6211
2011	0.5197	1.0650	0.5840	0.4469	1.0380	0.6103	0.5636	0.9890	0.6173
2012	0.4849	1.0420	0.5657	0.4069	1.0040	0.5901	0.5327	1.0640	0.6045
2013	0.4865	1.0060	0.5745	0.3896	0.9330	0.5867	0.5395	0.7750	0.6213
2014	0.4943	1.0300	0.5786	0.3890	1.0060	0.5874	0.5434	1.1720	0.6228
2015	0.4945	0.9960	0.5812	0.3957	0.9690	0.5927	0.5333	1.0730	0.6209
2016	0.5098	1.0350	0.5847	0.4016	0.9820	0.5918	0.5516	1.0530	0.6186
2017	0.5014	1.0350	0.5836	0.4074	1.0440	0.5937	0.5574	1.0970	0.6252
2018	0.5244	1.0200	0.5884	0.4238	1.0140	0.5951	0.5711	1.0010	0.6266
平均	0.5056	1.0230	0.5796	0.4130	0.9930	0.5948	0.5527	1.0100	0.6197

物流效率提升方面,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  $TFPCH$  均值分别为 1.023 和 1.01,物流效率呈现增

长态势。而京津冀城市群  $TFPCH$  均值仅为 0.993,物流效率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所降低。进一步

分析发现: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中,由于技术进步较高,弥补了技术效率的损失,使得两区域内总体物流效率得到改善。而京津冀城市群中,纯技术效率上升幅度较大,带动技术效率增长;但物流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在降低,物流效率因此仍在下降。

上述三大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都位于勉强协调以上等级,且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其中,珠三角协同发展水平最高,已达到初级协调,京津冀与长三角紧随其后,处于勉强协调,离初级协调仅一步之遥。对比三大城市群内各个城市 2009 年和 2018 年协同发展等级变化发现,2009 年达到初级协调以上等级有 18 座城市,其中河北仅石家庄、唐山 2 例,安徽 0 例;位于勉强协调以下等级仅 10 座城市,河北 3 例,安徽 7 例。2018 年三大区域城市群中达到初级协调以上等级的城市数量上升为 20 个,新增城市为合肥和邯郸;而仅有马鞍山,铜陵,池州和秦皇岛 4 市的协同发展水平位于勉强协调以下等级。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区域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调发展水平随时间变化趋势总体向好。而从空间上看,区域内部协同发展差距较大,其中安徽省除合肥外,整体协同发展水平都不高,低于其他所有城市群。

## 六、结论与建议

### 1. 主要结论

本文对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及两者协同发展状况进行测算,并与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做对比,得出以下结论:

(1)对新型城镇化评价:从空间上看,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较好,三大区域对比中仅微逊于珠三角城市群。但区域内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江苏和浙江发展水平位居区域前列;安徽经济基础差,发展较晚,发展水平最低,但增速最快;上海因人口密度过大,尽管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完善,但人均拥有量不高,发展水平较低,随着外来人口数量的增长,发展水平有下降的风险。从时间上看,三大核心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建设皆呈“U”形发展趋势,发展节点和“新型城镇化”理念推行时间极为契合。

(2)对物流效率变化评价:长三角城市群物流效率提升最快,进一步分析得出,物流技术效率呈下降态势,而物流技术进步提升较快,驱动区域物流效率平稳增长。表明 10 年来,长三角城市群内物流基础设施及相关硬件在不断改善,但物流企业的运营管理,资源配置仍有所欠缺。从空间来看,安徽省城市群  $TFPCH$  均值仅为 0.9895,物流效率为技术效

率下降所累,是长三角城市群中唯一一个发生效率受损的区域。

(3)对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评价:长三角城市群两者协同发展水平为三大城市群最低,仅达到勉强协调,并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其中,上海协调等级微降为中级协调,江苏和浙江仍维持初级协调,安徽升为勉强协调,但仍为区域最低,影响区域整体协同发展。

### 2. 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和物流效率实现协同发展,能够有效驱动区域经济向更高质量,实现协调发展。为提高两者协同发展,应该分别从改善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物流效率两个方面去探讨。

#### (1)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不同地区阻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原因不尽相同,就长三角城市群而言,安徽地区发展水平整体落后是源于自身经济基础差,发展较晚;而上海地区则恰恰因为经济发达,发展较早,导致人口不断聚集,城市未来待开发空间受限,最终导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应借助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落实,厘清各地区定位,推进地区分工协作。上海应充分发挥自身区位、经济、金融、科技文化、航运等优势,积极投入到国际竞争中去;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尽快转移非核心产业;改善同苏、浙、皖间的交通条件,增进与邻近地域联系。目的是为了提升上海核心竞争力的同时,缓解人口压力,并且辐射驱动周边城市发展。而安徽应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创新活力较强等特点,积极打造承接苏浙沪产业转移示范区,并集中科研力量协同苏浙沪地区,共同攻克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关键核心技术。

#### (2)改善物流效率

尽管长三角城市群十年里物流产业效率年均提升 2.3%,但其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却在降低。在当前国家大力支持“新基建”和“水利、交通等重大工程建设”的新背景下,地方政府应适时完善和升级区域内部物流基础设施,同时继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物流行业降本增效。区域物流业要转变发展理念,改善资源配置,聚焦高质量发展;物流企业应摒弃短视行为,将行业恶性竞争转为广泛合作,借助区位及政策优势,引入先进的物流技术,管理技术及专业人才。安徽省应发挥自身独特的科研创新优势,借助长三角强大的科研创新优势,深入产学研合作,探索发展低资源消耗,高附加值,高信息化、自动化、网络化的智慧物流。

### (3) 加强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2日主持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关键词之一就是“一体化”,即区域一体化发展。因此,区域内部应当强化合作,厘清分工定位,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区域朝着高质量、一体化方向协调发展。根据结论不难看出,安徽省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物流效率提升和两者协同发展等级方面都是属于长三角区域中最落后的地区,与苏浙沪发展差距较大。依据短板理论,为提高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水平,必须要集中资源,改变安徽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抓住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和安徽省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重大历史机遇,快速创造及形成安徽区域产业集聚的有利条件,吸引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承接苏浙沪地区产业转移。同时,合肥作为安徽地区的绝对中心城市和中欧班列节点城市,应积极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间交流,再借助合肥辐射能力,推动安徽地区整体发展。

#### 参考文献:

[1] Tan Y, Xu H, Zhang X.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J]. *Cities*, 2016, 55(6): 82-93.

[2] 陆大道, 陈明星. 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编制大背景的几点认识[J]. *地理学报*, 2015, 70(2): 179-185.

[3] 张文杰. 区域经济发展与现代物流[J]. *中国流通经济*, 2002(1): 13-15.

[4] Yang J C, Deng Z H.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Chinese logi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C]//Yu L, Zhu Q, Chai J, et al. Proceedings of Seven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IEEE. Portugal: [s. n.], 2014: 143-146.

[5] 汪鸣. 国家三大战略与物流业发展机遇[J]. *中国流通经济*, 2015, 29(7): 5-9.

[6] 简新华, 黄锬. 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 *经济研究*, 2010, 45(3): 28-39.

[7] Buhaug H, Urdal H. An urbanization bomb: Population growth and social disorder in citi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 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 2013, 23(1): 1-10.

[8] Cohen B.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trends, future projections, and key challenges for sustainability[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06, 28(1-2): 63-80.

[9] McDonald R I, Weber K, Padowski J, et al. Water on an ur-

ban planet: Urbanization and the reach of urban water infrastructure[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4, 27(1): 96-105.

[10] Cui Y, Cheng D, Choi C E, et al. The cost of rapid and hazardous urbaniz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Freetown landslide disaster [J]. *Landslides*, 2019, 16(6): 1167-1176.

[11] Guan X, Wei H, Lu S, et al. Assessment on the urban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reflections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8, 71(1): 97-109.

[12] 单卓然, 黄亚平.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2): 16-22.

[13] 张占斌. 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3(1): 48-54.

[14] 蓝庆新, 陈超凡. 新型城镇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J]. *财经研究*, 2013, 39(12): 57-71.

[15] 蔡宁, 丛雅静, 吴婧文. 中国绿色发展与新型城镇化: 基于SBM-DDF模型的双维度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130-139.

[16] Farrell.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57, 120(3): 253-290.

[17] Cook W D, Seiford L M.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 Thirty years 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9, 192(1): 1-17.

[18] 刘翠萍, 李武. 中国物流产业效率评价文献综述: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J]. *中国流通经济*, 2016, 30(11): 12-21.

[19] 余泳泽, 武鹏. 我国物流产业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J]. *产业经济研究*, 2010(1): 65-71.

[20] 唐建荣, 唐萍萍. 中国物流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化[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3(6): 43-53.

[21] 范建平, 肖慧, 樊晓宏.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改进EBM-DEA三阶段模型: 基于中国省际物流业效率的实证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 2017, 25(8): 166-174.

[22] 刘承良, 管明明. 低碳约束下中国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17, 37(12): 1805-1814.

[23] 陶婷婷. 产业集聚能促进物流业效率提升吗: 来自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商业研究*, 2017(1): 75-83.

[24] 柳键, 涂建.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低碳物流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超效率DEA低碳物流效率评价模型的实证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7(12): 130-133.

[25] 丁斌, 段艳影. 我国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7(16): 56-59.

- [26] Sun Q.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regional logistics and new - type urbanization: A panel data analysis from 2000 to 2015 for Liaoning Province in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7, 24 ( 16 ) : 14163 - 14175.
- [27] 祝滨滨,吴明东,杜磊. 东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四个着力点[J]. 经济纵横,2016(2) :60 - 63.
- [28] 陈丽芬. 内贸流通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功能作用及促进措施[J]. 中国流通经济,2015,29(6) :21 - 29.
- [29] 梁雯,孙红,刘宏伟.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协同发展问题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8,38(8) :69 - 80.
- [30] 徐海峰. 新型城镇化与流通业、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基于协同理论的实证研究[J]. 商业研究,2019(2) : 45 - 51.
- [31] Haken H. Synergetics[J]. IEEE Circuits & Devices Magazine,1977,28(3) :412 - 414.
- [32] 徐青青,缪立新. 区域物流协同内涵及模式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1) :94 - 97.
- [33] 张许颖,黄匡时.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指标和政策框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24(S3) :280 - 283.
- [34] 时悦,梁净. 城镇化与农业生产效率耦合协调关系:基于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3省数据分析[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18(2) :190 - 198.
- [35] 田逸飘,张卫国,刘明月. 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耦合协调度测度:基于省级数据的分析[J]. 城市问题,2017(1) :12 - 18.
- [36] 曹炳汝,孔泽云,邓莉娟. 长江经济带省域物流效率及时空演化研究[J]. 地理科学,2019,39(12) :1841 - 1848.
- [37] Fare R, Grosskopf S, Norris M.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Repl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 (5) :1040 - 1044.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Research on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Logistics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New Era

LIANG Wen, GU Dachao, YE Renhui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mechanism analysis and index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logistics efficienc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logistics efficiency and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09 to 2018,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Beijing - Tianjin - Hebei regions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relatively high, showing a “U” trend; the overall logistics efficiency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with an average annual increase of 2.3%, but there is a large difference in regional changes; (2) affected by the low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logistics efficiency in Anhui,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still in a barely coordinated state, the lowest among the three core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logistics efficienc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enhancing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and improving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It also emphasizes that Anhui should give a full play to its regional advantag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vitality, concentrate resources, and quickly form a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agglomeration of high - tech industries.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logistics efficienc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 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效应

——投贷联动框架下基于安徽省样本的实证分析

刘妹,李会

(安徽新华学院 财金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摘要:**投贷联动框架下风险投资的加入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产生作用,为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开展提供新方向。遵循“风险投资—技术创新—企业价值—信用风险”的作用路径理论分析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效应,基于KMV模型,利用安徽省样本上市企业2019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的加入明显拉大了科创型企业的平均违约距离,无论是样本企业整体还是各细分行业,风险投资都能够明显地降低科创型企业的信用风险。投贷联动各参与主体需要多方采取措施加强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防范,为投贷联动政策的有效实施、金融驱动创新有效推进提供保障。

**关键词:**风险投资;信用风险;科创型企业;安徽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06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35-06

## 一、引言

科创型企业是我国社会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整体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力量,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高质量科创型企业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科创型企业尤其是科创型中小企业一般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初创期和快速成长期,资金需求量大、死亡率高是其主要特点,这给信贷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成本控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科创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也因此受限。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符合条件的银行机构可以与股权投资机构形成联动,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方式,以解决企业创新活动的资金需求。2016年4月,原中国银监会、科技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圈定了首批投贷联动试点单位。投贷联动是一种银行机构与股权投资机构

(风险投资VC或私募股权PE)共同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新型金融模式,风险投资先行、银行贷款跟进,共同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投贷联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资金需求量大的科创型企业,尤其是科创型中小企业,通过提供“股权+债权”的金融服务方式将其从传统融资困境中解救出来。

信用风险是指企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如约履行债务偿还义务而致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又被称为违约风险。一旦借款企业发生违约行为,会直接导致银行资产受损,极端情况下会给银行的稳定运营带来极大威胁。所以,审慎对待每笔贷款业务、严格把控受信方信用风险一直是商业银行的重点工作。传统信贷模式下,商业银行往往会因为科创型企业较高的信用风险而不愿意向其发放贷款,而在投贷联动模式下,商业银行乐于与风险投资机构形成联动而为科创型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这不是因为在投贷联动内在机制下风险投资降低了科

**收稿日期:**2021-03-20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资助项目“安徽省科创型企业投贷联动风险管控研究”(SK2019A0734);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2019mooc346);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投贷联动支持安徽科技创新研究”(SK2018A0650)

**作者简介:**刘妹(1991—),女,安徽合肥人,硕士,安徽新华学院财金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

创新型企业的信用风险呢? 贷投联动中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机制又如何呢? 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对于科创型企业发展、科技创新与金融有效结合, 以及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贷投联动过程中, 风险投资并不会直接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产生作用, 而是在投入资金的基础上作用于科创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企业价值等, 最后才会对其信用风险水平产生作用。参考蒲实(2003)<sup>[1]</sup>、Chemmanuer(2011)<sup>[2]</sup>等学者的研究, 风险投资作用于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基本路径可以归纳为: 风险投资的参与作用于科创型企业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作用于科创型企业的价值, 企业价值作用于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水平, 最终风险投资的参与作用于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

### (一) 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技术创新过程可分为投入(研发)、转化(生产)和推广(销售)三个阶段, 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需要每一阶段都有相应资源投入。对于各种资源均有限的科创型企业来说, 进行技术创新往往比较困难, 而风险投资则能在技术创新各阶段向科创型企业提供多种资源支持, 进而对科创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作用。

(1) 提供技术创新资金。在技术创新的各阶段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并且技术创新的投入资金具有回收期长、收益不稳定的特点, 科创型企业的自有资本积累速度和规模往往很难达到技术创新的资金需求。受信贷配给和抵押物的约束, 科创型企业通过银行信贷获得充足资金的可能性也比较低。而风险投资对企业可抵押资产没有明确要求, 并且是一种期限比较长的权益资本, 能够满足科创型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各阶段资金需求特点, 为其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提供资金保障。

(2) 改善企业治理结构。风险投资的进入改变了科创型企业原有的股权结构, 各种股东及利益主体之间的制衡关系发生改变, 企业的整体治理结构发生变化。较大比例的风险投资进入科创型企业使得风险投资机构成为企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甚至是主导者。作为科创型企业主要利益相关者, 在高回报率驱使下, 风险投资机构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高的技术创新发展策略, 增加技术研发投入、推动企业快速成长。同时, 风险投资的加入挤占了科创型企业原来股东和经营者的股权比例, 此时股东和企

业经营者也会积极推动技术创新, 推动企业快速成长和挂牌上市, 为风险投资退出提供渠道, 进而重新获得企业控制权。

(3) 提供增值服务。为了在退出时获得尽可能高的投资回报率, 风险投资机构还会在资金支持、企业治理之外通过提供增值服务的方式推动科创型企业成长与发展, 在科创型企业技术创新、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提供帮助和规划, 比如帮助拟订和完善组织管理规章制度、帮助产品推广和企业形象推广等, 为科创型企业的稳定发展与成长保驾护航。

### (二) 技术创新对科创型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

技术创新为科创型企业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带来更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 推动其快速成长和价值提升。根据MM理论, 当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 相同风险水平下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期望报酬率, 任何企业都不可能获得套利机会。如果存在一个投资回报率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资本成本)的投资项目时, 在生产要素可自由流动状态下, 市场中的其他企业会纷纷选择投资于该项目, 最终会使得该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趋于市场平均收益率。而如果企业无法获得一个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项目, 则其很难实现价值较快增长。所以, 企业为了实现价值的较快增长, 必须能够寻找到高投资回报率且其他企业很难较快进入的投资项目。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新技术为科创型企业带来了优势竞争力, 并且很难在短期内被其他企业所复制和模仿, 限制了其他企业进入创新项目。尤其当生产要素流动性有限时, 技术优势会为科创型企业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只要技术创新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大于市场平均收益率, 科创型企业就存在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并会在一定时期内掌握新技术的竞争优势, 助推其实现价值增长。同时, 技术创新成果还可以通过使用权、所有权有偿转让的形式给科创型企业价值带来增长。所以, 技术创新可以提升科创型企业的价值。

### (三) 企业价值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机制

科创型企业价值提升对信用风险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 偿债能力提升。科创型企业价值越大, 则其未来发展潜力越大, 风险投资机构作为股东可获得的资本回报率就越高, 尤其是处于价值增长长期的科创型企业更容易受到股权投资者的青睐。股权投资作为一种实收资本提升了科创型企业的股本占比, 其资产负债率因此下降, 长期偿债能力得到强化。因企业价值提升而获得的风险投资是一种长期

资本,在短期内不会退出,为科创型企业中短期债务偿还提供了更多保障,其违约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此外,股权资本的加入为科创型企业提供了更充足的营运资本,其财务状况及支付能力会因此得以改善,短期偿债能力进一步提升,进而信用风险水平降低。

(2) 盈利能力提升。科创型企业价值的大小是其盈利能力的主要保障,决定着其未来现金流量。科创型企业能否如约偿还债务主要取决于其偿债能力和偿还意愿,而债务偿还是未来的事务。科创型企业盈利能力提升使得未来债务的偿还得到保障,其一,盈利能力的提升给科创型企业带来了更加稳定的现金流,为债务本息的偿还提供了资金流保障;其二,充足的现金流为科创型企业日常运营提供了

更多保障,其债务偿还意愿相应更强。所以,企业价值的提升强化了科创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提升了其债务偿还能力和偿还意愿,降低了其信用风险水平。

(3) 违约概率降低。根据 Merton 理论,可以将企业股权看成是以企业资产为交易对象、债务面值为执行价格的一种看涨期权<sup>[3]</sup>。在债务偿还日,如果企业资产价值低于其负债量,则企业会放弃行权,不履行债务偿还义务,发生违约行为;如果企业的负债额低于其资产价值,此时企业会选择行权,履行债务偿还约定。所以,当科创型企业的价值上升时其资产价值上升,资产与负债间的距离变大,进而其违约概率降低。



图1 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路径

综上所述,风险投资的加入,促进了科创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进一步提升了其企业价值,企业价值的提升为科创型企业债务的偿还提供了保障,降低了其违约风险(图1)。所以,在投贷联动下,风险投资可以降低科创型企业的信用风险。

综上分析提出,假设:风险投资能够降低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

### 三、实证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了投贷联动框架下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效应,下面基于 KMV 模型,利用挂牌 A 股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样本企业数据对前文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 (一) KMV 模型信用风险评价理论

##### 1. KMV 模型基本原理

Merton 于 1974 年提出了银行贷款损益和看跌期权空头损益存在同构关系后,美国 KMV 公司于 1997 在 Merton 观点基础上从借款企业股权所有者角度构建了基于期权理论的 KMV 模型,用于衡量借款企业的信用风险。该模型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同,成为评价企业信用风险重要的方法之一。KMV 模型指出,企业股东的损益主要决定于企业资产价值和债务价值之间的关系,而一定时间里债务价值通常是不变的,所以股东损益主要取决于某一时点的资产价值。在债务到期日,当企业资产价值大于其债务价值时,债务偿还后会剩余部分收益分配给企业股东;当债务价值大于资产价值时,企业不再具备如约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当企业破产清算时,股东会因为承担有限责任而最大损失仅为其最初投资额。

债务到期日企业股东损益可表示为:

$$SY_s = \begin{cases} C_v - C_d, C_v > C_d \\ -I, C_v < C_d \end{cases} = \text{Max}(C_v - C_d, -I) \quad (1)$$

其中,  $C_v$  为企业资产价值,  $C_d$  为企业债务价值,  $I$  为股东最初投资额。

看涨期权多方在期权到期日的损益可表示为:

$$SY_B = \begin{cases} P_T - P_s, P_T > P_s \\ -O_p, P_T < P_s \end{cases} = \text{Max}((P_T - P_s) - O_p, -O_p) \quad (2)$$

其中,  $P_T$  为股权标的资产价值,  $P_s$  为期权的执行价格,  $O_p$  为期权价格。

比较式(1)和式(2)可以发现,企业股东在债务到期日的损益与看涨期权多方在期权到期日的损益几乎一致。所以, KMV 模型将贷款企业的股东权益看成是债务到期日为期权到期日、资产价值为投资标的、债务价值为执行价格的欧式看涨期权。建立以资产价值和资产波动率为参量的函数:

$$\overline{C_\phi} = F(C_v, \bar{r}, \overline{T-t}, \sigma_r) \quad (3)$$

其中,  $\sigma_r$  为资产波动率,  $\bar{r}$  为平均利润率,  $T$  为债务到期日,  $\overline{T-t}$  为期权到期时间。

当资产价值低于债务价值的临界值(违约点)时,企业将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此时会发生违约行为。KMV 模型中将企业资产价值的变化设定为服

从正态分布,并结合企业资产价值的预期变化率估算出  $T$  时的资产价值,最后通过计算  $T$  时资产价值与违约点的距离评价企业的违约水平。

## 2. 信用风险评价步骤

### (1) 计算企业资产价值和资产波动率

构建以资产价值和资产波动率为参量的函数方程:

$$\phi = C_u f(\omega_1) - C_d e^{-\zeta(T-t)} f(\omega_2) \quad (4)$$

$$\ln \frac{C_u}{C_d} + \left( \zeta + \frac{1}{2} \sigma_\tau^2 \right) (T-t)$$

其中,  $\omega_1 = \frac{\ln \frac{C_u}{C_d} + \left( \zeta + \frac{1}{2} \sigma_\tau^2 \right) (T-t)}{\sigma_\tau \sqrt{T-t}}$ ,  $\omega_2 = \omega_1 -$

$\sigma_\tau \sqrt{T-t}$ ,  $f(\cdot)$  为正态分布函数,  $\zeta$  为无风险利率水平。

从弹性角度搭建股价波动率和资产波动率的关系表达式:

$$\frac{\sigma_\phi}{\sigma} = \theta_{\tau, \phi} = \frac{d\phi}{dC_v} \times \frac{C_v}{\phi} \quad (5)$$

$$\sigma_\phi = \frac{d\phi}{dC_v} \times \frac{C_v}{\phi} \times \sigma_\tau \quad (6)$$

其中,  $\sigma_\phi$  为股价波动率。

而后用对冲比率 ( $\Delta$ ) 构造无风险对冲组合,即

$$\Delta = \frac{d\phi}{dC_v}, \text{其在数值上 } \Delta = f(\omega_1)。$$

最后求解出:

$$\sigma_\phi = f(\omega_1) \frac{C_v}{\phi} \sigma_\tau \quad (7)$$

联立公式(4)和公式(7)计算出资产价值和资产波动率。

### (2) 测算企业违约距离

当资产价值小于债务价值时企业并不是必然产生违约行为,它会在一段时间里尽量改善自身财务状况并偿还债务, KMV 模型将违约点设置为短期负债价值和总债务价值间的某一个数值,即:违约点 ( $\omega$ ) = 短期负债 + 0.5 × 长期负债。最后测算出违约距离 ( $D$ ):

$$D = \frac{\phi(C_v) - \omega}{\phi(C_v) \sigma_\tau} \quad (8)$$

(二) 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作用效应的实证

####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随着安徽省融入长三角经济区,大力依托金融支持推动区域技术创新成为安徽省近年来的重点工作,尤其以省会合肥市为代表的城市成为安徽省大力吸引、聚集科技创新型企业的重点地区,以此推动全省的创新发展。在此背景下安徽省的科创型企业不断发展,不但数量逐年增长,质量也快速提升,尤

其在投资联动改革下,风险投资的加入进一步满足了科创型企业尤其是科创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需求,所以,可以选择安徽省的科创型企业数据对前文理论分析进行实证。科创型企业是科技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一种统称,目前学界并没有在科创型产业的具体领域上达成共识,但绝大部分学者认为科创型产业主要包括信息软件、先进装备(制造)、物联网、生物制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行业,本文样本企业均选取自这些产业。本文样本为挂牌于 A 股的安徽省企业,相关指标数据选择 2019 年数据。剔除 2019 年存在停牌、数据严重缺失和异常的企业,最终选取 98 家样本企业。

为了凸显风险投资对信用风险的作用,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有风险投资和无风险投资两组。对于有无风险投资的确定,参考 Stefan Blochwitz (2000)<sup>[4]</sup>、张大斌(2015)<sup>[5]</sup> 等学者的研究,将企业前十大股东名称里带有“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字样的认定为有风险投资,没有的则认定为无风险投资。最终样本企业中有风险投资的有 37 家,无风险投资的有 61 家,具体各行业及有无风险投资的样本企业分布如表 1 所示。所有数据收集整理自 CSMAR 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运用外推法进行弥补,所有计算过程由 Eviews8.0 实现。

表 1 各行业及有无风险投资样本企业分布表

行业	有风险投资	无风险投资
信息软件	5	7
先进装备	2	5
物联网	7	10
生物制药	4	7
节能环保	5	8
新能源	4	6
新材料	5	8
现代物流	3	5
文化创意	2	5
总数	37	61

## 2. 相关指标选取与计算

### (1) 股权价值

与国外上市企业不同,我国上市企业股票有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之分,企业的股权价值包括流通股价值和非流通股价值两部分,其中非流通股价值的测算比较困难,目前学界尚未对此形成统一观点。本文利用彭伟(2012)<sup>[6]</sup>、谢赤(2018)<sup>[7]</sup> 等学者提出的、目前学界认可度比较高的回归预测法,首先利用上市企业前一年度的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净资产增长率等核心指标对交易价格进行回归,然后利用 CAP 曲线和 AR 比率计算出股权价值。经过推算,科创型企业的股权价值可以表述为:股权价值 = 流

流通股市值 + (0.98791 + 0.61507 × 每股净资产) × 非流通股数。

### (2) 股价波动率

计算样本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日收益率,并计算股价日波动率:  $\overline{\sigma}_\phi =$

$\sqrt{\frac{\sum_{i=1}^n (\mu_i - \bar{\mu})^2}{n-1}}$ , 其中  $\mu_i, \bar{\mu}$  分别表示单个企业股票收益率和平均收益率,而后利用股价日波动率换算出年度波动率:  $\sigma_\phi = \overline{\sigma}_\phi \sqrt{T}$ , 其中  $T = 240$ 。

### (3) 债务期限和无风险利率

本文样本数据期限为 1 年,所以债务期限也设定为 1 年。在众多投资产品中,1 年期国库券的风险是最低的,被学界众多学者看成是一种无风险投资产品<sup>[8]</sup>,所以本文选用 1 年期国库券收益率作为无风险利率的替代值。

### (4) 债务账面价值

企业债务账面价值即为其负债总额,即为科创型企业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之和。

### (5) 资产价值及资产波动率

企业的资产价值和资产波动率无法直接获得,所以需要在股权价值、股价波动率、无风险利率、债务账面价值等指标确定后,构建方程组:

$$\begin{cases} \phi = C_d f(\omega_1) - C_d e^{\xi(T-t)} f(\omega_2) \\ \sigma_\phi = f(\omega_1) \frac{C_v}{\phi} \sigma_\tau \end{cases} \quad (9)$$

求解方程组(9)得到资产价值和资产波动率。

## 3. 违约距离计算与分析

根据公式(9)分别计算出样本企业的资产价

值、资产波动率和违约点,而后根据公式 8 计算出全部样本企业的违约距离及各行业的平均违约距离(表 2)。就全部样本来看,有风险投资的科创型企业的平均违约距离为 0.1808,明显大于无风险投资的 0.1177,有风险投资的违约距离高出无风险投资的违约距离 53.61%,有风险投资的科创型企业的违约风险水平更低,风险投资的加入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科创型企业的信用风险水平,所以上文假设为真命题。结合图 2 从各细分行业平均违约距离来看,有风险投资的各行业平均违约距离均在不同程度上大于无风险投资的各行业平均违约距离,这进一步论证了上文假设的真实性。其中文化创意、新材料、物联网等行业有风险投资企业的平均违约距离均在 0.2 以上,是信用风险绝对水平最低的行业。而就有无风险投资间的变化率来看,生物制药、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行业的有风险投资科创型企业平均违约距离比无风险投资科创型企业的平均违约距离高出的比例较大,均在 50% 以上,说明风险投资进入这几个行业中的科创型企业对信用风险的降低作用更为突出。

表 2 样本企业各细分行业平均违约距离

行业	有风险投资	无风险投资	“有对无”变化率
信息软件	0.1904	0.1361	39.90%
先进装备	0.1255	0.1009	24.38%
物联网	0.2251	0.1518	48.29%
生物制药	0.1173	0.0618	89.81%
节能环保	0.1805	0.1205	49.79%
新能源	0.1266	0.0841	50.54%
新材料	0.2305	0.1513	52.35%
现代物流	0.1938	0.1105	75.38%
文化创意	0.2377	0.1422	67.16%
全部	0.1808	0.1177	5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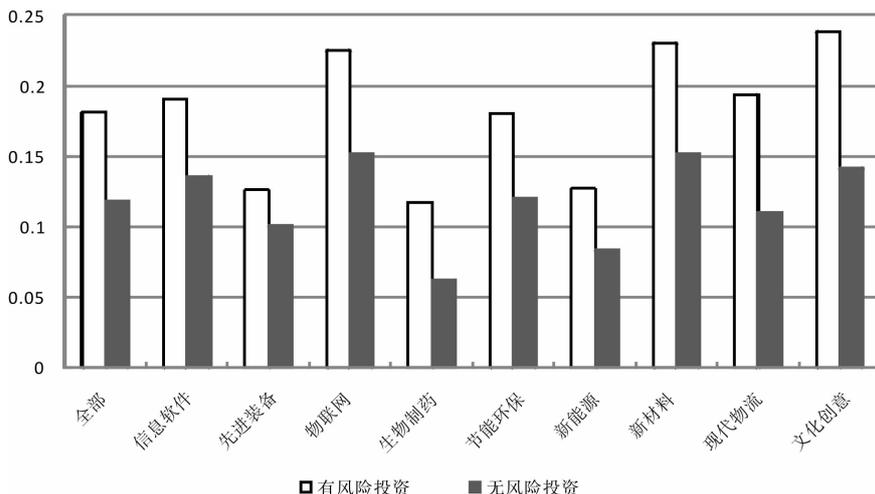


图 2 各细分行业平均违约距离柱状图

## 四、结论与建议

投贷联动政策是促进我国科技金融发展和“创

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尝试,商业银行与股权投资的联动为科创型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模式。在投贷

联动内在运行机制作用下,风险投资的加入对科创型企业的信用风险产生作用,为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开展提供新的方向。

为了更好地保障投贷联动政策的实施,推动我国金融驱动创新,可以从投贷联动各参与主体角度出发制定相关政策以加强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防范。

(1) 科创型企业应注重自身经营管理质量的提升,除了需要通过高素质管理人才的引进及内部培养等手段提升自身经营管理团队素质外,还应该不断开放股权、降低股权集中度,给风险投资机构的加入提供空间,完善其内部治理结构,从自身角度出发控制信用风险。

(2) 风险投资机构需要构建一套系统、科学的目标投资企业筛选机制,对科创型企业的选择除了需要符合政策导向外,应该尽量选择那些处于成长阶段、企业价值提升较快的科创型企业作为投资对象,为商业银行信贷的加入提供第一道信用风险防火墙。

(3) 商业银行应加强对风险投资机构与科创型企业银行账户的监管,比如风险投资机构追加的专项偿贷资金必须存入商业银行的监管账户、科创型企业 IPO 的募集资金账户必须在贷款银行开设等,必要时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将监管账户内的资金用于清偿贷款,以尽量控制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发生概率,确保资金流向无损自身利益。

#### 参考文献:

- [1] 蒲实,杨海芬. 信用在风险投资中的效用与行为分析[J]. 经济体制改革,2003(6):95-97.
- [2] Chemmanur T J, Krishnan K, Nandy D K. How Does Venture Capital Financing Improve Efficiency in Private Firm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1, 24(12):4037-4090.
- [3] Merton R C. On the pricing of corporate debt: The risk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J]. Journal of Finance, 1974, 29(2):449-470.
- [4] Stefan B, Thilo L, Mikael N. Benchmarking Deutsche Bundesbank's Default Risk Model, the KMV Private Firm Model and Common Financial Ratios for German Corporations [J]. Supervision, 2000(8):1-5.
- [5] 张大斌,周志刚,刘雯,等. 上市公司信用风险测度的不确定性 DE-KMV 模型 [J]. 系统工程学报, 2015(2):165-173.
- [6] 彭伟. 基于 KMV 模型的上市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研究 [J]. 南方金融, 2012(3):23-30.
- [7] 谢赤,凌毓秀. 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度量及传染研究:基于修正 KMV 模型和 MST 算法的实证 [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8(3):2-8.
- [8] 冷奥琳,王梦迪,贾明. 无风险利率影响担保市场交易结构的效应研究 [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9(7):1635-164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The Effect of Venture Capital on the Credit Risk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amples from Anhui Provinc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vestment-loan Linkage

LIU Mei, LI Hui

(Schoo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of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88, China)

**Abstract:** The participation of venture capital under the investment-loan linkage framework has an effect on the credit risk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enterprises, and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credit business. Following the theory of action routes of "venture capital-technological innovation-corporate value-credit risk", it analyzes the effect of venture capital on the credit risk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KMV model,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Anhui Province in 2019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tes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addition of venture capital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average default distan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Whether it is the sample enterprise as a whole or in various sub-sectors, venture capital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redit risk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The participating entities of the investment-loan linkage need to tak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of credit risk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a guarante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vestment-loan linkage policy and the effective promotion of financial-driven innovation.

**Key words:** venture capital; credit risk;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investment-loan linkage

# 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中的应用

卢宇, 郑依婧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在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下,各地各级法院产生了诸多人工智能智慧化应用的具体成果,例如在法官裁判中植入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在证据运用中利用人工智能增强证据的要件化和逻辑化,在案件分流中运用人工智能推动类案分流系统建设。然而,囿于技术发展有限,人工智能目前对诸如如何科学判断证据证明力及合法性、如何缩小地域间差异、如何形成统一的类案划分标准等司法实践问题仍然束手无策,因此宜首先在简单案件、案件程序适用、庭审记录等审判工作范围内进一步推广人工智能应用,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技术水平、攻克技术壁垒,这样才能够全面建立智能信息化的审判模式,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和数据分析。

**关键词:**司法裁判;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智慧法院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07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41-06

2017年7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由国务院出台,其主要内容就是指出了国家准备把人工智能的应用发展提高 to 战略层面,深化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改革,加强建设智慧化的法律知识平台,使审判、司法人员和数据处于公开和监控的状态,促进审判现代化的建设。目前杭州、广州和北京已经建成了互联网智慧法院,在与智慧法院相关的表述中,“智能化”“信息化”“大数据”等都是热门词汇,当前的信息化审判可以被概括为电子文书—智能语音—智能服务的模式。

通过对人工智能在法学领域应用的研究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在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对其创造的物品是否享有知识产权,是否享有法律上的权利,是否承担法律上的义务,以及为法律职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sup>[1]</sup>,在建设智慧法院中的应用等方面研究得比较广泛。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法官裁判方法嵌入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证据运用以及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类案类判等方面的应用<sup>[2][48]</sup>,并

探讨其面临的挑战,从而提出解决方案助力电子化审判模式的建立。

## 一、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的应用发展历程

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方法和应用系统,去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的一门科学技术。所涉及的领域涵盖识别语音、图像,以及处理自然语言,还有机器人等。<sup>[2][67]</sup>20世纪中期图灵认为机器完全可以像人类一样有自己的想法,到了1956年约翰·麦卡锡第一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初衷是为了模拟人脑的智能,尽可能地避免人为的错误。经过科学家们几十年的研究,人工智能已经告别了符号式的时代,进入了“人工神经网络”时期,完全颠覆了符号化时代的程式<sup>[3]</sup>,通过计算机对数据进行联结式的深度学习,将一些抽象的特征提取出来,经过测试之后输出。人工智能现在可以自己通过对大量数据的读取建立符号与逻辑公式供思维过程的使用。

2015年7月“智慧法院”这一名词首先由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提出。2016年,智慧法院的建设又被列入信息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和

收稿日期:2021-02-20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语境下宪法财产权制度创新研究”(19BFX016)

作者简介:卢宇(1978—),女,江西南康人,博士,华东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十三五”信息规划。2017年2月,最高法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16年工作报告及2017年工作重点》等多个文件。为了响应国家战略和规划,实现网上办理业务、工作流程全公开、智能化服务渗透至各个环节,各级法院目前都在加快智慧法院建设的步伐,比如北京市高院的智能化研判系统“睿法官”,重庆市高院的“云中心”数据库,还有上海市二中院的“Court to Judge”智能办案系统,等等。上海市高院在人工智能助力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将科学技术运用与机制改革的融合作为主要手段,努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并研发出了相关的改革软件——“刑事206”系统,将证据判断标准通过模型引入智能办案系统。可以说,上海市高院的做法开创了司法审判智能化的先河。在研发推出智能化的刑事审判系统之后,上海市高院也准备在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开展办案系统的研发。

现阶段关于智慧法院的研究也是非常热门,从中国知网上的数据来看,在2016年以前,人工智能和法学领域的交叉研究增长得十分缓慢,而在2017年之后则是突飞猛进,特别是在2018年有许多文献是研究审判智能化的理论问题的。<sup>[4]</sup>

从现阶段来看,人工智能运用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包括立案阶段、分流案件、庭审过程和执行过程。立案时,智能辅助系统可以帮助法官对材料进行预审,将案件进行分流,对数据进行运算,对巨大差异进行预警,还可以将一些纸质版的材料转换为电子档,根据材料中的信息确定是否能够立案受理,确定管辖法院等;依据证据的种类和数量、法律关系的复杂程度对案件进行分流;通过智能系统完成自助缴费、电子送达等诉讼活动。在分案过程中,利用协助分案系统,使案件的分配机会均等、随机,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使案件流转速度加快。审判时,人工智能系统的主要功用就是对证据进行初步核查、采集数据、检索法律条文,以及对材料进行归纳整理,还能够语音识别庭审对话,自动生成笔录,借助编程技术对案件辅助审阅、形成预判,为法官查询相关法律规定、参考案例等,还可以对案情简单的案件直接进行网上审理。在作出裁判时,推理的标准和方法统一化是智能系统的主要特征,系统通过推送一些相似案件的判决为法官提供裁判指引,避免裁判结果之间出现较大的差异,进而促进司法裁判公正性的实现。在执行过程中,对信用评估系统进一步完善,制定惩戒机制,同时对大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实时共享信息,与社会中的其他机构相互配合,共同规范诚信体系。<sup>[5]</sup>

## 二、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具体应用

现阶段,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在各地法院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广应用,下面就以具有代表性的应用案例来展现人工智能在法院审判中的应用。

### (一)法官裁判方法植入人工智能辅助办案的路径

作为一种智能化的辅助审判工具,人工智能办案系统要满足审判者的切实需求,就必须将裁判方法引入智能系统,实现其真正的“智能”。

首先,裁判方法和标准的统一化为智能系统提供建模的前提基础。在实践中,司法裁判的方法是通过审判经验和法学理论的总结而共同作用产生出来的,这种方法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并经过特定系统的数据分析而存在的经验规律,将这种裁判的方法植入到智能系统中,对智慧法院中的智能审判建设大有裨益。虽然有关裁判方法和适用法律的研究较少,但在一些领域仍有一套完备的裁判标准,例如民事审判中的九步要件审判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以演绎推理的内在逻辑为基础,根据裁判的逻辑结构,将本身具有抽象性的三段论具体化,对抽象的法律规定具化为可度量的要件,这种裁判的方法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可以作为一个重要条件供系统去识别法言法语。

此外,研发智能化的辅助办案系统可以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化案件为着手点,像民事案件中的债务纠纷、合同纠纷、离婚案件等,刑事案件中的盗窃、抢劫、故意杀人等,可以对这些不同类别的案件的特征、裁判要旨及方法、构成要件进行归纳总结,并通过机器的深度学习对民事和刑事案件裁判的统一方法进行总结,以此为基础逐渐促进智能系统在裁判方法方面的深度学习。

其次,裁判文书中有关裁判方法的表述规范化有助于为深度学习提供参考识别的样本。作为裁判方法的具体呈现方式,裁判文书为深度学习提供直接的来源范本,如果要增加识别度,就必须使裁判文书表达的方式和内容足够的清晰规范。比如在民事案件中,裁判方法以九步要件审判方法为主,而其判决书的程式也是与这种方法的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该方法中的第一步为确定诉讼请求,这也是起诉状、判决书最先明确的内容,因为诉讼请求是确定法律关系的出发点,所以将诉讼请求放在文书的第一项中,从而有助于引出下边的论证。总之,将法律文书的格式统一规范化,可以帮助智能系统更准确地识别裁判要件。

最后,建立人工智能办案系统的途径要以裁判

方法的深度学习为主。现阶段,深度学习是所有机器学习中最先进的一种方法,并以神经网络为其核心模型,李开复曾对深度学习的运行机制进行解释,深度学习是一种数学模型,主要用于解决生活中特定的某一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将计算机要学习的一堆数据放入一个数据处理网络中去,之后经过这个处理网络计算,检验其是否满足要求,如果满足,就将这个数据处理网络作为最终模型来使用,但是如果不满足,就要不断地调整各种参数直到符合要求,是一种理论和经验共同作用的建模方式。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是以深度学习成熟的裁判方法为基础的,这也是人工智能司法化的捷径。具体的做法就是,对一些法律文书或者案例之类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经过神经网络对这些数据进行核验,最后得出可以应用在相似问题处理上的模型。现在的司法智能辅助系统虽然具备专业的数据库并且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和检索,但是对于如何将法官的裁判方法植入进智能系统仍然是一项难题。所以,如何让机器利用自身处理自然语言的能力进一步去识别文书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出裁判的规律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智能系统的设计者应该把计算机调整到可以辨别个案具体信息的模型上,来满足信息的处理要求,然后通过对程序的设定完成输入和输出数据时的知识问题展现。如果完成了以上工作,就可以很顺利地运用语法结构来处理接下来的任务了。分析识别案件并对信息进行处理需要以特定的裁判规律和方法作为裁判的模型,而这种裁判方法需要体现出法学的方法论思想,所以选取专业科学的方法论就很关键了。目前深度学习的技术发展得比较成熟,模型也是多种多样,可以较好地解决司法智能化的相关问题,甚至还可以对存在的难题提出解决的模型。例如,在某些任务中,对自然语言的处理需要先进行分词的处理,被使用的主要有词袋、FastText 等模型,但这些模型也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缺点,比如只考虑了词出现的频率,没有注意到语法、句式等特征,这些缺点应该参考进行裁判时的思维过程进行改进。

## (二)人工智能在证据运用方面的应用

在2016年,贵州省制定了全国首项关于证据标准的指引,方便公、检、法三机构办案,并将要件化和逻辑化的证据标准植入到智能系统中,统一证据的运用,以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还有,在2017年,上海市高院也将统一的、法定的证据标准引入到办案辅助系统中,从而有利于实现统一证据适用标准的目标。

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经历了求解问题、专业人员辅助系统、机器学习、人工神经网络,以及对模式的识别和人工生命等阶段,即使这些尝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人的思维过程,但在识别自然语言和直觉方面、非确定性和形象思维方面仍有欠缺,不能够完全达到人类思维的水平。审查证据的时候,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运用数学运算等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但如果遇到比较复杂的形象思维时,比如,想象类比之类的对图像进行直接感知的判断在认定证据时运用得更为广泛,而人工智能此时还未达到这种形象思维的水平,还有一些关于价值的判断、政策的考量也难以通过智能化系统实现。据此,人工智能很难独立完成复杂案件的证据运用的工作,只能起到一些辅助性的帮助作用。

此外,人工智能并不是可以解决所有的证据判断问题。人的思维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抽象与形象思维,还有社会性思维、灵感等,值得一提的是,逻辑思维是被研究得最为广泛的,计算机的发展就是以数理逻辑学为基础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思维研究仍然缺乏。人工智能是算法中的一种类型,人的思维中不仅包含了算法,还有社会性思维、灵感等,而在思维方面的运行机理连人类自己都没有弄明白,又怎么能够要求人工智能很好地进行思维的模拟呢?尽管计算机的计算水平可以超越人脑,但是算法属于演绎推理的范畴,是不会完成人们形象与抽象思维、灵感思维等之类的活动,因为思维无法准确地用语言表述出来,所以算法也就只能解决有限范围内的问题了。

在现阶段,使用人工智能完成证据的审查工作,方法主要是先输入数据,进行机器学习,然后通过大数据技术将证据的具体要素转化为数学模型供系统使用,进而完成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资格、证明力等判断工作。但在判断证据资格、证明力以及证明责任承担和证明标准的认定方面,人工智能只能在很狭窄的范围内运用,因为这些方面的判断不仅仅要参考法律规定,还要有价值判断、直觉、逻辑判断等方面的辅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所以,人工智能在不善于模拟人类思维过程的条件下,就只能在特定范围内进行判断,比如,通过计算机可以计算个别证据的似真概率,核验各个证据之间是否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然而在需要运用想象、直觉、灵感思维等方面时,人工智能就力不从心了。

虽然在证据的运用方面,人工智能不能够按照设想完美地完成各项任务,但其在诉讼过程中对证据的认定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在庭审准备或者是庭前会议时,审判人员可以运用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对证据进行预先的判断,为明确争论点和庭审做出充分的准备,但在这个阶段并不能把对实体事实的认定作为根本目的,因为这样很可能导致庭审被架空,因此,需要对辅助系统中关于证据判断这一功能在庭审前运用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说仅仅在证据的规格、瑕疵、是否矛盾这些方面可以使用智能系统,而在证明力以及案件所有证据的判断中不能够使用辅助办案系统。到了庭审时,法官需要通过庭审过程形成自由心证,这是庭审实质化的要求,而且要遵循直言词的原则,保证证据的调查和裁判的形成都是在法庭中完成的,如果在庭审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一定会对法官在证据判断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在庭审阶段不应该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但是如果某一案件的证据繁杂,法官难以当庭形成自由心证,此时可以在庭审之后,借助于智能辅助系统完成自由心证。因为庭审已经进行完毕,原告和被告也都进行过举证、质证的活动,所以在这个阶段可以对辅助办案系统的所有功能进行运用,就证据判断方面来说,像全案证据证明标准的判断、单个证据的证明力的判断等都可以在庭审之后进行使用。此外,还可以把各个证据和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输入智能办案系统中,防止必要信息的遗漏。

### (三)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类案类判

人工智能和法律大数据的结合引发了司法领域的技术性革命,类案类判系统的研发可以提高法官的审判效率,极大地满足了一线审判人员的需求。所谓类案类判,就是指对类似的案件类似处理,通过特定的方式寻找与正在审理的案件相似的案件,为法官提供参考指引。

但是在类案类判方面还是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说,有一些推送案件的系统不能够准确推送所需案件,所检索出来的案件出处不明确,级别混乱,系统本身的实践差异也很大,等等。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技术难题未被攻破、数据来源狭窄、法律体系不完善等。此外,类案类判系统是不是可以替代指导案例或者司法解释,这还是未知的,值得进行探讨。所以,很有必要仔细考量法律与算法的结合程度。从微观角度来看,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可以帮助法官扩展思路,提供裁判参考;从宏观层面来看,类案类判系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类似系统的研发可以统一裁判标准,有利于对裁判的监督和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通晓类案类判技术的人才较少,物力、财力投入也不够多,人工智能时代未

完全到来,类案类判系统还未普遍适用,所以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对智能化的类案类判系统进行改进。

第一,提高技术水平。对于数量庞杂的案件,如果仅仅依靠传统检索案件的方式搜寻案例会增加时间和人力成本,所以,现阶段改革需要由主动搜索案件向系统推送案例进行转变,从而使审判人员能够高效准确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案件。这就要求智能化辅助系统的算法要有质的飞跃,还要考虑法律领域的特殊性,找到算法与法学的特征完美结合的平衡点,在不久的将来,类案类判系统有赖于不同算法的结合,尤其是类案推送功能的发展,所以说,不能仅仅只研究某一算法。

第二,建立真正的法律数据库迫在眉睫。没有强大的案例数据库作为基础,类案类判系统的发展就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要将各地法院关于历史裁判的档案统一进行整理、归纳、汇总这项任务作为重中之重,对现阶段的法律文书也要加强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快信息基础化的工作完成。

第三,促进类案本身的规范统一化。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需要改善,首先,对案件的标签化做进一步的细化工作。吸纳更多的法律专业人员或者具有经验的法律实务人员加入对法律事实“标签化”的工作中。其次,进一步明确智能化系统中的案件来源、层级,清晰划分案件是属于指导性的案例,还是属于公报或者典型性的案例,根据案件来自哪一个地区、判决的效力如何、是否经过了二审程序等进行区分归纳。

第四,建立国家统一的类案类判管理标准和机制。虽然最高法已经研发出了一套智能化的类案推送系统,但目前只是在个别法院进行试点,其他法院也有自己开发的类案类判系统,如果这些系统中的类案都不相同的话,就很难达成裁判尺度和标准的统一,因此,要加快类案系统的统一标准化管理。

第五,应尽快构建出一套国家标准实现检索和推送相似案件,推动相似案件相似处理的智能化辅助办案系统的普遍适用。通过智能技术辨别数据库中的案件的质量高低、权威性高低,同时还要建立一套监督提醒机制,如果法官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与推送的案件中的大多数案件判决结果差距过大,系统要及时提醒法官注意。

### 三、人工智能应用在司法裁判中存在的问题

诉讼法规范的仅是传统的诉讼活动,而对智能化和电子化的诉讼活动并无具体规定,所以法律不具有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也正是如此,人工智能在诉讼过程中的应用问题也是很突出的。

### （一）人工智能运用于刑事诉讼所存在的问题

就刑事诉讼来说,作为诉讼的起点,立案这一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说应当立案而未予立案,或者虽然立案了,但是没有进行侦查活动等等。这些问题不断积累而未得到有效的解决,最终会导致对绝大多数的案件没能够很好地处理。追根溯源,一是因为刑事案件的立案权限属于公安系统,具有封闭性,社会中的其他机构和组织不易进行监督核查,检察机关如果想深入对公安部门的立案权进行监督十分困难;二是由于案件数量的激增导致公安、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压力越来越大,矛盾也越来越凸显。基于此种状况,人工智能系统进入到刑事案件的立案环节不仅仅能使上述矛盾有所缓和,还可以在防止隐私被故意泄露的前提下发挥大数据的优势进而提高案件侦查的效率。

### （二）人工智能应用于证据审查所存在的问题

人工智能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承担起刑事案件的检察工作?是否可以代替审判人员对证据进行审查,或者是担任公诉人这一角色?这些问题都还未形成定论。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对证据的合法性以及证明力的判断,人工智能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辨别审查机制。也就是说,对证据的审查,人工智能不能独立完成,还需要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事实进一步调查核实。而其他学者却认为,人工智能虽然只相当于人类的中级智力水平,但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应当是游刃有余的。在管辖方面,目前来看,即使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已普遍应用,但是仅仅只将其作为建议意见进行使用。智能化的管辖建议可以为诉讼主体减轻诉讼压力,也使各个法院之间相互“踢皮球”的问题有所缓解。其实,人工智能在管辖方面的运用应以保障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权利为前提,然后通过自身智能化的优势解决诉讼过程中的难题,并且还要遵循多维度全面开展实行的原则。但从另一层面来说,当事人申请回避属于其基本诉讼权利的范畴,如果开发人工智能在回避警示提醒方面的功能,是否违背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应由本人行使的原则,这还需要学界进一步探讨论证。

### （三）人工智能针对现行司法模式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宏观的法律规范体系亟待完善。各级法院都希望通过智能化的技术来使审判的效率大幅提升,而互联网法院也会朝着深化改革审判模式的方向不断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和民众认可人工智能在审判中的运用,还要考虑程序以及地域间的差别,先通过试点,从容易的地方着

手,层层推进智能化在裁判领域的广泛应用。然而,如果在司法领域中没有对改革做出法律体系的构架,那么当前的规范可能无法应对一些新情况的出现,这就会对智能化在纠纷的解决和审判的进行中产生发展的阻力。

其次,对证明标准的适用全部由人工智能来进行也不太可能。因为模拟或者植入人们的经验,现阶段的技术还无法达到,即使智能化的机器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或者对大数据进行分析来学习一些人类经验,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远远不能满足审判的需要,而人们的经验由于种族、地域、风俗、思维方式等的不同也是多种多样,所以通常也难以统计归类。同时,人类经验是不是可以在审判活动中被认可,这也具有特定的判断准则,人工智能都是很难掌控的。此外,构建并模拟审判中的推理过程也是一项难点。在使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似真推理运用得较为广泛,这种推理方法是通过一种模糊的刻度“确信值”进行测量的,而这种“确信值”看似有很强的决定力,但实际上又与概率值不同。这种推理方式的经验很难被学习,也就不容易通过智能算法实现。

最后,实践中对类案类判的适用不是很普遍,法官们也没有特别乐意使用此类系统。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推送的案例并不是十分精确,对法官的参考价值不大,检索时往往会出现成千上万个案件,尽管改变检索条件也还是有上百个案件,有过量的案件供参考对法官来说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此外,推送的案件大多数范围狭窄,来自何处,属于哪一级审判机关作出的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通常情况是相似的案件集中在某些年份,在其他年份就寥寥无几了,还有就是大多数类案推送的案件来源不明晰,甚至一审裁判在二审中发生了改变也未注明,总之通过类案类判系统推送的案件比较混乱,参考价值具有不确定性。

在上述几个方面之外,人工智能在审判程序中仍存在许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技术难关未被攻破,还有法官固有的思维等诸多原因导致的。这些问题有待于专业技术人员和法学领域的专家进一步攻克。

## 四、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裁判针对存在问题之解决方法

目前最为重要的就是将人工智能与审判相结合的改革思路梳理清楚。以民事审判为例,随着智慧法院的推广试点,智能化司法已经是大势所趋,关于智能化审判的相关法律规定也要及时提上立法的日程安排。人工智能与法学的结合就是要重点在简单

的案件中加以运用,因为这些案件都是事实证据较为清晰,较为客观的案件,在民事案件中,往往这些案件的信息量较大,准确性较高,也较为充分具体,特别在原被告双方相互质证、相互对抗反驳的情况下,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信息会进一步展现出来,将来人工智能在法学领域的应用可能会更侧重于民事案件的纠纷。比如有关婚姻家庭纠纷、继承类的案件、劳动争议、道路交通案件等,事实都是比较简单易梳理,证据也充分具体、客观性很强,人工智能在这些案件中的使用会更加受欢迎,运用空间也很大。但是,法律是由人创造的,而人又是理性受到限制的动物,相应地,法律的内容实际上就体现了人的思维和理性的局限性。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只对传统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而智能化的审判程序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的情况,因此基于人工智能审判实践的需要对程序法做出相应调整是未来无法绕开的必要举措。虽然说就目前来看,制定新型的诉讼法所具备的各项条件、时机等还不是太成熟,但是我们可以先确立一些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内容,随后在实践中逐渐填充细节性的东西,使智能化和信息化的诉讼改革合法化,然后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总结具体的内容。此外,提高技术水平,攻克技术壁垒,对机器的深度学习进一步探索,完善并细化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证据判断的相关标准,建立健全法律数据库等都是解决相关问题的有效手段。在法律数据库建立之后,统一全国类案类判的管理标准和机制也是刻不容缓的。

现在与法律有关的职业,比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他们都不仅要有专业的法律知识,还必须具备

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道德水准。目前,人工智能仅处于中级智力水平,与上述法律职业的要求还有一些距离,但一些辅助类的工作,比如书记员,这一类的工作是可以被替代的。智能化的辅助办案系统被引入审判阶段,可以运用其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庭审情况的记录或者法律文书的送达等工作,这样可以使审判人员腾出充足的时间去钻研适用法律的问题。所以,伴随着员额制的推行,法官的工作压力巨大,智能化办案系统的研发有助于解决这些难题。而我们此时需要做的就是摆正自己的态度,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受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使用,并对人工智能在法学领域的地位进行明确,同时对法官进行相关的技术或使用方法的培训,使人工智能很好地辅助于审判。通过努力实施以上措施,既可以使人工智能的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又可以真正地实现司法公正,使法律与科学技术完美融合。

#### 参考文献:

- [1] 松尾丰. 人工智能狂潮: 机器人会超越人类吗? [M]. 赵函宏, 高华彬,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 [2] 卡鲁姆·蔡斯. 人工智能革命: 超级智能时代的人类命运 [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 [3] 罗伯特·杰·斯顿伯格. 认知心理学 [M]. 杨炳钧, 陈燕, 邹枝玲,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
- [4] 李开复, 王咏刚. 人工智能 [M].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7.
- [5] 曹建峰. “人工智能+法律”十大趋势 [J]. 机器人产业, 2017(5): 86-9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Judicial Adjudication

LU Yu, ZHENG Yij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justice, and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itigation. Under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e courts at various levels produced many specific achievemen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such as buil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xiliary systems for judges, enhancing the elements and logicalization of the evidence, and promoting the case shunt system construc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imit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still helpless on how to make a scientific judgment on the legitimacy of an evidence, how to narrow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how to form a unified standard of case classification. So it should be further promoted first in simple cases, case application, trial secretary and other trial work scopes, and on this basis to improve its technical levels and overcome technical barriers. In doing so, it can fully establish an intelligent informatization trial mode, provide decision reference and data analysis for the national rule of law.

**Key words:** judicial decis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xiliary trial system; intelligent court

# 论刑法与著作权法的有效衔接

——以两法联动修改为背景

王昕宇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著作权民事侵权与刑事归责之间存在规范价值的差异。刑法以秩序为本位,侵犯著作权罪的主要客体应是市场竞争秩序,而著作权法等民事法以保障私权为首要任务,刑法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相对独立于著作权法并不违背法秩序统一原理。新《著作权法》生效后,侵犯著作权罪仍应采用作品类型法定模式,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不能以“兜底的兜底”纳入《刑法》第217条第(一)项规定的作品范围。为进一步加强版权保护,实现刑法领域的综合治理,应当以秩序本位的规范保护目的指导犯罪圈的适度扩张,进一步扩充侵犯著作权罪的实行行为类型,落实“同等保护”,灵活入罪标准以适应网络时代的技术变迁。

**关键词:**著作权;犯罪圈;民刑衔接;市场经济秩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08

**中图分类号:**D923.41;D924.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47-06

2008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是2020年建成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回顾十余年发展,在制度机构建设方面,完成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修订,设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最高司法机关出台了若干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司法保护规划,为加强知识产权的刑事、民事司法保护提供规范依据和机构依托。从近三年(2018—2020)最高法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来看,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数量增长较快,人们的维权意识显著增强,尤其是新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在2020年新收案件数增长63%,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大,更多涉及新领域新业态。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迈入2021年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总体要求是:“力争到2022年,侵权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

并保持较高水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更加有效发挥。”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坚持严格保护、同等保护,以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水平。在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领域,确立“严保护”的政策导向,推进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订完善,加大刑事打击力度,降低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标准,提高刑罚严厉性,开展常态化专项打击行动,保持高压严打态势。2020年9月最高法发布《关于依法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的意见》,在刑事打击方面体现“严保护”的贯彻,将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特定期限假冒特殊物品的注册商标和受过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三类情形作为从重处罚条件,同时强调加强罚金刑的适用,以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知识产权犯罪的修改也鲜明地体现了“严保护”的政策导向,首次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一节中6个罪名做了修改,又增设第219条之一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

收稿日期:2021-03-25

作者简介:王昕宇(1997—),女,山东泰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供商业秘密罪,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方式、犯罪对象、定罪标准、法定刑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实现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在范围和力度上的实质扩张。这些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知识产权保护实践需要的回应,以及作为法定犯的知识产权犯罪与前置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其他法律的衔接与一致。

### 一、著作权法与刑法规范的实体衔接

此次刑法修正以前,以网络时代作品传播方式、技术手段的更替为背景,理论和实务中针对原《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规定的作品范围、行为方式、主观目的等构成要件要素,一系列司法解释认定的违法所得数额、严重情节、实行行为等定罪量刑标准提出了若干批评意见。

#### 1. “复制发行”的过度扩张甚至类推解释

原《刑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是以1990年《著作权法》为依据的,囿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当时的《著作权法》中并没有以网络技术手段传播作品,以及相关侵权行为的规定,相应地,1994年首次规定侵犯著作权罪的《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就没有也不可能将网络侵权考虑在内,并为1997年《刑法》所沿袭。随着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产生了规范网络传播的现实需要,2001、2010年两次修正《著作权法》都对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做了相应增补,但《刑法》却没有同步更新。考虑到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与“复制发行”具有相同甚至更严重的社会危害,同样具有刑事可罚性,所以2004年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04年《知识产权解释》)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应当视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有学者指出“应当视为”表明网络传播不是“复制发行”,本意是将此类行为“等同”于后者,因而不是对“复制发行”的扩大解释。由于网络传播具有实质可罚性,所以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妥。<sup>[1]</sup>以具有相同的实质危害性,将刑法并未规定的某种行为以与之类似的条文处理,实际上是司法解释对侵犯著作权罪的类推适用,对解决现实问题具有一定意义,但存在以刑事司法代行立法职责的风险,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著作权保护的刑法规范已经远远滞后于时代发展的困境。正因司法解释对“复制发行”的不断扩大乃至类推适用,暂解了立法不足的燃眉之急,使得16年间历经7次刑法修正,都未涉及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

#### 2. “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证明困难

犯罪目的这一主观方面的内容自身就存在证明

难的问题,在利用网络技术的新型数字版权犯罪中,犯罪目的和动机往往具有多元化的趋势,也并非只有以营利为目的的著作权犯罪才会对市场秩序造成严重危害。目的犯的规定大大限制了侵犯著作权罪的司法适用,缺乏操作的灵活性,不利于刑法的全面保护。<sup>[2]</sup>

3. 侵犯著作权罪的适用范围过窄,刑法保护明显不足

有学者提出,应当树立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同等保护”的基本立场,改变“适度保护”的理念误区。<sup>[3]</sup>《著作权法》第53条列举了8种具体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并规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罪仅将其中部分行为犯罪化,有不少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侵犯著作权行为尚未纳入刑法治理。以“复制发行”为核心的实行行为规定模式已经不适应网络时代的技术变迁,对利用网络技术实施的侵权行为难以有效涵盖,出现了对深度链接行为能否解释为对他人作品的“复制发行”、网络服务提供行为是否属于传播的实行行为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议。此外,除“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外,刑法显然将其他侵犯著作人身权的行为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而只能以民事手段制止。

4. 包括侵犯著作权罪在内的7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存在客体保护偏差

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应当立足于权利本位的立场,兼顾秩序,<sup>[4]</sup>强调其私权属性。应当将知识产权犯罪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分离出来,独立成章,以体现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充分保护。<sup>[5]</sup>

有鉴于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罪做了如下几方面的修改,部分回应了上述批评意见,以解决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实践困境。

#### 1. 调整作品保护范围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第一项侵权情形中将“复制发行”的对象由“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修改为“文字作品、音乐、美术、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对作品范围的修改主要是一种技术性调整,其实际范围与旧法相比没有明显变化。视听作品是新《著作权法》对原“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即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概括表述,而美术作品是从“其他作品”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举。对“其他作品”的兜底规定增加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条件,也是配

合《著作权法》由作品类型法定到开放的修改进行的同步调整,对作品保护范围的实质影响不大。

## 2. 增加实行行为

新法将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对象由“著作权”修改为“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进而将表演者权以增设的第(四)项“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纳入保护范围。与《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独立于复制权、发行权的权利内容相一致,解决网络时代司法解释对“复制发行”的不断扩大的理论争议,在第(一)、(三)、(四)项中单独规定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行为方式。增设有关技术保护措施的实行行为,以解决利用视频解析、深度链接等网络技术手段实施侵权行为的刑事责任。<sup>[6]</sup>

## 3. 提高法定刑

取消了拘役刑的规定,第一档刑罚的最低刑由拘役提高至有期徒刑。将第二档刑罚由“三年以上七年以下”修改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况下,其法定最高刑提高至十年有期徒刑。改变了原有刑罚处罚过轻所产生的震慑力不足的问题,也体现出知识产权犯罪从严、从重惩处的“严保护”立场。

此外,侵犯著作权罪法定犯的特点,使得前置的《著作权法》的部分修改内容虽未直接体现在《刑法》第217条的条文之中,但实质上也是对犯罪圈的扩张或者限缩起到重要影响。例如,《著作权法》第24条对排除侵权责任的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做了局部调整,完善合理使用的“三步检验法”,完善免费表演的合理使用情形,还增设第(十三)项兜底性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改变了以往封闭式的立法模式,增强了立法的灵活性。<sup>[7]</sup>这些通过前置法修改排除民事侵权的合理使用情形必然不会进入刑法视野,间接起到了合理限缩犯罪圈的效果。

## 二、著作权法与刑法的规范价值差异与整合

著作权法是私法,强调对公民个人著作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而刑法是公法、保障法,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本质以及共同客体概念的存在,揭示出对个人权利的刑事保护是以该权利侵害同时侵犯公共利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的,强调刑法保护的秩序价值。在刑法体系中,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优先于权利保障的<sup>[8]</sup>,刑法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以保障和维护公民最低限度、最为基本的消极自由。<sup>[9]</sup>著作权法与刑

法的这种规范价值差异主要体现在侵犯著作权罪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与新《著作权法》的规定相衔接,但又非完全同步。

### 1. 两法对作品保护范围的不同表述及其争议辨析

两法都对作品的范围做了修改,《著作权法》从作品类型法定改为开放模式,而侵犯著作权罪则由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其他作品”修改为体现法定性、明确性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这一不同只是表面的规范表述差异还是实质的价值取向分歧,直接决定了对《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类型兜底条款——“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能否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进入刑法侵犯著作权罪保护范围这一问题的回答。

有观点认为,如果一种新类型的作品在理论和实践中被认为属于“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从而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那么从民刑衔接和维护法秩序统一的角度,侵犯该作品的行为也应该受到刑法规制。但笔者认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自身就是《刑法》第217条对作品范围的兜底规定,由于其明确性不足在适用时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而“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又是法律对作品类型的开放式规定,以法律中的兜底条款解释刑法中的兜底规定岂不成了“兜底的兜底”?既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也难以保障公民的预测可能性,其正当性存疑。

首先,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之前,原《刑法》第217条规定的作品包括“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而修正案草案在二审稿即最终审议通过的修正案正文中,将其修改为“文字作品、音乐、美术、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一方面,与《著作权法》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修改为“视听作品”相衔接,《刑法》第217条也将“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归入“视听作品”,同时增加列举了美术作品。另一方面,将“其他作品”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正是对新《著作权法》改采作品开放模式后的必要限制,强调其法定性和明确性。《著作权法》的修改决定于2020年11月11日通过并向社会公布,而《刑法修正案(十一)》是于同年12月22日提请二审,并于12月26日审议通过,对作品类型的修改明显晚于《著作权法》的修改。这其中不难看出刑事立法对作品类型法定的要求和刑民衔接的考量。如果认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也

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那么《刑法》第217条对作品范围兜底规定的特别修改并无实质必要，以原本“其他作品”的规定方式反而更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作品类型开放模式的需要。

其次，刑法这一保障法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绝对从属于前置法的认定，当前学界对严格违法一元论的观点也多持否定态度。《刑法》与《著作权法》在规范保护目的上的差异，决定了两者的作品保护范围并不一致。《著作权法》是私法，保护著作权这一私权、鼓励创新是其立法目的和出发点，而作为国家刑罚权惩治对象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则更多地体现对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利益的保护需要。因此，著作权法家长主义指导下的“作品类型法定”并不符合创作规律，著作权法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应受保护的作品表达形式<sup>[10]</sup>，其鼓励作品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发展与繁荣的立法目的具有作品类型开放化、扩大保护范围的内在要求。而侵犯著作权罪被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而非侵犯公民权利等个人法益犯罪中，强调因侵犯知识产权而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危害。法定类型以外的新作品由于数量少、界定标准不统一等特点，通常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危害不大，不具有以刑罚处罚的必要性。其过于模糊的认定标准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刑事司法层面实际可操作性也不足。

最后，知识产权，尤其是著作权领域存在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刑事法律保护范围的确定既要考虑公共利益目的，也要通过保障权利人与智力成果的产权关系以鼓励创新。<sup>[4]</sup>如何进行利益平衡进而确立一个合理的刑事保护边界需要严格的立法程序保障，而不能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任意裁量。

2. 侵犯著作权罪行为方式对《著作权法》侵权行为规定的有选择性更新

(1) 技术保护措施。发达的网络技术使著作权从“印刷型权利”转为“数字化权利”<sup>[11]</sup>。2001年《著作权法》修改，在第47条侵权行为列举中增加了“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2020年《著作权法》修改，在第49条、第53条第(六)项将其进一步细化为“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的，或者故意为他

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而观之《刑法》第217条修改对规避和破坏技术保护措施这一行为方式的规范表述，其实是与原《著作权法》第48条第(五)项相一致的，而并未包含新《著作权法》第49条或者第53条第(六)项规定的有关技术保护措施的全部禁止行为。

(2) 信息网络传播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著作权法律保护的演进就是一部复制发行技术的发展史。<sup>[12]</sup>《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第217条第(一)、(三)项中增加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这一行为方式，改变了以“复制发行”为核心的行为模式。信息网络传播权是2001年《著作权法》修改新增的著作权内容，而在此后的数次刑法修正中都并未将此项权利纳入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但是随着网络著作权犯罪的频发，为了弥合实践需要与现有刑法规范的差距，2004年《知识产权解释》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的行为，视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以扩张解释现有规范消极回应实践问题也受到理论上的不少批评，通过立法修改及时更新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类型有其必然性。

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质，理论上以保护私权为主要客体和以维护竞争秩序为主要客体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sup>[13]</sup>前者认为知识产权作为公认的财产权、纯粹的民事权利，应该确立以私权为本位的犯罪体系，而非如当前立法中规定在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之中。强调对个人法益的尊重和保护，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制度只能作为次要客体。<sup>[5]</sup>后者认为知识产权犯罪应当以维护市场秩序为出发点。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存在形式与实质之间的错位，即形式上归类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属于侵犯公共法益的犯罪，而实质上却体现出与侵犯财产犯罪具有相同的性质。从罪名设置和保护对象来看，不仅以知识产权本身为保护客体，也有专门针对其物质载体的罪名设置，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体现对财产权利的偏重，定罪量刑标准、主观目的的规定也是过于注重财产属性的体现，与其秩序本位的应然属性不一致。<sup>[14]</sup>也有学者以数字社会中财产权从私人财产权向私人和社会公共属性兼具的嬗变，进而指出知识产权的社会属性凸显。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有利于保护个人的权属关系，而且有利于提高知识或者作品的传播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公权力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的需求在当下更为迫切。<sup>[15]</sup>

笔者认为，刑法不是对作为私人权利的著作权保护的首要选择，无论是受制于谦抑性原理还是出

于权利保障实质有效性的考虑,应当实现版权保护刑事、民事手段之间的合理分工。主张以私权为本位的著作权犯罪体系,强调对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全面性,甚至提出将著作权犯罪作为自诉犯罪予以规定的观点,极易导致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也不利于权利人自身利益。著作权侵权对被害人造成的主要是财产方面的损失,大多数侵权案件以民事手段弥补被侵权人损失,足以实现保障私权的目的。新《著作权法》修改了赔偿数额的认定标准,并大幅度提高法定赔偿数额,民事赔偿较之刑事处罚更有利于权利人自身利益,民事案件中灵活的调解、和解程序使得权利保护更加及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有效落实对故意侵权行为也能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因此,著作权民法保护是以公民私权为本位的,而刑法保护仍应当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为核心,只有当著作权侵权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造成危害时,才应划入犯罪圈。

从对深度链接行为处理态度的刑民差异上,也可以体现出二者规范保护目的的不同。从民事侵权的角度来看,由于理论和实践中普遍以“服务器标准”,即作品是否储存在服务器中作为认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标准,进而认为深度链接不属于传播行为,并未直接侵犯作品本身,应属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只能构成间接侵权或者共同侵权。<sup>[1]</sup>而刑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是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主要客体的,刑事审判实践中对深度链接成立侵犯著作权罪多持肯定态度。当然,这种行为性质的认定差异并不违反法秩序统一的内在要求,法秩序的统一是一种实质的评价结果的统一,而不是拘泥于形式上的一致,不同法领域在形式上会有不同。<sup>[16]</sup>“深度链接”无论在民法中还是刑法中都是不被允许的行为,只是在如何将其涵射入现有立法规定的侵权行为类型方面,两法存在不同的规制路径。

尤其是在刑法修正案增加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这一行为方式后,提供深度链接能否解释为网络传播,应当以该行为是否会产生混淆市场的效果为判断依据。深度链接包括跳转链接、加框链接和盗链行为三种。跳转链接是绕过被链接网站的主页而直接跳转至分页面或者多媒体文件的方式,不会对被链接网址的内容做修改。加框链接是将自己需要的他人网站中的内容呈现在自己的网页中,将自己不需要的他人网站名称、广告等用自己网页的内容遮挡。而盗链行为是抓取他人视频地址、占用他人带宽或版权内容等硬软件资源,在自己设定的视频客户端进行播放的一种技术。<sup>[17]</sup>由此可

见,上述三种深度链接类型中,只有盗链行为和加框链接会产生使网络用户对作品归属产生错觉的市场混淆效果,直接影响权利人因其著作权而应享有的市场竞争优势,是侵犯著作权罪所要规制的对象,应当认定为属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实行行为,而跳转链接本质是一种帮助行为,只有被链接网站存在侵权时才可能以共同犯罪追究跳转链接者刑事责任。

### 三、刑民共治视野下侵犯著作权罪的完善路径

#### 1. 以规范保护目的指导犯罪圈的适度扩张

如前所述,著作权刑事保护的核心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权利人因其著作权而享有的竞争利益。而《著作权法》提供的民事保护是以著作人身权、财产权为核心的私权保护,以保障著作权人财产权益,鼓励作品的创造和传播为首要任务。两者各有偏重。刑法介入的理由不仅在于非刑事保护规则的失效,还在于其社会危害性过大以至威胁秩序的安定。<sup>[18]</sup>在理解规范保护目的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两法的协调衔接,对不危及市场秩序的一般侵权行为以民事赔偿等方式实现权利救济,以民事、刑事手段相配合,合理划定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范围,构筑科学合理的著作权保护体系。当然,刑法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保护秩序,而是透过对相应社会秩序的维护来确保具体的法益不受侵害。<sup>[19]</sup>保护私人的著作财产权、人身权是侵犯著作权罪保护市场秩序的最终落脚点,但实现刑事手段与民事手段的合理分工,避免犯罪圈的不当扩张或者过度限缩,应当以市场秩序是否受到严重威胁或者破坏为界定标准。

#### 2. 进一步扩充侵犯著作权罪的实行行为类型,落实“同等保护”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罪的修改实现了刑事保护范围的合理扩张,但是仍然局限于一种对现实需要的被动回应,很多潜在的严重威胁秩序的侵权行为类型尚未考虑在内。例如,新《著作权法》新增了有关故意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信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管理信息被删除或者改变仍然向公众提供的侵权行为。权利管理信息是指识别作品、作者、任何权利人的信息,或者有关作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具有明确作品权利归属的宣示作用,虚假的权利管理信息极易发生真假难辨、真伪颠倒的后果,严重威胁市场秩序。虽然权利管理信息并非著作权的内容,但是对市场秩序和著作权保护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应该将此类侵权行为也纳入刑事立法的考量。此外,《著作权法》规定的“故意制造、

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侵权行为也应做入罪处理。当前刑法修改对有关技术保护措施的实行行为只规定了“未经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一种,上述两类型只能作为帮助行为,或者信息网络犯罪的一般罪名处置,不利于实现著作权犯罪的源头治理和有效预防。

### 3. 适应网络时代的技术变迁灵活入罪标准

新旧著作权法在侵权民事赔偿数额问题上,原则上都采取了区分三个层次的认定标准,除第三层的法定赔偿从五十万元以下提高至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之外,新法引入了权利使用费作为权利人损失与侵权人违法所得难以计算时的参照,又将权利人损失与侵权人违法所得并列作为第一层的损害赔偿数额认定标准,由权利人选择其中对自身更为有利的。此外,对故意侵权,情节严重的情形规定了上述赔偿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也是此次著作权法修改的一大亮点。由此也可以看出著作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实践中对被害人因侵权遭受损失或者侵权人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存在相当的难度,而侵犯著作权罪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作为定罪标准之一,也因利用网络技术侵犯著作权犯罪中数额难以计算、因果关系认定困难等方面的原因而颇受诟病。尤其是网络环境下,不同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可以销售侵权物质载体的数量、数额来评价危害结果,网络侵权所产生的收益多种多样,增加点击量、吸引关注、广告收入等能否认定为违法所得,其价值应当如何计算都是必须直面的司法难题。<sup>[14]</sup>因此,最高司法机关应该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其他严重情节”的入罪标准做尽可能详尽的列举,在网络侵权中将“点击次数”“用户数量”“浏览量”等体现权利人市场竞争优势的数据作为考量因素,以提高著作权保护刑事条款的可操作性。

## 四、结语

近年来,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逐渐完善,从规范制度到机构建设,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保护体系的重要战略指示。在处理著作权保护的民刑衔接问题上,必须强调《著作权法》与《刑法》规范保护目的的差异。在刑事立法层面,只有那些侵犯个人权利,进而达到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著作权侵权行为才应该纳入刑法保护。而在刑事司法环节,侵权行为的认定并不必然以《著作权法》认定的侵权类型为依据,刑

法并非完全从属于前置法的违法性,而应当在保障秩序的规范价值指引下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 参考文献:

- [1]王冠.深度链接行为入罪化问题的最终解决[J].法学,2013(9):142-151.
- [2]向鹏,张婷.大数据时代数字版权保护“焦虑”的刑法治理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2):92-100.
- [3]于志强.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检视与未来建构[J].中国法学,2014(3):156-176.
- [4]田宏杰.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J].中国法学,2003(3):141-152.
- [5]寇占奎,路红兵.我国知识产权犯罪体系的反思与重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7(6):124-128.
- [6]周光权.刑事立法进展与司法展望:《刑法修正案(十一)》总置评[J].法学,2021(1):18-35.
- [7]石宏.《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重要内容及价值考量[J].知识产权,2021(2):3-17.
- [8]黄晓亮.论我国刑法修正的秩序价值优先性: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J].法学杂志,2016,37(3):40-47.
- [9]何荣功.自由秩序与自由刑法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10]卢海君.“作品类型法定原则”批判[J].社会科学,2020(9):95-103.
- [11]于志强.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14.
- [12]李国权.数字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机制向度:兼论从回应到预防的范式演变[J].电子知识产权,2020(4):96-103.
- [13]田宏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J].法商研究,2010,27(2):110-116.
- [14]王志远.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挑战与应对:从知识产权犯罪的本质入手[J].法学论坛,2020,35(5):114-123.
- [15]付晓雅.数字时代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挑战与回应[J].当代法学,2020,34(2):67-74.
- [16]王骏.违法性判断必须一元吗:以刑民实体关系为视角[J].法学家,2013(5):131-147,179.
- [17]张素敏.全媒体环境下“深度链接”行为的刑法规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97-105.
- [18]张浩泽.论知识产权法与刑法的衔接:以犯罪圈的划定为路径[J].荆楚学刊,2019,20(6):45-48.
- [19]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9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下转第93页)

# 论五四运动与“红船精神”的内在逻辑关系

南大伟,王秋香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摘要:**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运动不仅使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而且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了解放。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红船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土壤、阶级基础和文化养分。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红船精神”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09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53-05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红船精神”,称它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sup>[1]</sup>。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为“红船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导引。探索五四运动与“红船精神”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一、五四运动为“红船精神”孕育思想土壤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爱国仁人志士进行的一次革命实践活动,又是先进知识分子对广大民众进行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逐渐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先进分子开始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新途径,为人们接收马克思主义提供思想土壤,推动中国人民在精神上有所觉醒,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储备思想条件,为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革命力量。

### (一)五四运动推动人民求得思想解放

作为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五四运动团结起众多社会阶层,从最初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到成为包括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掀起了

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救亡图存运动。这场爱国运动推动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封建地主阶级联合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人民的本质,在比较推求中厘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的发生发展。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从最初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是顺应时代需要,是当时社会大背景下的产物。因为“任何社会思想的变革,并不是先贤圣哲观念的产物和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对社会经济领域变化的回应,其变革的动力来自社会现实中的矛盾运动”<sup>[2]</sup>。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顺应中国现实国情,才能够与其他思想角逐中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在以后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sup>[3]</sup>五四精神以进步思想的形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了思想准备。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先

收稿日期:2021-04-19

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新时代‘红船精神’及其价值研究”(18YJC710053)

作者简介:南大伟(1982—),男,河南濮阳人,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党史党建等方面的研究。

进知识分子陆续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由此,五四运动不仅成为一场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主义运动,而且成为一场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思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广大人民体现出来的开拓进取、团结统一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提供了精神指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下,中国人民开始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找真正解决中国的救国方案。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找到了抵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并将它应用于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 (二)五四运动促使人民获得精神觉醒

关于革命道路的选择,经历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经历了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辩论、批驳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等。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使人们再次对中国出路问题陷入迷茫苦闷之中。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碍,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为在苦苦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展示了一条新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基础,五四运动的鲜活实践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是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sup>[3]</sup>五四运动使中国各个阶层团结起来共同为维护中国主权作斗争,改变了以往中国只有少数人清醒、多数人愚昧的状态,真正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结统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人民有了正确思想指导,也必将指引着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作斗争。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并追随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各个地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他们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投身群众实践,在群众中讲解马克思主义,以此使群众认清他们被剥削的现实,启发群众觉悟进而团结人民大众实施救国方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使工人阶级进一步觉醒,锻造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为领导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准备条件。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下的人民大众获得了精神觉醒,促使中国工人阶

级在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由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从而催生出中国共产党的“红船精神”,聚集与展现出中国革命的精神之源。

## (三)五四运动引领人民追求科学信仰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民认识到闭关锁国下的中国与追求民主开放的西方存在很大差距,在历经种种探索后,中国仍未能找到正确出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助力中国人民燃起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检验证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在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道路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从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了追随马克思主义、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科学理论与现实需要的一应而合,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宣扬要与现实相结合,要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中国工人阶级自五四运动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并着手在工人阶级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培养更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工人阶级在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后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基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与广泛活动,一大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聚集在一起必将使得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共一大昭示的“红船精神”,是五四精神的传承延续。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困苦,开展革命斗争,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坚持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五四运动促使社会各阶级真正团结起来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同时它也使得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受到一次庄严的思想洗礼。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国家前途命运的转机,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内容的五四精神,成为一面思想大旗,有力地掀起革命的思想潮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红船精神”,意味着熔铸了五四精神的“红船精神”成了指导人们进行革命的精神力量。五四运动推动下的五四精神使中国人民在黑暗摸索中看到希望并进而在思想上获得解放。在五四运动实践检验下,成为中国人民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摆脱了思想束缚实现了全面觉醒,并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

## 二、五四运动为“红船精神”锻造阶级力量

“红船精神”的形成不仅需要先进的思想引领,还必须先进阶级开展实践活动。中国工人阶级一经产生就具有与压迫者、剥削者斗争的精神,但这种

斗争大多限于经济斗争而非政治斗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从斗争的自发性转为自觉性,成长壮大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马克思主义切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能够帮助工人阶级成长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从而为“红船精神”锻造阶级力量。

(一)工人阶级不断觉醒的革新进取精神,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准备了条件

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在华办厂需要招收大量工人,中国产生了第一批工人阶级。其二,当时的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社会有识之士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兴办了“官办”的近代军工企业,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中国产生了第二批产业工人。自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得以诞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进一步壮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将对华经济政策由之前的战争压迫转为获取战争物资,中国经济发展间接获得发展机遇,工人数量猛增。据统计,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总量已达200万人。除了产业工人以外,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工业、苦力运输等普通职工,总数也达到4000万人左右。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又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这种先进生产力是受到剥削、受到压迫的,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工人要想解放自己就必须反抗阶级压迫,因此他们最具有革命性。他们大多集中在一起,也最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世界无产阶级共有的优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和剥削,革命性更强;其次,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并且多在少数大企业中如铁路、纺织等部门,集中性更强;再次,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与农民有天然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联盟。<sup>[4]</sup>中国工人阶级的自身优势以及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使得工人斗争性更强,他们为了争取自身权益敢于举行一系列的罢工运动,体现出强烈的革命进取精神。

(二)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展现出的革命性与坚定性,彰显了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五四运动中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率先斗争,工

人阶级继而开始罢工进行反帝爱国运动,表现出强大的爱国精神。《民国日报》曾记载:“某印刷工人宣言,不愿以日本纸加之机器,如有所强迫,宁全体罢工。”<sup>[5]</sup><sup>346</sup>六三运动之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风潮扩散至全国,运动的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至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由经济斗争变为政治斗争,他们的罢工斗争,是自己独立地发动起来的。《字林日报》中记载一位运动的目睹者曾经比较公正地指出:“对于工人来说,这些年轻的学生,不论要他们来发动一次罢工,或是把罢工的举动停止下来,他们的影响总不会过大的。这些工人一般都具有他们自己单纯而强烈的意见,很难用劝告、威胁或其他方法,使其改变过来的。”<sup>[5]</sup><sup>351</sup>由此可见,工人阶级具有很多先天优势,特别是彻底的革命性与坚定性,同时仍需在运动中辅以马克思主义系统指导,促使其了解与形成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

在虚无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并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以往突出工人阶级的作用只是夸大了事实。历史证明虚无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在学生斗争最困难的时候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存问题而是民族存亡的问题,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挺身而出,上海、武汉、天津等城市的工人纷纷响应号召支援学生。一时间工人罢工活动席卷全国20余省、150多个城市,工人阶级强烈的救国表现表明了他们在政治上有了觉悟,能够团结起来组成坚定的救国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工人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工人阶级在思想上不断成长。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的罢工表现与以往只关注经济利益不同,这次的罢工有鲜明的政治性,并突破了行业和地域的限制,实现了全国大联合,表明了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

(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寻求救亡图存的决心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群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sup>[6]</sup>中国工人阶级也一样,他们只认识到自己被压迫、被剥削,却不能看到其本质,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去真正解放自己。

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初步掌握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主动走上

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这表现在:其一,到工农群众中去宣讲演说。例如,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在长辛店、卢沟桥、通县等地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知识。陈独秀在上海向码头工人宣讲,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劳工要旨》等演讲,鼓舞了工人阶级。其二,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sup>[7]</sup>其三,创办工人刊物。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在北京创办了《劳动音》周刊,等等,带领工人阶级认识到只有斗争才能实现自身解放。其四,创办工人补习学校。例如在上海创办的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在北京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一方面提升了工人的知识水平,另一方面也系统向工人传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其五,帮助工人建立工会。例如,在上海组织了上海机器工会,在北京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等等。先进知识分子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指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使工人阶级开始联合起来,由最初的自发斗争转而进行自觉斗争。

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正是工人阶级始终饱含爱国心并坚持通过斗争解放自己的精神,激励着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彻底的坚定性、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精神使他们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级,为“红船精神”锻造了坚实的阶级力量。

### 三、五四运动为“红船精神”提供文化养分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专制的强化,各方仁人志士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不断摸索,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逐渐产生了革命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的原生精神形态“红船精神”诞生了。

(一)革命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升华,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产物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形成了深厚的中华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理念,其以道德约束的形式有效指导着民众的实践活动。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华儿女心中,促使中华民族虽屡遭磨难,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激励着华夏儿女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革精神推动社会进步;“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鼓舞无数爱国者无私奉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为“红船精神”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然而,在封建中央集权的形势下,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一步步将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民在身体上受到封建伦理的压迫,在思想上也变得封闭落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严重摧毁了中华民族精神,重塑民族精神成为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重要课题。历经一系列学习西方器物、制度,进行政治革命等种种尝试,却未能根本改变国家系于存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局面,以“摆脱封建束缚、革新国人思想”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华大地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口号,抨击封建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为五四运动的爆发酝酿了文化气息,其“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与“红船精神”相契合。

新文化运动为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更深层次地带动中国人民为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而努力。五四运动从群众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表现出与新文化运动相同的目的,再一次引发更多人思考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正确方案,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做出正确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二)五四运动推动革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结合,在运动斗争中甄别比较,选择信仰追随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社会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抛弃资本主义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成为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sup>[8]</sup>中国人民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并将这个理论武器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五四运动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为指导中国革命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中国人民提供了精神力量。一方面,鼓励先进的社会阶层、有一定的思想觉悟的同志,了解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另一方面,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提升劳动群众文化素质的同时,鼓励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进步青年区分与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封建主义。

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指引着中国人民从愚昧、落后的封建束缚中寻求解脱,在中国的救亡

过程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五四运动将革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相结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在革命斗争中追随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道路上有了新的精神力量“红船精神”。

(三)五四运动使革命文化走向工农群众,体现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铸就“红船精神”的文化主体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目标必须改革封建制度,于是就有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探索,但最终失败。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戊戌维新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也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五四运动形成的五四精神是真正为了解放人民大众、服务人民大众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工人阶级逐渐觉醒。毛泽东指出:“文化要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sup>[9]</sup>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孕育了革命文化的原生形态,凝聚起“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红船精神”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

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sup>[3]</sup>“红船精神”是近代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智慧的集中表达,是五四运动精神基因的时代传承。它是中华民族于磨难中奋起的爱国主义,是指引党和人民无畏前行的力量源泉。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N]. 光明日报, 2005-06-21(A3).
- [2] 杨军. 关于五四运动若干问题评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9(4):61-64.
- [3] 习近平.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5-01(A1).
- [4] 刘德军, 张荣华. 创建伟业: 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史研究(2002—2011)[M].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8: 44.
- [5] 彭明. 五四运动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346, 351.
- [6] 列宁. 列宁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17.
- [7]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21.
-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24.
-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0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On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Red Boat Spirit”

NAN Dawei, WANG Qiuxiang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0, China)

**Abstrac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s of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t not only wake the Chinese people's awareness of a historic turning point in the road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but also liberated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romoted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ccelerated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provided ideological soil, the class base and cultural nutrients for the bir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Red Boat Spirit”.

**Key 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rxism; Red Boat Spirit

# 档案工作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途径研究

——以美国为例

黄静,余强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档案工作在构建社会记忆的途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围绕档案工作与社会记忆两者展开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以美国为例,列举了档案工作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几种途径,并分析美国档案工作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优势与不足,以促进档案在社会记忆构建中更好地发挥其文化价值。

**关键词:**美国;档案;社会记忆;构建途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10

**中图分类号:**G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58-05

##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实施“世界记忆工程”项目推动了一批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社会记忆理论引入档案领域,为认识和研究档案工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学者们积极将社会记忆理论与档案工作相联系,档案记忆理论也因此诞生。随着学术研究的热潮逐渐付诸到实践中去,美国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档案工作,以推动社会记忆的构建。作为社会记忆的载体之一,档案凭借其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使得其构建或参与构建的社会记忆更为可靠、真实。档案在构建社会记忆中有独特地位,本文以美国的档案工作为例,研究其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途径,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 二、档案工作在美国社会记忆中的构建途径

美国在社会记忆方面的工作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在构建社会记忆的过程中,美国的档案工作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将美国档案工作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途径整理如下。

### (一)档案部门参与“记忆工程”项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记忆工程”就成为各国各地区争先建设的热门项目。美国对于这一主题

所进行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借鉴意义。作为世界上最早实施记忆工程的国家之一,199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推出“美国记忆项目(American Memory Project)”。现今,“美国记忆”包含超过900多万条和美国历史、文化相关的数字藏品,被认为是关于美国历史和文化的较为全面的数字化记录。<sup>[1]</sup>美国记忆项目的成果丰富,主体部门众多,机构合作密切,如国家图书馆与佛罗里达档案馆共同开展的“佛罗里达记忆(Florida Memory)”、印第安纳州立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共同开展的“沃巴什谷视觉与声音(Wabash Valley Visions and Voices)”,等等。

在具体的项目内容上,美国“记忆工程”侧重反映当地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特色。如佛罗里达档案馆与国家图书馆共同开展的“佛罗里达记忆”项目,该项目将反映当地民俗文化、地理环境、重大历史事件等的各类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并入库。目前,该资源库共有50多万个条目,并向佛罗里达州州民和其他对佛罗里达州历史及文化感兴趣的公众提供数字资源的分类型横向查阅、分专题纵向研究及特色资源在线订购服务。<sup>[2]</sup>

“记忆工程”项目的直接作用就是将国家、各州

收稿日期:2021-03-16

基金项目:2016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档案在安徽社会记忆构建中的介入方式研究——以美国为借鉴”(AHSKQ2016D76)

作者简介:黄静(1983—),女,安徽合肥人,博士,安徽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

甚至社区的档案资源进行整合,挖掘那些之前未能被发现的各种档案资源,经过整理加工后向社会大众展出,从而构建社会记忆。

## (二)“公民档案员”思想的普及和应用

美国一直注重保存个人档案,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家庭中的个人档案有了更好地保存和分享途径,该现象也引起美国相关学者的思考。

2008年,美国档案学者考克斯(Richard J. Cox)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到了“Citizen Archivist”这一词语。之后他又在文章中,对“Citizen Archivist”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随着个人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管理水平的不断改进,档案馆难以接受个人以及家庭档案,而家庭以及个人也不太愿意把这些档案捐赠给相关的档案保管机构。在数字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是档案工作者,我们整理和保存自己的档案,并不时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sup>[3]</sup>

2010年4月,时任美国国家档案暨文件管理署长的大卫·肖恩·菲尔里诺,在其官方博客上首次以官方名义提出了“Citizen Archivist”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美国国家档案暨文件管理署不乏大量的纸质文件需要数字化或者转录,是否可以改良档案工作者的日常工作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在协同合作方面的力量呢?借助于普利策奖获得者、传记作家斯提尔斯(T. J. Stiles)为完成其著作而充分挖掘图书馆馆藏资源这一典型作为,菲尔里诺认为,这就是“Citizen Archivist”的典范,即公民个人能够结合自己的兴趣或是专长,充分利用国家的档案资源进行研究、创作,从而最大化地发挥国家、社会的档案资源价值。<sup>[4]</sup>之后,美国国家档案馆就开通了“Our Archives”的档案领域网站,开展了对美国档案事业发展影响巨大的“Citizen Archivist”项目,造就了一大批公民档案员。

## (三)“参与式档案馆”思想的提出及实践推广

参与式档案馆是在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指导下展开实践的。参与式档案馆承认参与的多方对记录拥有责任、需求和发表观点的权利。它是由多个社群根据尊重社群价值观、实践、信仰和需求而创建的,为多个社群服务。参与式档案馆为不同的观点、经验和需求提供了一个协商的空间,也提供了一种协调两者的机制。<sup>[5]</sup>

美国的维基百科是参与式档案馆开展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高度开放互动是维基百科的重要特征,无论年龄、性别、职业、地域,任何网络用户都可以直接参与维基百科条目的编写。2009年,维基百科GLAM(Galleries,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合

作项目启动,以档案馆为首的多个文化机构与维基百科开展交流合作,以开发各类信息资源。<sup>[6]</sup>在“GLAM”项目中,档案工作人员与用户通过对资源条目或评论信息进行添加标签的方式,共同参与档案馆维基资源组织与整合。<sup>[7]</sup>

参与式档案馆概念的提出以及实践的开展,使社会公众能广泛参与社会记忆的构建工作,通过与官方档案机构的合作,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公众参与构建社会记忆的热情,使社会记忆的构建过程更加大众化。

## (四)档案部门跨界合作参与构建社会记忆

构建社会记忆不应该是档案部门大包大揽的任务,在各个学科交叉发展的今天,部门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跨界合作成为构建社会记忆的新途径。档案部门将自己的馆藏资源与其他部门联合开发,进而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档案展出的服务质量,促使公众更快、更好地体验到馆藏资源,构建共同的社会记忆。

美国的缅因记忆网就是档案部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社会记忆构建的经典案例。它是由历史学会、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270多个机构协同建设。在网站建成前后的资金支持方面和整个网站建设过程中,共有多个组织和团队参与,团队成员对150多项历史藏品进行了数字化,还研究撰写了当地历史,并在缅因记忆网内建立了在线展览和社区网站。多方协同建设不仅为缅因记忆网项目提供了稳定和持续的资金支持,还使得网站的在线资源越来越丰富,网站功能越来越健全。<sup>[8]</sup>

## (五)档案工作与新兴技术结合构建社会记忆

新兴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档案工作来说是一次自我更新和挖掘档案资源潜力的机会。新兴技术一方面为档案资源的挖掘提供新的技术与手段,另一方面为档案资源的展出创造了新的表现形式。

特定历史时期、群体以及事件档案库主要使用文本编码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对档案文献和各类影音照片资源进行编码,再进行结构化处理,重新研究历史事件。<sup>[9]</sup>美国的布朗大学图书馆实施的“开放档案”(Opening the Archives)项目借助数字化技术和索引编制工作,将美国总统图书馆的数千条纪录扫描上传并归档,最终为研究美国、巴西两国关系提供参考。<sup>[10]</sup>

美国档案部门积极与高新技术公司开展合作,充分开发馆藏资源,扩大档案产品服务对象的范围,提升公众对于档案展览的体验感。美国国家档案馆借助谷歌强大的内容制作技术,将展览在谷歌文化

与艺术(Google Art & Culture)平台上展出,扩大了档案文化产品的受众范围。该项目运用谷歌地球和街景视图艺术,突破了原有观赏的局限性,高达10亿的像素让公众在网上就可以在线浏览展览作品的笔触特点。<sup>[11]</sup>

#### (六)档案部门与社会媒体合作构建社会记忆

一方面,社会媒体保留着社会生活的各种材料和各类资源;另一方面,社会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使用群体广、覆盖种类全的特点,使得社会媒体逐渐受到档案部门的重视和关注,为档案部门构建社会记忆提供了新平台与新途径。凭借强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广泛的公众参与度,美国在社会媒体文件归档工作中,走在世界前列。

美国曾发布多个关于社会媒体信息归档以及管理条例,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总署(NARA)曾发布过《社交媒体文件管理指南》,用以规范社交媒体文件的捕获、保管期限等方面。<sup>[12]</sup>美国各州政府积极与社会媒体合作,对社会媒体文件归档以构建社会记忆。亚拉巴马州的档案与历史部门从2006年起就开始收集亚拉巴马州档案机构的Facebook页面、亚拉巴马州的美国国会代表参议院的Twitter、州政府机构的YouTube视频等。2010年4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和Twitter签订协议,收集Twitter公司的tweets档案,并建立规范的流程来接受与保存这些档案。<sup>[13]</sup>

#### (七)档案工作与艺术工作结合构建社会记忆

对于美国的档案工作来说,艺术一直是与之结合的“活跃分子”。作为情感体验与逻辑认知的统一,艺术可以使传统档案中晦涩难懂的内容可视化,并更好地向社会公众展出,以此构建社会的共同记忆。

美国波特兰市档案馆曾开发过“驻场艺术家”项目,该项目要求艺术家进驻档案馆,通过将他们的艺术眼光运用到历史记录中来为档案添加新的维度。在2018年初,美国地区艺术与文化委员会(RACC)选择了克莱奥·戴维斯(Cleo Davis)等人的艺术家团队参加2018年波特兰档案馆的“驻场艺术家”项目。这些艺术家与档案管理员合作,深入研究纽约市的档案记录,并根据研究成果创作了相关的作品,最后在档案馆展出。<sup>[14]</sup>艺术与档案工作的结合,不仅使得传统的档案展出更加容易为大众接受,也为构建社会记忆提供了新的思路。

影像作为艺术的重要表达形式,在档案工作中,同样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国家电影登记处每年都会挑选25部电影,展示美国电影遗产的范围和多样性,以提高人们对保存的认识。这些电影并

未被选为有史以来“最佳”美国电影,而是对美国文化具有持久重要性的作品。<sup>[15]</sup>极具影响力的影视作品被收纳进档案,不仅在源头上丰富了档案的资源种类,也更容易唤起社会对于重大事件的共同记忆,从而实现对社会记忆的构建。

#### (八)社群档案建设参与构建社会记忆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社会团体众多。因此,社群档案就成了美国档案工作关注的重点。鉴于美国的国情,社群档案的实践工作往往将视角集中在特殊群体的方面,这些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处于社会底层,因此多被主流档案馆排斥。

美国南部历史档案馆是一个以特殊群体档案为研究对象的社群档案馆,帮助弱势群体建立档案,补充除官方档案以外的历史纪录,从而构建对应的社会记忆。南部历史档案馆鼓励社群成员参与建档,让社群成员决定什么是重要材料并纳入社群档案馆的保管范围,同时推出经验推广计划和未来档案工作者培养计划,创建项目宣传网站,定期分享项目进程和经验。<sup>[16]</sup>

社群档案的建设对于构建社会记忆的意义十分重大。在提倡构建社会记忆的今天,社群档案往往是对社会公众生活的最真实的写照,是社会记忆不可或缺的部分。建设社群档案,使得广大的社会群体能够成为构建社会记忆的一分子,一方面修补与完善了社会记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提高了他们参与档案工作的积极性。

### 三、对档案工作在美国社会记忆构建中途径的评价

美国档案工作在构建社会记忆的途径中,既有其本身的特色和优势,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弊端。对这些途径的评价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可因其优点而过分夸大,也不能因其缺点而过分贬低。

#### (一)优势

美国的档案工作相对发达,在构建社会记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1. 公众参与度高,社会档案意识强

美国不仅由各个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合作构建社会记忆,且积极吸纳民众参与构建社会记忆,民众具有较强的档案收集与利用意识,全体公民在有意识保管自身档案的同时,也让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共同维护社会记忆的趋势。民众的广泛参与,能够激发其自身的身份认同,提高档案工作的积极性,使构建社会记忆成为社会大众共同的职责。随着民众档案权力意识的增强以及数字化技术为档案工作带来的变革,民众广泛参与档案工作成为可能,

也使得社会记忆的构建更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感。

## 2. 重视特殊群体档案工作,全面构建社会记忆

美国在利用档案构建社会记忆的过程中,除了传统档案工作关注的主流档案,一些特殊群体档案也被重视,这些社群档案研究的对象为社会中的各种弱势群体。鉴于美国多种族的国情,在档案工作中只涉及主流的官方档案明显是不能适应社会记忆构建要求的,特殊群体的档案为构建社会记忆提供了细节内容。特殊群体档案工作的不断开展,使得许多社会原本的边缘性群体能够通过档案找到认同感,提升社会地位,构建的社会记忆也得到了更多民众的认可,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和谐。

## 3. 档案部门广泛开展跨界合作

美国档案部门与社会各界合作的历史悠久,且与时俱进。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委员会创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员咨询小组,共同致力于保存美国的影像档案。美国的档案部门也积极与社会媒体合作,如亚拉巴马州的档案与历史部门与社交媒体的合作。同时,美国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多方协作的社会记忆项目,“缅因记忆网”就是一个由档案馆、图书馆等多个机构协同建设的产物。此外,美国也将档案工作与艺术相结合,将档案通过艺术家之手转变成艺术品,再通过展览的方式构建社会记忆。可以说,美国档案部门与社会各界广泛合作,为构建社会记忆提供了多种途径。

## 4. 社会记忆类项目较为成熟

美国对于社会记忆的构建十分重视,既有国家级记忆工程,又有地区级记忆工程。各项目侧重反映民族特点,着重与其他机构合作,制定标准,开设网站,建设数据库,并采用多种方式宣传,不仅推进了美国社会记忆的构建,且构建的途径十分丰富,具体工作也已较为完善。美国的记忆工程项目多是以记忆网站或者在线资源库为基础内容的,项目的成立和发展模式已经较为成熟,都借助数字化平台发布项目成果,供社会公众阅览。

## 5. 制度规范较为完善

在社交媒体文件归档工作中,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发布的《利用 WEB2.0 和社交媒体网站的行为准则及内容管理责任(NARA 指南 831 - 2)》、《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 2014 - 02 布告》与各联邦机构的社交媒体政策,一起组成了规范美国社交媒体记录捕获归档的法规体系。<sup>[17]</sup>

在档案工作的其他领域,美国也推出相关法律条例。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颁布了《国家电影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保护美国电影档案。在“记忆

工程”中,相关的成果网站也已制定相关技术标准,以规范各项工作的有序展开。总的来说,美国档案工作在法律和制度规范的建设方面还是比较完善的。

## (二) 不足

美国档案工作在构建社会记忆的途径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现就其不足方面做出简要分析。

### 1. 档案工作体制和档案行政部门的职能存在局限

美国档案馆是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的内部机构之一,主要职能是保存联邦政府各机关的档案并提供利用,由于没有指导监督检查的职能,美国档案馆的档案大多靠部门以及社会大众自觉的档案意识来收集。美国的档案部门在社会记忆构建中,也没有起到领导、带头组织的作用,主要的社会记忆项目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的。

因为档案机关指导职能缺失,易导致档案收集不全面,存在部分对于社会记忆构建有重要作用的档案未被收集的现象,所捐赠档案的格式也并不统一,对整理工作造成了较大压力。此外,由于指导职能的不健全,档案机构也较难开展某专题的社会记忆构建工作,该方面档案资源的缺失,会导致整个社会记忆的构建不健全。

### 2. 档案资源储备有限,基础建设不够完善

从 1789 年成立至今,美国的历史只有两百多年,相较于一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美国国家的历史较短,其从古老时期遗留至今的档案资源也相对较少,总体的档案资源储备有限。

由于美国种族问题复杂,移民众多,为了扩大存储的档案资源,美国在开发档案资源的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了挖掘特殊群体档案资源以及倡导公民建立个人档案等方面,但对于这些方面的工作大多也只是停留在挖掘层面,对于进一步的档案资源基础建设力度不够,未能有强有力的档案部门进行统一指挥与领导,整体的档案基础资源建设较为混乱,不利于各地区各种类资源的分享。

## 四、结语

利用档案工作构建社会记忆离不开不同的时期、地域特点与数字技术的发展。美国积极开展“记忆工程”项目,提出“公民保管员”思想,档案部门积极与社会媒体、艺术部门合作,同时也注重对社群档案的建设,以此来构建社会记忆。根据对这些途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任何国家或地区在构建自己社会记忆的时候,选择的途径都要根据自己本身的情况来决定,并不是其他社会记忆构建途径都适用于任何地区和国家,对于构建社会记忆的途径

的研究,要有清醒和冷静的思考,切忌“拿来主义”。对于我们档案工作者来说,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和道德素质,履行“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使命与责任,才能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档案工作和构建社会记忆贡献自己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1]徐拥军,王薇.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文化遗产数据库资源建设的经验借鉴[J].档案学通讯,2013(5):58.
- [2]王森,祝庆轩.美国“佛罗里达记忆”资源库特色与启示[J].中国档案,2019(9):78-79.
- [3]Richard J. Cox. Personal Archives and a New Archival Calling: Readings, Reflections and Ruminations [M]. Duluth: Litwin Books, 2008:64.
- [4]David Sean Ferriero. Citizen Archivists Making an Impact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EB/OL]. <http://blogs.archives.gov/aotus/p=1204>.
- [5]Gilliland. AJ, Mckemish S. The Role of Participatory Archives in Furthering Human Rights, Reconciliation and Recovery[J]. Atlanti: Review for Modern 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 2014:79-88.
- [6]张灵慧. 社交媒体时代参与式档案馆的建设路径及对策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19.
- [7]高海燕. 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的图书馆数字资源组织与整合模式研究[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2.
- [8]张丽,秦垒. 档案构建社会历史记忆的实践探究:基于对美国缅因记忆网建设的经验借鉴[J]. 档案管理,2017

(6):12-15.

- [9]靳文君. 中美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比较研究[J]. 浙江档案,2019(4):37-39.
- [10]Open the Archives: Documenting US - Brazil Relations 1960s - 80s [EB/OL]. [2018-11-05]. <https://library.brown.edu/create/openingthearchives/en/>.
- [11]最科技谷歌文化研究所:一个集合的历史时间轴[EB/OL]. [2017-11-25]. <http://www.chinaz.com/news/2012/1017/278574.shtml>.
- [12]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Bulletin 2014-12: Guidance on Managing Social Media [DB/OL]. [2016-09-09]. <http://www.archives.gov/records-mgmt/bulletins/2014/2014-02.html>.
- [13]周文泓. 全球社交媒体归档行动概览与展望[J]. 浙江档案,2016(12):16-19.
- [14]2018 Artists-in-Residence - Cleo Davis & Kayin Talton - Davis [EB/OL]. [2018-10-11].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archives/article/700041>.
- [15]T·库克,李音. 铭记未来:档案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 档案学通讯,2002(2):74-78.
- [16]黄霄羽,陈可彦. 论社群档案工作参与模式[J]. 档案学通讯,2017(5):89-94.
- [17]张江珊. 美国社交媒体记录捕获归档的思考[J]. 档案学研究,2016(4):119-12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Research on the Approaches of Archival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A Cas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HUANG Jing, YU Q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Abstract:** In the way of constructing social memory, archival work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both archival work and social memory,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 taking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enumerating several ways of archival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It also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merican archival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in order to enhance archives' cultural val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archives;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approach

# 《严禁浪费米粮告示》探析

胡安徽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黄宗汉《严禁浪费米粮告示》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主要包括节约米粮的重要性、川民浪费米粮的表现、对浪费米粮者的惩治等。黄氏颁布《严禁浪费米粮告示》的背景与四川大部分地区所处环境如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土地质量低下、水利设施落后等关系密切,还与自然灾害和清政府一贯的粮食政策有一定关联。

**关键词:**《严禁浪费米粮告示》;黄宗汉;节约粮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11

**中图分类号:**F329;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63-05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俭朴节约的民族。俭朴作为一种美德,为智者仁人所大力倡导和弘扬。无论是社会实践还是文献记载,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民族性格和优良传统。《荀子》:“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sup>[1]</sup>《礼记》:“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sup>[2]</sup>《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sup>[3]</sup>《三国志》:“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sup>[4]</sup>《后汉书》:“节用储蓄,以备凶灾。”<sup>[5]</sup>《杜牧诗集》:“艰难同草创,得失计毫厘。”<sup>[6]</sup>《新五代史》:“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sup>[7]</sup>《增广贤文》:“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sup>[8]</sup>这些充满智慧和辩证思想的至理名言,从正反两方面议论,既昭示了勤俭节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彰显了勤劳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除了这些著作及其论述,《严禁浪费米粮告示》也是一篇专门论述节约的文章,然学界对其关注甚少,故而本文拟对《严禁浪费米粮告示》略做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 一、《严禁浪费米粮告示》简介

为便于说明和为研究者提供资料,现将《严禁浪费米粮告示》原文辑录如下:

为严禁浪费米粮以裕民食事。照得民以食为先,食以米为贵。古者耕三余一、耕九余三,原以年岁丰啬无常,旱涝莫测,若不未雨绸缪,难免临渴掘井,故必日用有节,庶可凶歉无虞。人之于米粮,所系甚大,岂可稍有浪费哉?本督部堂莅任后,访得川民不惜五谷,且有靡费多端,正在饬属查禁间,即接据有人联名呈,称伊等籍隶川中,家居畎亩,于稼穡之艰难、市井之情形最为熟悉;川省产米本广,近年因烤酒熬糖,以及染坊洗浆等事,将米粮耗费过多,是以前次雨泽愆期,栽插不时,正恐秋收歉薄,米价即陡然腾贵。其实并无凶荒之象,皆缘牟利之徒罔知惜,禄户鲜盖藏所致,恳请通飭示禁。前来本督部堂查,染色洗浆不过取衣服之鲜明,煮酒熬糖仅可供口腹之嗜好,既非必需之用,即不当任意浪费,除禀批示并通飭各属访查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仰闾属军民诸色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开设醴房、糖房之家,从前有以大麦、芋麦、糗米酿酒者,以红苕、芋麦、白米熬糖者,开设染坊之户,有以白米调浆刷染者,洗浆衣服以米磨粉和匀者,务念粒米

收稿日期:2021-04-11

基金项目:2020年度贵州省教育厅课题“明代贵州政区资料整理与研究”(2020JD023)

作者简介:胡安徽(1971—),男,河南唐河人,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和中共党史研究。

粟为养命之所需,黄粱白黍亦物力之维艰,切勿唯利是图,仍前作损食之浪费,当思生财有道,从兹存惜福之恒心,则天和时顺,家庆年丰,永无旱涝之灾,咸享饱暖之福。本督部堂系为尔民足衣足食起见,倘敢阳奉阴违,暴殄浪弃,由地方官访查得实,差唤到案,从重枷责,以示惩儆,其团首约保及一切在官人役,如遇所管团甲暨里邻内,有前项浪费米粮之户,祇许赴监管衙门禀呈,听候官为查明办理,以杜栽诬搽索之弊,倘有挟嫌妄禀,以及书差私行拘拏,借端诈扰,亦即严行治罪,勿稍宽贷,各宜禀遵,毋违特示。<sup>[9]</sup>

这篇文章出自《晋江黄尚书公全集》,作者是清代黄宗汉(约1804—1864)。黄宗汉,字秀云,号寿臣,晋江(今福建晋江市)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咸丰二年(1852)出任浙江巡抚,时值太平天国革命兴起,湖州一线漕粮搁浅,为保京师粮食供应,他将漕粮改行海运,保证了京城的粮食供给,同时又采取措施有效地解决了清政府江南大营的军饷难题。因其海运和漕粮运输有功,咸丰四年(1854)九月升任四川总督。此文是其咸丰五年(1855)八月所颁布。

## 二、《严禁浪费米粮告示》解析

《严禁浪费米粮告示》主要说明了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节约米粮的重要性。黄宗汉在告示中的第一句话“为严禁浪费米粮以裕民食事”即明确了该告示的目的:严厉禁止浪费米粮,以便粮食宽裕。接下来他又开宗明义指出“民以食为先,食以米为贵”,表明了米粮在百姓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古者耕三余一、耕九余三”,意思是三年、九年的辛勤耕耘,在正常年成下,才能有应对一年、三年灾荒的储备,可见收获来之不易、节粮势在必行。另外,每年米粮的收获并无定数,旱涝灾害也无法预测,如果节约粮食,“则天和时顺,家庆年丰,永无旱涝之灾,咸享饱暖之福”;如果浪费粮食,就会像临渴掘井那样,且会造成“米价即陡然腾贵”。一正一反的鲜明对比,节约或浪费米粮的孰是孰非,昭然若揭。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指出,只有平日节约粮食,才能不担心荒歉之年。黄氏在文中所谓“人之于米粮,所系甚大,岂可稍有浪费哉?”是提醒川民认识节约米粮的重要性。正因为米粮重要,但在现实生活中又存在着浪费米粮的现象,故而有必要倡导节约、制止浪费,否则将贻害无穷。黄宗汉对米粮重要性的阐释,

体现的是一种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之执政理念。

其二,川民浪费米粮的具体表现。米粮很重要,但川民尤其是商人却并未珍惜,“且有靡费多端”,主要表现在用大麦、芋麦、糯米酿酒,用红苕、芋麦、白米熬糖,用白米调浆刷染、洗涤衣服等。民以食为天,大麦、芋麦、糯米、红苕、白米等本是百姓三餐之必需品,但却被大量用在三餐之外,用到不该用的地方,这是浪费现象的另一种表现。就文章的表述看,不仅存在着浪费而且浪费极为严重。“染色洗浆不过取衣服之鲜明,煮酒熬糖仅可供口腹之嗜好,既非必需之用”,此语中肯地指出米粮用在这些方面价值不大,并非生活之必需。而且,这种浪费很容易造成米价飞涨。因此,黄宗汉希望川民“务念粒米颗粟为养命之所需,黄粱白黍亦物力之维艰,切勿唯利是图,仍前作损食之浪费”,不要随意浪费粮食。黄氏言之恳切、情之笃深,在告示中显而易见,显示了一位父母官的良苦用心和责任担当。

其三,对浪费米粮者的处置。事物总是有正反两个方面,如果说黄氏阐释节约米粮重要性的话语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正面的劝说引导,那么对浪费粮食者绳之以法、坚决打击,则是反面的约束惩治。告示末尾:假若有人敢阳奉阴违,暴殄浪费,则由地方官访查实情,传唤到案,从重处理,以示惩儆。同时,为确保依法制裁浪费米粮之人,避免栽赃诬陷勒索徇私报复等弊端的发生,黄氏还要求地方吏役马弁,如果遇到所管辖区内有人浪费米粮,先要到衙门禀呈,等待官府查明办理;倘若有人诬陷徇私,或是擅自拘捕处理,将严惩不贷。这样既做到制裁符合程序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由此看来,黄宗汉颁行这份告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故而制定的措施对制止米粮浪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总而言之,黄宗汉《严禁浪费米粮告示》摆事实讲道理,正反结合,观点鲜明,既动之以情又严之以法,要求川民对粮食务必节约、严禁浪费。黄氏此文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代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 三、《严禁浪费米粮告示》颁行的动因

黄宗汉之所以颁布《严禁浪费米粮告示》,与当时四川所处环境关系密切。换言之,这是四川当时实际情况的必然选择。

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粮食不仅关系着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中国历代王朝中有作为的帝王和地方官员无不重视和关心粮食的生产和储备,前揭古代名言警句“节用储蓄,以备凶灾”“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等即是明证。为此,上至皇帝下至府县官员,都会想方设法把

农业基础设施搞好,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黄宗汉也不例外,他1854年就任四川总督,1855年颁行此告示,告示中的“照得”一词,意即“查察而得”,由此而言,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对当时四川地区农业的基础状况和基本条件进行了调查,对相关情况有了较为全面和详细的了解。

古代社会,粮食生产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而且与劳动力的数量和土地面积、质量、水利工程等有密切关系。四川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分布、土地面积和质量、水利工程等,决定了该地域粮食生产颇不平衡。成都平原由于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人口密集等条件,粮食生产较为富足,素有“天府之国”之美誉。有清一代,该地粮食生产依然充足,如汉州府(即今四川广汉市)，“村落平壤,古称膏腴,食藉耕作,衣藉纺绩,其地蔬果麻桑,不待外求”<sup>[10]</sup>。但也必须提及的是,在宋代,该地已是“地狭而腴”“无寸土之旷”<sup>[11]</sup>。这就是说,宋代成都平原的土地数量已经满足不了众多人口对土地的需求,即人多地少。清代这种局面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嘉庆二十五年(1820),成都府(即今四川成都市)滋生丁口5484272,田地6818828亩<sup>[12]</sup>,人均约1.2亩。人多地狭的状况无疑会对粮食生产和需求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成都平原之外的四川大部分地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土地质量低下,水利设施落后,导致粮食生产存在不少问题。如雅州府(即今四川雅安市)，“山崇岭峻,绝少平畴,鹄面鸠形,尤伤土满”<sup>[13]89</sup>，“地气严寒,不生五谷,山皆不毛,人皆野处”<sup>[13]151</sup>，打箭炉(即今四川康定市)，“瘠土不毛,惟播州青稞莞荳”<sup>[13]144</sup>。“山多无田,民种青稞,因无水利。”<sup>[13]150</sup>再如理塘县(即今四川理塘县)：“土皆沙砾,百谷不宜,纵横百里内不生寸树。”<sup>[14]</sup>兴文县(即今四川兴文县)：“环绕皆山,并无沃野。”<sup>[15]113</sup>渠县(即今四川渠县)，“虽有大江小溪,然皆岸高水低难于筑堤,故无水利可言”<sup>[16]</sup>。汶川县(即今四川汶川县)，“九石而一土”，<sup>[17]</sup>农业生产环境颇为糟糕。梓潼县，“山峦峻嶒而迭出,石田硗确而莫耕”<sup>[18]27</sup>。荣经县(即今四川荣经县)：“邑山多田少,产谷无多。”<sup>[19]</sup>罗江县(即今四川罗江县)：“河堰水田颇少,陂岭山地十居六七。”<sup>[20]</sup>高县(即今四川高县)：“山邑也,似无水利可言。”<sup>[21]211</sup>大竹县(即今四川大竹县)：“多山而无大河流,三山之产物较逊于两漕,而东西两山,视中山则又逊焉,平日米价之低昂,恒视外县有无输入以为定,而一切服食器用,其仰给外输者尤为不少。”<sup>[22]</sup>此类记载在清代和

民国四川方志中俯首即拾,反映了该地域自然环境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

正因为如此,四川不少地区的土地面积增长缓慢,如清溪县(即今四川汉源县清溪镇),康熙二十年(1681)至雍正七年(1729)间,“原载中下田共五十七顷二十九亩八分二厘八毫六丝”,雍正十二年(1734),中下田地共壹百陆拾壹顷陆亩叁分柒毫伍丝玖忽<sup>[13]130</sup>。从康熙二十年(1681)到雍正十二年(1734)共53年,清溪县土地面积平均每年增加约2顷,相当缓慢,而且土地仅有中下田而无品质好的上田。再如叙州府(即今四川宜宾市),雍正六年(1728)上中下田地二万一千五百六十五顷四十九亩四分三毫五丝九忽二微九尘九织,嘉庆十年(1805)上中下田地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五亩五厘<sup>[23]</sup>。自雍正六年(1728)至嘉庆十年(1805)共77年,叙州府土地面积年均增长约85亩,极其缓慢。土地是粮食之母,土地面积增长缓慢自然不利于粮食的生产。此种状况无疑会给百姓生活带来一定困难,如雅州府:“家鲜盖藏,无大殷实”,“地瘠民贫。”<sup>[13]130</sup>又如长寿县(即今重庆长寿区),丰年有余,荒歉之年则“仅足供饔殮而已”<sup>[24]</sup>。再如梓潼县(即今四川梓潼县)“地瘠民贫”<sup>[18]429</sup>。高县“惟是饔殮粗给,终鲜储藏,故虽少凶荒之患而亦无巨万之财”<sup>[21]413</sup>。

四川地区在粮食生产上除了自然环境条件较差外,自然灾害对川民粮食生产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关于清代四川地区自然灾害的记载很多,略举数例:乾隆三十八年(1773),兴文县:“禾已吐秀叶红,稻田水尽赤,气腥羶,秋仅收十分之一,春米食之多腹泻。四十三年大旱,次年春夏间斗米千钱。”<sup>[15]611</sup>汉州府,道光十年(1830)四月二十日酉刻,“治东大雨雹,大者如鸡子小者如李子,偃倒菜籽大麦小麦暨竹木房屋不计其数,此灾甚烈”;咸丰三年(1853),“夏大旱,四月不雨,五月十九日小雨,禾尽枯,至六月十一日,始大雨,水发山陂,河坝无水灌者,颗粒无收,惟近灌县大堰水田收几成”<sup>[25]</sup>。彭县(即今四川彭州市)，“咸丰三年癸丑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同治五年癸酉,秋七月,大淫雨,稻熟不收”<sup>[26]1056</sup>。汉州和彭州市均地处号称“天府”的成都平原,在灾害来临之际仍然“禾尽枯”“颗粒无收”“稻熟不收”,则“天府”之外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在灾害面前的情况更不容乐观。荣经县(即今四川荣经县)：“道光十八年大饥;咸丰四年四月雨雹伤稼。”<sup>[27]832</sup>此类记载甚多,表明清代四川地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和危害之重。学界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是四川自然灾害由少

到多和由弱到强的一个转折时期<sup>[28]</sup>。

自然灾害对四川地区农业和粮食生产带来相当不利的影响,从而对川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如荣经县,“自壬寅癸卯甲辰三年歉收,坝田犹有三四分,山田山地有颗粒俱无者,连岁饿死及迁徙流离约减人丁一万有奇,十年之生殖恐不敌此三年之死亡也”<sup>[27]</sup><sup>386</sup>。文中所谓壬寅癸卯甲辰三年即1842、1843、1844三年,“十年之生殖恐不敌此三年之死亡”,足见当时因饥饿和迁徙流离的死亡人数之多。庆符县(现属四川高县):“乾隆丙辰年大旱,丁巳年谷价高昂,至戊戌又旱,己亥年谷价高昂,人民饿死者十之二三焉。”<sup>[29]</sup>秀山县(即今重庆秀山县),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大饥,斗米钱四千有奇”。原书解释曰:“比年凶荒,居民流离,平时米价一斗值钱千数百,今三倍其常价。民多取石粉为食,死者道路相望焉。”<sup>[30]</sup>筠连县(即今四川筠连县),嘉庆十九年(1814):“大饥,民以野菜与白泥充食,呼为观音粉。”<sup>[31]</sup><sup>403</sup>南川县(即今重庆南川区),道光二十年(1840),“是年歉收,米价昂贵,贫民无所得食,掘白泥果腹,号观音粉”。该县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禾叶被虫食且尽,民苦无收,大饥。多全家逃入贵州”<sup>[32]</sup>。如此众多的记载彰显了当时四川地区自然灾害的严重以及川民生活受灾害影响之严重,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粮食生产对川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上分析表明,黄宗汉颁行《严禁浪费米粮告示》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

#### 四、余论

上述资料显示四川相当一部分地区颇为不利的粮食生产条件,以及咸丰及其之前四川地区的自然灾害和对川民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四川地区风俗的变化也让人担忧,如筠连县,“清初,习尚勤朴素俭。乾嘉以还,日趋侈靡”<sup>[31]</sup><sup>527</sup>。侈靡之风的出现毫无疑问会带来对粮食的过度消耗。作为该时期四川总督的黄宗汉不可能不对此有所了解,再加上咸丰二年(1852)他在任浙江巡抚时曾负责京师的粮食供应,对粮食重要性的认识清楚,当其莅任四川总督之时,经过调查发现当地浪费米粮的社会现象,他随即颁行《严禁浪费米粮告示》,这既在情理之中,又顺应了当地、当时社会现实的要求。实际上,四川地区一些地方官员比黄宗汉对于米粮重要性的认识更进一步,如彭县官员认为:“害谷者曰蓝靛与烟叶,妨食者曰烧酒。”<sup>[26]</sup><sup>286</sup>彭县官员不仅认识到烧酒对粮食的消耗,更认识到种植蓝靛和烟叶抢夺了种植稻谷的田地,而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无疑会影响到粮食的产量和储备。

黄宗汉禁止川民浪费米粮的告示与清政府一贯的政策也有关系。乾隆时期,由于人口不断增多,灾害频繁,粮食问题十分突出,甚至连沿海产粮地区也不例外。为了保证粮食供给和抗御自然灾害,清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禁止大米出口、禁止陋习烧锅、禁止奸邪商人放青囤积、鼓励外洋贩米来华、鼓励粮食流通买卖、开仓平糶、运丰补欠等<sup>[33]</sup>。黄氏禁止用米粮烤酒熬糖、染坊洗浆无疑是上述政策的继承和延续。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sup>[34]</sup>探析黄宗汉《严禁浪费米粮告示》的内容及其提出的背景,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该文的历史价值,传承优秀文化,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党和政府提出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意义,培养珍惜粮食的良好习惯。

#### 参考文献:

- [1]梁启雄.荀子简释·第十七篇:天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3:220.
- [2]钱玄,徐克谦,张采民,等注释.礼记·檀弓下[M].长沙:岳麓书社,2001:129.
- [3]诸葛亮.诫子书[C]//史孝贵.历代家训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2.
- [4]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498.
- [5]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145.
- [6]杜牧,撰,冯集梧,注,陈成,校点.杜牧诗集·卷四〇,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98.
- [7]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传·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4:397.
- [8]金缨.增广贤文·格言联璧[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119.
- [9]黄宗汉,撰,黄贻,辑.晋江黄尚书公文集[C]//陈明光,侯真平.中国稀见史料(第二辑)第一三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296-301.
- [10]刘长庚,等修.嘉庆汉州志·卷一五,风俗志,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442.
- [11]脱脱.宋史·卷八九: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2230.
- [1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0:407.

- [13]曹抡彬,曹掄瀚,纂辑.乾隆雅州府志·卷四,赋役志·卷五,风俗志、物产志、水利志,乾隆四年(1739)刻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 [14]陈登龙,编.嘉庆理塘县志·卷上,土则,嘉庆一五(1810)年抄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46.
- [15]江亦显,等纂修.光绪兴文县志·卷一,輿地志;卷五,外纪志,光绪十三年(1887)修1936年重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 [16]陈铭勋,修.民国渠县志·卷二,食货志,1932年铅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177.
- [17]祝世德,等纂修.民国汶川县志·卷末,附录,1944年铅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224.
- [18]张香海,等修,杨曦,等纂.咸丰梓潼县志·卷首,旧志序;卷三,风俗志,咸丰八年(1858)刻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 [19]劳世沅,纂修.乾隆荣经县志,乾隆十年(1745)刻本.转引自蒙默,等著.四川古代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473.
- [20]李桂林,纂,邓林,等修.嘉庆罗江县志·卷六,户口志,嘉庆二十年(1815)修同治四年(1865)重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64.
- [21]教立榜,曹毓佐,等纂修.同治高县志·卷九,水利志;卷一九,风俗志,同治五年(1866)刻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 [22]陈步武,江三乘.民国大竹县志·凡例[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19.
- [23]刘元熙,修,李世芳,纂.嘉庆宜宾县志·卷八,田赋志,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1932年重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77.
- [24]卢起勋,等修,刘君锡,等纂.民国长寿县志·卷四,风

土志,1944年铅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268.

- [25]张超,修,张敏行,纂.同治续汉州志·卷二〇,祥异志,同治八年(1869)刻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510-511.
- [26]张龙甲,等修,龚世莹,等纂.光绪彭县志·卷一一,祥异志;卷三,风俗志,光绪四年(1878)刻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 [27]贺泽,修,张赵才,等纂.民国荣经县志·卷一三,五行志;卷六,赋役志,1915年刻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 [28]中国农学会,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我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181.
- [29]佚名,纂修.光绪庆符县志·卷三六,祥异志,光绪年间手抄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未载出版时期):200.
- [30]王寿松,等修,李稽勋,等纂.光绪秀山县志·卷三,官师志,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207.
- [31]祝世德,纂修.民国筠连县志·卷六,要事志;卷七,人文志,1948年铅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 [32]柳琅声,等修,韦麟书,等纂.民国南川县志·卷一三,前事志,1926年铅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1197.
- [33]叶志如.乾隆朝米粮买卖史料(上)[J].历史档案,1990(4):23.
- [34]新华社.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N].光明日报,2019-03-0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The Analysis of Notice on the Strict Prohibition of Wasting Rice and Food

HU Anhui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Huang Zonghan's *Notice on the Strict Prohibition of Wasting Rice and Food* contains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importance of saving rice and foo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ichuan people wasting rice and food, and the sanctions against those who wasted rice and food. The background of Huang's *Notice on the Strict Prohibition of Wasting Rice and Foo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in most of Sichuan areas, such as relatively harsh natural conditions, the low quality of land, and the backwardn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as well as the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consistent food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Notice on the Strict Prohibition of Wasting Rice and Food*; Huang Zonghan; food conservation

# 红军长征文献所载疾病资料探析

陈清莲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红军长征文献载有丰富的疾病信息。文章重点对战伤、疟疾、脚伤、肠胃病等疾病资料进行了研究,并对防治疾病的医方验方做了探析。红军长征文献所载疾病信息具有资料丰富、立场鲜明、充满地方特色、编纂主体多样化等特点。开展对红军长征文献所载疾病资料的研究,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长征文献;常见疾病;医方验方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12

**中图分类号:**G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68-05

红军长征文献是指红军将士们在长征过程中以及长征胜利后撰写的各类题材的作品,如长征日记、回忆录等,以及学界在研究红军长征过程中挖掘整理的各类资料。红军长征是在极为罕见和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既面临着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又面临着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疾病成为红军长征中遇到的另一种“敌人”,它们是威胁红军将士生命和健康的重要“杀手”。红军长征文献载有丰富的疾病信息,包括呼吸系统、内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传染病、皮肤病、外科疾病等多种类型的疾病。有学者认为,常见的有战伤、疟疾、痢疾、疥疮、下肢溃烂、胃病、肠伤寒、肺炎、伤风、冻疮等。<sup>[1]</sup>美国学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日记》中指出,疟疾、腹泻、感冒、伤口溃烂和脚痛是常见疾病。<sup>[2]58</sup>就笔者目之所及,红军长征文献记录最多的是战伤、疟疾、脚伤、肠胃病等疾病。学界对这些资料的挖掘利用仍有一定的空间。鉴于此,本文对红军长征文献所载疾病信息略做探析。

## 一、常见疾病

### (一)战伤

红军长征途中几乎每天都要打仗,都会造成伤亡,“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sup>[3]</sup>牺牲如此之大,

负伤更是家常便饭,故而战伤是文献中记载最多的疾病。战伤主要是枪伤、外伤,如果不能及时治疗,往往会引起其他疾病。

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在《长征日记》中记载:1934年11月23日,敌机八架轮番向红军阵地扫射轰击,造成30余人伤亡,其中三营通讯班班长刘挺楷大腿被打伤。<sup>[4]</sup>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的童小鹏在《残酷的轰炸》中对战伤的记载尤为翔实:“碎片,泥土,树枝,以致被炸战士的衣肉,均纷纷飞起来。”“他们手足断裂了,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地流,……他们的知觉失去了,身体破碎了:有些头颅已经破碎,脑浆流在地上;有的是手足已经炸断,残缺不堪;有的是身躯已经溃烂,五脏分裂;甚至有些炸得体无完肤,炸得骨肉碎裂,撒在地上,而肢体竟被挂在树枝上,鲜血淋漓,带着的破碎衣片,尚燃着火冒着烟;很多尸体,已认不得是谁了。”“一丛绿森森的松林已经成为脱叶萎枝的枯柴一堆,很好憩息的荫地已成为血肉横飞、尸体狼藉的血腥场所。”这是对敌机轰炸造成的战伤的总体描写,从中看出红军战士伤势之惨重。该文还对单个红军战士的战伤进行了特写:“受了伤的阴大生、郭承祥摸着伤口蹒跚走了过来,满身都沾着泥灰,面孔已是现着青

收稿日期:2021-04-15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长征时期民间对红军医疗救护资料辑录与研究”(18BDJ055)

作者简介:陈清莲(1971—),女,河南唐河人,硕士,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图书文献研究。

色,衣裤已为鲜血染得湿透了。他凄凉地对我说:‘我负伤了,请叫卫生员来上药……哎哟!’”<sup>[5]</sup>该段文字中的“衣裤已为鲜血染得湿透了”从正面、“蹒跚”“青色”“凄凉”“哎哟”从侧面,直观描述了两位战士战伤的严重。贺炳炎 1935 年 12 月 22 日在湘黔边界的瓦屋塘战斗中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止血急救包打开一个又一个,绷带缠了一条又一条,血还是止不住,他右臂的骨头被打碎,只剩下几根筋连着。贺炳炎的战伤没有有效处理,后来引起感染、发烧,不得不截肢。<sup>[6]</sup><sup>[22]</sup>在贵州毕节的哲庄坝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余秋里的左臂,露出骨头和筋腱,胳膊当即垂落下来,血流不止。由于缺医少药,他的伤臂迟迟不能痊愈,后来因感染又引起了高烧。<sup>[6]</sup><sup>[98]</sup>在娄山关战斗中,敌人的枪弹撕开了钟赤兵右小腿上的一大块肉,血如泉涌,一连包了十多层破布,血还照样向外浸。钟赤兵在遵义做了手术,伤口不幸感染,腿肿得分不清大腿和小腿,高烧持续不退,半月内竟然做了 3 次截肢手术。<sup>[6]</sup><sup>[136]</sup>一名红军战士在回忆录中说:“一颗子弹打在我的左小腿骨上,骨头都打去半边。”<sup>[7]</sup>从文献记载的情况看,这些战伤都特别严重。还有一些文献对战伤的记载相对模糊,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在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老鸡山的战斗中腿部负重伤。<sup>[8]</sup>《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记载:1935 年 1 月青杠坡战斗中,一名红军战士腿部负伤,一名战士肩部锁骨受伤,被当地百姓救护。<sup>[9]</sup>伤势程度如何并不明确。还要提及的是,因战伤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很容易诱发或转换成其他疾病。文献记载,中央警卫班班长刘贵祥受了战伤,伤口发炎引起了高烧不退。<sup>[10]</sup>

## (二) 疟疾

疟疾俗名打摆子、打脾寒、发寒热,西医认为它是人感染了疟原虫而引起的疾病,而蚊子是传播疟原虫的媒介;中医认为,疟疾的形成大都是由于感受暑热、风寒等病邪,留滞体内,成为疟邪而引起,人体抵抗力降低,疟邪乘机而起,便会导致疟疾的发作。<sup>[11]</sup>疟疾是我国常见多发的传染病之一。长征期间,红军战士几乎每天都是风餐露宿、顶风冒雨,途经的也多是密林和人迹罕至之地,这些地方正是蚊虫肆虐的地方,因此,疟疾既是红军常患也是威胁红军极为严重的疾病之一。毛泽东在长征初期因患疟疾而只能靠担架抬着行军;任弼时转战贵州黔东南地区时得了很重的疟疾;萧锋在长征途中突发疟疾,幸好在懋功休息几天,病情才有好转。此类记载在有关长征的文献中颇多,反映了疟疾确实是当时威胁红军的主要疾病之一。耿飏所患疟疾尤为顽固,从

长征出发前到进入贵州黎平,疟疾就一直纠缠着他,即便在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之际,疟疾依然不放过他,因疟疾发作而使他的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只好坐在地上指挥。<sup>[12]</sup>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记录了朱德总司令长征时期也曾患过疟疾,“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sup>[13]</sup>。普通士兵同样患疟疾,萧锋《长征日记》记载,1935 年 4 月 23 日,红军经板桥,过北盘江河到牛场、者相宿营,吴富善发疟疾,幸运的是他半夜就好了。<sup>[14]</sup>李真《挺进黔东》对一个从事护理工作的红军战士患疟疾的情况有细致描述:“看护班小梁发疟疾,他先在石洞岩头上睡着了,脸烧得通红,手脚滚烫。过一会,他又冷得上下牙齿打战。他爬起来钻进打谷场的稻草垛里,仍然颤抖得使草垛直晃荡。摆子打过之后,他钻出草垛,扎紧腰带,背起药兜,定睛一看,在田埂上休息的是最后尾的收容队,急得他赶快跑步去追自己的队伍。”<sup>[15]</sup>这段文字不仅说明小梁确实患了疟疾而且描绘了疟疾的症状“脸烧得通红,手脚滚烫”“冷得上下牙齿打战”。另外,还用“急得”“赶快跑步”等文字去彰显红军医护人员忠于职守、以事业为重崇高精神。陈伯钧在广东佛子岭时得了疟疾,“又吐又烧,苦不能当”<sup>[16]</sup><sup>[73]</sup>。时任中革军委三局副局长的伍云甫在其日记中记载,1935 年 9 月,他在四川阿坝一带,“头痛,身体发冷、发烧”<sup>[16]</sup><sup>[736]</sup>。1936 年 8 月 21 日在甘肃中堡,“是夜大病,发冷,发烧,周身甚痛”<sup>[16]</sup><sup>[772]</sup>。这显然是疟疾的病症。材料也说明伍云甫多次患疟疾。有些红军战士的疟疾与其他疾病并发,姚醒吾长征之初患伤寒病,接着又染上了疟疾。<sup>[17]</sup>

## (三) 脚伤(足疾)

长征时期,红军将士“双脚走天下”,而且基本走的是羊肠小道、崎岖山路,还要钻山林、穿荆棘,因此,脚伤特别常见。贺龙在转战乌蒙山时患了严重的脚疾,脚板上裂出一寸长的口子,往外渗血,起初用凡士林膏抹擦,后来凡士林膏用完了,只好用火烤来消炎。<sup>[18]</sup>董必武过草地时,原来溃烂的脚再度发炎,连骑马都很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污泥草地上拖。<sup>[19]</sup>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贵州黎平患脚疾,几天后不仅未愈,反而加剧,只好用担架抬到宿营地。<sup>[16]</sup><sup>[73]</sup>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军需科科长隰志良因脚上生疮,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只好用担架抬着他。<sup>[16]</sup><sup>[409]</sup>材料表明董必武、陈伯钧和隰志良的脚疾特别严重。某些时候,脚伤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引起其他疾病,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科科长赵镛右脚负伤后,经包扎治疗,本将痊愈,因行军时将结痂

磨掉,又未及时采取措施,继续行军走路,结果发生刺痛,脚痛加重,溃瘍面扩大化脓,而且因伤口感染又引起了高烧到摄氏40度。<sup>[16]451</sup>脚伤很多时间是群体性疾病,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沙耿飏对此有明确记载:“旁边战士说:‘卫生员,请你拿点药出来擦一下我的脚。我这脚起了几个泡,痛得很!’”“那边又有几个战士说:‘我的脚痛了,大约也是起了泡。’”<sup>[20]</sup>显然,脚伤的不止一个人,是许多战士。索尔兹伯里《长征日记》也注意到了红军的脚病是个大问题,因为许多战士脚上长水疱和脓疮。<sup>[2]61</sup>

地方百姓的回忆录对红军战士的足疾也有较多记载。红军在离开贵州黎平时将一个双脚肿得像小冬瓜大的红军战士安置到当地百姓家。<sup>[21]</sup>红军战士朱云章到贵州台江时,因脚走伤留在了当地,另一战士赖远光也因脚伤不能行走留了下来;红军战士何胜隆因双脚肿痛追不上部队而流落到贵州施秉新城;红军过黔东南谷陇时,几名战士的脚肿得不能行走,只好留在当地。<sup>[22]</sup>红军战士朱炳山脚受伤肿了,实在走不动便留在了纳雍。<sup>[23]</sup>

有些脚疾则是由战伤引起的。红军战士李世彪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右脚板<sup>[24]</sup>,朱镇中在广西全州同敌军激战时被子弹打中左脚踝<sup>[25]</sup>,红34师传令班长林中辉被民团用机枪打断了右脚脚掌<sup>[26]</sup>,红军在遵义期间,高家住了几个红军伤员,其中有两个断了脚板<sup>[27]</sup>。

文献对红军战士脚伤的记载特别多,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脚疾在红军长征中尤为常见。也正因为脚伤无法行走,跟不上大部队,这些红军战士被留在了民间接受百姓的救护。

#### (四) 肠胃病

肠胃病是一类疾病的俗称,包括腹胀、腹泻、胃溃疡、痢疾、恶心、呕吐等。长征途中,红军的饮食和卫生得不到保证,饥一顿饱一顿甚至很长时间吃不到饭是常态,有时候只能吃野菜、树叶树皮、变质食物等,故而肠胃病也是困扰红军的主要疾病之一。陈伯钧曾在日记中记载:“最近天气欠佳,夜,风大,甚冷。兼之吃东西不注意,衣服较少,住地不卫生,生病者较多,大半是肠胃病。”“近来营养不济,肠胃生病。”<sup>[16]116</sup>可见肠胃病在战士们中间颇多。时任中革军委三局副局长的伍云甫在日记中写道:1936年3月22日在四川道孚县,一个夜间突然腹部剧痛<sup>[16]755</sup>,这显然是肠胃病的病症。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董小鹏在其《军中日记》中说:1934年11月4日在湖南城口县因吃鸭导致肚胀<sup>[16]782</sup>;1935年8月14日,部队会餐,本想多吃点,“可惜近日消化不良不能

多装!”<sup>[16]819</sup>贺龙长征中因吃了变质羊肉而患中毒性痢疾。<sup>[28]</sup>红二六军团两名患痢疾的红军曾流落到贵州赫章县安万庆家。<sup>[29]</sup>肠胃病有时是集体性的。红一军团运输队途经贵州湄潭时,20%的人员发生肠炎、腹泻。<sup>[16]451</sup>红军进入藏区后,由于天气反常,忽冷忽热,伙食又无油、无盐、缺菜,多日以煮青稞、苞米当饭,所以腹泻肚胀、消化不良等病大量发生。<sup>[16]552</sup>

张量《爬雪山》对腹胀的原因、处理方法有生动描写:“我们炮兵营自长征以来,已有三个月没有吃上盐巴了。每天吃的不是青稞就是大豆。而这些东西又没有磨成面粉,所以吃了就胀肚子。爬山时,同志们用两手不时地按摩着自己的腹部,走一二十步就要按摩一次,我们叫它‘人工消化’。在腹部发胀时,只能挺起胸走,不能弯下腰,这就妨碍了爬山的行动。”<sup>[30]</sup>患痢疾的病人非常痛苦。1935年9月中旬,某战士患了痢疾,行军时走一会就得蹲一会儿,拉得瘦弱不堪,脸无血色,嘴唇发青。<sup>[15]</sup>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因吃了半生不熟、嚼也嚼不烂的肉导致拉肚子,行军时双腿发软,最后掉了队。<sup>[31]396</sup>邓颖超过草地时拉肚子,浑身气力衰竭,最后两天常常是骑五分钟的马,就要下马在路旁躺十分钟;出了草地,她在地上躺了两个多小时才缓过神来,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奄奄一息,人们甚至担心她活不成。<sup>[31]399</sup>消化系统疾病甚至会威胁人的生命,红一军团运输队监护连司务长周明玉,当天看着还是好好的一个人,当晚突发肠胃病,不到天亮就去世了。<sup>[16]552</sup>

除了上述较为常见的疾病外,还有一些疾病不容忽视。一个是眼疾。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长征途中本人患了眼疾,他所在部队的战士眼肿者十有八九<sup>[16]199</sup>,可见数量不少;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科科长赵镛左眼角膜被砸伤,又发了炎,造成溃疡,疼得厉害,严重影响了工作<sup>[16]646</sup>。《红军长征的故事》记载:红三军团的一个炊事班班长,出了贵州就闹眼病,两只眼红通通的,肿得像桃,开始,眼睛只是淌眼泪,后来流起血水来。<sup>[32]191</sup>另外,雪山上和其他高地引起雪盲<sup>[2]58</sup>,也一定程度对眼睛造成伤害。更要提及的是,红军长征途中还有一些烈性传染病,如伤寒、霍乱等。《红军长征的故事》记载:战士邓仕俊战伤伤口还没好,又害起伤寒。<sup>[32]179</sup>索尔兹伯里《长征日记》称,周恩来在长征途中也曾得过伤寒。<sup>[2]43</sup>红二军团第五师政委谭友林长征途中也患过伤寒,<sup>[8]</sup>红一军团某运输员在甘肃松岗患了霍乱,上吐下泻。<sup>[16]586</sup>所幸的是,红军医务人员对这些烈性传染病高度重视,采取了得力措施,如隔离、专人护理等,很快将其控制。

还要说明的是,伤风感冒是红军长征中最为常见的疾病,一般情况下靠自身免疫能力就能抵御,除非重感冒和流行性感,正因为此,长征文献对其记载并不特别多,只是对重感冒和流行性感有所关注,故而本文未单独分析,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常见疾病。

疾病给红军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据学者研究,因水土不服、痢疾等疾病,以及持续行军造成的严重疲劳,使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在到达湘江之前减员了2.5万人,伤病是红军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sup>[33]</sup>

## 二、应对疾病的医方验方

有了疾病必须应对,否则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和战斗士气。红军医务工作者和广大民间百姓,采取诸多措施为红军伤病员治病。由于红军部队的医疗条件极差,药品奇缺,治疗能力有限,不少伤病员是用验方和偏方治愈的。

就文献记载看,长征途中,红军医务人员就地取材,采用中草药、土方土法等各种手段,为伤病员医治。每次行军前,医务人员都要指导战士们穿好草鞋,避免打脚泡或磨破脚,打绑腿不要过紧过松,有水壶的装满开水,在行军中不要喝生水。在小休息或大休息时,都以班或排为单位,挖一临时厕所,离开时掩埋。每次休息,卫生员都检查病号,请卫生队医生医治,并指导“倒脚”活动,增进下肢血液循环,防止静脉曲张和下肢溃疡的发生。<sup>[34]</sup>

除了红军医务人员对疾病的应对,民间百姓也是救护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初期,耿飏所率部队在大雨中与敌人激战,不少战士伤风感冒,在广西天堂圩被当地老中医用宽中理气汤治风寒,为伤员敷上了接骨生肌的药膏,对有风寒腿、腰背疼的人则施以针灸;对耿飏的顽固性疟疾则用祖传秘方治疗,主要成分是去掉头足的斑蝥,以桂圆肉赋型,一剂共为九丸,九丸又分三服。老中医又叮嘱红军多吃七叶灵芝草(即大蒜),有病可治,无病亦防。因为大蒜有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的功效,所以老中医的民间验方,后来在长征途中试用,对红军预防和治疗疾病有积极作用。<sup>[35]</sup>战士们用酒和樟脑液洗脚来止痛消肿,用布绑腿包扎腿脚,以防止茅草和带刺的植物划破和割伤腿脚<sup>[2]61</sup>。注射樟脑和闻闻食盐有助于恢复呼吸。<sup>[2]62</sup>针对红军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出现晕眩、呕吐等高山反应,当地百姓给出了“以白糖和水饮”的验方<sup>[36]</sup>。小腹部有硬块,只用温水疗法即可痊愈<sup>[16]183</sup>。肚痛可服用中草药吴庚子(即吴茱萸),几分钟就好了。<sup>[16]462</sup>角膜发炎可注射人奶。<sup>[16]645</sup>吃了变质食物而患中毒性痢疾,可以

先用冷醋水服下“甘隶”和“列曹尔清”,再喝下大半碗冷醋水,前者用于肠道灭菌消炎,后者帮助腹泻。吃药喝水后还会有几次腹泻,把肠道中有害物排出体外才康复得快。<sup>[28]</sup>贵州镇宁江龙茅草村百姓用茶水帮助红军战士治疗拉肚子和退热退烧<sup>[37]</sup>。贵州习水百姓赵文斌用苦蒿碾碎后敷在红军战士伤口上治疗战伤。<sup>[38]</sup>正是得益于这些医方验方,不少红军伤病员或被从死神手中夺回,或恢复了健康,重新走上了战斗前线和工作岗位。

## 三、长征文献记载疾病的特点

综观长征文献记载疾病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资料丰富。既有专门的著述,也有涉及疾病的论著,还有各地出版的红军长征专辑,另有红军将士的回忆录等。第二,立场鲜明。不管什么样的论著,都对红军伤病员、红军医护人员、救护红军的百姓充满着尊崇、敬佩之情,都是讴歌和颂扬。第三,充满地方特色,不同地域关于疾病的记述几乎都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尤其是疾病和中草药名称最为典型,如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侗寨,毛老伯挖了一味草药叫“四两麻”,又称“蛇怕死”,具有退凉、止痛、排脓的功效。<sup>[39]</sup>显然“四两麻”是富有地方特色的称呼。第四,文献编纂的主体多样化,就有红军普通将士,也有红军医务人员,还有其后代;既有当时当地百姓,也有后来从事党史工作的采访人员;既有专业的长征史、党史研究者,也有喜欢红色文化的民间业余爱好者,主体众多。

上述特点表明,长征文献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红军长征中所患疾病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

总之,对长征文献及其所载疾病资料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图书情报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一方面有利于图情专业与党史研究相结合,进一步推动图情相关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开展对红军长征文献所载疾病资料的研究,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张中俞.红军草鞋知多少[J].红色黔东南,2020(6):58.
- [2]索尔兹伯里.长征日记:中国史诗[M].王之希,许丽霞,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 [3]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4]萧锋.长征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
- [5]童小鹏.残酷的轰炸[C]//李海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113-114.
- [6]薛春德,刘心明.独臂将军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 [7] 孙日钹. 访问林庚春记录[C]//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 红军在贵州资料汇编(第1辑). 出版地不详,1983:125.
- [8] 李金钢. 长征路上的中医力量[N]. 中国中医药报, 2017-06-28(8).
- [9] 赵康. 穷苦人民爱红军[C]//《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 贵州省博物馆.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 出版地不详, 1983:760.
- [10] 石干成. 黎平历史名人列传[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288.
- [11] 徐树民. 疟疾[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13.
- [12] 胡安徽. 耿飏与疟疾[N]. 中国中医药报,2021-04-07(8).
- [13] 陈云. 随军西行见闻录[M]. 北京:红旗出版社,1985:2.
- [14] 萧锋. 长征日记[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0.
- [15] 李真. 挺进黔东南[C]//周朝举. 红军黔滇驰骋风云录.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74.
- [1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17] 付豪. 姚醒吾将军:战胜疾病走长征[N]. 武汉晚报, 2016-04-17(6).
- [18] 姜廷玉. 多视角下的长征[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6:92.
- [19] 王平. 红军与湖北[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157.
- [20] 耿飏. 由临武至道州[C]//孙国林. 信仰的力量·从井冈山到延安.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85.
- [21] 黔东南州文化局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 红军在黔东南的文化史料[M]. 出版地不详,1992:88.
- [22] 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红军在黔东南[M]. 出版地不详,1985:132-133.
- [23] 孙日钹. 红九军团长征过纳雍[C]//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 红军在贵州资料汇编(第1辑). 出版地不详,1983:97.
- [24] 孙日钹. 红九军团猫场之战[C]//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 红军在贵州资料汇编(第1辑). 出版地不详,1983:68.
- [25] 苏文娟. 资源铁匠救了红军班长 两家六十余载亲如一  
家[N]. 桂林晚报,2019-09-12(2).
- [26] 吕晓勇,周镜忠. 鱼水情深:红军与道县百姓互爱互援故事录[N]. 永州日报,2019-08-01(9).
- [27] 龙成云. 红军“千人”心连心[C]//中共遵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 长征火种:一九三五年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出版地不详,1987:95.
- [28] 佚名. 长征路上斗疾病[N]. 解放军报,2006-09-10(3).
- [29] 中共赫章县委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在赫章[M]. 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18:77.
- [30] 张量. 爬雪山[C]//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46.
- [31] 陈守刚,杨晓春. 遵义记忆中的女红军[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 [32] 红心族. 红军长征的故事[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6.
- [33] 范国平. 艰苦卓绝的生命救护:美国学者约翰·瓦特眼中的中央红军长征医疗[J]. 军事历史研究,2016(3): 37.
- [34] 高恩显.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7:70-71.
- [35] 耿飏. 耿飏回忆录(上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2-133.
- [36] 莫休. 由金沙江到大渡河[C]//孙国林. 信仰的力量·从井冈山到延安.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285.
- [37] 张光平. 镇宁浪风关留存261株“红军茶”[N]. 贵州都市报,2016-04-18(A11).
- [38] 贺焱. 生死相依血肉铸成的鱼水亲情[J]. 中国红博, 2015(3):88.
- [39] 石新民. 毛泽东长征过黔东南的十八天[J]. 杉乡文学, 2015(8):9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Analysis of the Disease Data in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Documents

CHEN Qinglian

(Library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documents contain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on disease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information on diseases such as war wounds, malaria, foot injuries and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and explores the medical prescrip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se diseases. The information on diseases in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documents is characterized by abundant information, distinctive perspe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 diversity of compilation subjects. The study of the disease information in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documents is both of high academic value and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he Long March documents; common diseases; the medical prescription and proved recipe

# 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的路径选择

王运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沿黄城市是传承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的重要载体。郑州市打造新时代的“黄河之都”,建设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要在系统挖掘与研究黄河文化,集中展示与呈现黄河文化,灵活转化与发展黄河文化,积极传播与推广黄河文化方面发力,着力做好“黄河文化”的核心叙述者、传播者和引领者,构筑更具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黄河文化高地。

**关键词:**郑州;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黄河之都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13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73-05

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建设郑州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既是郑州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也是国家区域政策积极引导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指出:“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sup>[1]</sup>黄河文化与国家战略的交汇,不仅要求作为黄河文化核心区与主体区的郑州要自觉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之中,而且还要利用自身文化资源优势,讲好黄河故事,构筑黄河文化高地,彰显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古都魅力,提升黄河文化在国家战略中的文化影响力。作为黄河沿线规模体量最大的城市,郑州具备利用自身丰富的黄河历史文化资源,打造“黄河之都”、建设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的基础和优势条件。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建设郑州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符合国家、省委的战略要求,切合郑州的实际和发展方向,是郑州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是一项全方位、系统性的文化传承创新实践,也是一项加快推进市域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探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机制,统筹解决好传承创新的理念、载体、形式、技术,以及产业品牌的建设、文化资源的转化等诸多问题。重中之重是要在守正创新中提高治理效能,既要有大尺度的宏观调控,也要有中微观尺度的城市建设管理与开发控制;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又要积极发挥政府与法规的调控作用;既要考虑整体的发展规划,又要充分照顾各发展主体的利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的要求,切实肩负起“黄河文化”核心叙述者、传播者和引领者的历史使命,着力打造“黄河文化”品牌,持续在黄河文化的挖掘与研究、展示与呈现、转化与发展、传播与推广上发力,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示范引领作用。

## 一、着力在黄河文化的挖掘与研究上下功夫

### (一)深刻把握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根据郑州的历史文化地位,依托“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资源和内涵,彰显“黄河之都”的独特魅力,郑州要把握三个关键着力点。一是打造“核心区”。加快落实《郑州市加强文物保护单位利用改革实施方案》,以“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魂”为主题,以“一带三核”(打造黄河文化带和

收稿日期:2021-03-25

作者简介:王运涛(1977—),男,河南开封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天地之中”文化核心展示区、黄帝文化核心展示区、郑州商代王城文化核心展示区)为抓手,系统梳理、深入挖掘黄河历史文化遗址的时代价值,讲“更有料”的“黄河故事”。二是嵌入多主题。结合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文旅融合、民俗文化、自然生态等主题,依托郑州现有文化资源,发挥各级智库和地方高校人才优势,多视角挖掘好、阐释好黄河文化的人文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等丰富内涵,讲“看得见”的“黄河故事”。三是突出“郑”元素。深入挖掘郑州黄河文化品牌特征,既要兼顾“面”,更要突出“点”,这个“点”就是郑州的特色优势资源,要用足郑州的特色文化、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讲好“突出郑州特色”的黄河故事。

## (二)系统梳理黄河文化的历史文脉

历史治黄工程文献和历代治黄工程遗迹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目前在对历代治黄工程遗迹、历史治黄工程文献进行全面搜集、科学整理、系统研究以及数据化处理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空间,通过整理和研究的方式实现系统保护亦迫在眉睫。<sup>[2]</sup>围绕系统保护好黄河的文化遗产,整理研究好黄河文化的历史文脉,持续挖掘黄河历史文化资源和历史文化精神,是郑州市繁荣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一是发布政府招标课题。加强政府引导,依托郑州市各级智库,加强对历代治黄工程遗迹、历史治黄工程文献的全面搜集、科学整理、系统研究以及数据化处理,通过整理和研究的方式实现系统保护。二是发挥研究基地作用。委托“黄河文化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等郑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系统整理、全面研究黄河文化的历史文脉,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中的典故、意义、美感价值,积极探索黄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三是拓展协同研究空间。围绕保护、传承、弘扬,拓展文学、文物、文化、文明一体化运作研究空间,深入阐释蕴含其中的思想精髓、道德追求、人文精神,形成系统的黄河文明话语体系<sup>[3]</sup>,为持续拓展黄河文化研究空间、推进黄河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奠定坚实基础。

## (三)挖掘运用黄河文化的遗产资源

丰富的黄河文化遗产资源既是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的金名片,更是郑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走出一条以黄河文化为根基、为底色、为驱动的城市创新发展之路的最大底气。一是形成产业发展新模式。既要通过加强技术创新、人才引进和资本集中,加快文化企业孵化器、科研平台和人才团队建设,持续推进黄河文化遗址

资源开发利用,又要通过建立配套的文化经营、流通和销售的市场体系,加快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增强黄河文化遗产的附加值,强化满足市场需求的比较优势和供给能力,形成保护与开发并重的产业化发展新模式。二是打造全域旅游新业态。在加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延续黄河文化遗产真实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着力发展精品民宿、文化研学、生态观光、非遗展示、田园体验等全域旅游新业态,把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实际的文化发展优势。三是构建融合发展新格局。加快“3年100处以上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路村综合整治,以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依托郑州黄河文化的资源优势 and 区位优势,加快整合黄河沿线历史文化遗产项目,打造点线面结合、高水平高层次的文化区域,构建遗址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文化需求、文旅商结合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 二、着力在黄河文化展示与呈现上下功夫

### (一)在融合创新中展示

融合创新是将各种创新要素通过创造性的融合,使各创新要素之间互补匹配,从而使创新系统的整体功能发生质的飞跃,形成独特的不可复制、不可超越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sup>[4]</sup>。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要通过提升原创能力、增加科技含量、突出产业特色等方式,有效激发黄河文化资源释放更大的魅力。一是打造更多“唐宫夜宴”式文化力作。牛年春晚点爆热搜的《唐宫夜宴》为融合创新让黄河文化“活”起来提供了“河南样本”。其成功“出圈”,除了作品自身的优秀基因外,电视编导的再创造<sup>[5]</sup>,尤其是充分运用“5G+AR”等现代技术手段提升作品的寓意深度,完美地呈现出了“唐朝少女的博物馆奇妙夜之旅”是关键。二是擦亮“民族根·黄河魂”文旅品牌。发挥郑州资源优势 and 区位优势,以项目建设带动文化旅游品牌建设,利用黄帝文化、嵩山文化、商都文化、诗圣文化等遗产资源,通过“只有河南”主题演艺公园、建业电影小镇、列子小镇、西泰山千稼集等重点项目建设,打造一批能把游客“吸引来、留得住、玩得嗨、还想来”的文旅项目。三是叫响美丽乡村郑州品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建设美丽乡村,结合自然资源、历史遗存、人文风俗等优势,以文化资源为内涵,以旅游业态为载体,在设计、规划和建设上加强静态展示和活态呈现,突出乡村的“美色与颜值”,为新时代的黄河故事“增光添彩”。如在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结合黄河、洛河清浊二水激荡交融形成的太极奇观,建设神话旅游村。

## （二）在区域联动中呈现

沿黄城市黄河旅游资源的内在关联性和地理空间的邻近性,为基于“市场共享”和“资源共享”的区域联动提供了可能性。一是彰显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古都魅力。立足郑州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and 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优势,依托黄河文化带、环嵩山文化带,集中优势资源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重点景区,自觉做好市域内的生态保护、沿河景观、产业布局、文化传承等融合发展的大文章,充分彰显“华夏之源、黄河之魂”的郑州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古都形象。二是增强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作为中原城市群发展“一核四轴四区”网络化空间格局的核心,郑州通过设施共建、资源共有、活动协作、成果共享的方式,发挥龙头作用,主导做好“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的大文章。2021年元宵节特别节目“河南博物院元宵奇妙夜”继《唐宫夜宴》后再次爆红,主要得益于《唐宫夜宴》中小姐姐们的串场,巧妙地融合了郑州、洛阳、开封等地的知名历史文物和建筑,用心做好了“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的大文章。三是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示范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强化西安、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推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要发挥其核心引领作用,加强郑州与其他沿黄城市特别是中原城市群间的跨区域联动协作,建立起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模式,推动黄河流域上下游各区域之间实现合作联动<sup>[6]</sup>,形成规模共享、优势互补、交通互联、经济互动、生态共治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sup>[7]</sup>,让“一脉相承”的黄河文化相映生辉,为唱响“黄河交响曲”提供有力支撑。

## （三）在参与互动中激发

休闲旅游是今后国民主要的旅游方式<sup>[8]</sup>。持续探索黄河故事吸引受众的互动形式,不断增强公众的深度体验或者代入感,在文化互动与参与中让游客获得精神享受。一是营造“人在画中游”的观光体验。坚持系统谋划、融合衔接、突出特色、打造品牌,整合串联现有文化资源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重点景区和精品文旅项目,利用秀美自然风光与浓郁人文景观,带给游客“人在画中游”的精神愉悦。二是增强“可参与化”的深度体验。在各个旅游景区积极开发可参与化体验项目,培育一批可供深度体验的民俗节庆和文旅产品,通过故事场景氛围营造增强游客的深度体验和代入感,打造沉浸式、体验型、实景化的精品文化之旅,着力从味觉、

视觉、知觉立体化唤醒游客对“黄河之都”的美好印象。例如,在少林武术产业园开辟专门的游客武术学习体验区,免费向游客传授简单的少林武术,使游客有机会真正体会少林武术的博大精深。三是留住“曾经拥有”的巅峰体验。结合山清水秀的旅游资源,利用文化创意设计,通过情节化设计集中展现郑州历史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借助图文、影像等媒体形式,让游客产生深刻印象,留下“老家河南、根在中原”的美好回忆。

## 三、着力在黄河文化转化与发展上下功夫

### （一）让创造性转化硕果累累

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要以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为依托,根据旅游产业发展需要,对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一是加强黄河文化保护,为创造性转化固本强基。加快落实《郑州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加强全市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此基础上深化黄河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创新、文化旅游融合,加快黄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二是实施黄河历史文化名城开发工程,为创造性转化搭建平台。依托郑州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充分挖掘文化资源特色以培育特色旅游品牌价值,并融合当代精神与价值需求进行再创造与创新,如依托黄河博物馆展现黄河历史文化文脉,依托郑州黄河文化公园开发新的文创作品,依托黄河文化带建好美丽乡村示范带,加快建设黄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和黄河国家博物馆等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精品博物馆,推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产品,真正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三是探索黄河文化产品新玩法,为创造性转化找准结合点。用当下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郑州的黄河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黄河故事,如河南博物院推出“考古盲盒”,让消费者在开启“考古盲盒”的过程中体验到文物考古的乐趣,迅速成为“网红”爆款。

### （二）让创新性发展绽放新花

旅游内生于文化、依托于文化、受益于文化并且终归于文化,旅游必须服务于文化的主体性自觉、创造性转化、创意性传播、选择性吸收和创新性发展<sup>[9]</sup>。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要切实发挥文旅的重要引擎作用,既要从保护传承弘扬黄河历史文化着眼,又要从创新发展黄河文化、书写当代黄河故事去谋划。一是在文化创意、载体创新上下功夫。通过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化开拓传播途径、丰富传播方式,用文创精品讲好黄河故事的“昨天、今天和

明天”，讲好郑州在黄河故事里的历史和未来，让郑州在新时代黄河故事里的角色更加出彩。二是在地标建筑、故事新讲上下功夫。围绕黄河文化带、环嵩山文化带，以黄河国家博物馆、黄河文化演艺综合体、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荥阳故城文旅融合项目、黄河中下游分界地标等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工程为龙头，打造具有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古都特色的地方独特景观。通过社会、人文、心理等多方面需求侧数据分析，强化黄河故事传播信息的获取、传递和反馈，持续输出郑州叫响黄河文化品牌的动人故事。在讲述黄河故事中巧妙融合少林功夫、名人故事等郑州元素，通过精彩讲述人文始祖黄帝、少林武僧救唐王、诗圣杜甫心系苍生的故事，以及“感动中国”的郑州好人的故事等，贯通古今打动人心，展现郑州新时代的人文精神，赋予黄河更加生动的文化形象。三是在彰显特色、打造品牌上下功夫。通过巧妙新颖的创意，持续做好《唐宫夜宴》小姐姐们的奇妙之旅系列节目，把新时代的黄河故事讲得更加深入人心，扩大黄河文化品牌中风华“郑”茂的影响力。

### （三）让产业化发展盘活文化资源

产业化是黄河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必由之路。郑州打造新时代的“黄河之都”，要不断延长黄河文化产业链，更多地盘活黄河文化资源。一是用好多种资金运作模式。通过政府提供政策和土地，积极引进工商资本和民间资本，用好企业与政府合资、独资、民营等多种资金运作模式，实行灵活的企业化的运作和发展方式。二是注重多个环节协同发力。着力在市场分析调研、产品输出完善、渠道联动推广等环节协同发力，逐步建立健全结构合理、布局科学、高端优势突出的文化产业体系。三是整合多个空间文化资源。发挥由黄河沿线巩义市、荥阳市、惠济区、中牟县旅游部门和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共同组成的“郑州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协作体”作用，立足全域旅游开发，坚持“多点开花”，依托精品旅游线路着力优化黄河文化产业链，进而推动黄河文化创新性发展。

## 四、着力在黄河文化传播与推广上下功夫

### （一）保持“技术敏感”强化传播

现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赋能黄河文化传播，讲好黄河故事要始终保持“技术敏感”。一是新技术赋能黄河文化传播。积极借助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利用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形式，探索开放、多元、共享的数字化开发和利用，全面推进黄河文化更清晰、客观、动态的传播，持续赋能黄河文化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和互动性，

使黄河文化成为公众的兴趣所在和目标焦点。二是新载体加速黄河文化传播。新媒体具有时间上的及时性、空间上的广泛性、强烈的互动性等多重优势，要积极创新传播载体，搭建传播平台，拓展传播路径，充分运用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数字电视、数字报刊、微视影像等手段，发挥智媒时代“微型、互动、跨屏融合、低语境传播”优势，打响郑州黄河文化品牌。三是新需求引领黄河文化传播。准确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积极转变传播理念，挖掘黄河文化内涵，凝练黄河文化亮点，探索趣味性的传播形式，实现更大范围的“口耳相传”。

### （二）构筑“文化高地”占尽先机

郑州要打造新时代的“黄河之都”，就要在国家战略中主动承担、积极作为，切实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示范作用。一是实施构筑“黄河文化高地”工程。通过文化资源的科学转化利用、文化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持续推进黄河文化理论研究工程、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工程、黄河文化民生改善工程、黄河文化产业提升工程、黄河文化消费刺激工程，不断增强黄河文化的感染力、带动力、影响力、融合力、普惠力、辐射力，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二是发展“黄河之都”产业示范区。通过空间集聚、要素集聚、项目集聚、企业集聚，不断完善产业链条，推动黄河文化资源的创新发展、融合发展、转化发展，实现文化与经济的高效融合，实现不同文化产业的集聚、集中，实现资源共享、服务共享、平台共享和市场共享，以及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打造黄河文化转化和创新发展的示范区。三是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管理与重点推广，围绕“黄河、黄帝、商都、嵩山”等核心资源要素，利用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国际少林武术节、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杜甫诗歌文化节、嵩山论坛等旅游文化节会品牌，形成餐饮、娱乐、住宿、商业等全链条的品牌化区域产业板块，塑造郑州“华夏之根、黄河之魂、天地之中、文明之源”的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形象。

### （三）打造“更大舞台”彰显魅力

郑州打造新时代的“黄河之都”，要坚持走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利用“一带一路”发展契机打造国内一流、有世界影响的历史文化展示载体和平台。一是搭建群众共建共享的展示载体和平台。坚持黄河文化品牌组群式发展观念，持续推进以“四大文化片区”和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建设为重点的文化郑州工程，积极搭建群众参与弘扬黄河文化的多元化舞台，努力形成政府主导、地方协作、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局面。二是积极搭建艺术化的展示载体和平台。以国内外各类重要艺术节会的举办为契机,分析研究黄河文化走出去的合适平台与契机,持续拓宽黄河文化“走出去、亮出来”的路径。三是打造国内一流、有世界影响的历史文化展示载体和平台。通过举办世界大河文明论坛、黄河文化节、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国际少林武术节等旅游文化节会,积极用国际话语体系阐述黄河文化人类价值,确立郑州“华夏之根、黄河之魂、天地之中、文明之源”的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地位<sup>[10]</sup>,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郑州黄河文化品牌。

### 五、结束语

黄河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传达着华夏儿女的智慧,是郑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软实力。挖掘与研究黄河文化是展示与呈现黄河文化的基础,展示与呈现黄河文化是转化与发展黄河文化的手段,转化与发展黄河文化是传播与推广黄河文化的关键,两者既相对独立与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郑州建设新时代“黄河之都”的重要内容。郑州建设新时代“黄河之都”,坚持“着眼大局、立足长远、围绕根本、抓实当前”的原则,立足黄河文化资源基础,完善旅游设施,优化公共服务,加强黄河文化品牌建设管理与重点推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强黄河文化资源吸引力,推动黄河文化开放、多元、共享的数字化开发和利用,扩充和释放黄河文化资源的价值,提升黄河文化品牌影响力;积极

打好组合拳,借助文旅深度融合拓宽艺术化载体,推动零散文化资源向产业化发展转型,整合跨空间文化资源构建国际化格局,彰显黄河历史文化古都魅力。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79.
- [2] 王博. 弘扬黄河文化 传承历史文脉[N]. 河南日报, 2019-11-20(10).
- [3] 温小娟. 加强研究发展 弘扬黄河文化[N]. 河南日报, 2020-01-13(5).
- [4] 刘新,吕廷杰. 融合创新的概念、背景和特点[J]. 通信企业管理,2006(12):68-69.
- [5] 武艳. 探寻《唐宫夜宴》的“出圈”秘籍[N]. 中国艺术报, 2021-03-03(6).
- [6] 林永然. 以中心城市建设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N]. 学习时报,2020-06-01(5).
- [7] 范晓鹏. 国家中心城市要引领带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N]. 中国改革报,2020-12-14(6).
- [8] 陈世林,彭根来. 在文化互动与参与中让游客获得精神享受:关于庐山旅游开发的思考[J]. 旅游纵览(下半月),2020(8):172-173.
- [9] 陈海波. “文旅融合”的理论逻辑及推进路径研究[J]. 中国旅游评论,2020(4):75-84.
- [10] 徐建勋,王延辉. 奏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的郑州乐章[N]. 河南日报,2020-05-24(7).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Route Choices of Building Zhengzhou into “the Capital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New Era

WANG Yuntao

(School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are important carriers to inherit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and tell the story of the Yellow River. In order to build the “Capital of Yellow River” in the new era and the main landmark city of the Yellow River history and culture, Zhengzhou should make efforts in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and studying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focusing on displaying and presenting the culture, flexibly transforming and developing the culture, and actively disseminating and promoting the culture. Therefore,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Zhengzhou to play the role of being the core narrator, inter-mediator, and leader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to build a more influential and radiant Yellow River cultural highland.

**Key words:** Zhengzhou; national landmark city characterized by the Yellow River history and culture; Capital of Yellow River; measures

# “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林延斌<sup>1</sup>, 刘仁春<sup>2</sup>

(1. 中共汕尾市委党校, 广东 汕尾 516600; 2. 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方案,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推广和守正出新, 至今仍迸发出穿越时空的旺盛生命力。“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价值追求、方式方法、同频共振上高度契合, 通过强化源头治理、突出强基固本、推进“五治融合”等路径, 坚持与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市域特点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枫桥经验; 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 风险挑战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14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1)03-0078-05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市域层级的具体落实, 即依托地级市较为完备的治理体系、资源与能力, 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主体协作治理, 共同解决市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群众安宁的风险问题与困难挑战, 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2019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sup>[1]</sup>。2020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 “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sup>[2]</sup>。市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特殊意义<sup>[3]</sup>, 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已成为党不断开拓治国理政新境界的前沿性课题。

## 一、践行“枫桥经验”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枫桥经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推广和守正出新, 现如今已从乡村走到城

市、从地方走到全国、从线下走到线上等, 并实现从群防群治向共建共治共享、从单一调解向多元化解、从条块分割管理向综合治理、从传统手段向智慧方式升级转变<sup>[4]</sup>, 成为“以预防和调解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为切入点、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主要治理技术、以平安创建打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目标, 强化党委、政府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和监督, 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村级组织建设, 以规范基层社会治理, 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种经验”<sup>[5]</sup>。“枫桥经验”与市域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 从“枫桥经验”到市域治理, 体现了治理效能由乡村到城市阶梯递进的逻辑上升进程; 从市域治理到“枫桥经验”, 凸显了统筹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整体推进思路。

(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具有相似相通的价值追求

“矛盾不出域、不上交”是“枫桥经验”的目标理念。通过自身治理机制体制的调整, 将外界紊乱的社会秩序过滤在本镇甚至本县以外, 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社区结构<sup>[6]</sup>。市域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是“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 “努力使市域成为社会矛盾的‘终点’”<sup>[7]</sup>。可见, 两

收稿日期: 2021-0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利益达成机制研究”(20BZZ031); 2020年度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招标课题“协商民主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2020-GDSYKT-044)

作者简介: 林延斌(1987—), 男, 广西贵港人, 中共汕尾市委党校综合教研室讲师, 研究方向: 公共治理与创新。

者的价值理念都是在区域内有效预防和控制矛盾,尽可能做到防患于未然、防患于基层。而“枫桥经验”的成功实践,无疑为市域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与思路。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农村城镇化、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等新型空间形式产生,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增多并向城市急剧汇聚,传统的县域、乡镇层级已难以有效防控。市域拥有比县域以下更高的政治权威、更强的治理能力、更足的治理资源和更大的治理空间,在新型空间态势下,能够通过自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前线指挥部”<sup>[8]</sup>的身份地位,整合市县镇村四级治理架构,打造区域更广、共治合力更强的“枫桥经验”城市样本。

(二)“枫桥经验”为市域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方式方法借鉴

法理情融合是“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法宝。“枫桥经验”强调综合治理,即通过政社互动、专群合作、群防群治等形式,采用说理、调解、帮教、治保、矫正等手段,对矛盾纠纷对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形成法律、道德、政策与乡规民约等相互作用的现代治理体系。这种模式对市域社会治理而言,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从市域社会主体结构看,城市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流动性大,其社会结构比乡村熟人社会更为复杂,更应通过人性化治理、精益化服务、柔性化关怀等综合手段,整合多元利益与价值,实现市域社会既有活力,亦有秩序。正如中央政法委所强调的,做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需要运用协商、契约、道德、习俗等社会内生机制以及法治方式综合化解纷争、规范社会行为,并且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强政府决策部署的科学性、风险防控的精确性、打击犯罪的实效性、执法办案的公正性、公共服务的便捷性<sup>[9]</sup>。

(三)“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共融互促

从“枫桥经验”发展看,“枫桥经验”由村镇到县市、由综合治理覆盖到社会治理全领域,这种自下而上延伸和点线面辐射,为市域社会治理夯实了基础,使市域社会治理起点更高、视野更阔、成效更有保障。从市域社会发展看,市域社会管辖人口多、地域广、问题盘根错节,各行政区域服务水平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有些县域之间还存在诸如水界、林权、矿产等跨越争端,导致辖区内部、平级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解决,“矛盾往上交”的张力愈发增大,“枫桥经验”的延伸发展遭遇了一定的瓶颈限制,需要更高层级的区域治理加以推进、突破。市域层级既是省域决策的执行者,也是县域行动的主导者,其承上启

下的双重身份和枢纽作用便于灵活掌控县域管不好、省域管不着的矛盾问题,通过发挥市域统筹性、协调性和综合性,有效统筹调度诸如市域财政、金融、人事、监察、地方立法等要素从市级“高地”流向基层“洼地”,从而不断增强“枫桥经验”在各层级防范化解重大矛盾风险的实效作用。

##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前沿课题,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贵在源头防控,稳在基层基础,新在共建共治共享,强在现代科技支撑。虽然目前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层面有一定的认识,各地市也不断探索实践,但从整体看,仍存在一些较为普遍和突出的问题。

### (一)源头防控不到位

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敏感,处理难度更大,新老问题交织、利益与权益交织、有理与无理交织、国内与国外交织、网上与网下交织<sup>[10]</sup>等,对市域治理主体的认知与行动构成了巨大挑战:一是认知上预防性工作滞后,现代化反思不足。社会风险往往复杂且极其不确定,尤其在转型社会、风险社会与网络社会叠加变迁的改革背景下,预测难度大,预测不准还会招致社会批评。有的干部认为既然风险捉摸不定、难以预测,预防工作因而也是徒劳的,由此产生了侥幸麻痹、预不预测都一样的心态。而事实是风险危机一旦发生,倘若不能精准预防与消解,很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让政治与社会付出沉重的治理代价。二是行动上职责不清、相互扯皮。在个别城市,受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体制机制影响,各区域各部门有分责,但共责意识不强;有事后问责,但事前担当不够,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较为突出,造成“有组织地不負責任”。这就使得一些本可以化解于基层、扼杀于萌芽状态的问题,由于责任主体不清和行动不及时,进而持续发酵、传导、升级,最后演变为省域乃至全国性事件。

### (二)基层基础不扎实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基础是市域治理体系中最关键也是最薄弱的环节。一是管理方式方法落后。与城市相比,基层管理方式方法仍然较为落后,现代智能管理技术应用能力差,应对矛盾挑战不够及时和灵活。有些基层干部在“无事就是本事”的刚性维稳压力下,不得不向村霸等黑恶势力妥协,甚至借其势力“摆平”日常纠纷。二是公共服务供

### 三、基于“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 (一) 强化源头治理,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风险防御水平

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sup>[11]</sup>。尽管如此,对于风险挑战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治理方式仍然是源头防范,通过从思想观念和制度完善层面统筹着手,及早、及小化解风险。

1. 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风险是人的一种客观存在状态<sup>[12]</sup>,是人类“征服与改造”自然的副产品,是“高度工业化的衍生品”<sup>[13]</sup>。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质是在推动城市工业化信息化过程中,基于人的现代化防范不断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以更好地推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生。一方面,当自然灾害、生态危机、公共安全事件等风险危机来临时,社会一切活动都应当遵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以此方能探索形成战胜风险挑战的正确路径,否则将会导致风险挑战失控。如新冠疫情暴发,中国的“治理之效”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治理之乱”即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即使风险暂时不暴发,市域治理也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通过提高公民的综合素养,推动其思想价值、行为方式、素质能力、交互交往活动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从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到两者兼顾,以最大限度降低人为的风险要素。

2. 建立健全综合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sup>[14]</sup>在市域层面建立健全综合治理体系,一是走好走实群众路线。通过下访、走亲、驻村、充当网格员等方式,强化各级干部与群众联系沟通,紧盯群众生活中的堵点、痛点,把基层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是示范孵化培育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为载体,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推进公众参与从原子化向组织化、无序化向制度化转变,确保公众诉求能够在法理渠道表达。三是动态追踪风险走势。对于风险挑战,没有一劳永逸的应对措施,只有建立健全风险动态追踪体系,对其进行宏观把控、实时追踪、综合评估和及时修正等,才能促使社会稳定和谐从机械、刚

给不足。基层处于直接服务群众和维系稳定的最前沿,而其所拥有的治理资源、空间和能力相较于市域层级却十分有限,这种事权倒置机制导致“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等问题的产生与恶化。尤其在新时代,基层群众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愈发强烈,而基层政权却在公共服务数量、质量和均衡性上难以满足,内在矛盾与张力尤为尖锐。三是治理效能不佳。基层工作错综复杂,矛盾纠纷千头万绪、碎片化严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疲于应付,难有时间精力统筹兼顾,导致基层矛盾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不到系统、根本、长效的治理。

#### (三) 群众参与不充分

市域社会治理是一个要素众多、结构复杂的系统,亟须市民群众广泛参与、协作共治。而当前我国市域民主建设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社区认同感、责任感和归属感较弱,参与意愿不是内生自发的,更多的是与利益期望直接挂钩。参与预期收益越大,成本越低,居民参与动力就越足,反之则越弱。在此情况下,投机主义、精致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得以渗入公共生活,对信任、规范、网络等社会资本与公共精神造成较大破坏,体现为公益性参与不足和自利性参与过度现象:一方面,在牵涉到责任与义务的公益上,如垃圾分类倡议,居民参与主动性、积极性往往较低,无法形成自发良序;另一方面,在涉及权利与利益的自利上,如征地拆迁补偿,居民参与又往往过于理性、算计,有的甚至采取“突击”增种树苗、增盖楼层、漫天要价、缠访闹访等手段不惜损害公共利益,促使自身参与利益最大化。

#### (四) 科技支撑不牢固

一是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低。不同行政区域、行政部门存储不同的数据,这些数据无论是物理性还是逻辑性都存在彼此孤立的问题,形成一个个“数据孤岛”,封闭性强、兼容性低、整合难度大。二是应用广而不深。当前“互联网+”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交通、卫健、旅游、社保等领域,然而在数据深度挖掘、系统分析、便捷服务、数据产权纠纷和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用户的体验度和满意度尚待进一步优化提升。三是对数据化智能化认知偏颇。市域社会治理固然需要科技手段支撑,但更需要绣花般的耐心巧心,即人文价值理性。现实中,一些城乡管理者过于依靠大数据治理,甚至“唯数据论”“唯技术论”,对城乡治理“一刀切”,造成人性关怀不足。这种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做法,容易引发市民群众对市域智能化治理的抵触。

性走向动态、柔性。

## (二) 突出强基固本, 夯实市域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建设

1. 深化市域党政机构改革。市域社会治理的初衷在于整合市县镇村等力量, 及时全面地回应和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风险挑战特征看, 风险挑战具有跨界扩散效应和飞去来器效应, 风险的制造者和受益者迟早都会和风险狭路相逢<sup>[15]</sup>。因而,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也不应袖手旁观、相互推诿。推动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有序协调, 是应对风险问题叠加扩散的必然要求, 也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大力深化党政机构改革, 增强党委领导力, 提高政府执行力, 推动各类机构、各种职能相互衔接、相互融合, 以此构建起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的市域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治理框架, 确保各区域各线条运行顺畅、环环相扣、执行高效。

2. 减负增能凝聚基层治理合力。在减负上, 以问题为导向, 以成效为基准, 坚决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力戒过度会议、检查、留痕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对基层工作造成困扰, 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入群众, 更好地为他们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和管理。在增能上, 以人财物权等资源下沉为基本前提, 以强化县域以下“独挡一面”的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倾斜, 使基层既有职有责, 也有权有物, 以此切实解决基层“责任无穷大、权力无限小”“看得见管不着、管得着看不见”“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等体制机制问题。总之, 通过减轻负担与放权赋能双管齐下, 不断优化县镇村组四级基层治理架构, 将“枫桥经验”拓展为“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信访不出县, 上访不出市”<sup>[16]</sup>。

## (三) 坚持“五治融合”, 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新架构

1. 政治是“枫桥经验”的本质属性。“枫桥经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皆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变的是党的政治引领地位。可以说, 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的地方, 都是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融合得好的地方<sup>[17]</sup>。因此, 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必须牢牢抓住党的领导和建设这个关键,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是辩证“一核”与“多元”的关系。市域社会治理强调多元共治, 这种“多元”能否得到有序组织和动员, 关键在党。党组织“众星捧月”的作用

发挥好了, 各方力量就能“统”起来, 进而形成“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二是把党的政治属性贯彻于市域社会治理各环节、全过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 把这一属性贯彻于市域社会治理, 确保治理行动与党的主张要求有机融合、同向同行。

2. 法治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准则。“枫桥经验”主张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各类调解联动机制化解社会风险矛盾, 即以最低的司法成本最大化实现社会包容和谐。然而, 这并非说法治不重要, 恰恰相反,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是调解成效之保障。在市域乃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中, 调解机制之所以必要且运行正常, 是因为法治在兜底, 尤其在矛盾调解失效情况下, 唯有法治能够发挥一锤定音、定纷止争的效用。市域拥有一定的地方立法权, 更应加强顶层设计, 加紧推动重点领域立法进程, 将各项主要工作纳入法规化、制度化轨道,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公正、合法运行。

3. 德治是“枫桥经验”的价值导向。“急公好义、爱说理、讲道理、重教育”等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习俗, 是“枫桥经验”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市域社会治理需要植根于深厚的道德土壤, 通过广泛开展以“道德评比”“英雄宣传”“好人好事教育”等主题活动, 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红色革命精神, 促使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有机统一, 以德养性、以德聚人, 凝聚“以人为本”的价值认同, 涵养“和美与共”的文化生态。

4. 自治是“枫桥经验”的突出优势。“枫桥经验”的突出优势在于依靠、组织和发动群众, 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社区、乡村社会治理等实践, 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治理体系。在多元、陌生和流动的市域环境下推动各主体参与治理。一是培育公共精神。从贴近社区日常生活且容易达成共识的公共问题着手, 梯度推进与深化, 逐渐形成丰富适合不同社区群体交流合作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二是加强制度性集体行动。建立健全多元利益协调机制、参与监督机制、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等, 让各方在机制体制约束下理性交往, 真正实现城乡社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5. 智治是“枫桥经验”的时代特点。工业化信息化时代, 大数据、云计算、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元素不断融入并支撑“枫桥经验”, 成为“枫桥经验”的鲜明特点和时代特征。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智治是必由之路, 前景广阔。

一是建构和整合数据平台。推动各级部门网络设施联通、信息开放共享、业务协作兼容,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效率效能,使群众办事能够“一窗通”、“零跑腿”或“最多跑一次”。二是创新“大数据+网格化+群众路线”市域治理机制。“大数据+网格化+群众路线”很好地均衡了“道”与“术”、人工与智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通过此机制全方位搜集和更新治理相关数据材料,为各级党委、政府做决策提供参考,提升决策前瞻性、科学性,不断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从静态、分散、低效向鲜活、集约、高效转化。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0-31.
- [2] 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55.
- [3] “一子落而满盘活!”市域治理为何如此重要?[EB/OL]. 中国长安网,2019-12-03.
- [4] 汪世荣,褚宸舸.“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证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16.
- [5] 汪世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7.
- [6] 赵义. 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M]. 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2008:3-4.

- [7] 陈一新. 中央政法委机关下半年要聚焦“十大抓手”[N]. 中央政法长安剑,2018-07-20.
- [8] 陈一新. 着眼把重大矛盾风险化解在市域 打造社会治理的“前线指挥部”[EB/OL]. 中央政法长安剑,2020-10-22.
- [9] 陈一新. 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N]. 人民网-人民日报,2018-07-17.
- [10] 李皋,丹彤. 基层之治[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85.
- [11] 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5.
- [12] 庄友刚. 跨越风险社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
- [13] 金大军,赵军锋. 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治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9.
- [14]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 新华社,2019-01-21.
- [15] 卢芳霞,刘开君. 借鉴“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J]. 农村·农业·农民,2020(3):43.
- [16] 中国法学会“枫桥经验”理论总结和实践经验提升课题组.“枫桥经验”的理论构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29.
- [17] 余钊飞.“枫桥经验”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N]. 人民法院报,2018-02-0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Fengqiao Experience”: Research on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Municipal Social Governance

LIN Yanbin, LIU Renchun

(Shanwei Municipal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Shanwei, Guangdong 516600, China;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Fengqiao Experience” is a successful program for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Afte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promotion and innovation, “Fengqiao Experience” is still bursting with strong vitality across time and space. “Fengqiao Experience”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municipal soci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value pursuit, working methods and co-frequency resonance. We should adhere to and develop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by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ance at the source, consolidating found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ive Governance”. It is of greatly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new model of soci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eatured by the times and the city.

**Key words:** “Fengqiao Experience”; municipal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risks and challenges

# 近代社会转型下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图书出版思想

刘加翠

(延安大学图书馆,陕西延安 716000)

**摘要:**陆费逵在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时提出的“教科书革命”思想,是对其教科书出版认识的高度概括。陆费逵早年直接从事教育、参与革命组织,以及步入图书出版行业是他“教科书革命”思想形成的基础。陆费逵认为,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是“教科书革命”实现的关键。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国人自编教科书是抵制殖民文化、关系民族兴亡的基础;另一方面,高质量教科书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根基,而教科书编纂者在其中的作用和责任无可替代。此外,在陆费逵看来,实施教科书出版审定制度是实现“教科书革命”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陆费逵;教科书革命;图书出版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15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83-06

陆费逵(1886—1941),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1886年出生于陕西汉中,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始人。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甫始,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即明确提出了“教科书革命”这一思想,指出教科书与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立国之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发达也。”<sup>[1]</sup>在陆费逵看来,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而教科书则是教育图书的中心,是推动教育发展的根基,没有适应国家发展和启蒙国民的教科书,教育便无以进步,也无法真正发挥出推动国家强盛和发展的职能。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提出,不仅是他早期教科书出版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近代中华书局图书出版事业方向的初步规划。在中国近代图书出版史上,中华书局能够后来居上、成为几乎和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的教育图书出版重镇,与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这一思想在近代中华书局图书出版实践中的一以贯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陆费逵“教

科书革命”思想研究的成果极为稀少。就笔者目力所及,仅有吴小鸥在2015年时候对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思想进行了相对集中的探究。<sup>[2]</sup>吴小鸥从教科书、教育、立国等方面阐述了“教科书革命”的重要性,并从新型教科书编纂与政体转换的关系以及陆费逵亲自参与编纂、出版教科书来推动实现“教科书革命”等方面系统论述了陆费逵“教科书革命”的“应时而上”。梳理陆费逵的职业生涯可以发现,陆费逵“教科书革命”的提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在其图书出版生涯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式的理念,具有承上启下的双重重要意义。一方面,这一思想是他创建中华书局前对教科书出版理念、方式和方法的一个系统总结;另一方面,也是中华书局创建伊始在教科书出版,乃至教育图书出版中一直贯彻的核心理念。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与其早年学习经历和早期职业生涯密切相关、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虽然吴小鸥的研究对全面了解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思想有着很大的启发性,但吴小鸥侧重于对中华书局成立后在教科书出版实践过程中陆费逵如何贯彻和

收稿日期:2021-04-20

基金项目:2019年度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项目“新中国70年陕西高等教育发展变迁研究”(XGH19035)

作者简介:刘加翠(1975—),女,河南南阳人,硕士,延安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员,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图书史。

落实“教科书革命”这一思想进行探究,对于这一思想形成的基础及其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内涵,则着墨甚少。基于这种原因,笔者拟以陆费逵“教科书革命”形成的基础为逻辑起点,对中华书局成立前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形成基础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独特的教科书出版思想做一系统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 一、早年教育、革命与出版经历:“教科书革命”思想形成的基础

如前所言,“教科书革命”是陆费逵教科书出版的基本理念,一定程度上也是陆费逵在教育图书出版中的重要职业观。一般而言,一个人职业观的形成,与其职业发展历程密切相关。陆费逵自进入社会伊始,就从事与出版和教育相关的职业,在不足20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在当时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急遽转型的大变局下,置身于中国现代图书出版转型发展的前沿,自己又从事过直接的教育活动,加上参加过革命活动这些经历,使陆费逵能够从图书出版、教育发展和革新等多重维度对如何编印新型教科书进行思索。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丰富阅历基础上对中国教育发展走向较为全面的思考。

陆费逵早期接受比较开明的教育,堪为其“教科书革命”理念形成的逻辑起点。陆费逵15岁之前,父亲奔走仕途,忙于公务,其教育主要由母亲承担。陆费逵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女,思想较为开明,虽然也对陆费逵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但对陆费逵学习和接受新思想持赞成态度。陆费逵回忆早期教育时曾说道:“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到十三岁,读过《四书》《诗经》《左转》《唐诗三百首》,没有造过句,没有做过文。因为先母主张多读多看,反对挖空心思作八股,并反对作疏空的论说,却学过珠算,看过《纲鉴》,我13岁正是戊戌年,我那时勉强能看日报和时务报,有点新思想了,和先父的思想不免冲突,先母却赞成我的主张,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来居然自习算术,并读格致书了。”<sup>[3]45</sup> 19世纪末期是中国新图书馆运动的萌芽时期,一些具有现代意义图书馆雏形性质的阅报社开始在东部和中部的中心城市开办。陆费逵随父母到南昌后,每隔一天就要到一个新办的阅报社去读书,每次都是从上午九点读到下午五点,“把当时新出的书籍杂志,差不多完全看过,旧书也看了很多。……照这样做了三年,学问渐渐进步,文理渐渐通顺,常识渐渐丰

富”。<sup>[3]45</sup> 陆费逵所接受的这些新旧糅合的教育,无疑成为其以后步入社会、从事与教育和出版相关的职业的良好开端。

1902年到1905年,陆费逵步入其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陆费逵不仅涉足教育和图书出版事业,还加入了日知会这样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1902年,在陆费逵不足17岁时,就和友人在南昌创办了以传授新知识为宗旨的“正蒙学堂”。但因经费短缺,在开办8个月后就无奈停办。<sup>[4]396</sup> 1904年,陆费逵参与创办武昌昌明书店,由此步入出版业,陆费逵自任副经理兼编辑。其后不久,1904年秋天,与朋友数人集资1500元开办新学界书店,销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刊。1905年上半年,陆费逵在武昌参与日知会,负责起草章程。1905年夏秋之交,陆费逵辞去新学界书店的经理职务,与日知会会员张汉杰一起担任由冯特民任主编的《楚报》的主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陆费逵不仅编辑了自己图书出版生涯中的第一本教科书——《正则东语教科书》,而且在《楚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治国者,必先谋夫教”<sup>[5]</sup>这一观点,初步明确了自己的“教育救国”观,成为其“教科书革命”思想的起点。这一时期的经历,使陆费逵对教育发展和出版的关系初步获得了较为直观和丰富的认知,特别是加入日知会参与从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宣传,在客观上推动他从革新的角度来看待教育问题,提升了他对教育改革认知的高度,拓宽了看待教科书出版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视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面对清王朝土崩瓦解之势,教科书是否先行适应政体转换内容,当时最大教科书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的决策者处于徘徊犹豫的境地。一方面,害怕革命成功,原有的教科书成为废纸,另一方面,又怕革命不成功,会“触犯清廷”<sup>[6]</sup>。即使精明强干、虑事周密的张元济也判断革命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变。<sup>[7]</sup> 而陆费逵能够率先出版发行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教科书,“为襁褓中的中国新式初等教育事业注入新鲜血液,在青黄不接之际立了首功”,<sup>[8]</sup>无疑与他的革命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陆费逵担任《楚报》主笔不及三月,“因揭露和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sup>[9]</sup>成为清政府缉捕对象,他被迫逃亡上海。20世纪初期的上海,已经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最前沿地带和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在西方文化的浸染下,上海已经有很多现代意义的图书出版机构。上海这一广阔的舞台给予了陆费逵施展才能的机会,也使他在教育图书的出版实践中

形成了“教科书革命”思想。

陆费逵到达上海不久,在担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不久,就应邀加盟文明书局。从1906年冬季到1908年秋季进入商务印书馆前,陆费逵在文明书局任职近2年时间。文明书局时期是陆费逵图书出版职业生涯的转折期,也是他的“教科书革命”思想的成型期。在文明书局任职期间,陆费逵先后编纂了《新编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两卷)、供中学及师范学校使用的《算术新教科书》(上下卷)以及《初等小学修身书》(上下卷)等教科书。编纂多册教科书,不仅使他对教科书出版中的许多问题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也帮助他积累了编纂教科书的丰富经验,使他真正系统地了解了现代图书编辑、印刷和出版的流程,在图书出版业务方面为他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正是在对多册教科书编纂的过程中,他得以真实地把握有关教科书编纂和使用过程中的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真正意识到西方列强殖民文化的危害和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的重要性,推动他对中国教科书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思考。在这一时期,陆费逵连续发表了《论设字母学堂》《论日本废弃汉字》《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著作家之宗旨》《同业注意》《论国定教科书》等论文,系统阐发了他的“教科书革命”思想。一定程度上,在文明书局的职业生涯标志着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系统形成。

1908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直至1912年元旦创办中华书局前,堪为陆费逵“教科书革命”思想的成熟期和实践上的奠基期。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中国人自主创办的最大民营图书出版机构,教科书出版是其主要业务,这进一步拓宽了陆费逵在实践上和观念上对教科书出版的认知。陆费逵入馆不久即被聘为《教育杂志》主编,使他能够从图书出版与中国教育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来对教科书出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更加广泛和现实的思考,也从理论层面丰富了他对“教科书革命”的认知。

## 二、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教科书革命”实现的关键

陆费逵认为,中国人自己编纂的、体现中华民族和国家发展需要的教科书是中国教育真正得以发展乃至独立富强的基础,从陆费逵的这一认知可以看出,他把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看作是实现“教科书革命”的关键。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国人自编教科书是抵制殖民文化、关系民族兴亡的基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随着中国主权的步

步沦陷,西方列强开始以教会办学等形式在中国进行教育活动。这种教育活动虽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但本质目的是通过文化侵略来愚化中国人民。正如毛泽东所言:“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sup>[10]</sup>其中,编印教科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关键一环。特别是在1877年,在华各基督教会举行了“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会上由狄考文和林乐知等发起成立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就是编写和出版教科书。虽然有传播现代文化知识的成分,但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西方宗教思想。狄考文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虽然教育作为教会一种非常重要的机构,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它不能替代传教,传教无可争辩地乃是最重要的工作。”<sup>[11]</sup>1890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在华基督教第二届传教士大会”上决定将“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改为“中国教育会”,“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教育侵略进一步扩张和深入”<sup>[12]</sup>,虽然该组织的工作范围有所扩大,但编印教科书仍然是其主要任务。从洋务运动时期到新政时期,外国传教士编纂的教科书一直是新型教科书的主体。虽然清政府在新政晚期意识到了教科书出版的重要性,并开始设立官书局来尝试自主编印教科书,但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出版方法和理念上都无法和西方教会出版的教科书相匹敌。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编纂教科书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早期现代教育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陆费逵认为,外国编纂教科书在中国大行其道不仅是影响中国教育自主发展的“隐忧”,也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侵略的最有力武器。针对当时很多人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出版中国人使用的教科书是一种“博爱”这种观点,陆费逵强调这是一种表象,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从文化上殖民中国人民之目的。陆费逵指出:“夫国与国有相睦之势,无相亲之理,即使其相亲,亦为自谋其幸福耳。岂真博爱为怀,慈航普渡耶?”陆费逵强调指出:“书籍诚最善之无形感化物,最精之灭国无烟炮哉!”<sup>[13]</sup><sup>201</sup>在陆费逵看来,外国人编纂的教科书在中国大行其道,无异于猎杀中华民族的毒药、鸦片、利刃和枪炮,“实鴆物也,鸦片也,砒霜也,饮之立毙;利刃也,后膛枪也,绿弗炮也,触之即伤”。如果外国人编纂的教科书一直占领市场,就会造成“我国民竟随教育著作而永沉沦”<sup>[13]</sup><sup>202</sup>的后果。陆费逵的这一教科书出版思想一定程度上是他“教育救国”

思想的核心,对他的图书出版生涯可谓影响深远。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之时,他亲自撰写《中华书局宣言书》,提出了“教科书革命”,一定程度上是他所强调的“国人自编教科书是抵制殖民文化”这一出版思想的集中表述。正是在这一思想下,中华书局很快成为民国初期中国人独立出版教科书的重镇,也为其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民营书局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高质量教科书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根基。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建,标志着以洋务教育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意义的教育蹒跚起步。但是,由于教育制度并未转型,较之于势力强大的封建教育,洋务教育犹如汪洋大海中的微小浪花而微不足道。在这种氛围下,整个洋务教育时期,国人对现代意义教科书建设建树聊无。其后一直到清末新政前期,教科书几乎被西方宗教机构主持的“中国教育会”和“广学会”所独占,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清末新政中后期,虽有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民营机构根据新教育发展需要,出版了当时国人编纂的最先进的教科书,但却存在着“一、程度太深;二、分量太多;三、欠联络,前后欠衔接”<sup>[14]</sup>的缺陷。针对这种状况,陆费逵忧心忡忡地指出:“近数年来,我国教育,渐形发达。教科用书,虽有多种,然求一适用之本,卒不可得,此教育界极危险之事,而亦吾国之耻也。”<sup>[4]16</sup>

在陆费逵看来,单单制定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制度、创设各种新式学校,而缺乏与之匹配的能够反映现代文化知识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型教科书,就不能从根源上推动新教育的发展。陆费逵强调:“教科书之于教育,犹锄犁之于耕。无炮械不可言战,无教科书不可言教育,此人人之所知也。我国教育之不振,由于教科书之未完善,又人人之所知也。”<sup>[4]18</sup>1910年,在对上海等现代教育发达地区教科书使用情况调查后,陆费逵就欷歔叹曰:“新出之良书不知采用,抱旧本为无上鸿宝。上海之学堂,尚有用《地球韵言》、普通学歌诀者,内地更可知矣!夫学堂用不良之教科书,无异军队用腐朽之军器,始基一误,遗害终身。”<sup>[15]</sup>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陆费逵意识到没有良好的教科书,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现代教育,也不能实现教育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陆费逵强调,虽然中国人自主编纂教科书是抵制殖民文化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国人编纂的教科书如果没有最为基本的、能够体现出国家和民族振兴这些爱国方面的内容,则同样无法抵制殖民文化的侵略。因此,陆费逵认为,中国人不仅要自主地编印教科书,而且要编印出高质量的教科书,而高质量教科书编

纂的根本宗旨就是能够推动国家发展、实现民族振兴。陆费逵认为,教科书是否能体现这些宗旨,教科书编纂者的责任至关重要。陆费逵把教科书的编纂者称为“著作家”。陆费逵认为,著作家在教科书的编纂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责任,“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国民人格之高下,端于我著作家是赖,我著作家之责任,固顾不重欤!”<sup>[13]199</sup>基于这种认知,陆费逵批评了当时教科书编纂过程中“我国固有之特质,竟无一可取,必惟碧眼白皙者是则是效”<sup>[13]200</sup>这一迷信外国的不良倾向,认为这些对外国的简单模仿是一种“易缠足为细腰,变佛老而基督,仍归于愚弱迷信,以渐尽泯灭,于国家之衰亡无补”的“猿猴主义”<sup>[13]201</sup>。

中华书局成立后不久即成为教科书出版的重镇,正是源于陆费逵对教科书在教育发展中重要性的认识。也正是意识到教科书编纂者对教科书质量的意义所在,陆费逵在出版界的38年时间里,身体力行,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教科书出版当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05年到1941年,陆费逵主编和参与编校的教科书达187册之多。<sup>[4]405-406</sup>

可以看出,在陆费逵看来国人自编教科书是“教科书革命”的关键所在。然而,陆费逵也意识到,国人自编教科书要真正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离不开良好的教科书出版的保障机制。陆费逵认为,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采用教科书出版审定制度。

### 三、教科书出版审定制度:“教科书革命”的制度保障

清末新政起步后,清王朝主管教育发展的学部计划在教科书出版上模仿日本的国定制,即教科书仅由学部组织人员编纂,其他任何出版机构不得涉入。这一消息风传后,陆费逵经历了“始闻而喜,继而疑,终乃戚然大惧”的心理变化,究其原因,是“惧以此阻我全国教育之进步耳”<sup>[16]</sup>。在陆费逵看来,要出版高质量教科书,不仅需要把出版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而且不应当生搬硬套日本的教科书出版制度。陆费逵认为,在中国自主编印教科书处于起步阶段、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教科书出版实施审定制度才是确保教科书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

陆费逵首先对当时社会上“言必称日本”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陆费逵以笔名“冥飞”在《时报》撰文道:“吾国自变法以来,每举一事,即曰外国如何。而所谓外国者,大率皆指日本。一若外国仅一日本者,又若欧美诸国皆与日本相同者。何其陋也!”<sup>[17]</sup>基于这种认识,陆费逵主张在教科书出版管

理上,既要博采众长,又要结合中国现实,不要在日本教科书出版制度后面亦步亦趋。陆费逵认为,以日本教科书出版采用国定制为依据,不仅是对日本教科书出版管理制度的一知半解和曲解,更没有真正考虑到中国社会自身的现实。陆费逵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教科书出版一直采用审定制,自明治三十七年才开始把国定制和审定制结合起来进行,并不是国定制一统天下。同时,日本新教育起步早,发展成熟,其“教育基础巩固,人才众多,编纂教科书者,多由学堂出身,有数十年之经验”。反观中国,由于新教育刚刚起步,“教育幼稚,编纂者阅历未久,任其自由竞争,悉心研究,合全国之学子以图之,欲求完善之书,尚须期之数年之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立即采用国定制,“无异始萌之木,倚为栋梁,初生之驹,责以千里,其必不可得矣”。在教科书出版人才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采用国定制,所有教科书均由学部编纂,以学部区区数人之才能来编纂一国使用的教科书,“果能尽兼众人之长乎?……以全国四万万人之教育而委之学部数十人之手,一成不变,其必无良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陆费逵又从中国人固有的社会心理方面分析了国定制的弊端。陆费逵认为:“吾国人之心理,最信服政府,苟一国定,则无人敢言其非,而全国风行,虽有民间编辑之善本,亦必不用。国定而善也,吾人固受其福;设有不当,其遗害将何所底止哉。”<sup>[16]</sup>陆费逵强调,应当全面、充分吸收各国教科书出版中的经验和教训,不应当片面地把日本一定时期内的教科书出版和发行制度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之真理来邯郸学步。

基于各种分析,陆费逵认为,应当遵循“天演公理,有竞争而后有进步”这一规律,通过采用教科书审定制度,鼓励民间书局参与编纂教科书,“书贾见其有利,相与投资而经营之。数年间,创立公司以十数,出版种类以百数”。当然,陆费逵也考虑到了采用审定制度会出现教科书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但他认为,待教科书出版成规模之后,学部应制定制度,“奖励其良者,禁止其不良者,示以程式以监督之,使日进不已,不十年间而吾国之教科书,不可胜用之”<sup>[16]</sup>。可以看出,陆费逵这一思想已经初步把市场调控和宏观管理结合起来对教科书出版进行思考,符合现代图书出版的基本规律。有利于鼓励出版界把出版兴趣投放在教科书出版上,对于培养自主、成熟的教科书编纂和出版人才,推动中国自主的教科书出版体系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1906年3月,清王朝学部最终放弃原拟定的教科书国定

制,确立为教科书审定制度,即由各书局自主编纂出版,而后必须经学部审定。初小教科书送审时候必须有著作者姓名、出版年月、价格、印刷、发行所等。学部对送审的初小教科书进行改订之后,必须照改订样式再寄呈学部进行复核,审定后必须标明“学部审定字样”,以5年为一审定周期。高小和中学除了审定周期为4年外,其他审定方式和初小教科书相同。<sup>[18]</sup>该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时候,审定的教科书102册,其中民营出版业发行的达85册之多,占教科书总数的五分之四。<sup>[19]</sup>1910年,商务印书馆中小学各科课本已达到531册,在全国教科书领域中,不仅质量最高,数量也无人能望其项背。<sup>[20]</sup>可以看出,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实施,激发了民营出版机构在出版教科书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了众多民营出版机构的竞争发展,使中国人自编的新式教科书逐渐成为教科书市场的主力。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陆费逵“教科书审定制”出版思想的前瞻性和正确性。

#### 四、结语

陆费逵先生的“教科书革命”思想是其教育图书出版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强调以教科书自主编辑、出版和发行为阵地,使教科书成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以实现其“教育救国”之理想。

虽然和中国近代其他著名教育家一样,陆费逵也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但与蔡元培、范源濂、李石岑等教育家不同,陆费逵终其一生几乎并不像蔡元培等这些教育家那样直接参与不同时期的教育决策。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出版家,陆费逵图书出版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出版事业有着密切关系。陆费逵除了用其如椽之笔对中国近代各级各类新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建言外,主要是把其“教育救国”思想通过“教科书革命”这一思想融入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事业当中,把推动高质量教科书的发展作为自己毕生之职责和出版界的社会责任。在图书出版界组织的“书业商会”成立20周年之时,陆费逵撰文纪念时就感言道:“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sup>[21]</sup>

在陆费逵56年的生命中,服务中国近代出版界长达38年之久,如舒新城先生所言,“先生以五十六岁之中寿,而服务于出版界达三十七八年,努力文化事业数十年如一日,近代实业家中实所少见”<sup>[22]</sup>。

而需要指出的是,陆费逵在出版界服务 38 年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他以图书出版为阵地来对中国教科书出版现代化进行推动的过程,更是他把“教科书革命”思想践行到教育图书出版事业的过程。

简而言之,陆费逵先生的“教科书革命”思想与当时中国新教育起步阶段教科书问题和教育发展密切相关,堪为其“教育救国”理想的具体实践。他希求中国人自主编纂高质量的教科书来推动教育发展,为培养新型现代人才奠定基础,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改变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面貌,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虽然这一理想因为改良性质有着乌托邦的一面,但他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这一理想。

#### 参考文献:

- [1] 陆费逵. 中华书局宣言书[J]. 中华教育界,1912(2):21.
- [2] 吴小欧.“应时而上”的教科书革命:以陆费逵为例[J]. 教育学术月刊,2015(11):90-96.
- [3] 陆费逵. 我的青年时代[J]. 新中华,1934,2(6).
- [4] 吕达. 陆费逵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 [5] 陆费逵. 论改革当从社会始[N]. 楚报,1905-09-06(1).
- [6] 郑逸梅. 书报话旧[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37.
- [7] 蒋维乔. 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C]//张静庐.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 北京:中华书局,1959:398.

- [8] 周其厚. 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史实辨析[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3):132.
- [9] 俞筱尧. 陆费逵与中华书局[J]. 出版史研究,1997(5):2.
- [1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0.
- [11] 陈景磐.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57.
- [12] 毛礼锐,沈灌群. 中国教育史(第四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420.
- [13] 陆费逵. 陆费逵自述[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 [14] 陆费逵. 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J]. 申报月刊,1932,1(1):15.
- [15] 陆费逵. 论今日学堂之弊[J]. 教育杂志,1910(1):14.
- [16] 伯鸿. 论国定教科书[N]. 时报,1907-03-23(9).
- [17] 冥飞. 论国定教科书[N]. 时报,1910-07-24(2).
- [18] 李瑞良. 中国出版编年史(下)[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799.
- [19] 李泽章.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C]//王云五. 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263.
- [20] 汪家熔.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166.
- [21] 陆费逵. 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J]. 进德学刊,1924,3(2):31.
- [22] 舒新城. 陆费逵先生生平略述[M]//舒新城. 舒新城谈教育.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177.

(责任编辑 林川)

## Lufei Kui's Thoughts of "the Textbook Revolution" Dur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LIU Jiacui

(Library of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 In 1912, when Lufei Kui founded the Zhonghua Book Company, he put forward a deafening thoughts of "the textbook revolution". Lufei Kui's thoughts originated from his early experiences in textbooks publishing. Lufei Kui was directly involved in education and took part in th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which are the bases of his thoughts of "the textbook revolution". Lufei Kui holds that the Chinese editing their own textbooks is the key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extbook revolution".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 thoughts of "the textbook revolu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at textbooks are edited by the Chinese is the base to resist the colonial culture and determine the national rise and fall; on the other hand, high quality textbooks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Meanwhile, the work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itors of the textbooks cannot be substituted. Besides, the system of authorization i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the textbook revolution".

**Key words:** Lufei Kui; the textbook revolution; book publishing

# 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机遇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为例

邹丹丹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当代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型冠状病毒的突然暴发加速了这一变局并引发全球对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的再思考。在病毒大规模进攻人类,西方负面舆论挑战我国意识形态时,社会群体凝聚共识、保证理想信念不动摇,树立机遇意识、风险意识,认可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稳定社会结构,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抗疫故事、抗疫精神是抗疫成功的精神保障,中国速度、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区治理、科技治理体现了我国治理特色,对舆论的正确引导为抗疫成功赢得舆论支持,这都为当下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生动素材。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意识形态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治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16

**中图分类号:**G641;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89-05

## 一、疫情防控下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性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暴发,“截至2020年12月29日,全球累计确诊81451630例,累计死亡1778064人,其中国内累计确诊102698例,累计死亡4851人”。新冠病毒从露出苗头、暴发到被控制,仅半年时间就造成全球数十万人死亡,上千万人感染,全球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各国股市多次熔断,国际石油和黄金价格持续下跌,经济直接影响民生,隐藏在下滑经济趋势背后的是无数个体及家庭受到波及,国际关系紧张。疫情暴发前我国国内正聚精会神进行脱贫攻坚工作,国际正与美国就贸易问题谈判,疫情暴发后国际社会又出现“中国病毒论”“中国赔偿论”等独断论调,这对我国治理能力与外交关系都提出了挑战。

在这一特殊时期意识形态教育尤为重要。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国家统治阶级为了国家发展、社会结构稳定,根据国内外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宣传符合本国国情的主流思想。既能在“变局”中巩固国家执政党的地位,对“社会治理发挥矛盾调处作用”<sup>[1]2</sup>,还能凝聚国家精神进行意识形态文化输出,形成具

有导向性的社会价值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sup>[2]339</sup>,“不仅要针对内部国民而且也要考量到其外在影响力”<sup>[3]214</sup>,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 二、重大公共危机疫情防控治理中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机遇

### (一) 抗疫故事、抗疫精神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

全民众志成城抗疫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sup>[4]15</sup>。全民抗疫故事、抗疫精神展现了中国价值观,激发抗疫积极性,促使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拥有鲜活案例,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生命力。“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sup>[5]710</sup>。84岁的钟南山院士在高铁上依旧研究疫

收稿日期:2021-02-10

作者简介:邹丹丹(1991—),女,贵州贵阳人,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社会治理。

情,企业家冷友斌在疫情暴发初始就提供大量医疗物资支援武汉,共向红十字会捐赠2亿元;72岁的兴十四村党委书记付华廷驻守在疫情的前线;基层民警石健承受严寒气候参与排查,还主动申请到人口最密集的高铁站对进出人员进行登记。除了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的先进代表,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前线既有医生护士等医务工作者,也有农民工、军人、企业家、社区人员、民警、志愿者等工作人员。正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才能支撑他们主动走在人民前面、奋斗在抗疫的一线,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同舟共济的集体主义精神、团队精神,使他们在风险危机应对中凝聚共同责任意识,在早期医疗物资短缺、风险不可控时奋不顾身,成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新时代青年彰显当代中国新面貌。抗疫最困难时期大量青年踊跃报名服务疫情一线,青年成为主力军。数据显示,“4.2万多名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有1.2万多名是‘90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95后’甚至‘00后’”<sup>[6]</sup>。他们用行动证明新时代中国青年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永不妥协的精神气质。他们是当代社会治理的践行者,是公民责任意识的诠释者,特别是当代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青年是国家的开拓者,他们与祖国共进退、面对挑战奋勇直前、不计得失、无怨无悔。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去有人说他们是娇滴滴的一代,但现在看,他们成了抗疫一线的主力军,不怕苦、不怕牺牲。抗疫一线比其他地方更能考验人。”<sup>[7]</sup>在公共危机发生时中国人民“舍小家为大家、功成不必在我”的民族精神得以弘扬,激励全国青年向前抗疫拒绝退缩。同时国家为援助的医疗团队提供了相应的保障,给予逆行前进的医疗人员子女中、高考加分鼓励,这是国家对抗疫前线无私者的回馈。

研制疫苗、国际援助体现大国责任形象。疫情防控工作凸显了国际区域合作的价值性,在面对病毒全球传播的紧张形势下,中国加强合作交流、遵守国际秩序、履行相应责任义务。在抗疫期间第一时间将国内情况向国际社会汇报、公开确诊人数、公开患者症状、发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公布医治及防控方案、分享救治与治理经验。在国内抗疫压力巨大情况下还向他国大量援助医疗物资,承诺“两年内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美元援助,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sup>[8]</sup>,获得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抗疫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肯定,增强了国际抗疫凝聚力与自信心。自

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科研工作者就刻不容缓地与病毒赛跑,尽全力攻克新冠病毒、研制疫苗,目前“我国有11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4个疫苗进入三期临床试验”<sup>[9]</sup>。习近平总书记表示疫苗研制成功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使用,强烈激发了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

## (二)制度优越性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

风险社会危机应对要求执政党在最短时间将危机转化成机遇,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此为契机凝练抗疫期间最大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亮点,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被全球化西化,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就是非意识形态化”<sup>[5]649</sup>。中国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竭尽所能解决民生问题,而资本主义首先考虑经济利益维护资本力量,其次才会考虑人民利益,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中国调度、中国速度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2020年1月2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高达1192.5万人次,如果缺少国家严格管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巨大的流动人口在疫情期间一旦失控会造成难以控制的严重后果,就会造成秩序混乱、病毒加速传播、三股势力可能会趁机作乱,整个社会运转系统崩溃。正是制度保障,共识一致,人民才会遵守社会公共规则,服从国家指挥,排除负面干扰情绪,保证社会秩序正常运行,满足了疫情期间全国物资的供需要求。仅从1月24日至3月8日,国家就调动了346支医疗团队,4万多名医务工作者,4万余台机器设备,根据病情的轻重程度迅速新建医院,仅用10天就建成了总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拥有1000多个床位的火神山医院,12天建成1600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当几万名援助武汉的医疗人员到达武汉,如果没有部门之间紧密配合、沟通协调,很难在极短时间调动、合理分配大量人员、设备。更值得一提的是火神山医院在最短时间完成了场地平整设计图、方案设计图和全部施工图,调动上百台挖掘机、推土机通宵施工,期间利用北斗高精度测绘,而且多数的测量都是一次性完成工作,病房焊接、安装,电力施工,经过五天五夜的奋战,火神山医院全部通电。中国调度、中国速度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特色保障制度保障民生安全。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在于保障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特别是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的特殊需要。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团结,实现

社会公平的功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是区别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在全国重大公共危机应对时给予抗疫信心、凝聚群众向心力,解决后顾之忧稳定全国民心。2020年1月22日国家下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紧急通知》,明确表示“对于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只有社会主义的保障制度才能为被感染的中国人买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降低公共危机后的社会风险,最大化稳定社会结构。除了疫情产生的救治费用,疫情后对失业、就业皆有补助,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保障制度的优势所在。

党的领导制度是抗疫成功的重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在疫情期间审时度势、临危不乱,迅速制定出符合当下国家治理的救治方案。党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切实解决与群众利益相关的问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强四个自信,才会在疫情暴发时涌现奋不顾身的青年群体,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才会有保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在疫情期间得到了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提出建立“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听取报告、召开会议、作出重要部署及指示,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党的意识形态是疫情期间国家稳定的重要思想保证。

### (三) 中国治理特色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抗疫工作彰显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特色性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引导质朴的意识形态前行,一直到它认识到自己得以成立的有效条件”<sup>[10]26</sup>,疫情期间我国基层社区、志愿者、群众性自治组织都对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呈现了全民参与、基层合作、科技防控的创新治理模式。没有科技就不能获得个人相关实时数据,没有全民参与就不能互相监督、信息互通。

社区治理、科技治理成为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在各小区设置关卡对进出人员进行登记、严格测量体温,对于返乡人员及时登记并跟踪观察,严格做好外来人员的信息登记工作,并发动群众互相监督,对于没有如实登记的居民及时反馈。他们上门统计人口及摸底健康情况,了解片区内人员是否去过高风险地区、有没有与疫情病人

的接触史,要求所有人员必须实名填写微信健康卡、每日进行健康打卡、健康申报。社区清洁人员每日对街道进行卫生清理、记录消毒时间,上门发放消毒用品,保持楼道健康通风。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民警24小时值班,春节无休假,人员轮流换岗。在宣传栏普及疫情预防措施,并通过微信建立社区群,告知疫情期间的注意事项。社区治理呈现出基层治理的严谨性与服务精细化。全民扫码成为本次疫情治理亮点,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给防控统计工作带来较大难度,社区工作人员利用微信扫码登记降低了感染风险。当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全民无论是乘坐公交、地铁还是进出大型公共场所都需要扫码登记,后台利用大数据实时监测能精确确定患者的移动轨迹、接触人员,我国科技防控在本次疫情治理中呈现出高效性。

党员治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稳定了民心。抗疫期间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优势,鼓励党员干部踊跃报名,鼓励他们一直活跃在疫情前线。援鄂医疗队伍多以党员为主,在疫情风险面前党员干部没有退缩,冲在人民前面,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展现了党的活力与生命力,强化了社会群体的政治认同。党员干部激励群众,联系群众,与群众站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向心力,稳定了社会局面,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全国各项经济活动开展的前提,坚定的政治信仰是构建现代化中国的动力。党员干部也充分发挥了党内监督作用,对疫情期间失责的干部严肃追责,体现了党员的责任担当。他们凝聚共识、增强信心、消除恐慌,及时处理疫情中出现的问题,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

德治与法治结合,外在转化为内在。国家在疫情期间积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拒绝吃野生动物、遵守国家公共安全意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道德素养从外在转化成内在,形成科学的文化素质,既提升公民的道德素养又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国家拟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列入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严格打击非法捕杀、滥食行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消除社会的不安情绪,巩固抗疫取得的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给出了当下道德建设的核心要义,也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我们应积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于抗疫行动中。

### (四) 舆情引导渲染主流意识形态感染力

引导、整合舆情,丰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机制。习近平同志强调在疫情期间“要加强舆论引导工

作,加强社会力量组织动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sup>[4]31</sup>。疫情期间建立了公开透明的新闻制度,借助新媒体在微博、抖音、快手等流量较大的短视频平台滚动播放,各大政务媒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疫情的重大部署及对政府相关政策解读,通报疫情动态,宣传防疫基本常识,增强群众自我保护能力,建立了立体舆论监督机制,形成了疫情期间的主流舆论声音,有效降低虚假谣言的流传,让群众意见理性表达,化解了社会矛盾,减少意见分歧。在疫情期间全国人民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厨艺、娱乐活动、创新节目,也反映了疫情紧张局势下中国人民诙谐幽默的一面,只有在相信国家治理体系的前提下人民才会进行娱乐放松活动,这也是人民群众对国家信任的表现。丰富的传播机制强化了群众的责任感、使命感、风险危机意识,同时还避免了盲目从众、泄愤报复等心理问题引发的群众性公共事件,正确的舆情引导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抢占舆论制高点,把握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导向,为赢得抗疫成功提供理性舆论支持。既要正面宣传抗疫中的模范榜样,又要对疫情中存在的问题客观报道,让社会群体了解真相才会认可政府行为。权威媒体在疫情舆论防控中主动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掌握网络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把舆论引向主流意识形态,在舆论中协调与平衡,宣传符合国家疫情防控政策的积极舆论,把握舆论的健康方向,占据舆论制高点。当重大公共危机发生时,杜绝因舆情混乱引发社会秩序混乱,防止社会群体因信息辨别能力不到位出现偏离防控工作轨道的现象,把握青年群体作为当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生力量,掌握舆情发展规律,在最短的时间将负面情绪的影响控制到最低,同时对错误思想进行纠正才能发挥好意识形态正确引领作用。“要增强党的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传播主体必须重视受众的心理特征和需求,建立和谐互动的传播关系”<sup>[11]133</sup>,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在宣传报道时应选择普通大众都能听懂的“人民语言”,注重情感的表达,高频率传播疫情时期主流词汇:团结、科学、信心、初心、同舟共济。整合抗疫故事精髓,给故事注入情感,挖掘抗疫精神,传播有温度的意识形态,引导群众产生情感共鸣、价值认同,深化对意识形态的认可度,提升舆论的影响力。

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主流意识形态有价值输出。“部分国家利用其技术优势,大肆兜售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干预与破坏另外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sup>[12]60</sup>。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抗疫行动的否定与污蔑,中国用实际行动让世界

再次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理性思考疫情涉及的政治问题,在国际上传播了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再次在本次抗疫中得到证实,合作共赢是人类集体应对全球危机的基础,人类强化合作才能共同走向新合作高度。世界各大媒体都应客观公正报道、传递正能量,营造健康的国际舆论环境。

### 三、结束语

重大公共危机应对需要意识形态护航,意识形态的功能、目的、地位决定了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辅助。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国家属性,正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引领才能在疫情期间保持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稳定社会群体的心态、凝聚全国人民共同抗疫的共识、形成危机时期攻坚克难的共同信念。意识形态教育与国家疫情防控结合,保证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将病毒传染范围缩小到最小,提高社会风险预警能力,增强治理信心。抗疫故事、抗疫精神使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涵具有生命力。制度是抗疫成功的重要保障,中国治理特色是取得抗疫成功的关键,积极的舆情引导为抗疫成功赢得了舆论支持。今后要更注重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确保社会群体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重大公共危机。

### 参考文献:

- [1] 郑永扣. 意识形态与社会冲突治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2.
- [2]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339.
- [3] 约翰·B·汤普森. 意识形态理论研究[M]. 郭世平,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14.
-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5.
- [5] 侯惠勤.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710.
- [6] 湖北日报评论. 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N]. 湖北日报, 2020-05-04(9).
- [7] 杜尚泽.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微镜头“武汉必将再一次被载入英雄史册!”[N]. 人民日报, 2020-03-11(1).
- [8] 人民日报思想纵横: 中国抗疫彰显大国担当[N]. 人民日报, 2020-11-03(9).
- [9] 陈海波. 新冠病毒疫苗何时上市怎样接种[N]. 光明日报, 2020-09-26(6).
- [10] 斯拉沃热·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季广

[11]全家悦.崛起与重构:大众文化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33.

(责任编辑 吕志远)

[12]吴满意.网络意识形态相关问题初探[M].北京:人民

## New Opportunities for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Major Public Crisis Governance

ZOU Danda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710054,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the century, and the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has accelerated those changes and triggered a global rethink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en the virus attacks human beings on a large scale and the Western negative public opinion challenges China's ide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social groups build a consensus, ensure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establish the sense of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nd recognize and practice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so as to stabilize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master the discourse power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ti-epidemic stories and anti-epidemic spirits are the spiritual guarantee for the success of the anti-epidemic work; China's speed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reflect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t systems; community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 governance reflect th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country; the correct guidance of the public opinion brings supportive public opinion and lays foundation for the success of the anti-epidemic work. All the above mentioned provide vivid materials for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deological education; core socialist values; state governance

---

(上接第 52 页)

##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Copyright Law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Joint Amendment of the Two Laws

WANG Xinyu

(School of Law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civil infringement and criminal imputation of copyright in normative values. Criminal law is based on the order. The primary object of the copyright crime should b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order. Civil laws such as copyright law take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rights as the primary task. The cognizanc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criminal law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copyright law, which does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unified legal order. After the new Copyright Law comes into effect, the crime of infringing copyright should still adopt the mode of legal work types. "The other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s" that are not clearly stipulated in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cannot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works stipulated in Item (1) of the Article 217 of the criminal law.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law, we should guide an appropriate expansion of the criminal circle with the purpose of order-based normative protection, further expand the types of behavior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rimes, implement the "equal protection", and flexibly adopt the crime standards to adapt to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the network era.

**Key words:** copyright; crime circ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ivil law and criminal law; market economy order

# 假设句的非现实性特征和表达功能

张雪平

(河南大学 文学院/语言科学与语言规划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通过对实例的统计分析发现,假设句分句中核心谓词具有非自主倾向,宾语具有弱受动性,实义成分少且无指成分多,还常出现表非现实情态义的能愿动词和语气副词,而排斥现实情态义语气副词。这些句法特征充分证明假设句是一种非现实性认识情态句。假设句也是一种推断性因果关系句,其基本逻辑功能是表达假言命题或判断,具有类比关系和反事实意义的假设句,能够表达类比推理或假言推理。假设句具有表推知、应变、疑问和评议等语用功能,多在非叙事语篇中用于说理论证,有时具有篇章衔接功能。

**关键词:**假设句;非现实性;语法特征;逻辑功能;语用功能;篇章功能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17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094-06

假设句是一种表达假设性推断因果关系的典型非现实认识情态句,其句式义主要受“如果、要是、的话”等假设关联词语的制约,<sup>[1]</sup>分句中的核心谓词、宾语、情态词语等的使用,体现了句式的非现实性认识情态特征。作为假设关系复句,假设句具有逻辑功能、语用功能和篇章功能等。现有研究极少关注假设句内句法成分的特征,也很少论及其表达功能。本文以对实例的统计分析,考察假设句分句中句法成分的语义语用特点,揭示假设句非现实性的语法特征,并结合例句描述其表达功能,以达到充分认识假设句的语义语法特征及其表达功能的目的。

## 一、假设句非现实性的语法特征

### (一)核心谓词的非自主倾向

假设句是一种典型非现实句,其语义上的非现实性,体现在分句中核心谓词的使用上。参照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分类<sup>[2]</sup>,以高频的假设标记“如果(说)”引导的假设句为例,从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收录的 1995 年《人民日报》前 38 条和 1992 年 12 月至 1993 年《作家文摘》前 41 条用例中,得到 82 个假设小句(“如果”小句 79 个,“如果

说”小句 3 个)、88 个结果小句。其中谓语核心 VP (多数为动词,也包括少数动词性结构、形容词和形容词性结构)是非自主的分别有 60 个和 65 个,约占总数的 73% 和 74%,如表 1。可以看到,非自主 VP 为自主 VP 的近 3 倍。这个结果说明,常用假设句的主从句的核心谓词,都是非自主的占大多数。

表 1

“如果(说)”句	从句(%)	主句(%)
自主 VP	22/27	23/26
非自主 VP	60/73	65/74

假设连词“万一”表可能性极小的假设,它所引导的假设句是口语中常用的。<sup>[3]</sup>我们从 CCL 中抽取 1995 年《人民日报》前 37 条、1993 至 1994 年《作家文摘》中 54 条、王朔等当代作家小说作品中 57 条,合计共 149 个“万一”复句。“万一”引导的假设分句中包含不止一个小句的,分别计算,共得到 162 个“万一”小句。其中非自主性 VP 约占 73% (118 : 162),非自主 VP 是自主 VP 的 3.5 倍(126 : 36)。“万一”句的主句中,非自主 VP 约占 62% (92 : 162)。这个结果同“如果(说)”引导的假设句的情况一致。

收稿日期:2021-04-25

基金项目:2020 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汉语非典型假设句的结构和功能研究”(2020BYY001)

作者简介:张雪平(1971—),女,河南舞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汉语语法学。

假设句从句和主句中核心谓词均以非自主主义为多,因此,可以说,假设句的谓语具有非自主主义倾向,或者说,假设句优先选择非自主谓词。使用不同假设标记的假设句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不会影响这种倾向性。这是假设句非现实性语义的句法表现。根据功能语法学者提出的及物性假说,及物性是句子/小句的综合特征,谓语动词的动作性是一项重要参数。<sup>[4]</sup>假设句式的非现实性决定了句中所述事态不是实际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便降低了句中动词的动作性,使句子具有了动作性弱这样的低及物性特征。非自主动词包括变化动词和属性动词,其动作性很弱或没有动作性,而自主动词是动作动词,其动作性强,便出现了假设句中非自主动词频率高于自主动词的句法特征。

## (二) 宾语的语义和指称特点

我们对几种类型语料中随机抽取的上述 162 个“万一”小句逐一分析后,得到 51 个无宾句、111 个有宾句(含 1 个双宾句和 1 个有 2 个宾语的兼语句),有宾句中谓词性宾语 24 个、名词性宾语 89 个。在 89 个名词性宾语中,抽象义的 46 个,实体义的 42 个,属性义的 1 个。可见,“万一”小句中有实体义名词性宾语的仅约占 26%(42:162)。依据功能学派对名词性词语指称性质的界定<sup>[5]</sup>,这 42 个实体义名词性宾语中有 14 个是有定形式(人称代词、专有名词、指量名结构等)的定指成分;有 28 个是无定形式(光杆名词、数量名结构等),其中用于定指的 5 个、不定指的 5 个、无指的 18 个,这三类指称成分的比例分别为:18%、18%、64%。上述情况说明,“万一”小句中无定形式的名词性宾语以无指成分多见。近似情况也存在于“万一”句的结果分句,以及由其他假设连词引导的假设句中。

由“万一”句宾语的语法性质、语义和指称特点可知,假设句分句中,有实体义宾语的用例只占小部分,使得多数谓语动词并没有施动对象。这说明假设句分句中宾语具有弱受动性,与其核心谓词的非自主倾向相对应;其无定名词性宾语以无指性的为多。宾语的弱受动性和名词性宾语的指称特点,是假设句非现实性特征的句法语义表现。一般情况下,现实句中的无定宾语名词性成分必须是有指的,而非现实句中无定宾语名词性成分倾向于无指。<sup>[6-8]</sup>假设句语义上的假设性和逻辑上的推断性,也决定了其表达上的说理论证性。典型假设句所述动作行为并非是现实发生的,使用它并不要求告诉听话人一个确定的信息,只要能说明什么样的条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讲清楚二者之间的推断性因

果联系,说明白道理就可以了。因此,分句中是否有宾语、宾语名词语是否为有定有指成分,并不重要。这就是假设句中分句宾语可以缺失、可以为谓词性成分,以及无定名词性宾语多为无指性成分的语用动因。

## (三) 句中的非现实情态成分

假设句中常出现能愿动词和某些具有非现实义的语气副词等情态词语,表达可能、必然、必要、意愿、估价、许可等<sup>[9]</sup>非现实情态意义,是假设句非现实情态语义特征的句法表现。根据在 CCL 语料库中的检索结果概述如下,例句可参考下文。

1. 推测义情态词语。可能义能愿动词“会、能、能够、可、可以、可能、该 1、应该 1、应当 1、要 1、一定、免不了”等,多出现在假设句的结果分句中,表示可能性或必然性的推断,其中以“会”的使用频率最高;假设分句中一般只出现“能、能够、可以、可能”。结果分句中也出现语气副词“也许、怕、恐怕、说不定、大概、多半”等,表示对假设条件下所得结果的或然性推断;“必、必须、必定、必然、想必、肯定”等,表示对假设结果的或然或必然性推断。

2. 必要义能愿动词。得(děi)、应、该 2、应该 2、应当 2、当、须得、必得、要 2”等,多出现在假设句的结果分句中,表示动作行为的必要性。

3. 意愿义能愿动词。“想、要 3、想要、要想、肯、敢、愿、愿意”等,多出现在假设句的假设分句中,也可出现在结果分句中,表示行为主体的意愿。

4. 估价义能愿动词。“值得、难于、难以”等,多出现在假设句的结果分句中,表示对某假设条件下所产生结果的估计或评价。

5. 许可义能愿动词。“准、许、准许、许可、容许”等,可出现在假设句的假设分句或结果分句中,表示所述事情的发生是被允许的或合情合理合法的。

## (四) 受排斥的现实情态成分

假设句的假设性非现实认识情态义对句中情态成分的制约,还体现在对一些情态成分的排斥上。如“幸好、原来、难怪、居然”等情态义语气副词,便不能用在假设句中。据我们考察,在假设句中不能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意义的语气副词<sup>[10]</sup>:

1. 情景性判断副词。“幸好、幸亏、幸而、好在、亏得、多亏、可惜”等情景性判断副词,表示说话人对已然发生的事情做出的庆幸、惋惜的判断,其语义中隐含着所限定事件的已实现义,修饰现实性的已然已定事件,因而不能用于假设句。

2. 意外性判断副词。“竟、竟然、居然、却”等意外性判断副词,表示违反一般的常情、事理或说话人

的预期,有出乎意料的意思,也用来修饰现实性的已然已定事件,不能用于假设句。

3. 论理及理会性判断副词。“原来、敢情、怪不得、怪道、无怪、无怪乎、难怪、其实”等论理及理会性判断副词,表示“事实如此”之意,修饰现实性事件,也不能用于假设句中。

上述这些语气副词都是表示现实情态意义的,也被称作情态副词或评注性副词<sup>[11]</sup>,它们与“也许、恐怕、必定”等表示可能性推测义的语气副词不同,其词义里面隐含着相关事件的已实现义,只修饰已然、已定的现实性事件,不能用来修饰未然、未定的假设性事件,也不能修饰假设性的已然、已定事件,所以不能用于假设句。这类主观评价性现实义语气副词在假设句中的使用受限,也是假设句的假设性非现实语义制约的句法结果。

## 二、假设句的表达功能

### (一)假设句的逻辑功能

根据假设分句所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假设句可分为现实、可能、反事实和虚拟四种。<sup>[12]</sup>假设句的基本逻辑功能是表达假言命题或判断,一般不独立表达推理。可能假设句是最常用的典型假设句,一般表达假言判断,非类比关系的现实假设句和虚拟假设句也具有假言判断功能。例如:

(1) 温度如果达到 100℃,水就会沸腾。

(2) 要是再不下雨,秋庄稼就早死了。

(3) 如果说我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乐于助人。

(4) 假如我是一只雄鹰,一定会勇敢地飞翔。

这几个句子前后分句为假设条件和推断结果关系,从逻辑上看为假言复合判断,它们不独立表达推理。(1)(2)这样的可能假设句和(4)这样的非类比虚拟假设句,常用作假言三段论等推理形式中的大前提或小前提,和其他命题或判断一起构成一个假言推理。(3)这样的非类比现实假设句实际表达肯定判断,相当于一个简单判断,其假设分句和结果分句并不是一般的蕴涵关系,即不具有必然的条件和结果关系,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它所表达的通常是“话题”和“说明”的关系,属于“言域”层面的语用性假设句<sup>[13]</sup>,既不表达推理,也不用作推理形式中的大、小前提。

具有类比关系的现实假设句和虚拟假设句,以及反事实假设句,其内部逻辑语义关系比较复杂,也不是一般的蕴涵关系,而是用一个假设句式表达推理的

内容,分别具有类比推理和假言推理功能。例如:

(5) 奇迹又一次出现。如果说第一个奇迹靠的是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那么,第二个奇迹靠的则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报刊精选》,1999年)

(6) 李诚想:如果说团党委是一个人的头脑的话,那么这些人便是布满全身的神经。(杜鹏程《保卫延安》)

(7) 你是个普通人士,但你的名字连我都知道。要不是有真才实学,怎么可能这样出名呢?(《中华上下五千年》)

(5)(6)两例中“如果说……,那么……”结构的现实假设句、虚拟假设句,前后分句之间都具有类比关系。前例分句所述是说话人认识上的事实,以第一个分句的内容来衬托并类推第二个分句的内容,从而凸显了后分句的意思。后例采用了比喻式类比推理,前后分句内容都用了隐喻表达法,以“一个人的头脑”和“布满全身的神经”之间的密切关系,来形象地类比“团党委”和“这些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凸显的也是后分句的意思。(7)中“要不是”引导的反事实假设句,采用了反证法,从已知结果反推原因,从而说明了该结果产生的原因。反事实假设句实际表达了假言三段论推理<sup>[14]</sup>,体现了假设句的假言推理功能。

### (二)假设句的语用功能

邢福义根据句末语气的类型,把复句分为陈述型和非陈述型两类。非陈述型包括问句型、祈使型和感叹型。<sup>[15]</sup><sup>22</sup>“即使是充当分句的小句,它们在复句里也各有自己的语气。例如:‘你是川家的媳妇,我就不是川家的媳妇吗?’就是‘陈述语气+疑问语气’。”<sup>[16]</sup>从小句与小句(也包括独立的单句)的语气配合来看,其中具有假设关系的小句与小句之间可以有四种组配情况:陈述+陈述、陈述+疑问、陈述+祈使、陈述+感叹。<sup>[17]</sup>这就是假设句的假设小句和结果小句之间的语气组配类型,也就是假设句的语气类型。可见,从假设结果分句也就是全句的语气类型来看,假设句与一般句子一样,也分为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四类。

不同语气类型的假设句在交际语用功能上有差异。邢福义在论述“如果 p,就 q”假设句时,根据这一句式跟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语气类型的关系,把它的作用总结为六种,即用于推知、应变、质疑、祈使、评说和证实。<sup>[15]</sup><sup>85-88</sup>参考上述考察结果,根据我们的观察和认识,且把假设句的语用功能概括为表推知、应变、疑问和评议四种。

1. 表推知。假设句的结果分句可以表达依据假设条件所推断的结果,这是假设句最突出的一种语用功能,与其逻辑上的判断功能相一致。句子一般用陈述语气,结果分句中多用“就、那么”等承接性关联词,也常用“会、可能”等表可能义的能愿动词,以及“必定、肯定、一定、也许、恐怕、怕”等推测义情态词。例如:

(8)如果书籍不能迅速拿出放入,那么书架的价值就会减半,假如能缩短书籍的出入时间,就可能加速工作的进行。(《哈佛管理培训系列全集》,转引自北大CCL)

(9)我们这儿要是刮东北风的话,就一定会降温。

(10)时至寒冬,又遇荒年;若每天没晚上这顿热汤垫底,怕是连生命都难保障!(孙方友《陈州饭庄》)

2. 表应变。假设句的结果分句可以表达在假设条件下所要采取的应变办法或要实施的行为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说话人自己或行为主体而言,结果分句用陈述语气,如(11)(12);另一种是请求、要求或劝告他人在某种假设情况下要采取的某种行为或应实施的策略,结果分句一般用祈使语气,如(13)(14)。后者的结果分句中常用“可以、可、能”之类的可能或许义能愿动词,以及“要、应该、应当、必须”之类的必要义能愿动词。

(11)上车以后你先找到座位坐下,如果没有熟人,我就坐到你身旁。(余华《爱情故事》)

(12)如果你再叫我一声小市民,我就要请你滚出去了。(余华《西北风呼啸的中午》)

(13)要是买不着火车票,你也要想法早点回去。

(14)假如你不愿意把自己的爱交付给他,你就应该把你的真实想法向他说出。(《人民日报》,1995年)

3. 表疑问。假设句可以用来提出某种疑问,包括有疑而问和无疑而问。一般是结果分句用疑问语气,如(15)一(18);在特定语境中也可单用假设小句表示疑问而独立成句,如(19)。表疑问的假设句用于口语对话中较常使用紧缩式,如(20)。

(15)如果你下岗了,你将如何对待?(《MBA 宝典》)

(16)假如每秒钟移动一次,共需要多

长时间呢?(《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17)要是你都不为你自己高兴,那别人又为什么为你高兴呢?

(18)要是我没听错的话,您说的是王老师吧?

(19)万一火车晚点呢?

(20)若有打算会闹出啥样?(冯骥才《石头说话》)

4. 表评议。假设句的结果分句可以表达对某种假设条件所做的评述或议论。常用感叹语气,也用陈述语气;常用“那、这”和“就”连用成“那就、这就”来引出评议内容。例如:

(21)要是能早点写完论文,那该多好啊!

(22)万一博士毕业不能搞专业,那就太可惜了!

(23)夫妻俩要不吵不闹呀,就像炒菜没放盐!<sup>[15]87</sup>

(24)读书如果不进行思考,这就很难获得真正的进步。

(25)这次试验要是获得成功,将给他带来最大的鼓舞。

从例句可知,假设句的语用功能与语气类型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在实例中也并非界限分明,一个假设句也可以有不止一种语用功能。如具有疑问语气的反问句便具有推知功能和评议功能,因为说话人对某问题的评议常根据自我的一种推断而来。表应变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表推知,因为应变反应正是出于应对某种推测性事态的目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假设句语义上属于推断类因果复句,主要就是表达判断和推测的,表推知或推断是其基本语用功能。

### (三)假设句的篇章功能

篇章功能即语篇功能,包括衔接功能、信息功能、叙事功能和描写说明功能等。假设句是一种非现实句,主要用来表达判断,也可用来表达推理,因此常用来说明事理和进行论证,多用在非叙事性语篇中,在叙事性语篇中通常表达背景信息。如下面前三例是可能假设句,代表了假设句的一般用法,(26)说明事理用于论证,(27)(28)说明客观事理。

(26)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27)比如在正常条件下,2千克大米

和1千克大豆都卖2元钱,如果某个时候大米生产过多,要的人少,而大豆生产过少,要的人多,那么,大米的价格就会下降,大豆的价格就会上涨。(同上)

(28)假如没有空气阻力,小球将一直摆动下去,永不停止,这种运动叫无阻尼振动。(同上)

两个可能假设句常常并列使用,语义上形成相似比较,或形成正反对比,表达严密,说理有力。例如:

(29)如果呼号,就等于要毁掉喉咙;如果沉默,那就是等待内火自焚。(张炜《柏慧》)

(30)如果发了双薪,筹款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公司不肯发,大家就立刻发动罢工,一直到胜利为止。(欧阳山《苦斗》)

反事实假设句具有特殊的语用表达功能,利用反证法,批驳对方的观点进行说理和论证,比正面论证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例如:

(31)但是现在,对方辩友要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现代化工业几乎都建立在农村劳动力到处流动的基础上,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假如没有他们的流动,怎么会有祖国东北、西北边疆的开发?(《报刊精选》,1994年)

假设句表述非现实事态,一般不能用于叙事和描写,但有时也具有一定的叙事性和描写性。如非类比现实假设句也属于“话题-说明”句,语义上也兼有现实性特征,因而有一定的叙事功能,如(32)用“如果”引导的分句实际上是限定了结果分句所述计算结果的时间起点,相当于时间状语从句,句子便具有一定的叙实性。

(32)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人民日报》,1995年)

类比现实假设句和类比虚拟假设句用对比手法构成类比关系,表达形式相似,有以前衬后、以前突后的作用,一般用于论证或说明事理,分别如:

(33)如果说章草是隶书的快写体,那么今草也可以说是楷书和行书的快写体。(《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34)如果说椭圆星系是太空中的“老人国”,那么不规则星系就是一个“小人国”。(同上)

类比虚拟假设句还具有描写性和说明性,常用比喻或比拟手法,通过形象化描写来说明客观事理,如(35),句中使用了比喻句来进行类比,形

象地说明了重庆市和朝天门的地形特点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特定的语篇中,可能假设句有时也具有一定的描写说明功能,如(36)中“假如”引导的假设句,主要用于描写南方河岸边人家夜雨过后所见景象。

(35)如果说重庆的地形像一条长长的舌头,那么朝天门就是舌头尖了。(初中《语文》第三册)

(36)南方的河不属于哪一季节……最奇的是,随着夜幕的降临,淅沥细雨随风潜入。你睡在床上,屏声敛息,方能听到细而密的沙沙声。你的家假如枕着河道,后门口还挂下一条瘦瘦的石阶,到翌日开门一看,你会立时惊呆了,河水竟涨上了两个台阶,盈盈地向你展露着风姿,似还伴着窃窃的笑语。(《人民日报》,1995年)

表推知、疑问和评议的假设句主要用于说理或论证,而表应变的假设句用在应用文中则常用于说明,如下面两例表应变的假设句表述上都近似客观说明。

(37)假如你感到缺铬,或者开始近视,那么,不妨经常吃含铬量较多的食物,如糙米、全麦片、小米、玉米、粗制红糖,等等。(《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38)假如你有条件上网的话,可以访问它的网址……(《MBA宝典》)

假设句有时还具有篇章衔接功能,特别是非类比现实假设句,常用于引出话题或者转换话题,而使上下文语义上得以连贯。如(39)中“如果说”引导的假设句引出一个新的话题“蛇口有什么特别之处”,(40)中用“如果说”引导的假设句把话题从宗教转换为“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即人类之爱”。

(39)这一条全国各地都要求这么做,如果说蛇口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十多年来,这里从没出现过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案例。(《人民日报》,1994年)

(40)他首先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即兴讲话,他说耶路撒冷像个恢宏的宗教博物馆,我们远道而来的4个中国人都不是教徒,但我们尊重世界上一切宗教,就像尊重人类一切美好的信念,如果说还有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那就是人类之爱,这是一种崇高的永恒的精神,作家和诗人们都应该是寻求这种精神的先驱,因此我希望这座小礼堂能够成为铭刻这种精神的文学圣殿。(《作家文摘》,1994年)

### 三、结语

本文采用成分分析法,通过定量统计发现,假设句句句中核心谓词具有明显的非自主倾向,宾语具有弱受动性,实义成分为少,以无指成分多见;还常出现能愿动词和某些非现实义语气副词等情态词语,但排斥现实情态意义的语气副词。这些句法特征充分证明假设句是一种非现实性认识情态句。假设句也是一种推断性因果关系句,其基本逻辑功能是表达假言命题或判断,最常用的可能假设句和不具有类比关系的现实和虚拟假设句,一般只表达假言判断,但具有类比关系的现实和虚拟假设句,以及反事实假设句,语义形式上比较特殊,能够表达类比推理或假言推理。从语用功能上看,假设句可表推知、应变、疑问和评议等。多用于非叙事语篇中说明事理、进行论证,能增强论证的力量。有时也具有一定的描写说明性,并具有篇章衔接功能。句式义对句中成分的使用具有制约作用,句中成分对句式义也具有反作用。对复句的研究,不仅要把握句式义的意义,还要考察其句内成分的语法语义特征,同时也要考察其表达功能,分析和综合研究相结合,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句式的结构和语义功能之间的关系。

#### 参考文献:

- [1]张雪平.现代汉语非现实句的语义系统[J].世界汉语教学,2012(4).  
[2]马庆株.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J].中国语言学报,1988(3).

- [3]张雪平.“万一”的语篇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2009(1).  
[4]HOPPER P J, THOMPSON S A.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J]. Language, 1980(2): 251 - 299.  
[5]王红旗.功能语法指称分类之我见[J].世界汉语教学,2004(2).  
[6]GIV'ON T. Irrealis and the Subjunctive[J]. Studies in Language, 1994(2): 265 - 337.  
[7]王红旗.指称不确定性产生的条件[J].语文研究,2006(3).  
[8]张雪平.非现实句和现实句的句法差异[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6).  
[9]马庆株.能愿动词的连用[J].语言研究,1988(3).  
[10]崔诚恩.现代汉语情态副词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1]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12]张雪平.现代汉语假设句的分类系统[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13]沈家焯.复句三域“行、知、言”[J].中国语文,2003(3).  
[14]陈宗明.逻辑和语言表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5]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6]邢福义.小句中枢说[J].中国语文,1995(6).  
[17]袁明军.小句的语气类型与小句之间语义联结类别的关系[J].汉语学习,2006(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On the Irreality of Hypothetical Sentence and Its Expressing Function

ZHANG Xuepi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Science and Language Plann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xamp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core predicate in the hypothetical clause has the tendency of non-volitionality, and the object has the weak passivity. In addition, there are few substantives and more non-referential elements, and there are often modal verbs and adverbs with unreal modal meanings, excluding modal adverbs with the real meaning. These syntactic features fully prove that the hypothetical sentence is an epistemic modal sentence with irreality. The hypothetical sentence is also a kind of inferential causal sentence. Its basic logical function is to express hypothetical proposition or judgment, but the hypothetical sentence with analogy and counter-factual meanings can express analogical reasoning and hypothetical reasoning. The hypothetical sentence has such pragmatic functions including inference, response, question and comment. It is mostly used in non-narrative texts to reason and argue, and sometimes it also has textual cohesion functions.

**Key words:** hypothetical sentence; irreality; grammatical features; logic function; pragmatic function; text function

# 格的含义及其理论发展研究

司罗红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格无疑是句法学中最常用的核心概念,也是现当代句法学中理论发展最成熟,涵盖内容最广的理论模块之一,自然长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格在不同的语法体系中表示的意义不同,即使在形式句法的不同时期,格理论的句法内涵也有差别。格经历了表示名词形态变化的“形态格”,表示名词与动词语义关系的“语义格”,表示抽象句法位置的“句法格”;格理论经历了经典格位理论,扩充格位理论和最简方案“格位特征”核查等阶段。这些句法意义不同,句法表现各异的格伴随着句法理论的发展而产生,同时也影响句法理论的发展。梳理格的不同意义和内涵对准确理解和运用格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格;形态;特征;理论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18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100-06

## 一、引言

格(case)在不同的语法体系中代表不同的含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语法作用。从传统句法到当代最简方案,格经历了形态格、语义格、经典格位理论、扩充格位理论和格特征等五个不同阶段。从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具有的名词特征,到跨语言的语义特征,格研究从单一语言的静态描写到语言深层结构的共性,成为当代语言学的热门议题;从语义关系到摒除语义,只关注名词出现的位置,格位理论成为转换生成语法重要的组成模块;扩充的格位理论对经典格位理论中只关注名词的缺陷做了改进,对格位的赋予者和接受者提出双向要求,是特征核查的萌芽;当下最简方案中的格是词库中词的不可解释性特征,必须通过核查才能消除。格理论不断发展促进对语言认识的不断调整,造成不同时期对诸如被动句等相同句法现象有不同解释。

## 二、传统句法学中的形态格及不足

拉丁语、希腊语、德语等印欧语的许多语言都有“性、数、格”的形态变化,因此,作为显性句法表现的“格”自然很早就已经是传统语法研究的焦点。

很多学者研究拉丁语中的格现象,对拉丁语中的主格、使役格、宾格等名词的形态变化进行规范性的描写;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已经对包括法语、英语、梵语、格鲁吉亚语、日语、阿尔巴尼亚语等众多语言中的格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对“格”的含义、功能、语义、分类及理论价值进行了高层次的讨论。

### (一)形态格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表现

传统语法研究中的“格”是指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中名词或代词随着与动词之间的结构关系而发生的形态变化,有些语言中的形容词和数词也会随着名词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格”。形态格可以通过单词内部的形态变化得到体现,也可以通过添加词缀的手段得到体现,不同语言中“格”的种类和方式不同。英语属于格匮乏性语言,名词的格变化只限于所有格和一般格(通格)两类,通过是否添加词缀“-’s”的方式实现,例如:desk(桌子-通格)——desk’s(桌子-所有格)。英语中的代词仍然保留有主格、宾格、所有格的区别,通常采用内部形态变化的手段得到体现,例如:

收稿日期:2021-04-19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句子功能中心的跨语言差异对句法结构的影响研究”(17BY147)

作者简介:司罗红(1981—),男,河南新密人,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语言理论和汉语语法。

(1) He is a good boy.

(2) We all like him.

(3) His book is broken.

例句中的“he/him/his”分别出现在句子的主语位置、宾语位置和核心名词之前的位置,采用代词的主格形式 he,宾格形式 him 和所有格形式 his,代词的形态不同表示它的句法结构和功能也不相同。

日语中也存在形态变化表示的格,日语中的格特征要通过添加格标记的手段得到体现,主格、宾格、工具格、处所格分别采用不同的标记“-ga、-o、-de、-kara”进行标识。例如:

(4) Inu - ga neko - o oikakete iru. (日语,引自徐杰<sup>[1]109</sup>)

狗 - 主格 猫 - 宾格 追

“狗追猫”

(5) Tokyo - kara - wa John - ga kitta.

(日语,引自徐杰<sup>[2]108</sup>)

东京 - 处所格 - 话题 约翰 - 主格 来

“约翰从东京来”

例句中的“Inu、John”出现在主语位置,通过添加主格标记-ga的方式变为主格名词,“neko”作为句子的宾语,则必须采用添加宾格标记-o的形式表位宾格名词,表示处所的“Tokyo”添加处所标记-kara进行标识。

俄语等有丰富形态变化的语言中,不但名词、代词有格的形态变化,形容词、数词等也随名词的形态产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形容词、数词也有形态格。

### (二)传统形态格研究缺乏统一性

传统的形态格研究重视对语言进行细致和充分的描写,也初步涉及了诸如“格的来源、格的类型”等问题,但整体上看研究还囿于单一语言,缺少不同语言间的对比。语言学家菲尔墨<sup>[2]2-5</sup>指出了传统形态格研究中的主要缺陷:1. 忽视主格的研究。2. 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使分类含混不清。3. 研究多从意义出发而不是从句法中心出发。由于不同语言的格形态存在差异,有的语言格形态较多,如芬兰语中名词有16种之多,俄语中名词的格有6种;与之相对,缺乏形态的变化的语言,如汉语,则没有形态格。即便是都有格形态变化的语言,格的种类也不尽相同,跨语言的格体系对比有操作难度。但正如格林伯格指出:“两种格的体系可以有不同数目的格,而格的名称可能会掩盖功能方面的不同,但格的用法可以认为是能够比较的。”<sup>[3]98</sup>

### 三、格语法中的语义格及不足

传统形态格研究中只重视形态变化,缺少统一

标准,不能揭示句法结构方面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普遍现象。为了对格做统一处理,解决人类语言共有特征和语言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转换过程中的普遍限制问题,菲尔墨提出了格语法,其核心思想体现在1968年和1977年发表的论著中。菲尔墨论述的格多从语义句法出发,因此被称为语义格。

#### (一)菲尔墨的格是一种深层结构的语义关系

菲尔墨认为“格”作为普遍语法概念应该在每一种语言的语法基础部分都有一席之地。针对传统“格”研究中审查名词与其他部分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语义关系,关注名词的形态变化,忽视跨语言普遍性的深层机制等不足,菲尔墨提出“格”是种基础结构概念,是一种初始项,即便是在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中也存在隐性的“格”范畴,无论格是以显性方式还是隐性的方式存在,他们的基本内容和作用是一致的。他将“格”概念一分为二,一是表示传统语法中描写名词形态变化,即格的形式;二是表示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深层结构的句法——语义关系。

菲尔墨认为,句子在底层结构中包含一个动词和一个或几个名词短语,每个名词短语以一定的格关系与动词发生联系,这种格发生在句法层面,而不是词的形态方面。换句话说,每个句子都必须有动词和一系列与动词发生关系的名词组成,动词与名词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否采用显性形式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关系就是深层结构中的“格”。句子由情态和命题两部分组成,命题又包含动词和众多与之有格关系的名词组成。可以用下面的规则表示:

(6) 句子 = 情态 + 命题 (S = M + P)

命题 = 动词 + 格<sub>1</sub> + 格<sub>2</sub> + … + 格<sub>n</sub> (P = V + C<sub>1</sub> + C<sub>2</sub> … + C<sub>n</sub>)

每个动词在词库中都有自己的格特征,动词和有格名词共同组成了句子底层的命题意义,人类语言拥有同样的格类型,主要有:施事格(A)、工具格(I)、与格(D)、使成格(F)、处所格(L)、客体格(O)、受益格(B)、伴随格(C)等8种<sup>①</sup>,每个动词都必须有一个格范畴,同一个格范畴不能出现两次。例如汉语中“开”的深层结构可以表示为:

(7) a. [V + O] 空调开了。

b. [V + O + A] 校长开了空调。

c. [V + O + A + I] 校长用遥控开了空调。

深层结构中的命题结构通过转换变为表层结构合法的句子,从深层结构变化为表层结构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原则。比如无标记的主语的选择遵循A > I > O的顺序。即深层结构中若有施事则首先选取施事做主语,若没有施事则选取工具做主语,施事和

工具都没有的才选取客体格做主语。“空调开了”从底层结构到表层结构可以用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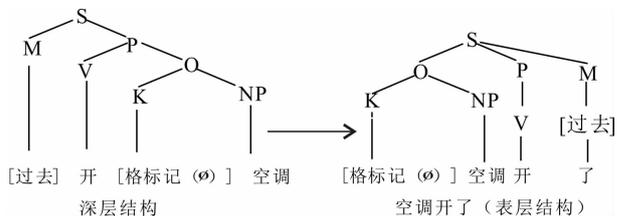


图1 格位结构

具有客体格(O)的名词“空调”为了满足句子必有主语的要求从深层结构中动词之后的位置移动到了动词之前,形成了表层结构中客体做主语的句子“空调开了”。

### (二)格语法成了转换生成语言学中的题元角色理论

菲尔墨的格语法理论从人类语言共性的视角探求语言深层结构中动词与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跳出了形式格只对一种语言的格形式描写的范式,并以此构拟出语言从底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基本规律,认为是对乔姆斯基同时期句法理论的修正。格语法中的格作为一种深层结构中的语义关系在语言中容易证明,这些成果已经被心理学家接受,将其作为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重要部分加以运用;计算机专业的许多学者也从其中汲取营养。

菲尔墨格语法将语言研究的视角引向语义研究,将句法形式和语义结合,与乔姆斯基“管约论”阶段的题元准则有相似之处。需要指出的是,格语法中“格”的认定仍然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定义格的“语义原则往往是模糊不清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胡壮麟<sup>[4]355</sup>,菲尔墨在之后的论著中,每次论及的“格”类型和数量都有不同。

### 三、原则参数理论时期的格理论

Vergnaud<sup>[5]21-34</sup>发现在形态变化不丰富的语言中虽然没有显性的格标记,但名词在句法中的分布却和有格标记的语言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提出语言中存在抽象格(abstract case)的概念。Chomsky 接受了 Vergnaud 的观点,在《管约论》(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中提出了格鉴别式(Case filter):

(8) 格鉴别式: \* NP, 当 NP 有语音形式却没有格(引自 Chomsky<sup>[6]49</sup>)

每个名词短语都必须得到格,句中若有无格名词,则句子不合法。

GB 理论中的抽象格不同于传统句法研究中名词的形态变化,也有别于格语法中名词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抽象格更多的是表示名词能够出现的一系列位置的概括,由格位的赋予者指派给名词。

常见的格位有:及物动词和介词可以指派宾格;句子中心语可以指派主格;主要名词指派所有格。

格位理论作为模组化的生成语法中理论发展最成熟、解释力最强的模组之一,涵盖了众多的语言事实,可以对许多表面看没有联系的语言现象进行统一解释。下列各句不合法均是句中有名词没有得到格位指派,例如:

(9) \* 李先生出生河南。(河南没得到格位)

(10) \* 很高兴这群孩子。(这群孩子没得到格位)

(11) \* Miss Lee very smart. (Miss Lee 没得到格位)

(12) \* John looking. (John 没得到格位)

被动句的生成机制通常可以通过格位理论解释。结构主义时期的被动句研究着力于对被动句结构的细致描写,转换生成语言学认为被动句是主动句转换生成的。例如:

(13) a. The man murdered the woman.

→ b. The woman was murdered.

例(13)句中的名词获得相同的论元,主动句的宾语与被动句的主语都是动作的承受者;被动句的动词发生了形态变化,并且使用助动词 be;被动句中动词之后的位置空置。

形式句法认为,深层结构中的动词发生了被动的形态变化“murdered”,使其失去了分派施事题元角色的能力,施事成分“the man”必须删除,形成了动词之前为空成分“e”的深层结构“e was murdered the woman”;同时,失去指派题元角色能力的动词也被吸纳了指派格位的能力;位于动词之后的受事名词“the woman”为了获得格位指派只能移位到主语位置获得句子中心语指派的主格,形成表层合法的被动句“The woman was murdered”。移位的目的就是“格位驱动”。我们用图2表示这一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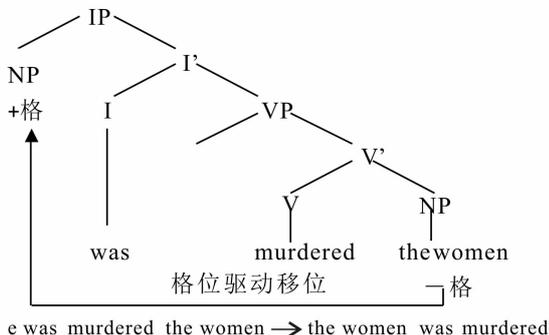


图2 格位驱动移位

汉语中被动句的生成机制与英语相同,我们用

“小明被打了”说明汉语被动句的生成机制。

(14) a. 小吴打了小明。

b. e 被打了小明。(深层结构)

c. 小明被打了。(格位驱动移位, 表层结构)

首先也是由于动词“打”发生被动化变为“被打”, 失去了给施事“小吴”分派题元角色的能力, “小吴”不能出现在句中, 形成了动词之前是空位“e”的深层结构“e 被打了小明”; 失去指派施事题元角色能力的“被打”同时失去了指派宾格格位的能力, 受事成分“小明”得不到格位指派, 只能通过移位至主语位置得到格位指派, 形成“小明被打了”这样的被动句。

GB 时期的格位, 主要是名词能够出现的位置的概括, 具有人类语言的普遍共性。格位理论涵盖了大量的语言事实, 对被动句的生成机制等问题首次给出了富有创意的解释, 同时还吸引研究者关注空成分等传统语言学没有涉及的内容, 开辟了对结构格、内在格等抽象格深入研究的新领域。需要看到的是, 格位理论只关注格位的接受者提出单向要求, 要求名词必须获得格位指派; 对格位的指派者却没有要求, 对介词悬空等问题不能给予很好的解释。经典格位理论构拟的被动句的生成机制也存在问题。

经典格位理论无法解释小句做主语的被动句。经典格位理论只对名词提出了限制, 要求所有的名词短语都必须出现在有格位置, 得到格位指派; 格位理论对小句却没有限制, 小句可以出现在有格位置, 也可以出现在无格位置, 按照经典格位理论构拟的被动句生成机制, 小句不用移位形成被动句。事实上被动句的主语不但可以是受事名词, 也可以是小句, 例如:

(15) 孔乙己偷书被发现了。

例句中的“孔乙己偷书”作为小句不需要得到格位指派, 但也移动到了句首, 形成了被动句, 说明经典格位理论被动句是“格驱动”形成的有待商榷。

#### 四、扩充的格位理论是特征核查的萌芽

管约论时期格位理论中的格不是具体语言中发生的形态变化, 也不是深层结构中动词与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而是一种抽象格, 是名词能够出现位置的综合。经典格位理论仅仅对名词提出了限制, 能够解释众多语言现象, 首次构拟了被动句的生成机制。经典格位理论却不能解释介词悬空等与格位赋予者有关的语言问题, 例如:

(16) \* 鲁迅出生于

(17) \* John goes home with

例句中的“出生”是不及物动词, 能给“鲁迅”分

派题元角色, 名词“鲁迅”获得句子中心指派的主格, 成为句子的主语; 句子不合法, 问题应该与介词“于”之后没有出现名词有关。同样, 英语例句不合法也应当是与介词“with”之后悬空有关。

(一) 扩充格位理论对格的赋予者和接受者提出双向要求

徐杰<sup>[7]98</sup>的博士论文提出格位理论应当是对名词及其相关句法单位共现关系的理论, 应当是针对格位指派者和格位接受者提出的双向理论。不但对格位接受者名词提出限制, 要求名词必须获得格位指派; 而且应当限制格位指派者, 即格位指派者应当将指派格位的能量释放出来, 格位指派者与格位接受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用扩充的格位理论表示。

(18) 扩充的格位理论: (引自徐杰<sup>[1]92</sup>)

a. \* NP, 当 NP 有语音形式却没有格。

b. \* 必选性格位指派者, 授格能量没有释放, 小句和名词是格位接受者。

扩充的格位理论不但包含了经典格位理论的内容, 而且增加了对格位指派者的限制, 并不是所有的格位指派者都必须将格位能量释放出来, 格位能量必选性的指派者必须释放能量, 而格位能量可选性指派者则可以两可。比如, 几乎所有语言的介词都要求将格位能量释放出来, 而句子中心 INFL 指派主格的能量在英语中是必选的, 在汉语中则是两可的, 句法上表现为英语句子必须有主语, 而汉语句子的主语则可以出现也可以省略。扩充的格位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能够富有创意的将诸如介词悬空问题、汉语中多主语问题、汉英两种语言祈使句主语的隐现问题等看似毫无联系的语言现象统一解释、综合处理。经典格位理论处理被动句时出现的问题扩充格位理论能够轻松解决。

扩充的格位理论认为被动句的生成本质上不是动词发生了被动的形态变化, 名词为了获得格位指派的“格驱动”, 而是语言表达者选取了非施事成分做话题, 发生了话题移位, 动词的格位能量得不到释放, 为了满足扩充的格位理论只能发生被动的形态变化, 形成表层结构中的被动句。我们用“小明被打了”说明这一过程。

话语表达者由于交际和思维的需要选取了受事名词“小明”作为话题, 形成了带有话题标记的深层结构(19a), 作为话题的“小明”通过移位到句首的形式得到句法结构上的体现如(19b)所示, 句中动词

“打”的格位能量不能得到释放,因此必须发生被动的形态变化,取消其授格能力,同时失去了分派施事题元角色的能力,施事名词“小吴”得不到题元角色不能出现在句子中,形成表层结构的被动句(19c)。

(19) a. 小吴打了小明[话题]。

b. 小明[话题]小吴打了。

c. 小明[话题]小吴被打了。

扩充的格位理论和话题化构拟的被动句生成机制得到许多跨语言对比的证据,许多语言被动句的主语都带有明显的话题标记;能够解释汉英两种语言被动句的差异;符合儿童语言习得中先发生名词移位,后发生动词被动变化的顺序;小句做主语的被动句在本质上仅仅是选取了小句作为全句的话题而已。

## (二) 扩充的格位理论亟待改进之处

扩充的格位理论不是简单的对格位理论的补充,而是从一个新角度对语言中的“格”这一句法概念作用范围的重新构建,扩充的格位理论继承了经典格位理论中格位内涵的认定,同时提出格位不仅要对名词限定,而且对格位的指派者也要有作用,格位是一种具有双向互动作用的纯句法概念。

扩充的格位理论对格位指派者提出限制,要求格位指派者要将格位能量释放出去,但认为格位能量的释放与否呈参数分布,将格位指派者分为“必有型格位指派者”和“可选性格位指派者”。徐杰采用举例的方式说明“介词是必选性格位指派者”<sup>[1]92</sup>,句子中心 INFL 在英语中是必选性格位指派者,在汉语中是可选性格位指派者。从理论的角度看仍有两个方面需要改进:1. 具体来看,必选性格位指派者有哪些,可选性格位指派者有哪些。2. 必选性格位指派者有何共性特征,可选性格位指派者有何共性特征,是否存在更简洁的形式特征将两者有效区分开来。换句话说,什么是格位能量释放与否的分界线尚有待考察。

## 五、最简方案中的格特征核查

1993 年乔姆斯基<sup>[8]1-52</sup>发表了《语言学理论的最简方案》(*A minimalist Program for Linguistic*)生成语法逐渐进入最简方案阶段。1995 年出版的著作《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和之后研究标志着最简方案理论架构逐渐日趋完善。最简方案认为人类语言机制能够顺利运行的最大条件是“容易理解性”,最彻底的方案便是:语言机制是关于易理解条件问题的理想解决方法。原则与参数时期的许多模块和设想在最简方案阶段被放弃,比如取消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而假设词库中的词直接进入“拼读”阶段,之后进行语音式 PF 和逻辑式 LF

的解读,“特征核查”成了最简方案中最重要的句法技术。

管约论时期的许多理论模块和假设被放弃,格位理论在最简方案中继承下来,并进行了改进。特征核查认为词带有不可解释特征,这些特征必须得到核查才能消除,从而进入语音式和逻辑式进行推导。比如原则与参数时期的屈折要素 INFL 在最简方案中被分解为 T-特征和 Agr-特征,两个特征都称之为 V-特征,它们会核查词库中动词的形态属性,若两者能相互核查则消除,句子进入语音式和逻辑式进行下一步的运算;若特征得不到核查而不能消除,则需要发生移位等句法变化。常见的特征有:语类特征,φ 特征(一致性特征),格特征,强 F 特征等<sup>[9]277</sup>;这些特征又可以分为固有特征和可选性特征。最简方案中的“格”就是一种不可解释的特征,是格的赋予者和接受者共有的局部关系特征;格接受者要通过格赋予者将自身的不可解释特征消除,格赋予者也需要格接受者消除自身包含的不可解释性特征,两者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依存关系。这与扩充格位理论异曲同工,最简方案认为强势特征必须被核查消除,弱势特征则可以被包容,一般说来显性特征是必须核查的强势特征。

最简方案放弃了 D-层和 S-层的区分,而是直接由词库进入运算层进行核查,所以最简方案理论下的被动句生成机制不同于原则与参数时期。最简方案认为以名词为补足语的限定语短语 DP 包含有不可解释的格特征,时态 T 也包含有不可解读的格特征,两者的格特征以及人称、时态等特征都必须得到核查以消除。动词的被动形态没有不可解释的格特征,包含有需要核查的其他特征。She is murdered. 具有下面的运算过程,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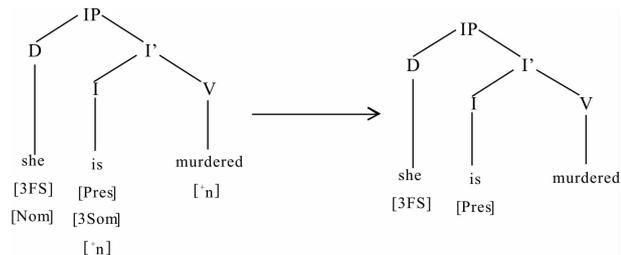


图 3 格的运算过程

从词库中选出的词 she 包含有 3FS 和 Nom 等特征,分别是第三人称(3),女性(F),单数(S),主格(Nom);系动词 is 包含一般时,第三人称,主格和分词特征,分别用 Pres, 3, Som, +n 来表示;动词的被动态 murdered 具有分词特征,用 +n 表示。不可解释性的特征主格(Nom)、第三人称(3)、分词特征(+n)等通过核查被消除,最后只剩余可解释的特

征<sup>②</sup>,句子进入语音式和逻辑式进行推导。

最简方案放弃了原则与参数理论中的许多模块,但格理论得以继续保留并加以改进,最简方案的特征核查与扩充格位理论如出一辙,同时解决了扩充格位理论中的格位能力释放的随意性,提出强势的不可解释特征应当被核查消除,弱势的特征可以被保留。

## 六、结论

格是句法理论中极其重要的概念,不同句法理论中的格表示的意义不尽相同。通过梳理不同时期格的基本含义和用途,不但能够发现格自身意义的变化,而且能够发掘句法理论的发展脉络。传统语言学将格看作形态变化语言中所特有的词形变化,是一种形态格,传统格研究缺少跨语言对比和语言共性的考察。格语法将格看作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各种语义关系,是一种语义格,与名词是否发生形态变化无关,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有相同的语义结构,格语法具有跨语言的视角,但是对格的特点和类型缺少统一和稳定的研究。原则与参数理论中的格是名词能够出现的位置的概括,与形态和语义无关,格过滤器成为形式句法中解释力极强的模块。扩充的格位理论修正了格位理论只对格位接受者提出限制的缺陷,认为格是名词及相关问题的概括,不但要求格位接受者获得格,而且要求格位指派将赋格能力释放出来,是一种双向限制,是最简方案特征核查的萌芽。最简方案特征核查将格看作是一种不可解释特征,是词库中词的属性,限制短语 DP 和时态特征 T、动词 V 等包含格特征都必须相互核查才能消除,从而使结构进入语音式和逻辑式进行之后的推导。

## 注释:

- ①菲尔墨在《“格”辨》中认为格的类型有8种,之后的论著中格的数量有所减少。
- ②名词的第三人称,女性,单数是可解释性特征,动词的时态是可解释性特征,可以保留。

## 参考文献:

- [1]徐杰.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菲尔墨.“格”辨[M].胡明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3]Greenberg J H. Language Universals [C].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III, Ed. Thomas A. Sebeok. The Hagu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6. (《语言的普遍现象》)
- [4]胡壮麟.语言学教程(修订版中译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5] Vergnaud J. - R. A Letter to N. Chomsky and H. Lasnik [C]//Freidin R, Lasnik H. *Syntax: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6]Chomsky N.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1.
- [7]Xu Jie. *An Infl Parameter and Its Consequences*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1993.
- [8]Chomsky N. A Minimalist Program for Linguistic Theory [A]. Hale K, Keyser J. *The View from Building* [C].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3.
- [9]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The Meanings of Case and the Study of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I Luo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Case, a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core concept in Syntax and one of the contemporary syntactic models with the most mature theory and the widest scope, has naturally received th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Case shows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grammatical systems. Even if in different stages of Formal Syntax, the syntactic connotation of case theory exhibits differences. Case has experienced from “morphological case” denoting nouns’ morphological changes to “semantic case” denoting seman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nouns and verbs, and to “syntactic case” denoting abstract syntactic places. Case theory in Formal Syntax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phases, from Case Filter and Generalized Case Filter to Case Features Check in Minimal Program. These cases with different syntactic meanings and expressions have emer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yntactic theories and, in turn, have an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syntactic theories. Combing these different meanings and connotations of case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precis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case theories.

**Key words:** cas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 基于 LDA 模型的高校科研管理主题演化研究

薛培军, 潘 宋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121)

**摘要:**从研究主题的角度出发,引入 LDA 主题模型,分析 2011—2020 年“高校科研管理”相关的期刊文献。结果显示,我国高校科研管理研究文献呈倒“U”形趋势,自 2015 年峰值后下降明显,研究力量有所减弱。研究主题随高校科研发展的要求发生承接和转化。研究主题的选择从研究的外部规律(注重高校的管理主体等)向重视内部规律(科研人员构成的科研主体及学术系统构成的科研载体)并举,从关注科技成果含量到与关注科技成果转化并重。研究内容从注重科研管理服务软指标转向经费、人员等硬条件,主题变迁的动因从关注考评指标、科研服务等单一因素促进向关注科研人员及其内在动机和激励等多元因素驱动。当前高校科研管理研究热点依次集中在创新、成果转化、经费管理、奖惩、人员激励和绩效评价等方面。

**关键词:**科研管理;LDA;主题模型;演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19

**中图分类号:**G64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106-05

当前关于高校科研管理的研究主要分为以激励手段和激励方法为主、以科研人员(教师)为主、以科研奖惩机制为主等几个方面。以激励手段和激励方法为主的研究主要是从不同的视角提出科研奖惩机制措施方面展开。孙桃<sup>[1]</sup>探讨了内、外两方面激励因素对科研人员的科研绩效的影响,并指出薪酬和创新是影响科研绩效的重要激励因素。张和平<sup>[2]</sup>认为高校薪酬水平及当地薪酬购买力对高校教师的科研生产力具有显著影响。以科研人员(教师)为主的研究主要是以人为主体。张海<sup>[3]</sup>呼吁为加强对高校科研人员人文关怀,为高校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科研数据规范化和标准化。熊立<sup>[4]</sup>通过调研大量高校科研人员的各方面信息,得出科研人员的科研绩效受到工作沉浸感的显著影响。刘宇文<sup>[5]</sup>认为目前高校科研外部奖惩机制缺乏创新是高校教师缺乏科研激情的主要原因之一。史冬波<sup>[6]</sup>以多起学术不端事件为案例进行分析,得出了科研不端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激励诱惑与奖惩机制不对称的影响。

现有研究对当前高校科研管理的发展和趋势涉及较少,本文从主题模型的角度出发,研究高校科研管理的发展主题,从总体上把握高校科研管理的研究脉络和发展动向。

## 一、研究方法 & 数据来源

### (一) LDA 模型

主题是由具有某领域特性的一系列专业术语组成,这些术语的组合能够表征一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向。从学术期刊的角度来看,科研管理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研究内容变化,表现为其研究主题的变化。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模型<sup>[7]</sup>是一种主题(topic)生成模型,是以文本—主题—词语的三层贝叶斯结构来实现文档中主题及词汇生成,能够挖掘出庞大语料库中隐含的主题信息<sup>[8]</sup>。LDA 模型认为文档由若干个主题以不同的概率组合而成,而主题是由若干个词语以不同的概率组合而成。从主题模型的角度来讲,每一篇文档都是词汇构成,而词汇由主题概率分布和词汇概率分部联合采样得到,其数学描述为:

收稿日期:2020-03-21

基金项目:2020 年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高校科研奖惩机制研究”(212400410161)

作者简介:薛培军(1962—),男,河南虞城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高校教育教学管理、机械设计研究。

1. 对于语料库  $D$  中的每一篇文档  $d$ , 依据服从于 Dirichlet 分布原则采样获取文档  $d$  中的主题分布  $\theta_d$ , 即  $\theta_d \sim Dir(\alpha)$ ;

2. 对于在每一个主题, 依据服从于 Dirichlet 分布原则采样获取主题  $z$  中的词汇分布  $\varphi_z$ , 即  $\varphi_z \sim Dir(\beta)$ 。

3. 根据主题分布  $\theta_d$  获得主题  $z_{d,j}$ , 再依据词汇分布  $\varphi_z$  获取词汇  $w_{d,j}$

重复上述过程, 即可获得一篇文档中的所有词汇。其中,  $D$  代表原始语料库,  $d$  代表第  $d$  篇文档,  $\theta_d$  是文档 - 主题概率分布,  $\varphi_z$  是主题 - 词汇概率分布,  $Dir(\alpha)$  和  $Dir(\beta)$  代表先验分布狄利克雷分布,  $\alpha$  和  $\beta$  代表模型的超参数, 是手动设置的常数,  $z_i$  代表第  $d$  篇文档的第  $j$  个主题,  $w_{d,j}$  代表第  $d$  篇文档的第  $j$  个词汇。在整个过程中,  $\theta_d$  和  $\varphi_z$  是隐含的参数, 一般采用吉布斯 (Gibbs) 采样方法进行参数估算。Gibbs 利用词汇和主题之间的后验概率, 间接估算参数  $\varphi$  和  $\theta$  的值。参数估算步骤如下:

1. 将主题  $z_i$  初始化为 1 到  $K$  之间的随机整数。 $i$  从 1 遍历到词汇总数  $N$ 。

2. 迭代循环。 $i$  从 1 遍历到  $N$ , 并给词汇赋予新的主题。

3. 估算  $\varphi$  和  $\theta$  值。分布收敛后, 保存样本, 将  $z_i$  的值作为训练成熟的数据。 $w$  表示词汇迭代一次的样本, 据此间接推断  $\varphi$  和  $\theta$  的值, 公式如下:

$$\varphi_m^{z=j} = \frac{n_j^w + \beta}{n_j^{(\cdot)} + V\beta'} \quad (1)$$

$$\theta_w^{z=j} = \frac{n_j^d + \alpha}{n_j^{(d)} + T\alpha} \quad (2)$$

其中,  $n_j^w$  表示词汇  $w$  被赋予主题  $j$  的次数,  $n_j^{(\cdot)}$  表示语料库中词汇被分配主题  $j$  的次数;  $n_j^d$  表示文档  $d$  中词汇被赋予主题  $j$  的次数,  $n_j^{(d)}$  是文档  $d$  中词汇数。

## (二) 数据来源

本文以来自中国知网的关于高校科研管理的期刊论文数据作为 LDA 模型的原始语料库, 进而挖掘出潜藏在学术期刊中的研究主题。根据 LDA 模型的输出结果, 对比分析不同年份的主题强度及主题内容的变化, 从而梳理出高校科研管理的研究脉络和趋势。

以“高校科研管理”为检索词, 收集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期刊论文数据, 时间跨度设置为 2011—2020, 在对检索结果进行精炼和筛选后得到期刊论文 2622 篇。鉴于期刊论文的结构性及文本内容的复杂性, 本文仅以对论文研究内容具有强表征性的

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作为原始数据, 并进行数据清洗。接着使用由 Python 编程的 Jieba 中文分词工具对每一篇文档进行分词。以一年为一个时间窗口, 将数据以文本文档的形式分布到对应的时间窗中, 文本中每一行词语序列代表一篇论文的分词结果。2011—2020 年, 我国高校科研管理研究文献呈倒“U”形趋势, 自 2015 年峰值后下降明显, 研究力量有所减弱。各时间窗口的文档数及词汇数见表 1。

表 1 各时间窗口中文本集数据情况

年份	文献数量	分词后词汇数
2011	234	53265
2012	238	50956
2013	288	61584
2014	298	65956
2015	316	72460
2016	279	66656
2017	274	64958
2018	247	59649
2019	248	54410
2020	200	45722
总文本集	2622	542351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

## 三、主题挖掘及结果分析

### (一) 主题挖掘

在进行主题挖掘之前, 需对 LDA 主题模型的参数进行设置。根据 LDA 模型应用中常用的设置, 这里设置参数  $\alpha = 0.5$ ,  $\beta = 0.1$ , 迭代次数  $item = 1000$ 。根据困惑度 (Perplexity) 评价函数确定了总文本集的最优主题数为 19。LDA 模型脚本以 Python 语言编程, 将处理后的期刊论文数据输入到脚本中, 得到 2622 篇期刊论文的文档 - 主题概率分布矩阵和 19 个主题的主题 - 词汇概率分布矩阵。通过对主题挖掘结果的分析与观察, 筛选掉 6 个无效主题。参照已有文献<sup>[9]</sup>的主题命名方法, 将保留的 13 个主题以其特征词汇的含义归纳命名, 并划分为“管理主体”“科研主体”“科研载体”三大类, 见表 2。其中, “管理主体”类的主题内容是关于高校的研究, 包含高校、创新、制度、改革四个主题; “科研主体”类的主题内容是关于科研人员的研究, 主要包含绩效、研究人员、激励三个主题; “科研载体”类的主题内容是关于科研的对象的研究, 包含学术、系统、经费、信息化、成果转化、科研项目等主题。

表 2 主题挖掘结果

主题分类	主题
管理主体	Topic 1: 高校, Topic 3: 创新, Topic 12: 机制, Topic 13: 改革
科研主体	Topic 7: 激励, Topic 8: 研究人员, Topic 9: 绩效
科研载体	Topic 2: 学术, Topic 4: 系统, Topic 5: 经费, Topic 6: 信息化, Topic 10: 成果转化, Topic 11: 科研项目

## (二) 主题强度演化

主题强度演化展示了相关主题在学术期刊中的研究热度,主题强度越大,则表明在当前时间段内该主题的研究热度越高。通过分析对比同一主题在时间轴上的主题强度变化,能够动态把握该主题的研究情况,对分析主题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主题挖掘结果中生成的文档-主题概率分布矩阵,给出了所有主题的概率分布情况,反映主题对文本的贡献度,亦即主题强度。本文采用的主题强度的计算方法<sup>[10]</sup>:

$$Q(Z_{t,k}) = \frac{\sum_{d=1}^{D_t} \theta_{d,k}}{D_t} \quad (3)$$

其中  $Q(Z_{t,k})$  表示当前时间片  $t$  中主题  $k$  的强度,  $\theta_{d,k}$  表示在第  $d$  篇文档中第  $k$  个主题的概率,  $D_t$  表示时间片  $t$  上的文档数量。

结合表 1 中各年份的文档数量及主题强度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总文本集中的主题在各个时间片上的主题强度。三类主题在时间轴上的主题强度变化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研究显示,我国高校科研管理主题随高校科研发展的要求发生承接和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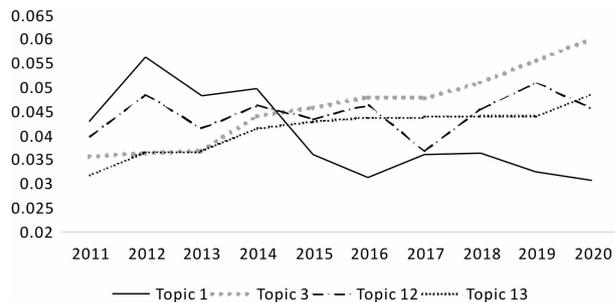


图1 “管理主体”类的主题强度变化

由图 1 可以看出,创新(Topic 3)和改革(Topic 13)的主题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在高校科研管理领域,研究科研管理创新和改革的热度持续增高;另外,受 2014 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影响,两个主题的主题强度都于 2014 年明显的大幅度上升。机制(Topic 12)主题的主题强度值保持在一个中等水平上,波动较大且无规律,这说明管理机制一直是科研管理领域的研究主题,也是提高科研质量和促进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高校”(Topic 1)的主题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结合 Topic 3 和 Topic 13 的整体上升趋势,说明在高校科研管理领域,对高校本身的研究逐渐转移到高校的创新和改革领域。

在图 2 中,绩效(Topic 9)的主题强度呈明显上升趋势,且强度值始终在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说明在科研管理领域,对研究人员的绩效评价一直

是研究热点,且研究热度不断上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科研绩效评价对科研人员的重要性。激励(Topic 7)的主题强度在波动中上升,这表明学术界在不断地探索管理学中的激励手段和激励机制对科研人员的积极作用,而近几年的主题强度不断上升且数值较高,说明激励手段对提高科研人员的科研效率和成果质量是具有正向作用的。科研人员(Topic 8)的主题强度波动不大,强度值也不高。三个主题的主题强度变化说明在高校科研管理领域,对科研人员本身的研究一直是重点,但是研究热度并不高,而对能够提升科研人员水平的激励措施和绩效评价则是研究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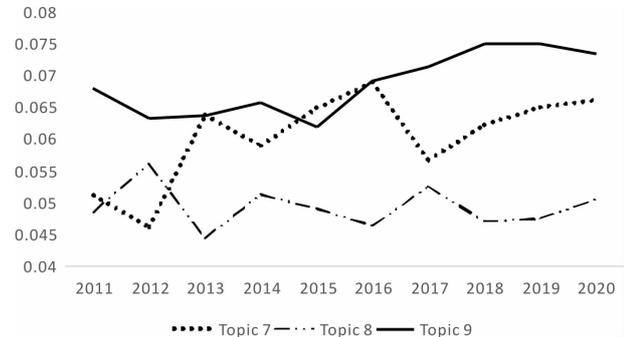


图2 “科研主体”类的主题强度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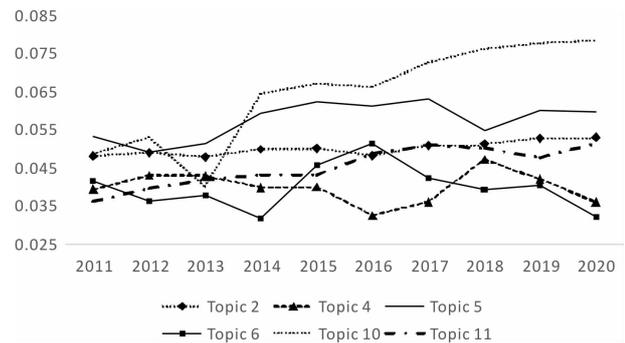


图3 “科研项载体”类的主题强度变化

在图 3 中,经费(Topic 5)的主题强度呈缓慢上升趋势,且强度值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表明科研经费一直是研究热点,经费支持是科研活动开展的基本支撑。成果转化(Topic 10)的主题强度值呈现不断提高的上升趋势,表明了学术界对科研成果的转化保持着较高的热度,而强度值从 2014 年陡增,也进一步说明经济新常态下对成果转化的高度重视和关注。Topic 2 和 Topic 11 的主题强度值处于中间水平,且波动较小,说明了学术活动和项目是科研的根本,也始终是高校科研管理的热点。系统(Topic 4)和信息化(Topic 6)的主题强度变化不大且数值较低,学术界对科研项目信息化和科研系统的关注度较低,而近年来的下降趋势和较低的主题强度数值,再加上 Topic 10 主题强度的持续走高,说明在两方面的热度正在逐

渐冷却,研究热点转移到了科研的成果转化上。

### (三) 主题内容演化

主题内容的演化必然表现为同一主题的特征词汇在时间片上的变化,而相邻时间片中具有演化关系的主题之间也必然会在内容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可以通过计算相邻时间片中主题内容的相似性来确定主题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分析主题内容的演化。为了更好地展现主体内容的动态变化,对表 1 中各个时间窗口的文本集单独进行主题挖掘,

表 3 2011—2020 主题挖掘结果

主题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Topic 1	管理	高校	项目	科研	科研经费	项目管理	创新	改革	科研人员	经费
Topic 2	服务	绩效	经费	项目	服务	成果	激励	创新	机制	人员
Topic 3	预算	学术	创新	学术	激励	经费	信息	管理体制	科研成果	创新
Topic 4	数据	系统	体系	教育	研究	社会科学	管理系统	项目管理	高校	改革
Topic 5	学院	科技	高校	制度	创新	协同	科研经费	人员	改革	高校
Topic 6	问题	信息	制度	科技	科研人员	控制	机制	成果转化	信息化	项目
Topic 7	教育	对策	成果	数据	制度	激励	分析	绩效	协同	绩效
Topic 8	指标	服务	系统	科研经费	思想	高校	科研项目	科研成果	科研经费	成果转化
Topic 9	部门	资金	学术	服务	绩效	教师	转化	数据	创新	标准
Topic 10			激励	转化	科研项目	创新	改革	科研经费	绩效	激励
Topic 11				激励机制	成果	机制	绩效	激励	激励	机制
Topic 12				创新			人员	放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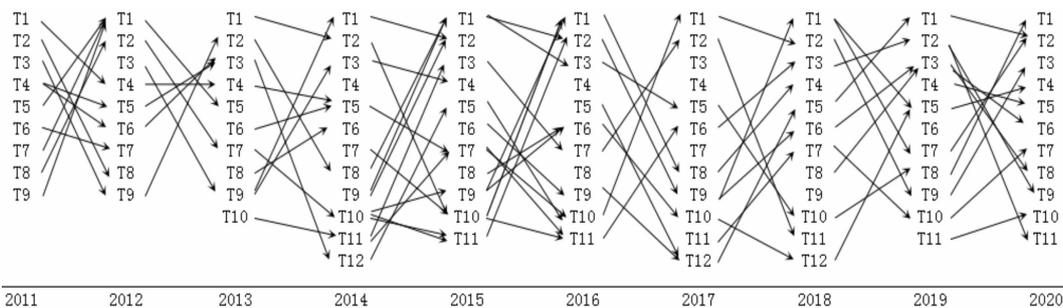


图 4 主题内容演化路径

结合图 4 及各个主题的特征词汇变化,对主题内容的演化做出如下分析。

1. 在“管理主体”类别中,研究热点由对高校本身的关注逐渐转变为对科研政策及奖惩机制的研究,又进一步向机制的创新、改革方向演化。2011 年主题 1、主题 5、主题 6 和主题 9 都是关于管理主体类的主题。2011 年的主题 1 逐渐演化为 2012 年的主题 4、2013 年的主题 4,到 2016 年的主题 11,最终到 2020 年的主题 11,特征词也经历了管理、系统化、体系、控制、完善、机制等的演变过程;2011 年主题 5 向下演变为了 2012 年的主题 1、2013 年的主题 5,然后主题中断,表明主题的研究热度大幅降低,其特征词也经历了高校、行政、保障等的变化过程。

2. 在“科研主体”的类别中,对科研人员的研究由评级指标、科研服务逐渐变为关注科研人员的情感思想、科研团队的协同效应,又进一步演化为对科

得到各阶段的主题内容,见表 3。由于每一个主题都是由若干个主题特征词构成的词向量,可以看成一篇文本,所以可以采用计算文本相似度的 WE - cos 方法<sup>[11]</sup> 计算主题间的相似度。根据相似度计算的实际情况,设定当主题相似度大于 0.8 时,认为主体间存在演化关系,反之则认为主题间无关联。根据演化规则绘制出主题内容演化路径,如图 4 所示。图中横轴代表时间窗口变化,纵轴代表主题,各时间窗口主题间的箭头代表主题的继承关系。

研人员的激励和绩效评价。2011 年的主题 8 是关于考核指标内容的主题,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演化为 2012 年的主题 2、2013 年的主题 7,到 2015 年的主题 8 和主题 9,最终到 2020 年的主题 7,主题特征词汇也经历了指标、控制、思想、绩效等内容的演变。

3. 在“科研载体”类别中,对科研项目研究重点由经费预算和科研数据逐渐转移到项目经费使用机制、项目科技含量,又进一步的演化为科研项目的创新、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2011 年的主题 4 逐渐转变为 2012 年的主题 5,2013 年的主题 3,到 2016 年的主题 10,最终到 2020 年的主题 3,主题词也经历了数据、科技、设计、探索、创新等的演变。2013 年的主题 1 是关于科研项目的内容,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转变为 2014 年的主题 2,2015 年的主题 10,一直到 2020 年的主题 6 和主题 8,主题特征词汇也经历了申报、科学、成果、创新、转化等的演变。

#### 四、结论

在管理主体方面,当前对高校的研究已经有对高校本身的关注逐渐转变为研究高校科研管理机制的创新和改革;在科研主体方面,由评级指标、科研服务过渡为关注科研人员的情感思想、科研团队的协同效应,当前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和绩效评价则变为热点;在科研载体方面,学术和科研项目一直是科研活动的根本,科研经费也始终贯穿着科研活动的全过程,而科研成果转化则成为当前研究的大热点。

在高校科研管理中,应注重高校、科研人员和科研载体的综合管理。在机制上注重创新性改革,提高成果转化率在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中的权重,要尊重科研人员的情感和实际情况,采取更加科学的绩效考核,以及有针对性的激励手段和措施,注重科研经费的精细化管控,建立起综合的、多主体的科研管理新机制,以更好地提高高校科研的质量和水平。

#### 参考文献:

- [1] 孙桃. 高校教师科研绩效的激励影响因素分析[J]. 上海商业, 2020(12): 96-98.
- [2] 张和平, 沈红. 薪酬水平对高校教师科研生产率的激励: 基于“全国大学教师调查”的实证研究[J]. 现代教育管

理, 2019(7): 84-91.

- [3] 张海, 刘蕾. 高校科研人员科研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新世纪图书馆, 2020(11): 57-64.
- [4] 熊立, 朱建斌. 高校科研人员工作沉浸感对科研绩效的影响: 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实证检验[J]. 科技导报, 2020(19): 94-102.
- [5] 刘宇文, 张鑫鑫. 从外部激励走向内部激励: 高校教师科研创新的动力转型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0(1): 16-20.
- [6] 史冬波, 周博文. 科研不端行为特征与治理对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披露科研不端行为的实证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3): 106-110.
- [7] 赵凯, 张峰. 基于北斗卫星系统的物联网网络层体系构架设想[J]. 计算机系统应用, 2011(5): 6-8.
- [8] 乔亲旺. 物联网应用层关键技术研究[J]. 电信科学, 2011, 10A: 60-62.
- [9] 李子彪, 张莉. 基于 LDA 模型的钢铁材料专利技术主题演化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0(24): 175-183.
- [10] 李湘东, 张娇, 袁满. 基于 LDA 模型的科技期刊主题演化研究[J]. 情报杂志, 2014(7): 115-121.
- [11] 谷重阳, 徐浩煜, 周晗, 等. 基于词汇语义信息的文本相似度计算[J]. 计算机应用研究, 2018(2): 391-395.

(责任编辑 许峻)

## On Topic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on LDA Model

XUE Peijun, PAN Song

(Zhengzhou Technic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12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topic,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LDA model to analyze the periodical literature related to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from 2011 to 2020. The result shows tha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decline trend, which has slowed down significantly since the number reached the peak in 2015,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research has weakened to some extent. The research topic has been carried on and trans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topic has shifted from the external law of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management subjects of universities, etc.) to the internal law (the research subjects constituted by researchers and the research carriers constituted by academic systems).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research content has changed from focusing on soft indicators such as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services to hard conditions such as funds and personnel. Furthermore, the motivation of the topic change has shifted from focusing on single factors such as evaluation indexes or scientific research services to focusing on multiple-layer factors such as researchers and their intrinsic motives and incentive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remain in the field of innovation,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fund management, reward and punishment, personnel incentive,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tc.

**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LDA; topic model; evolution

# 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实施调查与改革路径

——以《酒店市场营销》课程为例

陈一静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对高校酒店管理专业教师做调查,分析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课程思政实施过程所存在问题以及影响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效果的因素。以《酒店市场营销》为例,分析课程思政目标、德育教育元素及立足任课教师的课程思政成效提升措施。从学校层面,可以从政策制定、资金支持、奖评制度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成效;提升措施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2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111-04

## 一、高校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调查

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担当着主体角色,课程思政实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课教师自身的认知与素养。<sup>[1]</sup>笔者在全国高等院校酒店管理专业教师培训微信群投放问卷,进行酒店管理专业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调查,共收集来自全国不同高校问卷87份。

### (一)课程思政了解程度调查

把课程思政与教龄进行交叉分析,把教师个人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划分为“很了解,有过专门研究”“比较了解,但不透彻”“有一定了解,但不多”“不太了解”四个等级,对其进行分别赋值为“4、3、2、1”,根据作答结果,可知随着教龄的增加,对课程思政了解程度的得分也在增加,把教师的教龄分为5年以下、5—10年、10—20年、20—30年四个档,其得分分别是:2.0000、2.3532、2.7501、2.9398。各高校均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的主持人有职称或学历有所要求,而高校职称的评定必定以相应的教龄积累为前提,因此,在“项目驱动”引导下,更高职称的教师对课程思政教改研究更为透彻,年轻教师大多仅仅是了解了一些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推

进文件。至于何谓课程思政,71.43%教师的理解能够与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活动组织相结合,19.05%教师的理解仅存在于表层化、理论化,缺乏个人教学过程中对课程思政实施的深切感悟。

### (二)教学过程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调查

在此次调查中,所有教师在授课中都有课程思政的融入,教师自我评价所授课程思政元素较多融入的占33.33%,52.38%的融入程度一般,14.29%的融入程度比较少。在课堂上融入的思政元素位列前三的是:爱岗敬业、职业素养(47.62%);创新精神、奋斗精神(47.62%);热爱祖国、四个自信(42.86%)。而课程实施效果评价得分为3.524,在被调查教师中,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自我评价非常好的比例非常低,仅占4.76%,实施效果比较好的教师占比42.86%。课程思政实施效果与教师参与过的相关课程思政活动进行交叉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教师撰写课程思政建设大纲、撰写相关论文论著或参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研究等活动对教师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发挥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学习课程思政相关文件或参与相关培训的活动则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效果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收稿日期:**2020-04-15

**基金资助:**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能力本位导向’的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教学内容整合创新”(2019SJGLX510);2020年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样板课“酒店市场营销”(KCSZYBK202003)

**作者简介:**陈一静(1979—),女,河南南召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酒店管理、市场营销。

### (三)课程思政实施影响因素调查

课程思政开展中所存在的问题:66.67%的教师课程思政的融入生硬而表面化,42.86%的教师则是因为教学科研压力大导致开展课程思政时间不足,33.33%的教师则是不知道课程思政的成效,28.57%的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没有章法,不知道该怎么去做,23.81%的教师认为课程思政占用专业知识讲授时间。

对于影响课程思政建设质量的因素:76.19%的教师首选“课程自身的特点和性质”,“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施”和“教师自身思政素养及教学功底”并列第二,占被调查教师的61.9%,另有“学校激励及思政实施条件提供”占比57.14%，“学生的配合度”占比38.1%。

利用不同渠道积累相关课程思政建设经验和方法至关重要,被调查教师利用“相关主题报告或研讨”“观摩学习示范课程”“其他网络平台”三种方式最多。

为提高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被调查教师期望能够改进的措施:①组织更多的课程思政相关培训(80.9%);②开展课程思政教改教学研究课题(61.9%);③公布课程思政建设及实施的方案或指南,能够对教师发挥更明确的指导作用(57.1%);④通过课程群组建课程思政建设团队,进行专项研讨(42.8%)。

## 二、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改革

### (一)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改革思路

结合专业独特性、授课对象特点,顺应课程理论学习层次性、实践技能习得规律,立足教学内容,深挖思政元素,进行思政教育与教学模块的无缝对接、自然融合。

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改革的整体思路是:提炼课程思政元素,对授课内容进行梳理,将课程思政元素与知识点进行有机结合,结合对酒店管理专业教师和学生调查结果,设计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训练模块及教学活动,撰写课程思政框架下的《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教学大纲等教学资源库,从而达到对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的改革。

### (二)酒店市场营销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 1. 引导学生关注时事及行业发展

重大社会热点民众关注度高、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当代大学生必然的关注点所在。<sup>[2]</sup>抽取其中与酒店行业、营销理论及实践发展紧密相关的事件,在授课过程中或者第二课堂及时进行引入,培养学生打开眼界、积极关注时事及行业发展,提升其行业及热

点敏感度,锻炼其“理论分析——实践检验——理论总结与升华”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学

一家有品位、高品质、对顾客吸引力强的酒店必然是在其环境打造、硬件装修、服务流程、菜品菜式中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sup>[3]</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酒店产品开发、酒店品牌塑造、中国古代酒店业竞争中的商业价值观中等都有体现。在酒店市场营销授课过程中,深挖中国酒店业自古以来在发展、扩张、竞争、传承中的典型营销案例,提炼其中思政元素,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素质教育融于授课过程,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如,通过观看中华百年老字号餐饮企业的视频,从餐饮企业命名中的中华古诗词及历史典故的拓展学习,可以让学生感受“知情意行”的品格的精神;通过建国饭店发展及应对外来酒店品牌竞争的历史过程,让学生感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树立品牌强国的理念。

#### 3. 弘扬家国情怀

在酒店市场营销课程的授课过程中,针对“酒店市场营销环境”内容的讲述,组织学生对“2013年‘八项规定’对酒店行业的影响”的讨论,引导学生思考国家政策出台的背景与初衷,告诫学生不可过度关注个人利益,培养其大局观;组织对“2020年新冠疫情下的酒店困境及营销”的讨论,帮助学生树立与祖国同命运、与社会同发展。同时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运用专业知识为行业服务,为社会服务。真正实现学以致用行业用、社会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强化其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号召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懈奋斗。

#### 4.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市场营销宏观环境的经济因素讲解中,针对“收入”“支出”在基本概念及相关知识讲解之外,组织学生通过“国家统计局、河南省统计局及地方统计局”等官方网站,查找最近三年中国国民经济收入及支出结构、河南省及学生生源地城镇居民的收入及支出结构,询问自己家庭的收入及支出结构,从而对比差距,使学生理解父母之不易,懂得感恩父母。在对酒店消费者购买行为中“炫耀型购买动机”讲解时,带领学生分析网络上各种酒店消费的“炫耀晒图”“只追潮流、不顾个体差异”“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等消费现象,使学生懂得炫耀型、攀比性消费不仅导致个人价值观扭曲甚至腐化堕落;站在酒店企业未来从业者、经营者的角度,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引导顾客合理消费、打造绿色酒店,为创建节约

型社会贡献一份力量,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 5. 培养职业道德,养成职业情怀

酒店市场营销课程的应用性、实践性、技能性较强,为达成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授课过程中在灵活运用各类教学方法的同时必须对学生采取分组分工的形式进行,使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案例知识点挖掘、分析、解析,培养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形成团队意识、塑造与人探讨的协作精神。在“酒店市场营销环境调查与分析”部分,通过学生分工合作完成相关任务,培养其爱岗敬业、严谨负责、团结互助的职业精神;形成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诚实守信等的职业素养。在“酒店企业营销战略规划”部分,通过国内外知名酒店企业案例的分析,学生明白企业的初心和使命,在融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精神思政元素,鼓励学生在专业学习和今后的工作岗位上不惧困难、勇挑重任、报效祖国。

### (三)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教学成效提升措施

#### 1. 立足信息化技术,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

为推进课程思政的充分渗透,在引入重大社会热点问题时,可在课堂上直接利用图片、视频等资源为学生进行展示,避免纯文字或教师语言陈述的乏味。教师对行业专家在电视专题节目中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评讲、社会公众在抖音、快手、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的广泛关注与评论都应给予重视,除了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引入,还应该利用雨课堂、企业微信以及其他信息化教学平台为学生发布相应的讨论资料,既要有对问题讨论的热度又要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如,盘古七星酒店的“空中四合院”问题探讨、OYO酒店在中国的扩张等都能引发较好的思政讨论与引导。

对酒店市场营销课程中职业技能的训练,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平台,构建 OBE 引导下的教学模块,根据大数据信息采集及分析,为学生发布工作任务场景,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战略决策、团队合作、集体意识等能力和素养。

基于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酒店市场营销课程应该与酒店管理概论、餐饮管理、酒店公关与危机管理、酒店品牌建设与管理等邻近课程合作,共同打造教学“第二课堂”,利用雨课堂、微信群等平台发布教学案例探讨,组织学生到酒店行业进行岗位实践,从而实现学生对酒店管理专业课程学习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与综合应用,从而促使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更加的系统、科学有效。

#### 2. 以“学生为中心”改革教学活动组织

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抛开个人习惯,不能为图

轻松而“满堂灌”或教条式宣读思政条文,应该以学生为中心,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升课程思政有效性。如,组织学生进行酒店营销案例分析辩论赛、酒店营销策划对抗赛,带领学生参加“挑战杯”“‘尖峰时刻’酒店管理模拟大赛”等全国性赛事,从而使学生能够明确个人知识及实践的缺陷,激发其更加努力学习。在课堂上以项目为驱动,引入具有民族情怀或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酒店品牌,进行营销实践模块讲解,激起学生情感共鸣,使思政教育元素能够更加自然地与授课内容进行碰撞和融合。

#### 3. 以“四方评价+过程考核”改革教学评价与考核方式

学生学习成效应立足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结合课程任务、团队合作成果、酒店营销工作场景模拟、论述问答、期末考核等方式,综合评价学生成绩,对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进行科学有效的考核。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列入课程考核知识点,落实到课堂讨论、课后作业、课程实训中。并把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及时记录在案,形成课程思政过程性考核档案。

针对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采取四方评价模式:①学生德育获得感的自我评价。②授课教师课程思政元素实现度的自我评价。③教学督导评价,重点是思政教师对课程教学资源中思政内容的审查与指导,促使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作用的发挥。④同行评价。组织开展酒店市场营销授课教师与邻近课程教师进行思政研讨,采取不定时听课及教学活动参与等方式,及时监督与评价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的实施。

#### 4. 以“德育教育”为引导,重构教学资源

以思政教育和教学内容相结合为标尺,选择能够较好发挥德育教育效果的酒店市场营销教材。认真研读教育部思政教育指导要求,确立课程思政教育目标,提炼课程思政元素,在“德育教育”引导下,重建酒店市场营销的教学资源库,包括教学大纲、课程教案、教学 PPT、教学讲义、教学案例集、教学实训实习方案等。

### 三、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改革措施

#### (一)以课程为中心,组建课程思政团队

从学校层面,引导教师以课程群为中心,组建课程思政建设与研究团队。打破课程思政只紧盯一门课的局限,以学生德育素养高尚、职业能力提升为目标,共建专业课课程思政资料库,避免典型案例在不同课程反复出现而学生只能“瞎子摸象”而无法窥其全貌的弊端。尤其是对工作岗位的实习实训或者

模拟,更需要课程群拧成一股绳,利用同一实践活动设计或者信息化教学平台,使学生锻炼专业技能、强化思政意识,如此,既节省了教学经费投入,又能一定程度减轻学生学习负担。

(二)以项目为带动,促使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

高校教师除了教学,还需承担教科研任务。为促使课程思政的深入实施,学校应组织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类与思政教育相关的竞赛活动、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思政讲课大赛、教学设计大赛以及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带动全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热潮。

(三)以奖评为手段,提高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热情

对课程思政建设成效显著的课程、授课教师,应从教学效果认定、职称评定分值、职称职务晋升、教学工作量认定给予一定呈现;对于参与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思政竞赛、教师个人参与的思政相关赛事所取得的奖项,学校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或教学工作量认定。整体来讲,学校通过各类奖评手段,引导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上投入更多精力。

(四)以制度为保障,扫清课程思政实施障碍

学校应出台课程思政建设相关规定,包括课程思政建设方案或指南、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管理、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认定等,从而为教师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指明具体的操作方向,消除部分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时的迷茫。从制度上认可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所付出的努力,从而打消教师认为课程思政建设占用教学、科研时间的顾虑。

(五)以学校为平台,引入课程思政建设实战经验

从学校层面聘请课程思政建设丰富的专家对任课教师进行经验传授,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组织教师观摩课程思政示范课,鼓励教师参加校内外课程思政建设培训,组织专业相近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从而丰富任课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直观认识,促使其更加卓有成效地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

#### 四、结束语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在协同育人作用上的发挥,必然要求专业课授课教师在较高政治觉悟及全面政治知识的同时,需对授课对象拥有更为精准的把握,进而能够设计出更具针对性和卓有成效的授课方式。通过对不同年级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对课程思政认知、评价及需求的调查,酒店市场营销课程思政实施效果的提升首先要求授课教师构建课程知识与思政元素的关联,系统化设计思政原理在不同授课环节的恰当体现,通过多方式、重参与、强互动来激发学生对课程知识掌握的同时体会蕴含其内的思政教育。为营造课程思政实施的良好氛围,学校层面应该引导思政教育下课程组的组建、通过项目奖评激发教师课程思政实施的热情,制定制度和指导性文件为课程思政实施指明方向,搭建平台为课程思政实施经验学习与交流提供便利。

#### 参考文献:

- [1] 吕薇,金智学. 高校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缺失原因及对策初探[J]. 中医教育,2021,40(1):27-29,33.
- [2] 迟荣杰,韩天澍. 论重大社会热点事件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J]. 大庆社会科学,2020(6):137-140.
- [3] 胡良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新探:以市场营销课程为例[J]. 邵阳学院学报,2020(6):108-111.

(责任编辑 许峻)

##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ation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Path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lleges

——Taking the *Hotel Marketing* Course as an Example

CHEN Yij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eachers specializing in Hotel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ir cognition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obstacles affecting the promot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Taking the *Hotel Marketing* course as an example, the reform plan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een approved. T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for motivating teachers to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measure

# 新文科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探析

李彩萍

(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 大学英语作为一门面向全体高校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承担着立德树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重任。由于大学英语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弘扬人的价值,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体现了价值引领的育人导向,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势在必行。

**关键词:** 新文科; 大学英语; 课程思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21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1)03-0115-05

2017年,教育部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指出:“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sup>[1]</sup>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指出:在新文科背景下,创新是高等教育重中之重,要想应对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发展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工科与新医科、新农科交织交融、相互支撑,新文科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注入人文色彩,让科技的发展为人服务,“四新”为下一轮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深入的探索、引领以及支持,是未来国家繁荣兴盛的责任担当。新的社会发展新背景对外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探索建设“大外语”的改革思路、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大学英语教学不仅要培养同学们的外语应用能力、学习国外的精华,同时还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重大使命。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完善课程体系,解决好各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sup>[2]</sup>。

大学英语作为一门面向全体高校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同样承担着立德树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重任。2017年教育部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强调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需要有效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弘扬人的价值,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体现价值引领的育人导向,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势在必行。

## 一、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高校要打破领域行业等各自为战的局面……放大整体协同效应”<sup>[3]</sup>,大学英语课程也需要打破专业、课程的界限,将思政内容循序渐进、深入浅出地引入大学英语课程中。

大学英语作为高校必修课程之一,其教学资源绝大多数来自英语语言为母语的国家,教科书上的文章也基本带着英语母语国家所持有的价值观,我国高校学生在学习这些英语文章时,如果没有以坚

**收稿日期:** 2021-03-10

**基金项目:** 郑州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工程“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应用型本科大学英语课程分级教学模式构建”(ZZJG-B9019);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翻转外语混合式教学改革”(ZGJG2019081A)

**作者简介:** 李彩萍(1983—),女,安徽太和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大学英语和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定的理想信念作为检验标准,就特别容易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以致出现各种片面崇拜西方文化而无视甚或鄙视我们传统文化的现象,这对于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是一种莫大的背离。因此,大学英语教学过程有必要合理穿插进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大学英语课程学习有着正确的方向和指南,才能真正培养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在新文科“大思政”格局下,大学英语作为高校通识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融入课程思想政治元素是大势所趋。一方面,课程思政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其协同效应,使学生在两种语言和文化碰撞的环境中辩证地看待文化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课程思政的过程也是不断融入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还可以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价值观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学生对于外来事物的辨识能力也不断地增强。因此,大学英语思政课程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鉴于大学英语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特点,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一方面要强化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还要特别注重传统中华文化素养,让学生用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眼光去鉴别学习外国文化,培养学生批判性学习精神。众所周知,由于大学英语课程面向高校全体一、二年级的学生,其教学覆盖面之广、教学素材之丰富、教学间长跨度之大、教师与学生接触之多都是其他课程难以比拟的。由此可见,大学英语课堂是特别需要兼顾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课程内容,课程思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与否的重要标志。

## 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现状

### (一)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问题

首先,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在许多高校中仍旧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教师的思想觉悟不够高:一些老师对大学英语的课程思政内容有着刻板印象,把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混为一谈;一些老师觉得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角度难以挖掘,无法与课程内容相结合;还有些老师在授课过程中非常生硬地加入课程思政内容,导致课程内容枯燥乏味,严重影响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导入效果。

其次,我国高校的英语教学过程中,很多高校把英语的教学效果与四、六级,考研英语单科通过率联系起来。在英语教学中,教学效果的好坏往往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标准,大学英语教师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为了提高四、六级通过率,教

学过程中偏重于大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英语应试能力与考试技巧的培养,造成了东西方价值差异的区分,忽视了思政内容的输入,也忽略了对大学生整体人文素养的提升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

最后,没有思政元素的加持,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往往会偏向于强调英语语言知识和外国文化输入,忽视了文化输出的能力。曾经大多数高校的大学英语教材多主要强调学习地道的英语语言及文化知识,导致课堂上学生对西方文化了解较多,却对我华夏文明知之甚少,显然学生自身传统文化的薄弱限制了文化输出的可能性。此外,平时的学期测试中,无论是以前的期中、期末还是四、六级甚至是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考试内容基本偏重国外文化内容,我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方面的考试内容占比极低。片面强调单向的英语文化输入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感受到更多外国文化比重较大,从而产生文化交流中出现严重的不对等。为查漏补缺,讲好中国故事、培养文化自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势在必行。

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社会对于英语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明显,很多用人单位也把英语水平作为入职的必备条件。这一社会现象导致许多高校在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设置为应用型英语教学模式,过度追求短平快的英语教学技巧和方法,以适应社会功利化的发展。

### (二)学生明显的功利性学习动机

大学生在从小到大的学习过程中,由于不断地面对各种各样的英语考试: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乃至考博的过程中,都被灌输这样的理念——学好英语就能考个好学校,升入好学校就意味着好工作、好的收入以及好的前程。因此,学好英语的动力背后是巨大的功利性动机,把英语学习与未来的收入和工作画等号的时候,英语学习的纯粹性就越来越少了。

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4%的大学生由于兴趣爱好而喜欢英语学习,有34%的大学生为了考取英语四、六级证书后,可以继续研究生或者博士的深造学习,56%的大学生单纯是为了将来找工作时作为一个有力的敲门砖,换取一份高薪的工作。

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如何将英语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切实发挥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的协同效应,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水平、人文素养和认知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师必须认真思考和面临的当务之急。

## 三、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应对策略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下,课程思政尤其是大

学课程思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要想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又有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每一个大学英语教师都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也都肩负着重要的课程思政责任。如何探索构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如何应对全新的课程思政策略,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反思当前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问题,本文拟从以下几个视角探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应对策略:

### (一)教师要深刻探索课程思政教学理念

首先,作为高校英语教师,需要高屋建瓴,有大格局、家国情怀。

面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这一新课题,对大学老师的课堂教学提出了新挑战,因为课程思政的导入要求大学英语教师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水平,同时也要具备深厚而扎实的理论教学水平,通过理论学习和时政关注,大学英语老师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对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观察、感悟和体验。这一系列的内容要求大学英语教师在不断探索专业知识领域,还要提升自己的政治理论学习,尤其是深入领会党的大政方针,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高校需要培养的是有国际视野、有温度、有担当、有家国情怀的国际化人才。面对新时代立德为本的教育理念,高校教师要积极转变教育思想,保持思想觉悟与理论水平与时俱进,不断提升道德修养,努力做到以身作则、行为世范,要把大学英语课程目标设置的更有温度、更有深度、更有政治敏感度。教师在人文尤其是我国国学、传统文化方面的底蕴越深,文化自信也就越能够体现的具体生动。教师本身通过言传身教,就足以在思想、情感、审美等方面给予学生春风化雨的熏陶和感染。学生不是被生硬的说教教育出来的,学生是根据身边的模范和榜样而不断模仿出自己未来的走向。

当然,教师通过自身的积极主动性和集体备课的集思广益优势,通过不断在线资料搜集、线下集体探讨来领悟和掌握思政教学目标的语言素材,才能更好地把课程思政与课程内容相融合。例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教学中穿插一些类似最新的时事要闻,不仅有利于课程内容的延展,同时也把其中一些语言知识和翻译技巧进行了巧妙的解析。课程思政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的课题,需要高校给任课老师提供高质量的输入保证,例如,学校可以通过开展思政课程学习培训给教师聘请国内专家、学者不定期地进行宣讲、培训、探讨和交流,为大学英

语思政团队开展研究、发布学术成果提供有力的保障。

其次,深挖教材内容,巧妙引入思政教育。

大学英语是一门跨文化交际的课程,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文化的交融碰撞。2017年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内容当中着重提到了“思想性”。可见大学英语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务之急。《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指出:将大学英语课程目标分为基础、提高、拓展三个级别,每个级别都对听说读写有着不同的要求,在满足这些要求的同时,大学英语教学还需要实现课程思政的教育目标。新文科教育背景下,大学英语的课程思政要求教师在完成专业授课知识的同时,把课程教学内容与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相挂钩。正确的价值观包括两大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责任、义务、群体、和谐。通过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帮助学生建立“四个自信”;同时,增强大学英语教学的思想性和问题意识,即增加大学英语教学的时代性、实效性、思想性。<sup>[4]</sup>为了增强大学英语教学的思想性和问题意识,必须要关注国内外时事政治,才能更好地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的时代性、实效性、思想性教育。要想达到这一效果,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1. 从现有教材入手,每一本教材内容都有自身待发掘的思政元素,作为大学英语的老师,需要时刻关注课文内容与我国文化相衔接的点,巧妙地导入模块化课程思政。以新视野第三版《大学英语一》第四单元为例——Heroes of Our Time 为例,可以结合疫情期间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真实的例子引出文章的主题——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这种新闻时事的抓手往往能第一时间引起学生的兴趣,从而引导学生思考身边那些爱岗敬业的平民英雄,他们虽然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但却是值得歌颂和学习的英雄。

2. 根据每个单元的相应主题,大学英语教师可以从学习强国里找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时效性新闻、报道、视频等素材,组织学生就某一主题展开探讨、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引导,让学生自己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现实意义,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三观。比如:新视野第三版《大学英语三》第一单元主题是:When work is a pleasure,可以结合《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今日中国》(China Today)里面的年轻人工作故事展开,在这个喧嚣和浮躁的社会里,引导学生树立脚踏实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的匠人精神非常必要,在自己的领域内调动自己的积极主动性,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专注于本职工作不仅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更多的是做这一项工作带来的满足和幸福感,成就感和满足感又让我们在工作中找到归属感并滋生出更多的工作热情,形成良性循环。

最后,利用好信息资源,形式多样地开展课程思政。

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深化,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从以往的传统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模式,经历多媒体的教学模式改革,再到如今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变革,以及2020年初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而产生的全面网上在线学习模式转换,网络时代已经渗透到教学的各个方面。无论课堂的形式如何改变,教师的引导仍然必不可少。

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课前教辅资料可以通过翻转课堂、在线学习让学生提前预习并准备课堂讨论,让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可以以更加丰富多样的活动展开二语语言习得。大学英语教学课程每一节课的主题可以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给学生生动形象的人物故事,引导学生思考、探讨并得出结论,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从而形成正确的“三观”构建。大学英语教师授课过程中,经过不断尝试摸索,充分利用第二课堂、翻转课堂、钉钉课堂、云课堂等一些有效的教学平台给学生共享更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素材,把思政教育元素合理穿插进入教学内容,通过利用小组讨论、辩论的模式,激发学生参与意识,在讨论过程中不断地深化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过程的有效性不仅让学生在第一课室里实现学生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全面提升、国学文化的巧妙引入,还可以组建“第二课堂”,让课程活起来。以我校为例,公外教研室每年在秋、冬季节都会抽出一些老师负责,在全校范围内发动、指导学生参加教学竞赛活动;有效利用“外研社杯”英语演讲、写作、阅读挑战赛等一系列机会,组织学生参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匹配的选题,让学生在演讲、写作、阅读、过程中,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洗礼。

## (二) 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

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sup>[5]</sup>少年强则国强,有着独立人格、正确价值观的大学生是我们未来繁荣昌盛的固国之本。大学阶段意味着一个人走向社会前的准备阶段,大学生不仅要进行知识文化的继续学习,还要在思想、道德、人格方面不断完善,为正式步入社会,成为国之栋梁做好最后的准备。

宏观上,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大学阶段的教育目标是促进人的思想、道德与人格方面更为全面的发展。立德为本,国家目前大力提倡的课程思政就是将德育置于课程目标之首,引导学生在大学阶段倡导并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强调基于省思之后的笃信和理论自觉之上的践行,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理论水平,提高大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学习知识以外,注重鼓励大学生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有追求、有涵养的人。高校也可以发挥自身的地理、人文、学科研究优势、社会网络资源等各个方面的育人功能,最大限度创造条件,激发大学生的自主创造活力,将学生培养成专业知识能力强、身心健康、品格高尚、审美高雅的新时代好青年。

微观上,老师作为引导者,可以发动学生采用小组活动的方式课下收集国内外时事进行英文时事教育。比如,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学生可以利用课堂活动节选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英文版,从时事点评中入手中国特色词汇的英语表达,逐步探讨报告中涉及的新时代话语的英文翻译方式,这一过程由教师引导,学生把控,大学英语的自主时事学习可以由易到难,层层深入。通过解读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分析,学生自己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思想教育。同时,老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拓宽视野,以课外讨论的形式推荐美国探索频道播出的大型纪录片《习近平的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China: Time of Xi*),学生可以从英文视角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我国为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系统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及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强化,我国的大国崛起也一定能增强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此外,BBC录制的纪录片“*Chinese New Year 2016*”(《中国春节》)、“*The Story of China 2016*”(《中国故事》),以及国家地理播放

的纪录片“*China from Above*”(《鸟瞰中国》)等,也可以作为让大学生课堂学习和探讨的内容,用英文讲中国文化,不仅可以培育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更深厚的理解与认知,还可以激发大学生传承我国优良文化的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意识,从而产生文化自觉,在具体教与学的过程中,体现出大学英语教学与课程思政的水乳交融,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 四、结束语

高校应努力构建课程思政的育人大格局。这一育人大格局,关键在于明确立德树人的根本培养方向;核心在于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协调前行;在继续巩固思政课程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的基础上,推动课程思政广覆盖,赋予专业课程价值引领的重任,并进一步提升和改善各种专业学科的育人成效。

课程思政这一别出心裁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式,打破了传统思政教育观念的禁锢,化有形于无形,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出现在每一科目的教学设计过程中。它不仅拓展了教学内容,还创新了教学载体,通过发掘教材内容与思政内容有机融合实现立德树人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并教育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主题,高校

英语教师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不仅在给学生进行大学英语知识的传道受业解惑层面不断精进,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强化课程思政的意识形态功能,更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实现大学英语课程真正培育有国际视野、有家国情怀的引导教育功能,从而为国家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参考文献:

- [1]张东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有关情况[EB/OL]. [2019-12-17].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20171206/sfcl/201712/t20171206\\_320713.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20171206/sfcl/201712/t20171206_320713.html).
- [2]张润杰,齐成龙.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N].人民日报,2020-02-20.
- [3]朱飞.协同学视阈下的高校多元协同创业教育研究[J].高等工程研究,2016(5):39-43.
- [4]梅强.以点引线以线带面:高校两类全覆盖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育,2018(9).
- [5]安秀梅.《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功能研究[J].教育文化,2018(11):12-13.
- [6]陈红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J].智库时代,2018(51).

(责任编辑 许峻)

## An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New Liberal Arts Education

LI Cai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College English, as 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for all college students,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educating people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educating people in all aspect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instrumentality and humanism in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it is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to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content, promote human values,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embody the value-oriented education. Theref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is imperative.

**Key words:** China's New Liberal Arts Education; College English; core socialist values

# 核心力量训练在大学生 田径运动员训练中的应用研究

——以400米项目为例

赵敦富

(河南省体育局 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河南 郑州 450012)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实验研究等方法对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20名田径400米项目运动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训练方法后,男子400米平均成绩加快了1.8s,立定跳远平均提高了0.15米;实验组采用核心力量训练方法后,男子400米平均加快了3.8s,立定跳远平均提高了0.29米;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后的结果对比,实验后实验组的男子400米平均成绩比实验后对照组快了1.9s,实验后实验组的立定跳远平均成绩比实验后的对照组立定跳远平均成绩多了0.15米。结论:男子400米运动员采用传统的力量训练方法也能提高400米及立定跳远成绩,但效果不是很明显;男子400米运动员采用核心力量训练后,400米和立定跳远成绩显著提高;实验组采用核心力量训练和对照组采用传统力量训练,两者400米和立定跳远成绩都有所提高,但实验组提高的幅度更大一些。

**关键词:**男子400米运动员;核心力量训练;实验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22

**中图分类号:**G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120-04

核心力量训练是提高运动员专项体能素质的重要方式,在众多体育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400米作为体能主导类速度性项目,对运动员体能素质有很高的要求,对运动员进行核心力量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就400米运动员来说,如何提高其竞赛成绩,奠定好良好的体能基础与技战术基础,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在男子400米运动员训练中引入核心力量训练,对比分析传统力量训练与核心力量训练的差异,通实验法探究其可行性,以及量化核心力量训练对运动员体能、技能的改善为训练队的指导人员提供参考。

##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以核心力量训练在大学生田径运动员训练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对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男子400米运动员核心力量进行实验研究与分析。

### (二) 研究方法

#### 1. 文献资料法

以“核心力量”“男子400米”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中国权威文献网站检索文献,经筛选,下载相关度较高的文献45篇,其中期刊文献35篇,硕士论文10篇,通过精读部分文献对核心力量训练以及男子400米训练的特征有初步理论了解之后,整理出研究的基础理论。

#### 2. 专家访谈法

在对核心力量训练以及男子400米的训练有一个初步的理论认识以及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试验方案之后,向田径专业的专家交流,向专家坦诚自己的想法以及实验的设计,对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梳理,有选择性地对自己的理论基础以及思维框架进行修改,得到最终可实施的框架基础。

#### 3. 逻辑分析法

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实际实验对象的选

收稿日期:2020-04-20

作者简介:赵敦富(1975—),男,山东青岛人,河南省体育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中级教练员,研究方向:运动训练。

择以及实验对象可供使用的外部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试验方案,保证实验方案符合逻辑,使实验能够顺利地进行,构建研究开展的基本思维框架。

#### 4. 实验法

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田径队随机抽取 20 名处于同等水平的男子 400 米运动员,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10 名运动员。在 2019 年 11 月 20 日—2020 年 1 月 24 日之间展开实验组和对照组系统地实验对比研究,其周期为 8 个星期。其中一组运动员采用核心力量训练方法作为日常训练方案作为实验组,另一组采用传统力量训练作为训练方案作为对照组,两组实验在实验地点、实验进行的时间、实施方案的教练水平均采用一样,并且在实验进行的全过程中不告诉运动员这是在做实验<sup>[1]</sup>。进行为期 8 周的训练,在实验前后分别对两组运动员的各项指标进行测验,实验结束后对两组运动员的前后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对照组在训练的过程中以传统的力量训练为主,并且在训练计划的制定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训练方法,以此保证训练的有效进行,而本次实验借用了河南省田径队传统训练的方式,并依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合理的训练方案,此方案在专家认可的基础上开展<sup>[2]</sup>。

实验组以核心力量训练为主,实验是分 4 个阶段进行的,每个阶段时长为 2 个星期,整个实验过程持续 8 个星期。训练的原则遵循由简单到复杂,负荷强度由小到大。整个训练计划过程中的阶段和内容的安排均是参考专家的科学的研究,并结合有关方面的理论书籍,以此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实验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适应性练习,从事瑞士球上一些静力性的基础训练,以此来达到躯干深层的小肌肉群体的增强作用<sup>[3]</sup>。实验的第二阶段:采用的是利用一些不稳定的条件来克服体重的训练,这个阶段的训练强度明显大于第一阶段,进一步加大了对躯干肌肉的刺激力度。实验的第三阶段:主要是借助瑞士球和实心球来开展训练的,在瑞士球上训练可以增强核心肌肉群的协调配合能力<sup>[4]</sup>。实验的第四阶段:这个阶段训练的和之前训练的作用相似,只是力量和强度明显增大,主要目的是发展运动员的核心爆发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核心力量。具体训练安排及内容见表 1。

如果实验过程中运动员出现不适或者无法完成相关动作,可以适当降低运动负荷和训练难度,并对间歇和休息时间适当进行调整,以此保证训练的质量,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sup>[5]</sup>。

通过对相关专家的咨询和访谈,对测试指标展开的讨论和分析,并对每位专家的评比结果进行了记录,最后统计发现,多数专家认为测试指标应为 400 米、立定跳远等项目,其他的例如抛实心球、单腿跳、俯卧撑也有涉及,但是比例较少,不作为本次测试的范围<sup>[6]</sup>。

表 1 实验组核心力量训练的内容及过程

训练阶段	人数
实验组第一阶段	双手撑地双脚夹瑞士球 瑞士球上侧身单手支持 瑞士球上双肘支撑 瑞士球上单腿挺起
实验组第二阶段	瑞士球上完成俯卧撑动作 瑞士球上完成仰卧起坐动作 瑞士球上完成背起动作
实验组第三阶段	瑞士球上携带实心球做仰卧起坐 瑞士球上携带实心球做背起 瑞士球上携带实心球做俯卧撑
实验组第四阶段	拉弹力带阻力跑 拉弹力带阻力高抬腿 持哑铃冲刺跑 平衡垫持重快速抬腿

##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 (一) 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原始平均成绩对比分析

实验前的原始指标成绩是证明实验组和对照组是否水平相当,只对相同的水平的运动员进行实验,其结果才有一定的意义,其结论才有一定的说服力<sup>[7]</sup>。

表 2 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指标	实验组(n=10)	对照组(n=10)	差别
400 米	58.01s	58s	0.01s
立定跳远	2.56m	2.55m	0.01m

由表 2 不难看出,实验组实验前 400 米的平均成绩为 58.01 秒,对照组实验前的 400 米平均成绩为 58 秒,两者差别 0.01 秒,而实验组实验前的立定跳远平均成绩为 2.56 米,对照组实验前的立定跳远平均成绩为 2.55 米,相差 0.01 米,因此实验前两组指标成绩相差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不影响实验的正常进行。

### (二) 对照组实验前后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对照组实验前后的指标平均值的对比,是反映实验效果的形式,如果实验前后有关指标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实验对测试指标起不到促进作用,如果指标得到增强,证明施加的因素有利于测试指标的提高<sup>[8]</sup>。

表 3 对照组实验前后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指标	对照组实验前(n=10)	对照组实验后(n=10)	差别
400 米	58s	56.2s	1.8s
立定跳远	2.55m	2.7m	0.15m

由表3不难看出,对照组实验前的400米平均成绩为58s,实验后的400米平均成绩56.2s,比实验前快了1.8s,而对照组实验前的立定跳平均成绩为2.55米,实验后的立定跳远平均成绩为2.7米,比之前远了0.15米,因此可以得出,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训练方法,其400米和立定跳远成绩有所提高。然而,在实验过程中,对照组采用的传统训练方法对男子400米运动进行训练,400米成绩和立定跳远成绩有所增加,这是符合青少年体质发展规律的。当前运动生理学的研究学者指出,人的体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了加强的趋势,特别是青少年时期效果显著,出现了增长幅度大、发展速度快的特点。大学生是力量发展的特殊时期,同时也是力量发展的敏感时期,一旦训练方法不当,就会带来一定的运动成绩下滑。一般而言,人们成熟以后,力量的增长就进入了稳定时期。此外,运动训练的本质就是由刺激—反应—适应的完美过程,所以,只要是合理的、科学的训练方法都会对体质和运动成绩带来提高。对照组的400米和立定跳远成绩的提高,也说明了传统的力量训练并非违背训练的原则,也是有益于力量训练的<sup>[9]</sup>。

### (三) 实验组实验前后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实验组实验前后指标平均值的变化是反映核心力量训练是否对400米起到促进作用的有效证明,也是本研究的重点<sup>[10]</sup>。

表4 实验组实验前后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指标	实验组实验前(n=10)	实验组实验后(n=10)	差别
400米	58.1s	54.3s	3.8s
立定跳远	2.56m	2.85m	0.29m

依据表4发现,实验组实验前的400米平均成绩为58.1s,实验组试验后的400米平均成绩为54.3s,其中400米加快了3.8s,而实验组实验前的立定跳远成绩为2.56米,实验组实验后的立定跳远成绩为2.85米,比实验前提高了0.29米,因此可以说明,核心力量训练能够有效提高男子400米运动员的400米成绩。然而核心力量训练是当前新兴的训练方法,查阅资料发现,在经过国家队筹备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过程中也证明了,核心力量训练对运动员的运动成绩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一些专业的运动队多是采用核心力量训练和传统力量训练相结合的训练方式,而这次实验也充分证实了核心力量训练的科学性,并进一步完善了运动员的核心力量训练的体系。

### (四)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后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实验组与对照组试验后的指标平均值对比,是

分析核心力量训练是否高于传统力量训练的有力证据,也是鼓励训练队重视核心力量训练的理论支持<sup>[11]</sup>。

表5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后的指标平均值情况

指标	对照组实验后(n=10)	实验组实验后(n=10)	差别
400米	56.2s	54.3s	1.9s
立定跳远	2.7m	2.85m	0.15m

由表5统计发现,实验组试验后的400米平均成绩为54.3秒,对照组实验后的400米成绩为56.2秒,实验组实验后的400米成绩比对照组实验后的400米成绩快了1.9秒,而实验组实验后的立定跳远成绩比对照组实验后的立定跳远成绩多了0.15米,因此可以说明核心力量训练有助于男子400米运动员运动成绩的提高,并提示田径训练队教练员合理运用核心力量训练,从而加快男子田径运动员运动技能的不断提升,为国家培养一批优秀的田径运动员<sup>[12]</sup>。

## 三、结论与建议

### (一) 结论

1. 对照组通过传统的力量训练,发现男子400米和立定跳远都有所提高,400米成绩提高了1.8s,而立定跳远成绩提高了0.15米,虽然提高不是很大,但对于男子400米运动员来说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

2. 实验组通过为期8周的核心力量训练,发现400米和立定跳远成绩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中400米成绩提高了3.8秒,立定跳远成绩提高了0.29米,可以说是有质的飞越,显然核心力量训练是有益于男子400米运动员运动成绩提高的。

3. 实验发现,实验前的实验组和对照组的400米成绩和立定跳远成绩几乎没有差别,而实验后的实验组和对照组相比于实验前的成绩都有提高,但实验组的成绩提高更多一些。由此说明,传统的力量训练方法固不能缺少,但是更多的是应该注重核心力量的训练。

### (二) 建议

1. 虽然传统的力量训练方法对男子400米运动的运动成绩提高作用不是很大,但仍然不能忽略传统力量训练的练习,而青年男子是身体素质快速发展的时期,传统的力量训练可以有效改变肌肉力量的薄弱状况。

2. 核心力量训练是训练核心肌肉群的有效训练方法,对方法和技术要求非常严格,而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教练员多是在基层的体育院校毕业或者在职参加培训,因此对核心力量训练的指导有所欠缺,学

院应多引进高水平教练员,从而对男子 400 米运动员进行科学的指导。

3. 核心力量训练可以有效对核心肌肉群进行锻炼,而核心肌肉群处于躯干的位置,长期坚持核心力量训练,而不进行传统的力量训练,整体的肌肉群就会出现不协调的现象,因此,应合理地把传统力量训练和核心力量训练相结合,才能达到突出的训练效果。

#### 参考文献:

[1] 陈杰. 男子 400 米跑速度耐力训练方法研究[D]. 成都:成都体育学院,2018.  
[2] 丁洁琴. 浙江省优秀男子 400 米栏运动员全年训练计划的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2017.  
[3] 张硕,李凯华,马冀飞. 关于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核心力量训练的研究[J].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7(10):169.  
[4] 杨祥红,王正磊. 在军校引入核心力量训练重要性的研究[J]. 体育世界(学术版),2017(7):68-70.  
[5] 姜来. 哈尔滨工业大学男子 400 米跨栏运动队赛前训练

优化研究[D].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7.  
[6] 卢卓. 中韩速度滑冰短距离项目专项体能训练的比较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7.  
[7] 阮青松. 越南女子乒乓球后备选手专项体能核心素质训练方法研究[D]. 北京:首都体育学院,2017.  
[8] 边雨霏. 江苏省女子现代五项队运动员备战第十三届全运会冬训期的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2017.  
[9] 王茜. 核心力量训练对平衡能力和核心稳定性影响的实验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2016.  
[10] 李小龙. 我国优秀男子 400 米运动员李小龙备战 2015 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赛前训练研究[D]. 成都:成都体育学院,2016.  
[11] 李天奇. 高校男子跳远运动员实施功能性力量训练的实验研究[D]. 牡丹江:牡丹江师范学院,2016.  
[12] 常鹏丽. 我国优秀男子 400 米运动员常鹏本区间性多年训练研究[D].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6.

(责任编辑 许峻)

##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re Strength Training in the Training of College Student Track and Field Athletes

——Taking the 400m Event as an Example

ZHAO Dunfu

(Henan Athletics Administration Center, Zhengzhou, Henan 45001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20 athletes running track and field 400m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are experimentally studied by using literature, expert interview, logical analysis,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other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 shows that after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method, their men's 400-meter average performance increased by 1.8s, and the standing long jump increased by 0.15 meters on average; afte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the core strength training method, their men's 400m average performance increased by 3.8s and the standing long jump increased by 0.29m on average.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compared. It shows that the men's 400m performanc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1.9s fas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anding long jump performanc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0.15m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It draws the conclusion as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strength training methods for men's 400m athletes can als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400m and standing long jump, but the effect was not very obvious; after the core strength training, athletes' 400m and standing long jump performance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re strength training us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raditional strength training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can both improve the 400-meter and standing long jump performance was improved, bu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roved even more.

**Key words:** men's 400m athletes; core strength training; experimental study

# 功能性训练干预下拉丁舞运动表现、专项动作及FMS分值特征的研究

丁利荣

(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体育舞蹈作为难美项群项目,在竞赛规则、评判标准、专项动作、负荷强度等方面都对力量及体能训练方法提出了新要求。对该领域学术关注度存在的缺失与错位,导致训练实践活动缺乏理论指引及方法操作。鉴于此,通过对拉丁舞专项20名男女大学生(实验组、对照组),分别实施功能性训练与传统训练干预,利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测试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的质性描述与量化推断,研究发现:1. 拉丁舞动作技术呈现出高度动作协调性、动作发力以爆发力为主、动力链及力量传递、髋关节运动为主等特征。2. 依据功能性训练竞技表现模型理论,通过制定的阶段性训练计划、拉丁舞专项技术动作构成及组合、专项课训练内容及方法,实施的9周功能性训练干预能够显著提高FMS分值与运动表现水平。3. 肯德尔相关分析表明FMS分值与拉丁舞专业学生运动表现呈现显著性相关,支持FMS预测运动损伤及表现的过往研究观点。4. 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干预前实验与对照组FMS分值未见显著性差异,总体表现为腰腹及臀部躯干支柱力量缺乏、下肢及踝关节稳定性较差、身体两侧完成动作不完全对称。5. 两个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运动干预前后实验组、对照组各自FMS分值都有不同程度提高(除去对照组的过栏跨步、躯干旋转稳定性)。6) 专家问卷调查发现实验及对照组运动表现都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实验与对照运动表现提升水平呈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拉丁舞;功能性动作筛查;运动表现;运动干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3.023

**中图分类号:**J7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3-0124-05

## 一、问题提出

区别于同场对抗、隔网得分类等项群项目,体育舞蹈属于技能-难美项群项目,其运动表现水平与竞赛成绩高低依赖裁判员的主观印象及评判打分。动作质量包括通用性动作、风格性动作和动作流动性等,其训练领域存在专项动作质量粗糙、运动损伤频繁发生、体能水平难以支撑技术及运动表现持续提升等诸多问题<sup>[1]</sup>;过往学者研究较少涉猎体育舞蹈专项力量、体能训练等诸多领域,导致体育舞蹈训练环节诸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理论启蒙及方法指导<sup>[2]</sup>。近年来,一方面以文化娱乐与健身健美为特征的体育舞蹈在群众业余体育活动中蓬勃发展,另

一方面一批商业化、职业化为特征的经典赛事历久弥新。国内体育舞蹈学术研究总量偏少,研究主题倾向于课程建设与教材教法、民舞演变与文化诠释、美学鉴赏与价值考究、现状调研与社会调查,其中涉及隶属舞种专项训练及运动表现的文献资料凤毛麟角。上述情况导致体育舞蹈理论研究滞后、学术热度锐减、主题方向趋同。

近年来,高频次、高强度的商业化职业化竞技比赛层出不穷。一方面对力量及体能储备、延缓运动疲劳及减少损伤等方面提出了保障要求;另一方面竞赛规则及裁判执法对动作难度、完成程度、艺术表现力等方面也提出了质量要求。国内教练依旧过度

收稿日期:2020-04-07

作者简介:丁利荣(1971—),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

依赖芭蕾舞及现代舞训练手段、长期专门化教条训练导致肌肉功能局限、动作代偿及力量不对称、难于兼顾动作稳定性与灵活性、力量—协调—柔韧性。上述情况需要教练员重新审视对体育舞蹈专项特征的认知,转变传统训练理念及方法。特别是面对运动员竞技水平及群众欣赏水平的不断提升,更应挖掘体育舞蹈规定动作学习、专项技能习得、力量及体能训练等规律。而由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提出最佳运动表现训练模式,搭配核心肌群的训练计划,能够显著改善动作控制的效能和提升身体适能的能力<sup>[3]</sup>。面对运动员竞技水平及群众欣赏水平的不断提升,目前,部分教练员及运动员针对该项目的专项特征及竞技制胜规律,尚未制定相应的单个动作及动作组合训练方法及模式,导致在比赛中难以高质量完成规定动作,影响运动表现及艺术表现力。高水平的比赛一方面对力量及体能储备、延缓运动疲劳及减少损伤等方面提出了保障要求;另一方面竞赛规则及裁判执法对动作难度、完成程度、艺术表现力等方面也提出了质量要求。若过度依赖传统教条训练手段易导致训练导致肌肉功能局限、动作代偿及力量不对称、难于兼顾动作稳定性与灵活性、力量—协调—柔韧性。重新审视、挖掘体育舞蹈规定动作学习、专项技能习得、力量及体能训练等规律及对不同体育舞蹈专项特征的认知,转变传统训练理念及方法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功能性训练理念及内容方法与体育舞蹈专项特征不谋而合,如舞蹈动作质量要求与动作模式训练、舞伴间整体性连贯性要求与动力链训练的力量传递等。适时引入以功能性训练新理念,借鉴其基本与专项动作训练模式、训练方法,对于解决当前国内体育舞蹈运动员神经—肌肉及身体姿势控制水平较低、动作完成质量参差不齐、专项力量及体能水平较差等棘手问题大有裨益。

本文以拉丁舞为例,借鉴功能性动作训练等新兴训练理念及方法,转变对该项目特征及训练理论的认知观念,弥补体育舞蹈在专项力量、核心力量、姿势控制等训练方面的缺失,丰富体育舞蹈运动员体能训练的方法,提高竞技表现水平。

##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 (一)研究对象

择取 A 学院体育艺术系体育舞蹈专业(拉丁舞专项)各 10 名男女大学生在功能性训练干预下运动表现、专项动作及 FMS 分值变化特征。原则上以固定搭配的男女舞伴同步划入实验组或对照组;选取运动等级水平及训练年限无显著性差异的大学生

为样本对象。

### (二)研究方法

#### 1. 文献资料法

借助国内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美国体能协会 NSCA 等学会官方网站及文献数据库,检索“体育舞蹈”“拉丁舞”“功能性训练”“功能性动作筛查”等为主题及关键词的学术文献。为功能性动作训练干预拉丁舞专业大学生运动表现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择取及实验设计。

#### 2. 问卷调查法

借鉴拉丁舞评判标准的诸多要素及专项动作特征及 WDSF 的客观竞赛规则、主观认知理解等,邀请 5 位资深体育舞蹈国家级裁判员制定《拉丁舞技术动作专家评判表》、经重复信度与内容效度检验,作为拉丁舞专业大学生功能性动作训练干预前后(实验组、对照组)运动表现的专家评判及自我评价的定量化依据。其中每项评价内容指标分值介于 0~3 分。

#### 3. 实验测试法

(1) 拉丁舞功能性训练阶段性计划及专项课程设计

功能性训练干预拉丁舞专业大学生运动表现的训练计划划分为三个阶段<sup>[4]</sup>:学习适应阶段(1~3 周)、巩固提高阶段(4~6 周)、专项强化阶段(7~9 周)。每节专项训练课时间为 90 分钟,训练内容主要解决动作灵活性与稳定性、动作不对称、代偿及功能局限、基本与专项动作模式及纠正等问题。

#### (2) 功能性动作筛查

利用功能性动作筛查评估拉丁舞专业学生的运动表现。为避免随机及系统误差,制定较为客观及严谨的测试流程与要求。分别对干预前后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分三次隔天实施 FMS 测试,剔除实验过程中运动损伤学生的 FMS 数据,提高重复测量信度及避免动作熟练干扰。

### (三) 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借助 SPSS17.0 社会学统计软件及 Excel2003 办公软件,对功能性动作干预拉丁舞专业大学生(实验组、对照组)前后的 FMS 分值、运动表现及关联度予以数据收集整理与统计描述推断。

## 三、结果与分析

### (一) 功能性动作筛查与训练内容程序设计

功能性动作筛查(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 简称 FMS)是一项评估人体基本动作模式的实验测试,在运动损伤风险预测方面得到较为广泛的理论认可及实践验证,逐步形成较为系统的自我筛查和

动作模式及纠正操作范式,已拓展到体能训练、运动表现等领域。传统体能训练强调强度与负荷,侧重身体素质及生理机能评价,FMS立足于动作完成质量及模式规范评价运动表现的视角,是对传统体能训练的有益补充。功能性训练起源于20世纪末期运动康复及物理治疗领域,目前在大众健身健美、体能训练等邻域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基于人体“运动链”“动作模式”等理论认知的人体最佳运动表现功能性训练模式<sup>[5]</sup>。以功能性训练的稳定、肌力和爆发力三大训练核心内容为依据,划分对应的三个训练阶段,主要发展人体核心稳定训练、动态和静态平衡训练、柔软度训练以及阻力运动训练等。依据每个时期特定动作的发展顺序,采用系统化和渐进式的训练方式,经由不同时期的运动训练,实现既定的训练任务及目标,最终提高专项技术动作质量与运动表现水平。

## (二)功能性动作筛查(FMS)与运动表现间关联性

体能训练领域对功能性筛查的研究集中于FMS对运动损伤的预防、FMS分值与高风险运动人群功能性训练运动干预,其理论研究及实践操作环节业已成熟<sup>[4]</sup>、规范及产业化;功能性筛查对运动竞技表现的研究较少,针对拉丁舞针专业大学生FMS分值与其动作完成质量、艺术表现力等运动表现予以关联性探究缺乏研究样本数量的实证研究及结论观点迥异,为佐证先前FMS与运动表现关联度的质疑与争辩提供理论与实验设计基础。采用非参数肯德尔等级相关分析体育舞蹈专业学生FMS分值与专家对其运动表现评分,研究发现:Kendall系数为1.000,Correlational系数为0.861,Sig(2-tailed)值为0.04;实验组与对照组FMS总

表1 功能性训练干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FMS分值统计表

组别	人数	过顶深蹲	过栏跨步	前后分腿蹲	肩部灵活性	仰卧直膝抬腿	躯干稳定俯卧撑	躯干旋转稳定性	T	P
实验组	10	2.3±0.5	2.2±0.6	2.7±0.5	2.8±0.5	2.5±0.4	1.9±0.8	1.4±0.4	-1.10	0.28
对照组	10	1.7	2.2	2.3	2.8	2.5	1.3	1		

功能性训练干预前,FMS测试结果反映出样本对象缺乏腰腹及臀部躯干支柱力量、下肢及踝关节稳定性较差、身体两侧完成动作不完全对称问题。短期未出现伤病的假象及墨守成规的传统体能训练,将会导致运动慢性损伤及运动表现提升停滞。因此,在优先解决非对称问题的基础上,依次解决灵活及稳定性,如通过增强薄弱骨骼肌群力量纠正动作发力不对称及代偿、强化躯干核心肌群力量,增强身体稳定性及可控性、增加再生恢复训练环节以该改善身体局部与整体的灵活性。

分值与运动表现存在显著性高度相关,功能性动作训练干预FMS的评价分值存在理论上影响运动表现的可能性。20名体育舞蹈专业学生FMS分值较高者,其专家运动表现评分相对也高,其中女生整体表现优于男生。

## (三)实验前实验组、对照组功能性动作筛查(FMS)整体描述及比较分析

拉丁舞基本动作是提升体育舞蹈基本技术及艺术表现力的基础。研究发现功能性训练干预前体育舞蹈专业大学生FMS单个动作完成得分及总分值呈现如下特征:1.女生FMS总分值略高于男生,一方面源于女生的柔韧性优于男生,另一方面男生在双人配合中承担较多的推送、托举等高功率肌力输出的主导地位,其训练导致的运动损伤及疼痛感干扰到FMS测试的自我评判。2.体育舞蹈专业学生FMS总分均值高于14,相对于其他竞技运动项目较少存在运动损伤;支持FMS可以有效预测运动损伤风险,FMS<14属于低运动损伤风险的学术观点。3.单个动作测试得分,肩关节灵活性表现最优、其次为前后分腿蹲及仰卧直膝抬腿,最差的为旋转稳定性。究其原因是拉丁舞舞者以髋关节运动为主并表现出高度灵活性,部分躯干不稳定及因疼痛难以完成动作得分低者,与长期髋部动作代偿及不对称有关;仰卧直膝抬腿女生得分高于男生,缘于男生大腿后肌肉及韧带柔韧性不足;躯干稳定性俯卧撑及旋转稳定性动作测试中普遍表现较差,尤其女生表现更差,出现大量代偿动作及抖动现象,与腰腹、上肢及肩关节力量较差直接相关。4.除去肩关节活动度未发现非对称问题外,其他测试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对称问题。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FMS分值未呈现显著性差异(见表1)。

## (四)功能性训练前后实验与对照组功能性动作筛查比较分析

研究发现:功能性训练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FMS分值有所变化。1.单项动作测试得分及FMS总分值,实验组FMS均值都高于对照组。2.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仰卧直膝抬腿、前后分腿蹲及肩部灵活性未呈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3项动作测试得分接近满分3分;过顶深蹲、过栏跨步 $P<0.01$ 、属非常显著性差异;躯干稳定俯卧撑、躯干旋转稳定性 $P<0.05$ 呈现显著性差异。3.样本

在躯干稳定俯卧撑、躯干旋转稳定性两项动作完成测评得分上有大幅度提升,但与项目特征及实践要求仍有一定差距。一方面反映出大学生躯干力量薄弱及训练缺失;另一方面短期的神经肌肉控制及本体感受性训练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身体核心力量的羸弱,需要强化人体核心区域的绝对力量及增加骨骼肌横截面积。4. 肩部灵活性、前后分腿蹲及仰卧直膝抬腿两项动作测试实验前后都表现接近满分情形,反映出拉丁舞特定专项动作特征,对局部骨关节、骨骼肌群及韧带特殊的用进废退功能。5. 过顶深蹲动作测试得分较低,缘于长期穿高跟鞋,导致踝关节灵活性不足及深蹲动作完成困难。综上所述,经过为期9周的功能性训练,在FMS总分值上得以显著性提高,预示着运动损伤几率的减少及运动表现提升的可能。

#### (五) 功能性训练前后实验组、对照组功能性动作筛查比较分析

通过对实验组功能性训练前后配对样本  $T$  检验表明:1. 除去肩关节活动度测试(干预前后 FMS 都接近于满分3分),其余单项动作测试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实验组的动作测试得分提高幅度整体优于对照组。究其原因:一方面其从动作完成质量而非发展肌肉力量提升运动能力出发,专项训练内容更加契合 FMS 动作测试项目内容;另一方面其通过神经肌肉控制与本体感受性专项训练,能够弥补传统体能训练的短板,更符合“竞技即动作”的训练理念。2. 过栏跨步、躯干稳定俯卧撑两项动作测试训练前后呈现统计学意义上非常显著性差异( $P < 0.01$ );过顶深蹲、仰卧直膝抬腿、躯干旋转稳定性三项动作测试呈显著性差异( $P < 0.05$ );前后分腿蹲动作测试分值有所增加但未呈现显著性差异。

对照组功能性训练前后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1. 过顶深蹲、肩部灵活性两项动作测试得分未见改变。与提升空间不大有关;缺乏必要的恢复及再生训练,导致踝关节长期紧张及灵活性下降,使过顶深蹲动作功能局限及 FMS 分值较低。2. 过栏跨步、躯干旋转稳定性呈现负增长,一方面归结于核心力量缺失,另一方面是躯体应对旋转与位移时本体感受性存在调整误差及反射滞后。3. 其他动作测试得分都有不同程度提高但未见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性差异,分析原因是抗阻力训练使得代偿肌群力量得以提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动肌及深层小肌肉群力量欠缺。总体 FMS 分值提高较少预示着拉丁舞传统体能或专项训练课仍旧遵循高负荷大运动量的力量训练模式,使运动表现持续上升空间受限及运动

损伤风险加大的趋势;反映出针对四肢及大肌肉群予以抗阻力刺激的固化持续的力量及体能训练无法解决拉丁舞对神经肌肉控制下的协调性、本体感受性等技术专项特征的精细化的要求与专项体能需求,与浅层及小肌肉群、腰腹及臀部等核心力量供需脱节,使运动表现出现平台期过早及运动损伤发生的几率增加。

#### (六) 功能性训练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运动表现比较分析

表2 功能性训练后实验组与对照组运动表现比较分析统计表

运动表现	对照组	实验组	$T$	$P$
姿势控制	2.2±0.2	2.8±0.3	5.672	0.005**
动作完成质量	2.7±0.5	2.9±0.1	1.591	0.001**
动作难度	2.5±0.6	2.8±0.0	5.082	0.001**
动态平衡及转化	1.9±0.9	2.6±0.5	3.782	0.031*
双人配合技巧	2.5±0.4	2.9±0.0	1.424	0.032*
身体中心区域稳定性	1.8±0.8	2.8±0.4	2.756	0.023*
肌肉协调性及紧张度	2.8±0.4	2.9±0.0	1.213	0.017*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通过9周的实验训练干预,对实验与对照组两个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2)发现:1. 实验组运动表现水平平均高于对照组,其中姿势控制、动作难度及动作完成质量三项指标评判呈统计学意义上非常显著性差异,其余运动表现评判指标呈显著性差异。2. 功能性训练使单个技术动作完成质量、整体的身体姿势控制通过动作模式的纠正及规范化而显著性改善。3. 充沛的体能、良好的力量、精准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及本体感受性等综合素质,为习得高难度动作及动作组合提供了可能。4. 神经肌肉控制、本体感受性、腰腹及臀部核心肌肉力量等方面的改善在短期内难以一蹴而就。

## 四、结论与建议

### (一) 结论

1. 功能性训练的竞技表现训练分层模型、训练阶段划分及功能效用、训练课内容及方法与拉丁舞专项动作要求相似契合。2. 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 FMS 分值及运动表现都有不同程度提高,两者 FMS 分值及运动表现存在显著性差异。3. 与干预前后实验组 FMS 分值及运动表现存在较大幅度提高且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对照组在干预前后 FMS 分值及运动表现略有提高或下降且呈现显著性差异。4. 运动表现的整体性提升需要在动作完成质量及人体素质机能能力同步提高的基础上才会有所突破,功能性训练的整体观、竞技是动作、神经—肌肉—关节层面的精准训练是非常合适拉丁舞专项特征及竞技要求。

## (二) 建议

体育院校体育舞蹈专业及业余水平大学生由于参赛经历较少及专项竞技及训练质量水平较低等因素制约,今后应强化既定训练内容的生理刺激,适时引入躯干脊柱力量训练、臀肌激活、神经激活、再生恢复训练等训练内容;增加功能性训练课时比例。

### 参考文献:

- [1]何忠,许志琳. 体育舞蹈的运动技术特征及其专项力量训练[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8):67-70.  
[2]刘立,吴万哲. 国际标准舞运动生物力学基础知识[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 [3]Cook G. 动作—功能动作训练体系[M]. 张英波,梁林,等译.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1.  
[4]王瑞. 身体功能训练在拉丁舞训练中的应用[D].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3.  
[5]Gambetta V. 竞技能力的全面发展:身体功能训练的艺术与科学[M]. 刘宇,孙明运,等译.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许峻)

# A Study on Latin Dance Sports Performa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fic Movements and FMS Scores under Functional Training Intervention

DING Lirong

(Zhengzhou Adult Education Research Office,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As a difficult aesthetic discipline, physical dance poses new requirement for strength and physical training methods in terms of competition rules, judging criteria, specific movements and load intensity. The lack of academic attention and misalignment in this field has led to a lack of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methodological manipulation in training practice. In light of thi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functional training and traditional training interventions on 20 male and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in Latin Dance, using qualitative descriptions and quantitative inferences by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s, experimental test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Latin Dance movement technologies present a high degree of movement coordination, movement power based on explosive power, power chain and power transmission, and hip joint movement. 2.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training performance model, the nine-week functional train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FMS score and athletic performance level. 3. Kendall'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M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Latin dance students' athletic performance, supporting previous view of FMS predicting athletic injury and performance. 4. Two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MS scores between the pre-intervention and control groups, with an overall lack of strength in the trunk pillars at the waist, abdomen and hips, poor stability in the lower limbs and ankle joints, and incomplete symmetry of movement on both sides of the body. 5. The two paired sample T-tests showed that the FM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increased to different degrees before and after athletic interventions (excluding the over-stride and trunk rotation stability of the control group). 6. The expert questionnaire found that both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showed different degrees of improvement in exercise performance,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improvement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exercise performance.

**Key words:** Latin Dance; 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ing; sports performance; exercise intervention